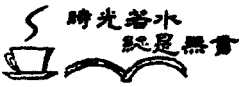
中国集邮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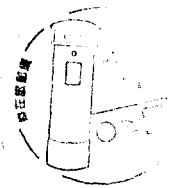
李毅民 编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国集邮史话

李毅民 编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文献资料为基础，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我国100多年的集邮历史概况，内容涉及清代、民国和新中国（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的集邮组织、集邮活动、集邮家、邮商、集邮书刊、国际交往等方面，从中可以看出集邮事业在中国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和特点，以及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本书史料性、可读性强，填补了我国集邮史书的空白。

中国集邮史话

zhongguo jiyou shihua

李毅民　编著

责任编辑：许庆发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崇文区夕照寺街14号

北京顺义振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本：850×1168　1/32　1993年8月　第1版

印张：10.75　　1997年6月　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283千字　　印数：6 001－12 000册

ISBN7-115-04958-0/G・240

定价：14.00元

序

集邮是一项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群众文化活动。在世界上，它的发展历史几乎和邮票发行历史一样悠久。在中国，它的出现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而且经历了比其他国家更为曲折的进程。

由于长期遭受外来侵略和战乱，中国集邮史也如同中国邮票史一样，历史背景复杂，缺乏系统资料，疑点悬案颇多，给集邮研究工作者带来许多困难。虽有不少集邮者不断探索，但从总体上看，与中国邮票史的研究相比，中国集邮史仍是较为薄弱的研究领域，至今还没有一部有关集邮史的通论著作。《中国集邮史话》汇辑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集邮史资料，对完成前人未竟的事业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这本书的特点在于重视和尊重历史资料，无论取自历史文献，还是老集邮家的回忆，都注意做到有根有据，不主观臆断，不回避集邮活动中的某些阴暗面。在对各种史料反复研究考证的基础上，作者还提出一些见解。对中国集邮发展各历史时期的评价，对早期在华外国集邮者的作为，对一些重要集邮团体和集邮家的地位等，分析得都比较细致。

历史虽然是客观事实，但需要经过人们的主观认识才能反映。一种观点、一部著作，从无到有，从不成熟到成熟，需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相信《中国集邮史话》出版后，在集邮界的关心和支持下，一定能够得到逐步完善和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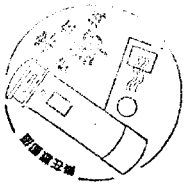
本书作者李毅民同志刚过不惑之年。他为了完成这部书的写作，历时数年，四易其稿，付出了十分艰辛的劳动。在撰稿中，他多次请教我国老一辈集邮家，得到张包子俊、钟韵玉等同志的具体帮助和指导。我有幸从本书初稿起阅读多次，深感作者对历史负责的严谨态度和多方探索、力求史料翔实准确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李毅民同志的父亲李振华同志是一位老集邮家，他的最大爱好

是集邮和藏书。李毅民幼秉家教，近年笔耕不辍，成为集邮界的后起之秀。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事。由此我也联想到，我国的集邮文化要不断向前发展，必须要有大批的接班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我深信此书的出版当为弘扬集邮文化作出积极贡献，谨为之序。

李容于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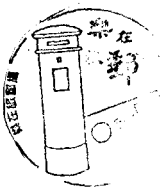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清代在华外籍人士的集邮活动…… (1)
　第一节　从鸦片战争到“大龙”邮票…… (1)
　第二节　为所欲为…… (6)
　第三节　形形色色的集邮者…… (9)
　第四节　毁誉纷纭 …… (14)
第二章　民国初期的集邮活动 …… (20)
　第一节　外侨邮会和邮商 …… (20)
　第二节　最早的中国集邮者 …… (25)
　第三节　少年邮迷 …… (32)
第三章　20—30年代的集邮活动 …… (37)
　第一节　沪杭邮会 …… (37)
　第二节　“邮王”周今觉 …… (48)
　第三节　上海、苏州的集邮图书和邮商…… (55)
　第四节　北平邮市 …… (63)
　第五节　天津邮坛 …… (68)
　第六节　走向全国各地 …… (71)
　第七节　三足鼎立 …… (83)
第四章　抗战期间的集邮活动 …… (90)
　第一节　沦陷区内 …… (90)
　第二节　“孤岛”集邮热…… (100)
　第三节　在大后方…… (107)
第五章　40年代后期的集邮活动 …… (117)
　第一节　集邮著作与邮展…… (117)
　第二节　寒风笼罩的一阵热潮…… (127)

第三节　旧中国集邮纵谈……（136）
第六章　解放区邮票的早期收集……（144）
第一节　解放区的收藏者……（144）
第二节　敌占区的收集热……（151）
第七章　中国集邮的新时代……（156）
第一节　崭新的风貌……（156）
第二节　邮人、邮商、邮展……（161）
第三节　集邮公司和书刊……（172）
第四节　普及的东风……（181）
第五节　一叶知秋……（190）
第八章　史无前例的浩劫……（195）
第一节　雪压冬云……（195）
第二节　冰下潜流……（200）
第三节　历史的沉思……（204）
第九章　集邮史的新篇章……（207）
第一节　空前的集邮热……（207）
第二节　全国邮联与邮展……（215）
第三节　百花齐放……（221）
第四节　百家争鸣……（232）
第五节　学术研究的硕果……（244）
第六节　跻身世界……（253）
第七节　邮市风波与新闻热潮……（259）
第十章　华邮牵动同胞心……（270）
第一节　海峡彼岸……（270）
第二节　来鸿去雁……（275）
第三节　携手共攀登……（286）
第四节　港澳邮坛……（292）
第十一章　方寸百年话沧桑……（301）
第一节　中华邮魂……（301）

第二节　新的起点…… (303)
附录　中国集邮大事记…… (310)
后记…… (331)



第一章　清代在华外籍人士的集邮活动

第一节　从鸦片战争到“大龙”邮票

1840年是个不平凡的年头。

这年5月6日，世界第一枚邮票——“黑便士”在英国诞生。这在世界邮政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842年10月29日，英国《泰晤士报》上曾报道过一位少妇想用全部用过的邮票裱糊化妆室的新闻。当时邮票问世不久，这位女郎用邮票糊墙的时髦爱好还不能称为真正的集邮。在邮票发明使用10年之后的1850年，英国的全部邮件中贴邮票寄出的只占50%，其余的仍在邮局窗口交付现金寄出。尽管如此，从那时起集邮就开始在欧洲大陆流行起来了。

1852年，比利时地理学家温地美伦在该国首都布鲁塞尔用镜框陈列出88种邮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邮票展览。1856年，英国人吉本斯开办了首家邮票商店。1863年著名的英国《吉本斯邮票目录》和美国《斯科特邮票目录》首次出版。

1865年，法国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集邮团体。1869年，“英国皇家集邮会”成立。

此时正值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扩张、瓜分世界的时代。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1842年8月，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开放口岸。英帝国的炮舰轰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国门，中国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由此翻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

与此同时，征服世界的邮票，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军事和经济侵略

一齐向中国袭来。

1868年(同治七年),清朝人士张德彝曾赴欧洲,见闻有感,在其一则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闻英国于二、三年前,有种陋俗,凡收得信票者,张贴壁上。以多为贵,相习成风。女子有因无许多信票而不得嫁者。据艾教习云,有贫妪吴姓者,应得欠款一百二十两,非有百万旧信票不能得,以故众人集得万余张送去。"(《集邮研究》1984年第3期)"信票"即中国人当时对邮票的称呼。在这段难得的文字中,看到欧洲人爱邮票竟爱到如此地步:无它出不了嫁,收不回款。张德彝认为这是荒唐可笑的,讥之为"陋俗"。

张德彝(1847—1918年),本名德明,字在初,是中国第一所外国语学校——京师同文馆的毕业生,1868年赴欧留学。1870年,中国发生了天津教案,他作为译员,随五口通商大臣崇原前往法国赔礼道歉,还亲身经历了巴黎公社起义。1876年,张德彝任中国第一位出使英国的大臣郭嵩焘的翻译,成为常驻西方外交官。"大龙"邮票发行前一年,受国内委托,郭、张二人还专程参观考察过英国伦敦的邮票印刷和发行情况。这番经历张德彝亦一一记入自己的日记。后来他将这些日记整理成《欧美游记》,其中的"再述奇"篇,就载有前边引述的那则日记,这是中国人最早记述集邮活动的资料。

然而少见难免多怪,这样一位喝过洋墨水,比较熟悉西方事物的学者,对欧洲人收集邮票尚且如此不可理解、无法接受,一般人更可想而知了。

1878年在法国巴黎举行了世界上第一次国际集邮会议。可惜直到这时,中国才开始发行邮票。

1878年7月,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诞生(图1)。但是,这个貌似神圣的"大龙",也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

从1840年鸦片战争订立《南京条约》起,清政府海关就由外国人管理。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更写明"大英钦差大臣并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行李囊箱,不得有人擅自开拆,由沿海无论何处均可送文。专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此后中俄、

中法条约中也有类似条款。从此，清政府承担了保护外国公使随员所派邮差在中国自由往来的责任。当中国爆发捻军及太平天国起义时，清政府怕发生途中遗失毁损外国邮件的纠纷，1866 年 12 月起，干脆把邮政大权完全拱手交给外国人去办。

图 1 "大龙"邮票

1878 年发行"大龙"邮票时，邮政由海关兼办，为英国人把持。直到 1896 年 3 月 20 日，光绪皇帝才批准李鸿章的奏折，正式开办大清邮政，设立邮局(图 2)。然而，清王朝 34 年的邮政大权始终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图 2 1890 年的上海"江海关"钟楼和大清邮政官局办公楼

清政府邮政大权被外国控制之严重，从当年各种邮戳上的文字明显表现出来。据著名清代邮戳研究家孙君毅统计，清朝海关邮政时期所用的主要邮戳和戳记中，全部用英文的占 80%多，全部用中文的不到 15%，其余的为中英文并用。丧权辱国，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第一套邮票为什么要以"龙"为图案？

龙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图腾。统治者以龙作为帝王权威的象征，自诩"真龙天子"。炎黄子孙也以"龙的传人"自居。清政府曾将龙旗作为国旗。

有感于此，"大龙"邮票的设计者中西结合，不照搬别国模式；与

世界上许多国家早期邮票都以君主头像为图案相比，同是宣扬皇权，中国选用的龙图案与众不同，别具一格。它显示出浓厚的民族特色，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当年一般的中国人还把邮票叫做“龙头”。

“大龙”邮票发行的时候，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近代邮政刚处于试办阶段，以致造成许多混乱，连个“大龙”的生日也成了悬案。它的确切发行日期，100多年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给中国几代集邮者们造成了莫大的遗憾。

操纵着中国邮政大权的外国官员，为了讨得清朝统治者的欢心，耍了许多花招。1894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爱国将士抗敌节节失利的时候，腐败的清政府却在北京隆重庆贺慈禧太后60寿辰。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也献计，于11月发行了一套纪念慈禧太后60寿辰邮票，俗称“万寿票”。

这套由外国人设计和承印的邮票，在印制中故意搞出一些变体邮票，以便他们混水摸鱼，牟取私利。当时的上海海关造册处长、德国人莫仑道夫甚至随意用其他纸张印制“万寿邮票”，人为制造出所谓“莫仑道夫版”。

1896年8月（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李鸿章向皇帝上奏的“总理衙门遵义兴办邮政折”中说：“光绪十九年，葛显礼（英国人）呈送万国邮政条例，联约者六十余国。大端以先购‘图记纸’粘贴信面送局，以抵信资。其实，每封口信，重五钱，取银四分，远近酌加，其取资既微，又有定期而无遗拆。百货腾跌，万里起居，随时经达。……为利商利民即以利国之要政也。”又在“邮政开办章程”的“征收信资”款中说：“邮政局须制造信票以便粘贴信面作为寄送外国暨通商各口之信资。”“信票系在各处邮政局并邮政局托售之铺店等处均可购买。”（《江苏集邮》1985年1期）这里，把邮票称为“图记纸”和“信票”，反映出当时中国从皇帝到重臣们对邮票的认识才刚启蒙。

清朝发行的邮票当时在中国境内境外都不能畅通地使用。贴“大龙”邮票的邮件寄往内地，须由海关邮局转交民信局。由于中国不是国际邮联成员，寄往国外的邮件，须由海关邮局转交外国在华邮局

(客邮)办理。贴"大龙"邮票的实寄邮件竟受到如此冷遇,实在可悲。

"大清邮政"成立后,直到1900年左右,全国各城镇才陆续成立二等邮局,仅几个大城市设立了一等邮局。邮局设立之前,民间(包括一些商号)捎寄信件多委托民信局寄送。直到30年代初,虽已设有邮局,老百姓仍旧习惯委托民信局送信。这种信件上不贴邮票,只盖民信局字号的木戳,在信封上写明"酒力已付讫"字样即可。所以,清末民初,绝大多数中国人,连寄信都没有接触过邮票,更不可能会想到集邮。另外,当年这种不贴邮票的民信局实寄封,亦未引起早期集邮者的注意,收集的人很少,故存世不多。

直到40年代,在天津等地的邮票社,封贱票贵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尤其是不贴邮票的民信局封、驿站信封,价格很低,有时成捆出售,常常无人问津。集邮家吴国华当年独具慧眼,将注意力投向实寄封的收集,大量购进。他收藏的驿站封和民信局封、文报局封不下百件,成就显著。

1888年5月(清光绪十四年),台湾邮政总局发行台湾"邮政商票"邮票,供民商通信贴用。但这种邮票还有个特殊用途,即购了票可以不寄信,照章交付另加的费用后,可作为台湾铁路火车票使用。当时台湾台北至土林的铁路正式竣工通车,因中法战争刚结束,火车票一时印不出来。为应付急需,铁路部门与邮政署协商,决定用该邮票代替火车票使用。这无论如何还是为后人创造了一种趣味邮品。

1909年(清宣统元年),江南苏浙等省在上海张园举办了一次大型出口商品博览会——"南洋劝业会"。举办如此规模的展览会,为清末首举。为此,清朝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曾代奏清朝税务司,请求发行1套纪念邮票。但清朝邮票发行部门经请示后,以"特别邮票应用为国家大典纪念",而"南洋劝业会究系一隅开会之事,未足称国家大典"为理由,批复此事"应无庸议",加以拒绝。(《集邮研究》1989年2期)。

清朝邮政共发行邮票26套、172枚(不包括客邮、商埠和地方邮票),其中15枚是海关试办邮政发行的邮票。在这些清代邮票中可算

作纪念邮票的只有两套：一套是为慈禧皇太后祝寿，一套是为纪念宣统皇帝登基。

第二节　为所欲为

邮政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旧中国，中国的邮政权却被外国人长期侵占，任意践踏。中国国土上先后出现了“客邮”、“商埠邮票”等，在中国邮政史上留下丧权辱国的烙印。

1834 年，英国首先在广州开办了一所英国邮局，专为在广州贩卖鸦片的英国走私商人和侵略军服务。1842 年英国又在香港开办邮局，以后扩展到我国各通商口岸。法、美、俄、日、德、意、比等国也先后在中国沿海和内地城市设置邮局。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邮政机构，还美其名曰“客邮”。

中国加入万国邮联之前，凡是由中国寄往国外的信函，寄信者必须先将信件贴足邮资交中国邮局。中国邮局收到该信后，照贴与华邮同等数值的客邮邮票，就近送往有客邮的商埠，交客邮邮局，转寄各国。这些在华客邮，有的国家发行了一些印有中国国名或地名的邮票，大多数则直接使用本国邮票加盖“中国”等字样。在中国的土地上邮件同时使用着 8 个国家发行的邮票，俨然国中之国。

此外，各国驻华领事馆、租界工部局、外国人团体，甚至私人还擅自在中国 11 个商埠城市设立“书信馆”，并发行邮票。1863 年，上海工部局成立书信馆，1865 年开始发行大龙图案邮票。随后设在汉口、烟台、重庆、南京等 10 余处书信馆都自行发行邮票。这些邮票被称为“商埠邮票”，只限在 11 个城市书信馆收寄的信件上贴用或是在商埠之间传递信函时使用。

这种商埠邮局没有相应的上级业务部门，有的纯粹是挂邮局招牌行滥印邮票投机牟利的勾当。更荒唐可笑的是，像重庆、芜湖等地的书信馆，竟完全由个人随意开设。例如，上海英文《字林西报》曾刊登一则通告：“我，葛雷森，从本月 1 日起委派我自己为芜湖本地邮局

局长。此告，1894年7月4日于芜湖。”真是明目张胆，利欲薰心。

在19世纪60—90年代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境内有客邮和书信馆两种外国的邮政机构，加上中国海关邮政和地方民信局，一个国家竟有4种邮政机构同时并存，可见国家之混乱、清政府之腐败程度。

当上海、武汉等地书信馆发行邮票时，在华外国人集邮之风已很盛行。大量的邮票为外国人购去收藏，国外的邮商也托在华外侨代为争购。这种情景也成了其他商埠纷纷自办邮政的重要原因之一。厦门商埠邮票发行后，由于集邮者抢购，半分面值邮票不久全部售完，只得在加印的同时，将高值票加盖暂作半分票应急。芜湖、九江、镇江等书信馆发行的邮票则完全以敛钱为目的，大量提供给外国投机家。有的转手以数倍的价格售给国外邮商，有的把低面值邮票全部买下囤积，等到集邮者配套时，索价几十倍，转瞬暴利。1897年当各地书信馆奉令停办时，九江、重[illegible]芜湖三埠还将所剩余的邮票全部按面值折价售给邮商。

在一些商埠邮票的印制过程中，还发生大肆作弊的事件，声名狼藉。1894—1897年，德国人费拉尔先后为镇江工部局书信馆承办设计印制6套邮票。他采取内外勾结的手段，人为制造出无奇不有的异体票，然后以“珍邮”出售。这种肆无忌惮的营私舞弊，令人震惊。美国邮商李文斯顿在1949年1月出版的《美国集邮总会杂志》第25卷第3期上撰文指出：“镇江票的合约交给一家称为叶子云的印刷铺，也就是费拉尔一向为海关交办印件的那一家铺子。而这店铺老板只是听命于费拉尔而已，要怎么印就怎么印，似乎这印刷铺是他自己开的。”凡此种种作法，在国际集邮界引起极大非议。

1897年，由邮商和集邮家组成的“英国防止投机邮票会”曾发表文章对此大加指责，认为中国商埠邮票的发行目的纯属投机性质。由于该会意见很受集邮界重视，使商埠邮票在国际邮票市场身价一落千丈，无人问津。对指望囤积发财的商埠票经营者是极沉重的打击，降价至一折仍难以出手，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位在华的早期集邮家司开甲（英国人），在公共机关任职几十年，把半生积蓄倾覆

于商埠票中。遭此惊涛骇浪几乎陷入绝境，导致他一生的集邮事业无大成就。名落孙山的商埠邮票从此不被集邮家重视，难登大雅之堂。

美国著名的《斯科特世界邮票目录》1928年版，中国商埠邮票全部罗列在内，到30年代出版的目录中，仅列上海一埠邮票，其余全部删去。

列强的种种侵略中国主权罪行，极大地刺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对于外国人在中国的邮政领域各自为政、为所欲为的行径，中国集邮界一向深恶痛绝。中国集邮界一直把客邮邮票和商埠邮票视为外国邮品，不入国邮专集。长期以来，中国邮票目录也一概不正式收录。

客邮和商埠邮票在中国的出现，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它们都是历史的产物、国耻的见证。收集和研究它们，不仅是满足集邮的需要，还能发人深省，让国人毋忘昨天。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一些有远见卓识的集邮家，从未放弃对商埠邮票的研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陈复祥是中国第一位研究商埠邮票史的专家。他的著作《中国商埠邮票史》在《新光》邮刊上连载数年，资料详尽，蔚为大观。

对于中国商埠邮票是否是正式邮票，有无收藏研究价值等问题，陈复祥有独到的见解：

“盖吾人搜藏邮票之主旨，完全以邮票之有无历史价值为依归，行用之正为取舍。故商埠票之创办，尚在吾国未办正式邮政之前，此在中国邮史上，实占极重之位置。即就邮票本身而言之，当发售时，均经正当手续即为明证。他如欠资之行用，暂作之加盖，水印之印制，明片封片之设置，无莫非循邮章而订之。其后虽有若干邮票，因停用而拍卖，但实不足为病。又缘国人谬于世界各大邮票公司年鉴之不录，并不热心搜集之。实觉有过信外国书本之成见矣。或谓商埠票在当时颇有藉为敛钱投机而作者。然则世界各国藉其国人之集邮而增加国家收入者，大至美国，亦所难免。”

陈复祥不仅周密考证记述了全部商埠邮票的发行经过和版模等

特征，而且深刻剖析揭示了商埠邮票产生的背景及其在集邮研究中的历史价值。这部堪称经典之作的问世，意义深远，成为宝贵的集邮文献。

史济宏是另一位商埠邮票专家。他集30多年研究的专著《中国商埠邮票及邮政史》，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认为“商埠邮票”应称之为“中国不平等条约商埠邮票”，才能说明它们的政治历史实质。

帝国主义者长期宣扬：他们对殖民地的统治，给殖民地人民带来文明。还有人曾经断言，生活在殖民化社会的人会产生一种殖民地性格：奴颜和自卑。综观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所做所为，完全是强盗的文明，是对中华文明的蹂躏。中国人民绝不会感激他们的侵略和剥削，中国集邮者将永远铭记历史告诉我们的教训：民族独立是发展民族文化的基本条件。

第三节　形形色色的集邮者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经济文化的侵入，集邮——这种时髦的嗜好，也逐渐从西方舶来，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曲折地蔓延。

清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十三日，上海的《申报》刊登一则收购邮票的广告。全文是：“收买信封老人头：工部局书信馆人头每百个价二角；海关人头每百个价二角；东洋人头每百个价三角。如送至今泰兴洋行内哈立斯收取即可付价。他国之信封人头亦可收买。”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五月三日，《申报》上又登出一则类似广告：“收买信面旧人头：启者现欲收买中国信封上所用过之旧人头，每百张愿出洋五角。如有出售者，请至海关营造处与沙孟先生面议可也。此布。”

这是最早见于中国报刊有关集邮的资料。“人头”即指邮票。当时中国人还都不知道“邮票”这个名词。因为中国清朝早期邮票多以龙为图案，而各国邮票则大都以君王或名人胸像为图，所以人们泛称华邮为“龙头”，外邮则取名“人头”。当年中国人看到这些广告感到很

奇怪，谣传收购旧邮票是外国人能以特别的药水洗去邮戳，重当新票用，所以才出这么高的价钱收废票。（当时，1 角钱可兑换制钱 96 文，而猪肉每斤 12 文，面粉每斤 5 文）可叹东方的巨龙在沉睡，不知多少有价值的珍贵邮品被外人捆载而去。

1880 年 6 月，由上海基督教会清心堂出版的《花图新报》第 3 卷刊登了一篇 600 多字的短文《各国信馆之印图》。文中在介绍了发行和使用邮票的方法和优越性之后，进一步讲述：

“考信印之设肇自英国，于一千八百四十年，始用蓝色黑色之信封，经六月后觉不便，乃易以黑色之信印，现有博古之人，欲觅其蓝色黑色之信封，已无有矣。至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始五色定价目，如洋二分则用红色；四分则用蓝色；六分则用淡红；八分则用桃红；一角二分则用雪青；一角八分则用黄色；二角则用褐色；二角四分则用绿色。此制至今不改。法国则起于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后各国亦接踵而起，俄国亦于是年举行。现用此法者，有一百三十国，各国花样不同，有炮台者，又有鹰、鹅、马、锁匙、客寓等，不可枚举，约共一千四五百种。西国人喜将各种信印聚而贴于无字之簿上，以教其子女，俾其童而习之，不至误用，其无字之簿，装潢好看，并有讲解，使小孩乐于观看，亦启迪蒙童之道也。”

该文还附有中外 22 个国家 1880 年使用邮票的图案，并一一注明国名。文中称邮票为“印图”、“国印”、“信印”也很新鲜；称集邮爱好者为“博古之人”，集邮册为“无字之簿”，更为雅致。文中虽然认为让儿童观看邮票册是为了教其“不至误用”，说明对集邮的特有魅力尚未完全理解，但仍当属国内最早向群众宣传提倡集邮的文章。外国在中国的教会组织也从事集邮知识宣传是不奇怪的，因为当年在中国的许多传教士都喜爱集邮。

中国的集邮活动始于何时，一直是个令人关注、尚难定论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困难在于，一方面有关早期集邮活动的文字记载史料极少，云遮雾障；另一方面清末年间中国人参与集邮者寥若晨星。如今，对大量在华外国集邮者的活动究竟该如何看待？显然，首

先必须明确研究的对象范围，才能据此研究起始时间。

中国集邮史研究可以有两个范畴：一是凡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集邮活动全部包括在内；一是仅以中国人从事的集邮活动为限，将外国人的在华集邮活动排除在外。实际上应该以前者为准。因为中国当年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大量外国人在华不是作短暂的停留，他们中的集邮者许多人在中国长期工作和侨居，而且中国早期的邮票发行大权和集邮市场又全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部中国集邮史如同中国邮票史一样，缺少了早期在华外国人的活动情况，便难以说得清其复杂背景的来龙去脉。耻辱、创伤也是历史，我们应该全面客观地正视。因此，这里研究的是中国集邮史，而不仅是中国人集邮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集邮活动是19世纪后期从上海、天津、香港等几个通商口岸开始的。当时集邮者基本全是外国人，其中有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商人、企业家、银行家、传教士、教师、工程师等，有一些驻华外交人员和把持清政府海关、邮政、铁路大权的外籍官员，以及在华租界区的外国官员、驻军和侨民。他们完全秉承了当时欧美流行的集邮理论思想、收集内容和研究方法，对中国早期集邮活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既带来大批国外邮品，也寄出或带走大量中国早期珍邮。

例如，有一种产生于清末的被集邮界称为“莫斯”封的著名集邮品。莫斯（德国人）曾在清朝中国海关邮政部门任职。在1898—1906年期间，莫斯曾先后到过广州、梧州、吴淞、厦门、上海、天津、胶州等地。所到之处，他均通过当地邮局向德国大量寄发专为集邮之用的信件。据估计现存世仍达1000余枚。因为这批实寄封上写的收信人均为莫斯，集邮界故称其为“莫斯”封。

这批实寄封最大的特点是除部分贴用清蟠龙邮票外，多数封贴用的是已停售、停用的早期邮票，有时还贴用十分罕见的变体票。不仅在同一信封上，将同值不同版的邮票共贴，而且每枚封所贴邮资额，大都超过邮政函件资费规定，甚至超过若干倍。这些实寄封虽然

纯属集邮者人为制作的集邮品，由于封上贴有中国早期珍罕邮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所以，长期以来仍为中外集邮家所瞩目。

集邮家姜治方回忆他30年代在比利时的见闻时谈到："在中国北方几省着力传播教义的正是比利时传教士。这些人又普遍集邮。我认识的一位老神父是19世纪80年代后期到中国，在甘肃住20多年。他收藏的中国老邮票之丰富，使人惊叹。还有一个靠在中国掠购成富的前比利时驻华使馆卫队长，在北京时就每天跑古董店，购置古玩、瓷器、字画，也到邮局买中国邮票囤积。此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回国，他携带的十多箱笨重行李，都是中国珍贵木器、地毯、古董，还有大量邮票。"

英籍德国人德璀琳1877年起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兼管邮政。他凭借权势，大肆搜罗中国早期珍贵邮票。他的邮集中有各时期"大龙"的整张票；"小龙"、"万寿"和各种加盖票多有全格或全张；红印花加盖票中只缺小字壹元；各种珍罕变体票也很丰富。1913年，德璀琳去世后，其女儿不了解这部邮集的珍贵性，30年代后期陆续将集中的外国票和中国票在德国和中国出售。

19世纪末，天津法租界紫竹林菜市场内的洋货摊上，已经有几家出售外国邮票的摊贩，用玻璃镜框装着各种邮票，供外国集邮者选购。1909年，福州"世界邮票社"在道山铺4号开业。中国各商埠城市早年出现的邮商、邮店，都是为适应外国集邮者的需求逐步发展起来的。

清末，在华的外国人对集邮具有相当丰富的知识。他们还经常利用中国邮政人员的幼稚和无知，制造一些珍奇的变体邮品，从中牟利。现在清代珍邮中，大部分有外国人从中捣鬼的痕迹。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10月22至24日，福州邮局将蟠龙无水印红2分邮票沿对角线一剪为二，代替1分邮票使用。传说当时因上海往福州运送邮票之轮船，在海上被飓风所阻，福州缺乏1分邮票。外籍局长遂用对剖票应急。这就是著名的"福州对剖票"(也称"飓风票")。集邮界视其实寄封为稀有品。该票虽仅使用3天，但大量外国

集邮者纷纷来邮局寄信或请求销印，一时出现内外勾结、中西合作的搜购热潮，谁都不愿放过这难得的发财机会。有些人几十、上百封地销印，因书写匆忙，有的连地址、姓名也没写全。还有的想不出姓名，就把基督教十二使徒的名字写上了。更有甚者，有人竟把“钢笔”、“铅笔”、“墨水”、“日记簿”等作为寄件人姓名。收件人竟写成“哈哈先生”等，洋相百出。

据说，福州对剖票的出现是由一名俄国邮商“导演”的闹剧。根据气象资料表明，那年 10 月该地区根本没有飓风来袭。邮局内一些中国人看到外国人如此热衷，意识到这些信封一定有利可图，有的人甚至事后伪造，结果使这种原出自人为加工的“邮品”，又陷入了伪造品的包围。

制作福州对剖票赝品最能乱真的首推当年福州邮局职员谢选卿。他私刻日戳，先后制作几千枚伪造封。他甚至发动全家，将新封一一悬挂室外，任其风吹日晒，迅速变色，赶制赝品应市，后因事发离职。谢临死前在遗嘱中说：“福州对剖票极受中外人士重视，余原有 5 千余枚，除赠送售出外，尚余 1900 枚，分作三份遗给三个儿子。”

由此可见，清末年间，受外国人集邮风气的影响，一批中国人已开始认识到集邮品的特殊“价值”，并想尽办法以此作为谋生发财的手段。个别人以洋“倒爷”为师，不惜违法乱纪。

当时，在华外国人集邮的人数众多，热情极高，在香港还发生过一起为集邮挤死人的惨案。

1891 年 1 月 22 日，香港发行第一套纪念邮票“香港开埠 50 周年纪念”。当天，香港邮政局门口挤满了排队购买邮票的各国集邮者。由于邮局后来将每人限购数由 25 枚减至 20 枚，许多排在后面的邮迷争先恐后地往前拥挤，秩序大乱，结果造成 2 名葡萄牙人被挤死，1 名荷兰水兵被击毙的惨剧。

外国集邮者在中国的大量涌现，造成中国早期邮票特别是一些珍罕变体票的大量外流。集邮家姜治方 20 年代在国外收集华邮时，曾发出早期华邮国外多于国内的感叹。被中国人视为一钱不值的废

物，被外国人随便收集，寄回本国成了宝贝。近代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是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

第四节　毁誉纷纭

中国近代邮政的建立，借鉴了西方邮政制度的模式和经验。在中国邮票诞生和集邮初创的时候，有许多在海关邮政身居要职的外国人，抱着不同的目的，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热爱集邮，利用职务之便公开或暗地里大肆搜集各种华邮珍品。近水楼台先得月，其中一些人因此成为拥有大批珍罕孤品的集邮家。其他官员即使自己不集邮，一般也具有集邮常识，随时留意收存邮票，或馈赠亲朋，或取悦上司，以博他人之欢。

清代中国的集邮者基本全是外国人，海关邮政的外籍官员普遍从事邮票收集是一大特点。因此，他们在邮票设计、印制、发行、管理中的指导思想和方式方法，除了能使中国当权者接受以外，更多考虑的还是满足在华外籍集邮者的需要。他们的所作所为，造成中国珍邮大量外流。他们是“播火者”，许多还是“窃火者”。

“大龙”邮票发行的主持者是英国人赫德（1835－1911 年）（图 3），中文名字赫鹭宾。赫德从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毕业后进入英国外交部。1854 年来华，仅用 4 年时间学习中文就达到了运用自如程度。1863 年起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1865 年清政府把原由中国驿站代寄的信件，交由总税务司办理。1878 年清政府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 5 处设立信管局，亦交赫德办理，于是成立海关邮政局，并发行了“大龙”邮票。

1896 年清政府核准海关总税务司拟定的 44 条大清邮政章程建议，准许海关所办邮务扩充，成立国家邮政，仍由赫德兼任总邮政司。因此，赫德自 1865－1911 年的 37 年里，实际掌管着中国的邮政大权，并负责主持了中国第一套邮票的设计发行。

赫德的一生几乎都在中国度过。在清朝，他先后参与了中国税

务、邮政、外交、钱币等一系列管理事务及一些对外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做为"客卿",官至海关总税务司,阶至头品顶戴,衔至尚书,加"太子太保",高官厚禄,荣耀非常。在英国,他被皇家授予男爵称号,声名显赫,衣锦还乡。赫德本人爱好集邮,曾利用职权之便,拥有许多早期华邮珍品,如"大龙"样票等。他去世后,所遗邮集在英国出售。由海关、邮政、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筹办,1914 年 5 月 25 日赫德铜像在上海外滩树起。

图 3　清朝总税务司兼办邮政的英国人赫德

对赫德在清政府中的历史作用,人们长期褒贬不一,争议很大。有人对他"引创新邮、建立海关"等推崇备至:"其居官也,明示身份,坚守立埸,以中国政府为服务对象,不因国籍而自生外心。其参赞交涉也,审情度势,谨言慎行,未尝露才扬己,包揽把持。"有人对他大加指责:"阴鸷专利,常内西人而外中国"。清末,举凡丧权辱国的对外交涉,赫德奉命居间调停,几无役不从,使中国受损蒙羞。

台湾集邮界对赫德一直评价较高。晏星在其编著的《赫德史话》中说赫德"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可以说在一部中国现代史中假使抽去了赫德这一人物,整个的历史面貌势将改观。"

台湾邮政当局 1985 年 2 月 15 日发行了 1 套"赫德诞生 150 年纪念"邮票。图案是赫德半身像及其签名,背底是"大龙"邮票,以表彰他开创中国新式邮政制度的贡献。

在大陆,人们对赫德完全持否定态度,从不认为他对中国有什么功劳可言。在一些书刊中称:"此人对中国邮政大权早有野心。尽管海关同邮政在性质上毫不相干,但当清政府把寄送信件一事交他办

理时，他便一口答应下来。"(《中国的邮票》，1985年版)赫德是"英国侵华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863—1911年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从控制海关发展到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1866年起越权办理海关邮政。"(《集邮词典》，1988年版)

如今海峡两岸集邮界交流尚未大开，赫德这个"大龙"的洋管家虽是风云人物，但究竟是"功臣"还是"罪人"，难以统一定论。桂冠和恶名他还得同时再戴着。但无论如何，他在中国开办近代邮政中起过重要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对于清朝海关邮政的外籍官员，在印制邮票过程中弄虚作假、中饱私囊的问题，集邮界曾作过许多调查分析。大量资料表明，这不是个别现象，其中以费拉尔的表现最突出。存世各1枚的"红印花小字当壹元"四方连票和旧票均被他窃取。

费拉尔(1860—1904年)年轻时在法国学习绘画，1892年在上海进入清朝海关造册处任邮票绘图员，这与他的岳父在海关任要职不无关系。(在当时，清海关用人并无制度可言，纯凭外国人操纵，牵亲引戚，司空见惯。例如，与赫德有各种裙带关系者就不下数人)费拉尔曾受命参与"万寿"、"蟠龙"等邮票的设计印制。在负责"万寿"票和"红印花"税票分别加字改值和加盖暂作邮票的监印过程中，费拉尔在海关造册处长英国人葛显礼的纵容下，大胆妄为，故意制造大量离奇的错体、变体邮票。诸如大字、小字、长距、短距、对倒、横盖、漏盖、复盖、移位等，名目繁多。当"红印花小壹元"邮票印出了一大张样张准备报废时，几个在场的外国人竟将其私分了，费拉尔至少拿了一个四方连。这个四方连加上一些"万寿"变体票，成了他发迹的家底。费拉尔的一个亲戚惠脱非尔金，是英国益浦司惠区的邮商。每遇新发行的稀少华邮，费拉尔除自己少留一些外，大部分寄给他，从中渔利。

1897年，费拉尔一系列营私舞弊丑行败露后，被捕入狱，被开除出海关。出狱后他曾在上海做邮票生意，不久双目失明死于上海，结束了狡诈的冒险家生涯。费拉尔去世后，大量邮品由其妻(中国人)继承，20—30年代分批售出。因所藏华邮均直接取自邮政当局，未经过

任何邮商之手，不仅绝对属真品无疑，而且有大量珍罕绝品。每当费拉尔遗集拍卖消息传出，都在上海及国际邮坛引起极大轰动。

1906 年，上海海关造册处出版了一本《华邮报告书（1878－1905）》。该书原附于 1905 年海关贸易统计册内，属官方内部业务资料，是英文单行本，12 开，19 页，有邮票图 4 页。此书详列 1878 至 1905 年发行的全部邮票种类、面值、发行日期、刷色、齿度及著名的变体。其中虽颇多讹误，然系官方第一手资料。尤其是附图中“万寿”及红印花加盖票加盖字模、清朝快信票均用原模精印，与真品无异。当年即十分罕贵。

这本书的编著者是意大利人绵嘉义（1860－1936 年），他原籍英国，其母为意大利人。他 1881 年来到中国，当时是上海的沪关税务司。当时海关邮政是海关的附设机关，所以他实为邮政业务最高负责人。他热爱集邮，其中国邮集珍品很多。1922 年交上海鲁意斯摩洋行分批拍卖，持续数星期。其中有“红印花小壹元”、红印花原票和一批早期珍贵实寄封。李辉堂、周今觉、陈复祥等一批中国集邮者购得了一部分，其余为外国人买去。最可惜的是，有极罕见的整张海关二次邮票全套，全漏齿，背有水印，当时怕价高售不出，竟撕开拍卖，尽为外国人买走。当年华邮珍品损毁、外流之严重，由此可以想见。

绵嘉义 1906 年编撰的《华邮报告书》，虽然在附录时标明是由绵氏个人名义执笔发表，但长期仍被集邮界视为官方正式记录，奉为经典。这个专著成书尽管较早，但其中的讹误却显而易见。例如：书中把一种“大清邮政官局代封”的签条，视作邮票，以编号 146 列入。书中还把 1903 年 10 月的“福州对剖票”和 1904 年 8 月的“重庆对剖票”都当成邮政正式发行邮票编入。对“红印花”邮票的介绍也大有问题，将“红印花”原票视同邮票，与红印花加盖“暂作邮票”相提并论，赋于邮票编号，谓之全套 9 枚。该书对当时及后世集邮界影响极大。书中首次公开发表关于“红印花小字当壹元”和“红印花暂作洋银小字肆分”的信息。在此之前，邮政官方从未承认正式发行过这两种邮票，将它们一直归入作废的误印票。经绵嘉义借官方文件之荫悄悄地

正式公布，邮政当局已无法否认它们的存在。结果使这两种“变体票”一跃成为“华夏之宝”。联系前文提到的费拉尔等人在“红印花”加盖过程中的种种劣迹，这种作法目的何在，岂不昭然若揭。造假的手段和弄假成真的手段同样都是登峰造极。

1912 年，再经绵嘉义编辑，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了英文的华邮贴票册《中国邮政票》。这本专册包括 1878 年至 1912 年“光复”、“共和”纪念邮票为止的全部邮票，共 28 页。

1923 年，绵嘉义退休后迁菲律宾，曾任菲律宾邮会理事长。1930 年，他在《华邮报告书》基础上补充整理，取名《华邮纪要》，寄往上海“中华邮票会”会长周今觉，请该会印行。此书因故拖至 1936 年纪念中华邮票会成立 10 周年之际才出版。该书将收录邮票范围扩大至 1916 年，比原作新增了 10 年的内容。集邮家周今觉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评价：“读者勿轻视此赓续十年之材料也，此十年中，含有前清鼎革，民国肇兴之一段重要邮史在。而著名之临时中立票，及号称变体最多之宋字楷书两加盖票，均在其中。其重要盖尤甚于 1906 年以前之纪录矣。”该书仍用英文撰写，体例编排参照吉本斯（英）、斯科特（美）等著名的目录，便于读者查阅。是研究中国早期邮票的重要参考资料。绵嘉义成为最早研究并编印华邮目录的外籍集邮家。

赫德、费拉尔、绵嘉义是中国早期邮票史和集邮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均为掌握清朝海关邮政大权的外籍官员，主持了清朝一系列邮票的设计、印制、发行工作。他们都爱好集邮，并利用职务之便，或有意制造变体票，或伺机攫取奇珍，其中不择手段者尤以费拉尔为甚。他不仅个人私集，且上呈税司赫德、远供海外邮商。因此，在清末，费拉尔的华邮邮集推为全球第一，绵嘉义次之。3 个人的邮集最后都以出售告终。赫德的邮集几乎全在海外出售。绵嘉义的邮集在其退休离华前，全部在上海售出，品高价低，华人集邮家购得不少佳品。而费拉尔的遗集每次拍卖都引起轰动，其珍罕究竟达到什么程度，集邮家陈复祥 1940 年曾有过如此评论：

“余以为棣（费拉尔）集之长处，不在变体珍品之多，而在全版大

张之多。如暂作票之错盖地位，及双连中间无齿者等，在今日虽已颇可宝贵，然非绝对不可得。而在十连以上，则难矣。又如北海票据余所知，世上所有者，皆出自棣氏一人之手。盖当发行时，全部由其购买。转寄与英国邮商其至戚金氏者，新票闻有五十余全张之多，五分销印者，亦有二全张。”“古华邮之现今存在数额，与当初之发行数额作比例，则存在数之稀少，其百分比远非任何大国所能及。盖当是时，国人既不知集邮，乏人购藏。而商家又皆信任民局，贴用既少，毁灭极多。若无此数君之预为集藏，则今之集邮家何来如许古华邮，以适当之价格，可以人各一套，普及大众耶。”(《邮典》第1卷第4期)说得也是，我弃人取，有弊有利，千秋功罪，又该如何去评说？

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在中国，邮票的出现也如同集邮的出现一样，似乎都是专为外国人准备的。外国人印，外国人用，外国人集。捷足先登，出尽风头。如此状况，早期华邮珍品怎能不全被外国人垄断？文化的入侵和掠夺往往同时存在。

打开19世纪中叶的世界地图，非洲、美洲、亚洲大陆上几乎插遍了西方列强的国旗。中国——这个唯一未被殖民化的衰老帝国，外强中干，形同一块任人宰割的肥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最基本原因。而卖国求安的清王朝干尽了丧权辱国的勾当，使当时的中国成了“洋人的朝廷”(资产阶级革命者陈天华语)。国家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必然造成文化的落伍。产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集邮文化，自然是充满殖民地色彩的畸形儿。来自西方的大量集邮者中，确有一些仰慕中华文化、热心集邮研究的学者，但更多的则是抱着冒险精神来东方大国实现发财梦的“淘金狂”。他们用一双双肮脏的黑手，丑化中国的邮票，扭曲中国的集邮文化，这是中国集邮史上永远洗刷不掉的历史污迹。

第二章　民国初期的集邮活动

第一节　外侨邮会和邮商

20世纪初叶，是中国社会政局动荡、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的历史变革时期。这期间，中国的集邮活动出现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变化。其中外籍集邮者的活动逐渐由分散趋向建立集邮组织，外侨邮商逐渐增多以及中国集邮者开始出现等，都是最显著的特点。

外籍集邮者以往收集的重点是外国邮票，这时，收集研究中国邮票以及在华客邮、商埠邮票的人已为数不少。

1912年，在上海的外侨成立了“上海邮票会”，这是中国出现的第一个集邮组织。成立时会员仅8人。会所设在开利饭店。活动仅为每月召开一二次会，互相交换或买卖邮票。几年后成立了拍卖部。

该会第一任会长是拉奇，第二任会长是绵嘉义，以后会长由布许担任。会所移至福利公司楼上后，会员和机构都扩大了。设有正副会长、书记、会计、拍卖主任、交换主任、藏书主任各1人。活动主要是每星期五下午在会所举行拍卖。由于会员中多为富有的各国人士，拍卖成交额很高，邮会抽取的佣金颇丰，以此设基金、购债券股票，积累了一定的活动经费，用作房租、办公等开支。1921年，该会曾在上海华美书馆举办过邮票展览会。

20年代中期，上海邮票会举办的拍卖会，主持人多数时候是斯蒂芬邮票公司老板、希腊人泊泼道拉夫。他虽然熟悉业务，但因私心太重受到谴责。每逢拍到他自己想要的邮票，不等别人追加竞争，就马上来一句“我自己的”，随即将木锤击下。人们于是送他一个绰号“Myself”（我自己的），当面讥笑他。后来取消了他的主拍资格。

上海邮票会成立之初，中国人仅有著名邮商李辉堂参加该会，并担任最早的中国籍理事。20年代中期中华邮票会成立后，全体董事均加入上海邮票会。以后中国集邮者加入上海邮票会的寥寥无几，主要原因，一是言语不通，二是会费太贵(每年10元)。

30年代中期是上海邮票会的全盛时期，会员发展到近200人。斯图亚特、佛龙克先后出任会长，出版了英文《亚细亚邮刊》。1938年4月，还在亚洲文化会举办邮票展览，纪念建会25周年，展品陈列268个镜框，中外参观者达千余人。

1917年，鲁意斯摩洋行开始在上海举办邮票拍卖会。由英国邮商品斯主持。该洋行座落在北四川路。拍卖范围很广泛，家俱、书籍、古董、字画等，应有尽有。每次均事先在《申报》上刊出拍卖邮票广告，拍卖的邮票往往华邮和外邮各半。喊价以英语为主，也夹杂几句汉语。除大量外国集邮者光顾外，亦吸引了不少中国集邮者。这是中国最早的邮票拍卖活动。

品斯原为上海屈臣氏汽水公司经理，因爱好集邮，逐渐以经营邮票为业。其邮票来源，多半出自欧美等国的邮商，少量来自中国国内。由于当时中国人集邮者少，使品斯常能以极低的价格搜购到大量瑰异之宝，一转手赢利数倍。在每星期六他主持的拍卖会上，竞购热烈，买卖双方均有所获。直到20年代初，由于国际上邮票价格上涨，国外存票锐减等原因，品斯的拍卖交易每况愈下，被迫停止。

俄国"十月革命"后，大批来沪的俄国侨民成立邮票会，也举行邮票拍卖活动，主持人是麦克李维斯基。1923年，白俄人休门夫妇在上海爱文义路开设"美古邮票公司"，销售各国及中国早期邮票。后以经营伪满邮票为主。还专门印制该公司售品目录。休门夫妇在沪的邮票业务一直持续到1949年底。

在旅华外侨邮商中，美国人薛多尔当年影响也很大。他酷爱集邮，虽然下肢瘫痪，但参加集邮会活动无论狂风大雨，盛暑祁寒，从不缺席。由于他待人殷勤有礼，许多中国集邮者和邮商都乐于长期与他交往。1925年，薛多尔编写出版了一本英文版的《中国和中国商埠邮

票目录》，图解详明，曾风行一时。后来斯蒂芬编印的邮票目录即以此为蓝本。1929年，薛多尔因与邻居发生法律纠纷，移居马尼拉。

因外国集邮者不断地在中国沿海城市开办邮票店，举行邮票拍卖、展览等活动，由此而产生的买卖邮票纠纷事件也逐渐增多。有时事态扩大还要闹到各国领事馆出面干涉，甚至把官司打到了法院，成为轰动新闻。

例如，民国初年，上海一位英籍犹太人汇啦在江西路南京路口开设一座汇啦洋行，出售各国邮票。一次美国领事馆一位参赞在此购买了1枚1873年上海书信馆发行的加盖商埠邮票。后经行家鉴定出是真票伪盖，买者持票前往要求更换，汇啦坚持不肯。于是这位愤怒的参赞先后诉诸英国领事和法庭。经过审判，法官判决汇啦此票虽由门市部收进，不知其为赝品，非存心欺诈，但作为邮商应当具备鉴别力，售货应负责保真，“自分无此能力，则辍业耳”。最后自认倒霉，关门了事。

30多年后，集邮家陈葆藩在一篇论及《邮商与信誉》的文章中，呼吁中外邮商们以此为戒，既要有公正之心，又要有真才实学：“凡操一业，必尝致力于其间，业工者不能不习艺于名师，为商者不能不投贽于良贾。妄执斧凿，则器未成而肤体先创，妄握筹算，则利未获而货财已丧。故不操邮业则已，欲操邮业，必先具邮识，而鉴别真赝，尤其首要者也。”（《新光》第7卷第6期）

当年，散布中国各地的外国集邮者，逐渐对收集研究中国邮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时有种种新发现，有的还很离奇。

“宫门倒盖”邮票被誉为“民国四珍”之一，早年传说是由一位旅居山西太原的外国集邮家首先发现的。1915年某天，他去当地邮局买了1枚“宫门”2元新票。当时未细看，回家后才发现是倒盖票。立即返回邮局，要求将所在的那一全张邮票全部买下。邮局营业员问明原因后一看，果然余下的48枚邮票也全部倒盖。经请示外籍局长，不准再出售。这位集邮家争辩了几小时也没有再购得。那些倒盖票后来被这位局长以96元钱全买到手，以15—20倍的价格卖给上海的

邮商。邮商又以每枚100元售给国外的邮票公司。

以后，这段轶事又有了更传奇的色彩。1944年集邮家陈志川在《国粹邮刊》第35期上撰写的《国邮见闻录》中曾叙述："距今数年前，某次沪上著名西籍邮家德铿氏相叙于陈复祥先生处，畅谈古今邮事，偶涉宫门倒印之产生地，德氏正颜相告于陈君云：'是票实非山西发现。其真正发现于汉口邮局，惟当时因恐邮人相继追踪探求，故作发现于山西之论，以惑邮人耳目者。'"1枚错体票的来踪去迹竟被外国人搞得如此神秘。为了珍罕邮品的竞争和垄断，声东击西，当年在华外国集邮者真可谓机关算尽。精明的商人作风，是来自西方集邮者们大都具有的特点。

"帆船"加盖"暂作"半分倒盖邮票的发现也有类似的奇缘。集邮家宾司船长在苏州游览时，为寄信去邮局购买2枚半分邮票，一看竟是倒盖票。他马上把全张余下的票都买下。接着又要了一全张，一看竟然也是倒盖，立即买下。没想到这样一张张看下去，一连买了12张全是倒盖票(每全张240枚)。营业员不解其意，待问明后一检查，邮局内所存的倒盖票尚有488全张之多。立即报告奥地利籍局长，局长下令全部收回报总局销毁。由于宾司执意不肯退还，所购12张倒盖票终于全都留下。

宾司是英国人，1890年左右来华任吴淞号船长，此船专行驶于长江上下游之间，直到20年代初他才告老返英。在华30多年，宾司收集了大量华邮新票、变体票和实寄封，有许多珍贵的商埠变体票也是由他发现后及时收藏。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了许多，一些错、变体邮票基本都是由外国集邮者在购票时偶然发现的。幸亏如此，否则现在许多早期倒盖票恐怕只能见到旧票了。

还有一位著名的美国华邮集邮家施塔(1870—1948年)，是一名理学士，曾为美军少校，1895年起在费城海耳煤矿公司任职。他自幼集邮，从1913年开始专门收集华邮，曾任美国中华集邮会会长。经过30多年钻研，所集华邮极为完备。其邮集中新旧票并存，还包括有大

量连票、全张、各种错异体(如著名的"红印花小壹元票"等)。同时,他还非常重视收集各种符合邮资的自然实寄封。举凡中国各时期快信票、明信片、保险信封、航空邮票、首航封、邮票纪念册、慈善与储金邮票、商埠邮票等,无不尽数网罗。

施塔最著名的收藏是"大龙"邮票集,有两大册之多。由于他注重版式研究,深得其奥妙,邮集内藏有各类全张票和大量实寄封。其中"大龙"阔边五分银黄色带四边纸全张新票,号称西半球最罕贵的华邮孤品,与中国集邮家周今觉拥有的东半球最罕贵华邮孤品"红印花小壹元"四方连票齐名,两人并称华邮界东西两大邮王。1931 年初,施塔应周今觉之邀,携此绝品赴沪,请上海集邮家观赏,并将其所藏华邮珍品抄列目录,刊于《邮乘》第 3 卷第 1 期至第 3 期。在沪期间,施塔还与周今觉、许伯明、李辉堂、朱世杰等中国集邮家合影留念,这张照片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48 年,施塔去世后,其遗集一直深藏于银行保险库。直至 1991 年才交英国著名的苏富比商行公开拍卖,估价达 100 万英镑之巨,引起国际集邮界瞩目。

华邮收藏之牛耳,长期执于外人之手,真是风流占尽,先声夺人。

列强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的租界内,不仅是外国人为所欲为的冒险家乐园,也是藏污纳垢的罪犯庇护所。天津 20—30 年代曾发生过四起轰动一时的外国人制造假邮票案。

1926 年 9 月 26 日,天津破获一起伪造"宫门"1 元假邮票案,总价值达银元 175000 元。主犯是居住在日租界的日本浪人波多野金次郎,后被判驱逐出境。同年冬,天津日租界警察署又破获一起伪造"宫门"5 元假邮票案,伪票价值达 15 万元,主犯为 4 名日本浪人,其主要销售对象是各外国银行。后查明这些伪品出自日本国内,罪犯被不了了之。

1930 年 3 月,天津邮局查获一起伪造"帆船"1 角邮票案,主犯是白俄及犹太人。在其住处搜出伪造邮票的全部工具和印好的伪票,几名罪犯被中国当局判了劳役。1937 年 5 月 1 日,天津邮局又查获一

起由2名白俄人伪造民国"单圈"孙中山像及烈士像图邮票案。在罪犯住宅查出印刷机、邮票铜模9块、切刀、印油和假邮票一批。当时2名罪犯被判处徒刑4年2个月，各罚金500元。但不久日寇侵占天津，这2名罪犯从监狱里被放出加入日军。罪犯竟然摇身一变成了耀武扬威的统治者。

主权何在？公理何在！

综观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在华外籍集邮人士的各种集邮活动，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一些利用种种职务之便和特殊身份者，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收藏了大量的华邮珍品，其中有的孤罕品完全是他们故意制造出来的。

二、受西方集邮风气影响，集邮者们比较重视收集和研究各种变体票和实寄封。其中包括在华客邮邮票、商埠票、清代票及民国初期票。

三、集邮活动中的投机心理和商业气氛浓厚。许多人从事收藏邮票完全是为了牟利发财，因此邮商和拍卖活动发展很快。

四、由于外籍人士与西方各国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人还曾充当国外邮票公司的在华代理人，造成中国早期邮票的大量外流。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清代早期票和各种变体票。

五、由于中国当时没有什么国际地位，所以总体上讲华邮在国际和国内集邮界不被重视，专门从事华邮收集研究者不多，多数集邮者仅附带收集华邮，重点仍放在收藏外国邮票上。

总之，中国邮坛成为外国人一统天下，外国邮品占主导地位的局面，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开始有了稍微的改观。

第二节　最早的中国集邮者

古代中国曾创造出世界上最辉煌的科技与文化，令世人钦佩。但是，从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遭受的外来欺辱真是罄竹难书。面对

来自西方的邮票和集邮，中国人最初感到迷惑不解，后来则不以为然；从接受和效仿继而有所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在英国，邮票发明后过了 10 多年，其使用价值才被群众认识，逐渐普遍使用。邮票的收藏价值深入人心，集邮受到社会广泛欢迎则是过了 20 多年以后的事。同样，邮票和集邮在中国的推广，也不可避免要经过这样的进程。从总体上讲，中国人对新生事物的接受速度比西方还要缓慢。中国人开始接触集邮比欧美晚了近半个世纪。这种集邮文化发展历史的滞后时间差，造成了中国集邮开端以仿效为主的特点。

从本世纪初开始，一些接触外交事务的上层人士和许多在海关、铁路、外国银行、商行、教会学校任职的中国员工，受外国人集邮的影响，起而仿效。在清朝上层人物中，那桐可算中国第一代集邮家之一。

那桐，字琴轩，清末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人，清光绪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曾任清政府军机大臣。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时，他受命为留京办事大臣，与联军议和。《辛丑条约》签订后，他被委派为专使赴日本道歉，后来他还出任过清华大学校长，是洋务派人物之一。那桐素爱搜罗古玩字画，其集邮爱好显然是受了外国人的影响。但他集邮只是为了赶赶时髦，并未下大功夫，无甚成就，不然按他的财势、地位，完全可以集成一部中国早期名贵邮集。那桐死后，邮集、邮刊被其后人贱价处理。其中收藏的 6 套《邮乘》等珍贵邮刊，以每本 1 角钱卖给邮商沙伯泉，使其赚了一笔钱。

据记载，清朝外务官员陈桓士也喜爱集邮，且邮识丰富。清末陈桓士曾随李伯芹（经羲）出使美国，购得 1 枚华邮珍品“红印花小字当壹元”带回重庆。直到 30 年代，传至其后人智仁勇女学校校长徐仁广收藏。陈桓士不仅是我国早期集邮家，而且慧眼识珠，已注意在国外搜寻华邮珍宝。

集邮家张承惠（浙江慈溪人，1888－1940 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学院工程系，入黄浦江浚浦局后任帮办工程师、水利科科长。1900 年，张承惠在圣约翰学校上学时，受同学影响产生集邮兴趣。当时学

校阅报室有许多外国报纸，他从上面看到国外邮商征换邮票的广告，就在家里和亲友家搜求信函，剪洗邮票。留下自己没有的，其余寄往国外交换外国邮票。从此他一直保持着与各国大邮商的函购联系。

他邮识丰富，20年代起历任国内最早的神州、中华、新光等邮会理事，经常耐心指导初集邮者，很受集邮界敬重。从30年代起，他专心从事华邮的收藏研究，其中以红印花邮票最丰富，他的邮集悬格甚高，品相极佳。但他倜傥不群，邮集从不轻易示人。

张承惠善长外文写作，常撰文发表于欧美集邮报刊。他曾编写一份数万字的红印花研究著作，可惜因病逝未能终稿。

集邮家徐慕邢（安徽南陵人），出身官宦，自1914年开始集邮，财大兴高，一度曾与袁世凯之子袁寒云交友，同掷巨资搜求华邮珍品，购得巨藏。以后担任过中华邮票会董事。1940年，他在《余之集邮谈》中，叙及其集邮往事：

“余集邮开始远在民国三、四年间。时方宦游北平，东安市场有鲁人杨瑞年者，以买卖邮花为业。偶过其处，驻足而观，不觉好奇之心油然而动。乃选购色泽鲜艳之西邮，怀之而归。久之以不谙西文，而不辨国籍，似了无兴趣。遂幡然改变作风，大量购置前清各项分角元数等票。不论新旧，广事搜罗。先后购入者约有十余万枚，归而分类编排，盛列匣中。五色缤纷，朝夕把玩，引为乐事。然所费亦不过数百元而已。朋侪皆讥余以有用之钱，掷诸虚地，余亦一笑置之。时国内集邮者如凤毛鳞角，寥若晨星。既无研求切蹉之友，更少参考指导之书，故进步甚难，彷徨不知所措。有时遂尔灰心，即束诸高阁，不知所购之票，其中掺杂变体等票甚多，如各种民国倒印、或无边漏齿、及一分之壬字头者。此后略窥门径，始仔细逐一检点，皆成现时不可多得之品。而红印花各项加盖票，亦复应有尽有。”（《邮典》1卷5期）。

涉足自偶然，狂购也盲然，悟彻方欣然。徐慕邢当年感受的乐趣和困惑，也是老一代集邮者所走过的道路。可惜能像他那样由浅入深，始终坚持下来的早期集邮家为数极少。很多人由于种种原因半途而废，功亏一篑。

袁醴波(浙江慈溪人,1889－1936年),供职于上海德和洋行。1920年左右开始集邮,并立志专集国邮。由于当时邮票价格不高,他仅用二三年功夫,花费二三千元,收集成了一部相当完备的中国邮票专集,成为最早专集国邮的中国集邮家之一。袁醴波是神州邮票会会员,曾担任中华邮票会董事。他还喜好收藏书画,亦颇可观。

1930年,袁醴波因病辞职。1932年为支付医疗费用,他忍痛变卖了全部邮集,售价8千余元。其中比较名贵的邮票334枚,采取自己编印英文价格目录,遍寄中外集邮家的方法出售。内有1枚号称孤品的"万寿"日版大字短距2分银改2分新票,最为珍贵,以1300元售出。不久袁病逝,享年47岁。如此盛年集邮家和卓越邮集竟被病魔夺走,令人惋惜。

清末民初,中国集邮者中工商界人士不少。其中绝大多数凭个人兴趣,权作业余消遣。集邮在工商界人士中较多的原因,一是这些人大多与外商有较多接触,受其影响;二是接触面广,往来信件多,收集邮品较易;三是感到集邮比集古董易保存,便携带;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有经济条件去集邮。当时除上海等大城市集邮风气渐浓,全国各地集邮活动尚未大开。社会上往往视集邮为儿戏,所以集邮者多不愿在公开场合当众出示邮集,恐怕被人耻笑。因而有记载的集邮史料很少,造成今天了解当年集邮发展情况的困难。

中国最早的华人邮商是李辉堂(广东四会人,1869－1943年),早年在上海玛立逊洋行任建筑绘图打样员,自修英文,交友广泛。每星期六爱好骑自行车出游。一天遇外籍人杜比车坏路旁,李辉堂帮助修好后,两人交上了朋友。杜比爱好集邮,请他帮助收集信销邮票。当几天后杜比得到一大堆裁剪下来的旧票时,高兴地送给李饼干糖果和10元钱。李辉堂此时才知道一向视为废物的东西竟被外国人视作珍宝,从此开始集邮和业邮。

李辉堂动了不少脑筋,他曾经不顾别人的嘲笑,学着外国人的样子在报纸上刊登收买"人头"广告。他还请美国在华客邮邮局中的朋友帮助留意收集变体票。他有一个最大的弱点是对邮票不深入研究,

票品到手辄尽。例如他曾获得美客邮二元票复盖一版全张，计百枚，以后不久即成为价值昂贵的珍品，而他当年却以极低的价格随便售出。他每言及此事，懊悔不已。

本世纪初，李辉堂弃职后于上海北四川路设店经营邮票。他特别留意各种变体票，售于外国人。当时中国人集邮者极少，上海业邮者仅他1人。20年代，中国著名集邮家们的珍贵华邮，大多是从他那里配购。他先后担任上海邮票会的中国籍理事、神州邮票会审核员、中华邮票会拍卖部主任等多年，成为中国早期集邮会的骨干之一。但他不注意收藏，自己保留的珍邮极少。只可叹这位嗜邮一生的邮坛元老，晚年积蓄微薄，双目失明，暮境凄惨。

本世纪初，上海北四川路又出现了两位邮商，一位是陈绍周，一位是冯兴记。虽然他们的经营范围比较小，但都和李辉堂一样是广东籍。所以早年邮坛有中国邮商创自广东人的说法。再联系到后来的著名邮商钟笑炉也是广东人，这种说法真是名不虚传。

李辉堂当年曾带有两个徒弟，一名冯荣龄，一名庄梁立。他俩在李家练习建筑绘图时，受李影响也开始钻研邮票。满师后，他俩也效仿师傅弃职成为邮商。冯荣龄的邮店设在四川路宁波路口，庄梁立的邮店设在虹口。李辉堂率先从事邮业，参与邮会，培养人才，他对中国集邮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还有一位著名邮商朱世杰(1880－1953年)，祖籍安徽，出生于江苏苏州)，名耀宗，字世杰，少肄业于汉口路美华书馆，通晓英文。1901年考进上海邮政局，早年任出售邮票的营业员。因善于辨别银元真伪，被当局倚重，调任上海城内分局局长。当清一二次有无水印蟠龙邮票发行时，李辉堂曾托朱世杰在出售邮票时帮助留意漏齿等变体票，朱由此受影响开始集邮。因他睿敏善悟，不久即成为研究邮票的行家。

1931年，朱世杰退休后专营邮业，在上海法租界吕班路开设了“集古社”，收购华邮珍品，并大量出售华邮及从美国进口的贴票胶水纸和镊子等集邮用品。与李辉堂不同，朱世杰在经营中同时注意收

藏，他保存有全部商埠票及变体新旧各一套；中国纪念票全部；“大龙”至“万寿”大小字加盖四方连；上海工部局封筒片全部；前清至加盖国币伍拾元明信片全部；1921－1931年中国航邮首日实寄封全部等大量珍贵邮品。他的另一个特点是经营作风稳健保守，不搞“对敲”或“踢皮球”等促销活动，甚至不大跟邮票市场发生联系，始终以不紧不慢的节奏开展自己的业务。

朱世杰的三个儿子也全都经营邮票，堪称邮商之家，在集邮界传为美谈。更可贵的是朱世杰为人和易，邮识渊博，1928年还编印过华邮图谱。早年国内许多邮刊上常能见到他刊登的广告启事：“敝社专门经营国邮，对于顾客出让各票，皆由负责人朱世杰本人直接认真选择。面售各名贵邮品，背角均盖有钤记C. CHU西文字样，负责保真。（要求免盖者例外）”

当年国内一些著名邮商出售名贵邮票，均仿照国外作法，应顾客要求在票背面加盖本人的保真戳记，以示负责。这种作法延用了很长时间，对一些真伪难辨的高档邮票，起到了明查秋毫的鉴定作用。没有深厚的功力，岂能胜任此种“邮坛法官”的重任！李辉堂、朱世杰，还有以后的陈复祥，是中国早期最著名的三位老邮商，他们的保真记号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后来，柳至川、谢大任、张赓伯、张包子俊等人的鉴定签名章，也取得集邮界广泛的信任。

这些老邮商还是“活辞典”。集邮家张赓伯长期与李辉堂等三位邮商过从甚密，他在一篇文章中曾说：“与老邮商谈，每可得无数隽闻，为集邮界所不轻易所能得知者。或熟于邮界掌故，或善能判别真赝，或深知变体源流。每于暇时，过往细谈，遗闻掌故，遍拾即是。归后笔而出之，散记中大好资料也。”当年寻常事，身后好文章。遗憾的是这些邮界元老们留下的集邮史料太少了。

1915年，著名邮商张景孟在苏州开设了“五洲邮票社”。张景孟（江苏苏州人，1893－1945年），大学毕业后当过教师，爱好集邮，后来因病辞职，改营邮业。他的邮社兼办通信函购，联系广泛，名闻全国。他的经营以儒雅之风见长，别具一格。铅印的卖品目录中，卖品

均按国别分类序列，每个国家还写上几句介绍，讲一点有关的地理历史知识，很适合初集邮者的口味。五洲邮票社与各地顾客往来使用的专门信笺也很别致，上端印有两个空格，各粘贴1枚外国邮票，作为奉送品。信笺上还印着致顾客的请求：一是来信请贴纪念邮票，二是请将来信信封上的邮票剪下退回，另赠外邮致谢。这样做既使顾客感到有所得，又使邮社能以外邮换回大量中国的信销邮票，广开货源。精明而不失风度，张景盂一直被集邮界称赞为最有规范的邮商。

随着中国集邮者的逐渐增多，中文书刊上中国人的集邮文章也多了起来。

1916年7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小说界》月刊，从第2卷第7期开始专辟《邮乘·邮票考略》专栏，发表集邮文章。由苇茹撰稿，共刊载了12期。这是中国最早的集邮专栏。

1918年2月，中国最早的中文集邮杂志《邮志界》由世界邮花联合会编印出版。主编是白狄人。该刊仅出了1期。

1918年4月13日，江苏常州《武进报》刊登了一则邮展消息："邮券展览会之消息　邮券会发起人魏君伯熙，收藏邮券甚多，曾与公园订约开会，各节已志报端。""邮券"又是当年对邮票的一种称谓。5月10日，邮票展览在常州公园内举办，历时3天。展览邮品由本地及外埠集邮者提供。这次邮展的发起人是魏伯熙、邹英、左鲁川、徐鸿伟等。主办者魏伯熙因公离常州，未能参加邮展，由其他集邮者操办完成了邮展会务。常州兰陵编译社还为邮展编印了一期特刊《邮票丛刊》，由许剑鸣编辑。根据记载，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次邮展活动。

此后，上海、苏州、太仓亦出版过集邮杂志。但是，这一时期由于集邮者人数还不多，邮识缺乏，对集邮品的收集范围理解得很窄。例如1912年5月下旬，在上海张园举行了一次赈灾大会，会场设有百货商场和各种珍玩陈列。邮局还在园内设立临时邮局，并刻制了3枚新颖别致的纪念邮戳，供3天会期分别使用。可惜当时闻讯赶来在明信片上销盖纪念戳的集邮者为数很少，致使这种"张园官白"（官白是日本邮学名词，指以空白明信片盖上纪念戳）传世量稀少，成为中国

早斯珍罕邮品之一。中国集邮界失掉的时机和珍品真是太多了。

第三节　少年邮迷

集邮作为一项轻松愉快、迷人的娱乐活动，自然能够赢得好奇心强的孩子们特别喜爱。从本世纪初开始，许多中国青少年在外国人或国内外亲友的影响下，萌发了集邮爱好。其中不少人以后成为中国第二代集邮家。

集邮家梁芸斋（广东南海人，1894—　　年），供职上海海关30多年。其华邮收藏除正票新旧皆备外，对各种变体票的收集研究也非常精到。不仅如此，他对画片、古泉、纸币，以及代价券、电车票等都有丰富的收藏。梁芸斋亦善长撰文，集邮文章在各种邮刊发表很多。

他曾经回忆起自己刚上小学时爱上集邮的情景：只要是喜欢的邮票，不论重不重复全贴在本子上，杂乱无章。另外，他还收集了许多火柴盒、香烟盒等。后来经英籍老师D的指导才真正入门。他在《新光》邮刊撰文说："一日举所藏以示吾师，吾师笑谓如此集藏，他日非建仓库，不能纳。几集藏应有认识，宜具宗旨，尤贵持之以恒，予因请示指南，D君乃为予一一详论，至今言犹在耳。""此外D君又常诏予以勿营买卖，以存邮人风格，宜有恒心，不可一暴十寒，不必志在必得，可省无谓苛索等等。D君所视为最著重者，曰集邮应从单枚集起也。"（《新光》14卷1期）

出于单纯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开始集邮，这和今天的青少年集邮者初始阶段大体相同。但在70多年前，中国经济文化都很落后，集邮活动很少见的情况下，这是需要特殊条件来启蒙的。这就是机遇加良师，耳濡目染，在集邮者指导帮助下，掌握正确的集邮方法。新式学校为一批中国集邮少年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集邮家赵善长在他的《邮事回忆》中写道："我1917年进入法国教会办的汉口法文学院攻读外语时，法国和意大利神父常赠予法、意等国邮票。当时不加分类地贴入学习簿内，课余赏玩，爱不释手。这

也可以说是我集邮的开始吧!后来将所集邮票在同学间互换有无,花样渐多,兴趣更浓。”“1921 年,我在北京陇海铁路总工程处任职时,首都已有集邮活动。路局方面的外籍工程师多喜好集邮。也常常讲解集邮常识及介绍国外集邮情况。这对我很有启发。以后,陆续从巴黎购买了集邮参考书籍,开阔了集邮的眼界。”“1920 年 5 月 7 日起,我国创办由北京到天津的首次航空邮政。我一开始即注意收集盖纪念戳印的航递首日封。以后,历届航线开航时,均有寄件,务使首航封罗致齐全。”(《集邮研究》1984 年 1、5 期)若无外籍邮人的指导,赵善长当年绝不会有丰富的邮识,会懂得去收集首航封。

集邮家姜治方在《集邮和我的生活道路》一书中回忆道:“我 10 岁(1917 年)开始集邮时,不过觉得这方寸之物挺好玩,挺有意思罢了。……我最初见到的邮票,主要是贴在五叔和郭老师从国外寄来的信件上。我的五叔姜浚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应招去了法国当华工。他常有信来。郭老师也不时从山打根(现在马来西亚)投书上海。这两人的信,由于是家书,时常由我从邮差处收下,交给父亲。我看到信封上五颜六色的邮票,觉得挺有意思。教我英文的曹老师发觉后,亦兴致盎然地指着这一枚枚邮票,教我读上面的英文国名,识别不同国家的图案,讲述票面上反映的外国历史、地理、人物、风俗人情。我听得津津有味,心驰神往。曹老师便因势利导教我集邮。”

姜治方曾向子女讲述过集邮对自己学习的帮助。1919 年,他在长沙楚怡小学念书时,常在课余时间和同学一起观赏邮票。有一次地理考试中的一道题是写出五大洲一些国家的名字。因为平时集邮早已把各国的国名熟记在心,所以这道题他在全班答得最好。可以想象,当年这对一个才集邮两年的小学生来说,是多么值得骄傲和快乐的事情。虽然只是一次小小的成功,但是童心可爱更可贵。童年的美好经历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难怪姜治方一直对此记忆犹新。

集邮家水泗宏(1914 年生)的舅父、父亲民国初期先后出任驻法、苏等国大使、领事,家中存有大量来自国内外的明信片和信封。优越的条件,使水泗宏 9 岁开始喜爱集邮。其父对此很支持,专门托人

为他买了贴票册和《邮乘》等国内邮刊。1926年，水泗宏从苏联回国，就渐渐成了北平各家邮社的常客。

剧作家夏衍也是一位集邮家。他曾回忆："我开始集邮，大概是在十四五岁的时候(1914年左右)。起先是收集香烟片子，后来主要是好奇，对邮票发生了兴趣。中学时代陆续集了一些，渐渐懂得各国邮票的多种多样，并且开始懂得从邮票上可以得到一些知识。'五四'以后到日本念书，方才知道集邮有各种组织，旧邮票有很大的市场。在日本七、八年，陆续收集了一些，但那时是穷学生，收集的都是所谓'大路货'。五角钱一袋的或一块钱一袋的。那时也没有什么目标，自己没有的，觉得图案和印刷漂亮的都要，总以为数量愈多愈好。""直到抗战前后，在上海、重庆、香港看到一些集邮刊物，开始有了一点门径，懂得邮票的品种浩如烟海，决不能无目的地乱集。同时，也因为已经收集了一部分华邮，对中国邮票的历史发生了兴趣，于是就把目标集中到以华邮为主了。"(《集邮》1958年5期)

集邮家柳秉钧(1899年生)，20年代初毕业于奉天(今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他回忆当年情景："我父亲早年在锦西县开杂货铺，代办邮票、邮差业务。记得我九岁时到铺上去，见门口挂个'大清邮政信柜'的牌子。取信人把邮票扔了，我就拣起来。当时只知道上边有龙头，挺好玩的。后来念师范，才知道那是邮票。同学们信多，我就留心收集起邮票来。毕业后到吉林执教，经济宽裕了，我集的兴趣更浓了。由于我熟悉英、德、日等几国语言，参加了一些国外的邮票会，便同许多国家通邮交换。"为了不使60多年的收藏品散失，1984年，柳秉钧将自己的1万多枚中外邮票、600多种中外钱币献给国家。其中有许多国家的首枚邮票。(《集邮家》报1984年22期)

上述几位集邮家的经历至少可以反映出两个问题：

一、他们当年都是学生出身，分别身处国内的汉口、北京、上海、沈阳及国外。在当时，沿海城市的青年学生中集邮者已不少。

二、大部分青少年开始集邮是直接或间接受到了外国集邮者的影响和指导。这种来自外界的帮助，使他们的集邮起步较稳，养成了

钻研的习惯，从而使兴趣能够持久。

集邮为什么能被中国人接受，并在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生根开花？

在哥伦布开始发现新大陆的航行时，中国已有5千年的文明史和悠久灿烂的文化。几千年来，中国文化是在相对隔离的状态下自发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她的独立性很强，自成体系。反映在教育思想上更是厚古薄今。直到清末民初，在中国大多数的学堂里，学生所读还只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国学，教学空气似一潭死水。西方学校早已普及的自然科学、外语、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许多中国乡镇的学童还闻所未闻。中国封建教育死板枯燥的内容和方式，无异是套在青少年学生头上的精神枷锁，束缚着他们的求知欲和想象力。

辛亥革命给中国吹来了一股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新风，西方文明成了有反封建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向往和追求的目标。由西方传来的电影、摄影、交谊舞、体育、集邮等新文化，较之中国传统文化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真是海阔天高，令人耳目一新。那些进入新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少年思想开朗，求知欲强。一接触到集邮，就像铁钉遇到磁石一样被其特有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吸引住了。

邮票能集历史、地理、文化、艺术知识于一身，既有欣赏和收藏价值，又有研究价值。比起爱好音乐、美术、体育等需要天赋的活动，集邮似乎更"大众化"。集邮人人能搞，可简可繁，易于入门。富有者尽可宏藏巨制，重金求珍；青少年亦可小集成册，相互谈邮。尤其对性格内向、不善社交的中国人，集邮自成一个别有情趣的小天地，从这里认识大千世界实在引人入胜。集邮册是青少年可以自由支配的"独立王国"。

邮票还能洋为中用，与本民族文化溶为一体。从"大龙"开始，中国邮票就充分展示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独特风采，使收集研究华邮被视为维护国粹，与外国人一争高低的爱国之举。民族感情和自尊心也是中国集邮者发奋集邮的动力之一。

虽然集邮在西方已风靡了半个多世纪才为中国人接受，但是集

邮在中国的起始和传播，可以说是拿来主义的结果；是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解放思想，勇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标志之一。这个历史性的进步来之不易，影响深远。

第三章　20—30年代的集邮活动

第一节　沪杭邮会

20世纪20年代，上海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化城市。工交、贸易、文化、电讯等都比较发达。这里外国租界林立，从城市建筑到社会生活都显出异国情调，被誉为“东方的巴黎”。中国近代邮政起始的标志“海关邮政”和“大龙”邮票都诞生在吴淞江畔。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各国商贾云集，邮品充盈，是世界邮票市场之一。

世界各国在远东的贸易，以上海作为货物吞吐地，因此邮件的频繁程度为全国之冠。加之上海外侨众多，得欧美集邮风气也早，促成邮市之盛。欧美的邮票公司，均视上海为亚洲最重要的营业对象，东方邮票这里价最廉，可以大量购进；欧美邮市中的华邮古票这里价最高，纷纷寄来求售。所以欧美与上海邮票市场的沟通与贸易额，居亚洲之首。

这时，上海除一些外国人开设的邮票店外，北四川路的钱庄、静安寺路的花店、城隍庙附近的镜华照相馆，以及几处外国洗染店、外文书店等也兼营各国邮票、书目和集邮用品。

使上海得天时地利之便，成为中国集邮文化的摇篮。中国许多著名集邮家都是从此时此地开始了他们的集邮活动。集邮虽是一项个人嗜好，但具有鲜明的社会性。一批集邮者出于弘扬国粹的民族感情，先后组织起自己的集邮团体，开展各种有益活动。其间，还有一些赴西方留学的青年，在国外坚持集邮。这些爱国集邮者们，从国内国外两个范围，多方涉猎，广采博收。尤其可贵的是，他们以维护国宝为己任，锲而不舍地收集并钻研中国的珍贵邮品，为早期的中国集邮研

究打下了基础。

1922年8月，为与上海的外国人邮票会分庭抗礼，一批中国集邮者在沪成立了“神州邮票研究会”，这是我国第一个有影响的集邮组织。

该会由张承惠、陈复祥发起。他们邀集了一批集邮爱好者在陈复祥家中聚会，经过讨论研究，与会者一致决议创办“上海神州邮票研究会”，规定每月举行一次月会，进行交流活动。会上还推举张棣村为会长，叶颂蕃为副会长兼中文书记、张承惠为英文书记、李辉堂为审察员、陈复祥为交换部主任。会所和交换部设在陈复祥家——上海文监师路（今塘沽路）1256号。

作为第一个中国人集邮团体，该会的各项制度是在实践中逐步改进的。当时的章程中，入会资格对年龄有严格规定：凡在16岁以内者不纳。后经9月份的月会作了修改：如16岁内得其父兄或保护人之证书，亦可入会，且会费一律减收半费，从而扩大了会员的吸收范围。到1922年底，因为有部分外地集邮者申请参加，于是决定，自1923年起会名改为“神州邮票研究会”，去掉了“上海”二字。

该会交换部当时订有暂行条例，其中第四条规定，会中收交换手续费一成，以充本会经费。后经11月的月会决议，鉴于收费太大，票价不能低廉，减收5%，遮可定价从廉，但规定非会员不能享受此利益。

“神州邮票研究会”首批会员22人，多系工商、金融界职员，均具有较高的邮识水平。象李辉堂当时从事集邮和业邮已有30余年。这是中国最早的集邮家群体。

上海神州邮票研究会首批会员名录如下：

姓　名	籍贯	职　业
朱诵清	吴兴	金星人寿保险公司
李辉堂	广东	建筑测绘师
陈复祥	苏州	华商证券交易所
陶仰遽	无锡	福新面粉厂

张棣村	京兆	画家
张叶笙	无锡	上海面粉公会
程志江	湖州	友华银行
蔡寄云	上海	江海关
邓伯昭	广东	亚细亚火油公司
叶颂藩	上海	松江第二中学教员
顾纬亚	无锡	山东胶济铁路工程处
朱烈卿	上虞	盐务
柴冠群	上虞	同里江震盐公堂
陈思明	武进	商业
袁醴波	慈溪	德和洋行
张承惠	鄞县	浚浦局工程师
许锡臣	乍浦	金星人寿保险公司
区甘源	肇庆	茶叶
蔡丽生	杭县	大精神学研究会会员
叶真源	闽侯	商业
黎永锦	南海	英美烟公司
谭蓉圃	香山	德和洋行

1923 年 1 月,《神州邮票研究会会刊》创刊(图 4)。该刊是季刊,16 开本。第一期印有插页、该会职员合影,以及民国邮票版别对照图案。在征稿的通告中说明,来稿一经登载,以相当旧邮票作为稿酬。这也是一种新颖别致的付酬良策。

该刊虽然仅出版了 1 期,但其内容的广泛性和研究的深刻性,都是值得后世称道的。该刊发表集邮论著 11 篇,从部分文章的标题即可窥其全貌:《论收集邮票之益》(陶仰遽)、《邮票之价值》(黎永锦)、《新旧邮票说》(张悟庵)、《美国邮票收藏家之研究入微》、《邮票搜集家当注意水印》(柴冠群)、《邮票上之四大要点》(叶颂蕃)、《中国邮票史》(李辉堂)、《中华民国邮票考》(陈复祥)。更难得的是,该刊还积极宣传提倡健康的集邮活动。在《论收集邮票之益》一文中,鞭苔了当时社会存在的"销磨于征歌选色,驰逐风月场中,仅以马雀扑克资消遣"弊端,呼吁人们参加集邮——识世界各国之兴亡盛衰、欣赏名胜、了解各地物产、风俗、地理、历史的高尚娱乐。该刊印制亦很精美,首页印有神州邮票研究会职员(11 人)合影,史料价值更高。神州邮票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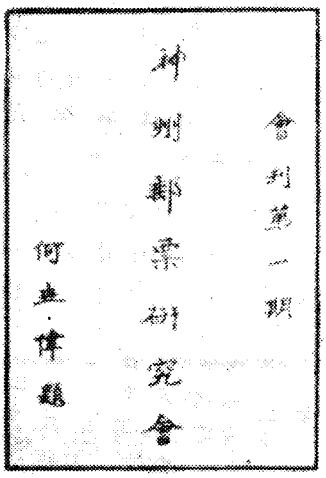


图 4　神州邮票研究会会刊

究会虽然成立不足一年即解散，但其在中国集邮历史上是开拓者。它标志着中国集邮者正在走向成熟，逐步探索创办具有中国风格的集邮团体和刊物，开始有组织地登上国内和国际集邮舞台，成为中国集邮事业的主人。这是历史性的进步。

神州邮票研究会 1924 年改组为“海上邮界联欢会”。发起人是周今觉、陈复祥、张棣村。集邮家张赓伯曾撰文回顾这段历史：“此会乃一聚餐会性质，系由会员迭为宾主，邀请集邮同好聚餐。无一定之时间，无一定地点。于席间讨论邮识，卖买交换，或互相携带珍品传观。会员约 20 人。此会行之一年，今觉君等谋扩充及久远之计，乃集议改组为中华邮票会。”(《邮典》1 卷 1 期)该会采取聚餐方式活动，美味加“邮”，尽可大饱口福眼福，何等潇洒自在。

1925 年 7 月，神州邮票会正式改名“中华邮票会”，其主要发起人是集邮家周今觉。他当时虽然开始集邮才两年多，但鉴于上海外国人集邮会对华人的轻视，下决心买进了华邮巨集，成为闻名全国的“邮王”。根据原神州邮票研究会创始人张承惠、黎永锦、张棣村等人的建议，周今觉决定牵头创建中华邮票会，担任了会长兼出版部主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出众的才华承揽了邮会的大部分开支和会务工作。(有关周今觉的集邮活动情况，在下一节还要专门介绍)

中华邮票会是中国早期著名的邮会之一，可以说是神州邮票研究会的继续，然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宗旨在会则中有如下声明：“广益集思，交换邮识，以研究专门为主体，以引导初恍为职志，提倡艺乐宗风，不取营利主义。”该会设有拍卖部、交换部，后增设出版部、藏书部、会计部、审察部等。集邮界著名人士陈复祥，张棣村、叶颂蕃、

张承惠、李辉堂、袁醴波、朱世杰、梁芸斋、谢鄂常等，先后担任各部负责人。1940年又设立总务、基金、发行三个部，其中总务部主任是集邮家张赓伯。

中华邮票会经常举办邮票观摩、邮票拍卖、中外集邮家联谊、专题讲座、邮史讨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这些活动基本都是在设于上海银行公会俱乐部内的会所中举行的；每月一次聚餐形式的董事会也在此召开。

为了向上海的外国集邮者显示华人国邮收藏的实力，1926年1月6日，中华邮票会在周今觉主持下在上海举办了一次银杯竞赛邮展。邮展邀请上海邮票会参加展出。当时由英国人雷本收藏的“红印花小壹元”旧票，在这次邮展上首次公开亮相，引起中国集邮界关注，第二年此票即被陈复祥购去。由于周今觉及中华邮票会集邮家们藏品丰盛、鼎力操办，使这次活动震动很大，华人华邮始令外国集邮者刮目相看。这是中华邮票会举办的最有生气的一次邮展，也是中国集邮界第一次主办的邮展活动。

新诞生的中华邮票会雄视邮坛，朝气蓬勃，很快便名扬国内外。当时该会影响最大的有两项活动：一个是每月举办一次的邮票拍卖，和上海的外国人邮票会拍卖并立不衰；另一个是于1925年10月开始出版会刊《邮乘》。(图5)1926年《邮乘》参加美国纽约国际邮展，荣获“特别铜牌奖”。(图6)这是中国集邮界首次在国际邮展上获奖，使中国集邮者闻讯无不感到扬眉吐气。

集邮家姜治方曾回忆他1925年底至1926年陆续得到从上海寄来的刚出版的《邮乘》杂志时的感受：“在青少年时代，有了七、八年集邮实践之后，获得这样一种专门性的杂志，真是爱不释手，浏览无遗。《邮乘》中‘邮界珍闻’、‘邮品披露’、‘记载’、‘杂俎’等专栏中那些知识性、趣味性的文章，我尤感兴趣；对刊物上面的一些专著，例如谈大龙邮票的版模、试印票、全张、纸质、刷色、胶水的文章，因我当时一枚大龙票都没有，读起来反觉兴味索然。我从《邮乘》的广告栏中看到国内几家邮票公司经营的业务和地址后，便分别写信联系。”由于《邮

图 5 《邮乘》和《邮学月刊》

图 6 《邮乘》1926 年获纽约国际邮展"特别铜牌奖"奖牌

乘》当年在中国为数不多的集邮者中确实起到了指导、交流和鼓舞作用，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邮乘》第 1 卷第 1 期为 32 开本，共 52 页。该刊文章汉英文对照，其中中文版 40 页，英文版 12 页，是一册中西合璧，装帧典雅的高档邮刊。当时据说仅印 200 册，在当年即为难得珍品，以后从未再版。《邮乘》创刊时，中国了解集邮是怎么回事的人仍非常少。为了扩大影响，吸引读者，还专门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宣传邮会成立和邮刊

创刊的消息。不料报馆也是极少接触集邮方面的稿件，结果报纸上将《邮乘》错印成《邮来》，令人哭笑不得。

《邮乘》于 1927 年 7 月停刊，先后不足两年时间，共出版 3 卷 8 期。《邮乘》在封内印有名贵邮票的彩色或黑白照片，2 卷 1 期还刊有周今觉的像和中华邮票会会所照片。该刊文章大部分由周今觉撰稿，内容偏重早期华邮珍品研究。刊物设有“邮界珍闻”、“邮品披露”、“社论”、“杂谈”、“会务报告”、“记载”、“读者俱乐部”、“新刊介绍”、“通信栏”、“后问栏”、“拍卖及交换章程”等栏目。在集邮刊物中独具特色。该刊最重要的邮学专著是周今觉著《华邮图鉴》。这篇文章系统研究中国早期邮票，全面考证分析版式，首倡我国赏析研讨红印花邮票的活动。至今仍有学术价植。

继《邮乘》之后，中华邮票会又先后出版过几种会刊。1928 年 9 月、1932 年 12 月—出版《邮学月刊》(图 5)；1936 年 1 月—1937 年 7 月，出版《邮讯月刊》；1936 年 4 月出版《邮典》一期(图 7)，为“中华邮票会十周年纪念创刊号”；1940 年出版《邮典》月刊，共出 5 期，至当年 11 月停刊。从此后，邮会的活动和邮刊基本都陷于停顿。

距离上海不到 200 公里的杭州，山环水抱，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城市。自宋朝开始，成为历代画家泼墨、诗人呕歌的著名旅游胜地。在上海的影响下，这里也成为中国集邮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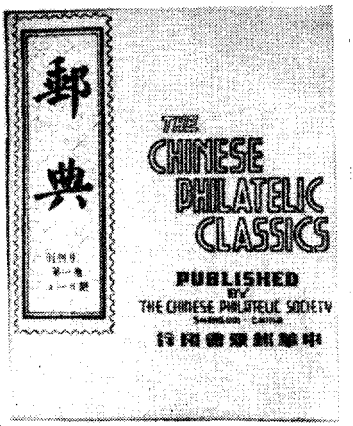


图 7 《邮典》

1925 年冬，“新光邮票研究会”在杭州成立。在会则中开宗明义地写到：“本会以广集同志共研邮识，引导初进，籍倡斯风，俾收攻错之益，不涉营利之途为宗旨。”该会发起者之一集邮家张赓伯在《新光月刊》第 7 卷第 2 期著《本会略史》一

文，介绍新光邮票研究会：

“本会最早创办时，系在民国十二年。当时仅杭州同志二十余人，公余互相集合。创设一新光俱乐部。丝竹金石、棋琴歌唱，无不尽有。最盛时期，会员达五六十人。惜只二年余，无形解散。独会中喜集邮之同志若干人，仍保持此会，且联合青年会集邮同志，筹设一邮票会。十五年一月，开始发行会刊。会所设于杭州严衙弄张包子俊君寓所。当时推柴冠群、凌能夏君为正副会长，张景孟君等为评议，子俊君任出版部兼会计部主任。并设研究、会员、交换等部。且有中、英、日文书记。规模粗备。外埠会员闻风加入者近百人之多。”

在新光邮票研究会里规定会员权利有：赠阅会刊、会员录和借阅图书；询问疑义及鉴别邮票；委托办理集邮事项；参加交换和拍卖邮票；刊登广告享受折扣等。该会常在周末举行邮品拍卖会。1925 年春节，新光邮票研究会曾在杭州基督教青年会举办邮票展览。展品共 40 余框，分珍贵邮票、实寄封、明信片三部分。历时 3 天的邮展，虽遇连日下雨，数百观众仍踊跃观展。绍兴、宁波、湖州等地集邮爱好者，还专程赶来参观，轰动一时。

新光邮票研究会是我国 20—40 年代历史最长、会员最多的集邮团体。以历年入会人数统计，会员在 5000 人以上，遍及国内外，其中有很多著名的集邮家。该会先后设立了华南、华北、上海、青岛、昆明、临榆、汕头、宁波、嘉兴、汉口、南京、江苏分会，还在比利时、香港、菲律宾、美国等设立通讯处。1926 年 1 月创办会刊《邮票新声》(图 8)，道林纸 16 开本，以撰述国邮为主题。该刊内容丰富、印刷精美，印数达 4000 份。还出版过几期专号，如《航空专号》、《中国邮戳专号》等。会刊先后改称《新光月刊》、《新光邮票钱币杂志》、《新光邮票杂志》。中途虽因战乱等几次停刊，到 1948 年止，共出版 15 卷 134 期，约 2700 余页。该刊是我国 30—40 年代水平较高、出版时间最长的邮刊。不仅保留了大量邮学研究史料，而且在国际邮坛为国争光。1935 年，《新光月刊》和《甲戌邮刊》参加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邮学刊物展览会，获得奖状，成为“万国邮学刊物联盟会”会员。1985

年，中国集邮出版社专门汇集《新光邮刊》22年间发表的重要邮学研究文章，出版了《新光邮票杂志文献选编》。1990年8月，人民邮电出版社为纪念新光邮票会成立65周年，出版发行《新光邮刊荟萃》。1981年，台湾集邮界也影印出版了全部的新光邮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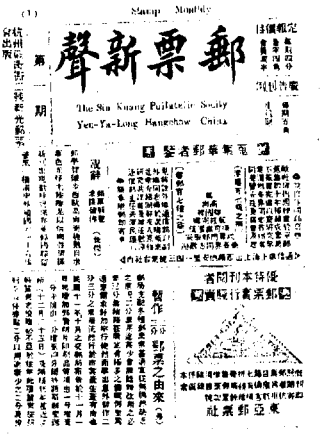


图8 《邮票新声》

旧中国集邮社团都是集邮爱好者自己组织起来的，经费、管理全部自己负责。会务也是骨干们业余义务所为。新光邮票研究会能持续20多年，取得卓越成就，重要原因：一是该会几乎集中了我国著名的集邮家，通过各种活动对各地集邮者指导帮助很大；二是注重邮德、诚心为推动提高集邮水平服务，赢得了广大邮人的信赖；三是有一批热心会务和邮刊工作的积极分子作骨干，像早期的邮会职员中，评议张景孟、徐荫祺、莫星白、李弗如，各部负责人卢赋梅、谢鄂常、沈瑞芝、蔡丽生、潘侠游、陈念祖，英、日文书记郑汝纯、王抱存等。历任的会长或理事长有柴冠群、凌能夏（现在美国）、阮景光、张包子俊、陈志川（在台湾病故）、钟韵玉、张承惠、王纪泽、马任全等，理事有梁芸斋、张赓伯、钟笑炉等。真是人才济济。

福建集邮家阮景光，是1925年成立的“福州基督教青年会集邮社团”团长（副团长是魏叔彝），新光邮票会成立后，仰慕其邮藏邮识之丰富，1928—1931年推选他担任新光邮票会会长。由于阮景光德高望重，学识超群，经集邮家周今觉推荐，1933年阮担任过维也纳国际邮展董事会董事，为华人争得荣誉。

新光邮票研究会第一任会长柴冠群（浙江上虞人，1889—1945年），又名柴英，号甸澄。其祖在清光绪年间为两淮盐运史，迁居苏州，乃殷实之家。20年代初，柴冠群开始集邮，不为当时盛行集外票风气

所动，较早重视并着手收集研究中国邮票。1922年神州邮票会成立时，他是会员之一。

20年代中期，时值中年的柴冠群，对参加集邮活动投入了满腔热忱。1925年，中华邮票会成立后，他担任了评议员。新光邮票研究会成立后，柴冠群又慷慨解囊，积极捐助。由于他德高望重，被会员们一致推举，成为新光邮票研究会第一任会长（任期1年）。

柴冠群20年代根据自己对华邮的深入研究，撰写过一些集邮文章在各邮刊发表，例如《邮票集家当注意水印》、《香港邮票与客邮之关系》等。1937年，日寇占领苏州时，柴冠群收藏的大量字画和邮票均被抢掠一空，使他心痛成疾，壮年早逝。

集邮家钟韵玉（浙江杭州人，1907年生）（图9），是一位报业专家。早年任过《绿玉月刊》、《绿痕娑刊》编辑，后担任《浙江新闻日报》副总编。1920年开始集邮，1925年担任新光邮票研究会图书部主任。1937年日军侵占杭州，他去上海，先后与张包子俊、史济宏等创办“奥伦多邮票公司”和《邮话》刊物；与钟笑炉、徐星瑛合办《近代邮刊》；与徐茂君合办“上海邮人服务社”，出版《邮人》季刊。同时担任新光邮票研究会理事和会员科主任。他通过提供集邮用品，举办国内邮票通信拍卖等，继续为集邮者服务。

图9　钟韵玉

抗战胜利后，钟韵玉回到杭州，担任新光邮票研究会杭州分会理事长，组织邮币展览和每周定期的邮票拍卖会，并在《工商报》副刊开辟了《集邮园地》周刊。1948年，还与蒋伯增等组织中国集邮协会，出版《中国邮报》，作为《浙江新闻》副刊。几十年来，钟韵玉像一位邮坛园丁，为会务为邮刊奔走操劳。他对集邮苦心孤诣钻研，学识深卓，文如其人。

集邮家张包子俊(祖籍安徽歙县人,1901年生于杭州)(图10),是一位阅历深广的中国集邮史见证人。集邮德高望重,经历了许多欢欣与磨难。其父张包镜如,清末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官授陆军少将衔,1927年退职从商,在杭州湖滨路专营清泰第二旅馆。张包子俊毕业于浙江法政学校后,在该旅馆担任总会计,是一名会计师。当时他还担任友声旅行团杭州团会会长,兼任浙江外海水警大队会计员,每月去镇海为该队催领经费,往来上海等地,兼顾旅行业务。因而见多识广,交友甚多。

图10 张包子俊

良好的家境和开明的家长,使张包子俊不满10岁就开始接触集邮。在其父祝贺30岁生日那年,浙江督军府一位姓汤的收发员,用"光复"、"共和"一元面值以下的邮票组成一个二市尺大的"寿"字作寿礼。张包子俊见了非常喜爱,几次向父亲讨要,但都没得到同意。后来因大雨堂屋漏水,其父才答应张包子俊把上面的邮票泡下好好保存。从此张包子俊与邮票结下不解之缘。收集邮票,他起先仍找那位收发员讨要,后来常随其父去上海,成了四川路、南京路上几家外国人开的邮票店的"老主顾"。在父亲的支持下,张包子俊逐渐拥有越来越多的各国邮票,还有了精美的贴票簿等集邮用品,邮识大有长进。

新光邮票研究会成立后一时没有活动场所。起初会员徐仁广把弘毅女中学的教室作为会所。两年后,张包子俊把会所设在自己家中,并将清泰第二旅馆作为每星期日该会进行邮票交换等活动的聚会场所。常常是集邮加旅游,全由他热情接待,使会友们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对外地会员,张包子俊也是细致周到地进行通信服务。当回函、出刊等会务应接不暇时,他的妹妹张包平之也帮助抄写信件、校对刊稿。更有意思的是张包子俊的两位妹丈王纪泽和钟韵玉也都是

著名的集邮家。一家人全把心思扑在为邮会和邮友服务上。张包子俊待人接物热情诚挚，喜爱集邮会友，广结海内外朋友，逐渐使新光邮票研究会声誉鹊起，四方同钦。

张包子俊集邮80个春秋，收藏品极为丰富。可惜他一生心血聚成的宝贵邮集遭受了两次惨痛的浩劫。第一次是日本侵略军攻占杭州，强住其家，使他30年代以前的集邮成绩毁于一旦。第二次是"文化革命"的抄家焚烧，使他重集的民国、解放区邮票、各国小型张、航空邮集、苏联邮集、日本邮集、民信封片专集等损毁的不成一集了，长期保存的大量珍贵邮刊也荡然无存。一位毕生耕耘的集邮家遭遇多灾多难，仍能泰然处之，保持乐观情绪，实在不容易。

张包子俊邮识渊博，文笔流畅，几十年来在各种邮刊上发表了大量著作文章。他为新光杂志倾注的心血更是非比寻常。如今他已91岁，但身体硬朗，仍担任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副会长，出席各种重要的集邮会议，热情关怀集邮事业的发展。他更以记忆力之强惊人，半个多世纪前的集邮掌故仍然记忆犹新，娓娓能详。

1925年，中华邮票会和新光邮票研究会的分别成立，是中国集邮界开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使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集邮活动，对全国以至海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国际邮坛上响起了中国集邮者的声音。

第二节　"邮王"周今觉

在中国集邮史上，集邮家周今觉是一位走在时代前面、影响了中国集邮发展进程的重要人物。他开创了华邮研究的许多领域，卓有建树；他创办的邮会和邮刊，中外同钦。

周今觉（安徽至德人，1879—1949年）（图11），名达，字梅泉（美权），在江浙和上海一带经营盐业及房产业。是一位大资本家、世代官宦子弟、集邮活动倡导者和邮学家溶于一身的上海名人。其祖父周馥官至清朝两江总督。周今觉曾游学日本，专研数理。邮坛元老郑逸梅

曾忆及他“不仅是位集邮家，又擅算学，复工诗文，对于经世之道，也有相当研究。”优越的物质条件和较好的文学素养，为周今觉收集和研究邮票提供了有利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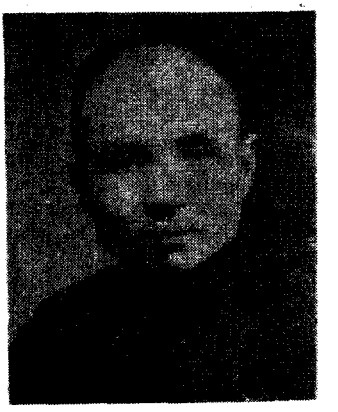


图 11　周今觉

周今觉在《余之集邮动机》一文中，曾叙述自己如何中年兴发，开始集邮：

“我的集邮动机，完全是我的儿子炜良造成的。民国十二年，他还只十三岁，就喜欢在我的来往信上剥取些不相干的外国邮票。我在别处写字间或洋行里，看见有新鲜的外国邮票，就剪下来给他。……我那时动了集邮的意志，便到处向人家打听邮票店，后来拿五元钱买了一大包各国邮票，又买了些成套的票子和一本最起码的法文图绘贴票簿，又买了一瓶胶水回来一枚一枚的贴上去。过了几天后，被炜良的英文教习某君看见了，他告诉我邮票是用胶水纸贴的，不是用胶水粘的。我于是又托他代买了一包起码的胶纸，又请他把他的邮集带来看看。有一天星期，在我家吃茶，某君同我及炜良三个人就开了一个小小的邮票展览会。”

就此入门以后，周今觉集邮进展神速，只几年功夫便名冠全国。举凡中国清代的珍罕孤奇票品，他均不惜巨资搜求，当时为购买邮票耗资达 10 万余元，先后购得施开甲、勒夫雷司、费拉尔等著名外籍集邮家的华邮专集。他的收集研究范围遍及远东各国邮票，十分丰富。而他对中国清代邮票、商埠邮票、上海书信馆邮票、香港邮票这四大类收集的尤为出色。他因获得号称东半球最罕贵的华邮绝品“红印花小字当壹元”四方连新票，被誉为“邮王”，著称世界邮坛。

“红印花小字当壹元”四方连新票原为德国人费拉尔占有。费拉尔死后，继承其全部邮集的中国籍夫人分几次将邮集拍卖。由于这位

夫人身边有一些精通集邮的亲戚出谋划策，索价极狠。周今觉为了不使这枚珍贵的四方连再落入外国人之手，“费尽苦心，盘算了一年之久”，终于在1927年以2500两纹银的价钱如愿以偿。这个数字创造了当时亚洲邮票买卖价格的最高纪录。

1923年，周今觉开始在上海《晶报》“社会定期刊”上发表集邮研究论文《邮话》，隔数天连载，持续达年。他还发表过其他一些集邮散文随记。

1925年，周今觉参与发起成立中华邮票会，一直担任会长，并以他雄厚的财力和渊博的邮识主编《邮乘》杂志。集邮家梁芸斋曾忆及：“今觉先生，在学术界为一代宗师，在集邮界为一代泰斗。先生掌中华会时，尝假银行俱乐部与各会董聚餐，月必举行，风雨无阻。先生崖岸自高，邮人与论文者，多短其骄。”（《近代邮刊》4卷3期）

周今觉抱负远大，他在撰文中立志以使“华邮见重于世界”为己任，为中华邮票会和《邮乘》等邮刊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在华邮研究中笔耕不辍，追根穷源，屡有惊人创见。1926年，他以创刊不久的4本《邮乘》参加纽约国际邮展，与31家世界著名邮刊一起陈列，引起强烈反响。评委会决定在仅设的2块银、铜奖牌之外，另制1块“特别铜牌奖”给《邮乘》。1926年和1927年，“英国皇家集邮协会”吸收周今觉为会员、会士，成为中国第一位获以上殊荣的集邮家。使中国集邮界欢欣鼓舞。

《邮乘》在中国集邮史中的重要地位已获举世公认。周今觉的一些观点和研究文章曾长期影响中国集邮界。他创“华邮四宝”、“民国四珍”之说；他对早期华邮中大量的疑点都发表过独到见解；他大力提倡收集研究华邮，并且在《邮乘》中编印英文版面，向世界宣传华邮。他对邮票的考证研究精益求精，既敢于大胆提出新观点，又敢于公开承认已经发现的失误。从一件事上就能够反映出他的严谨学风。

福州“临时中立欠资”邮票因存世稀少，伪票很多。周今觉早年曾购入蓝色欠资1分和2分票，并在《邮乘》第1期上刊登照片，向集邮界广泛介绍。10几年后，周今觉才发现这2枚票是赝品。为避免贻误

他人，周今觉立即在1940年《邮典》第3期上发表文章《余之错误》，对包括这2枚票在内的以往文章中的三处错误观点一一详细说明，给予更正。他在该文中说："余生平撰著邮学论文，极为慎重，有时亦不免小误，然一经发见，随时改正。"对纠正这2枚赝品，他非常认真，"余已撰就英文正误通告，印为小张，凡西人之藏有邮乘者，皆寄与一纸，并在美国某两种邮志上登载。以免误及后学。"如此对读者高度负责的治学态度，怎能不令国际集邮界刮目相看。

在周今觉的集邮活动中，也有不少使他遗憾之事。中华邮票会虽成立较早，影响很大，但发展缓慢。在邮会内，不仅经费由周今觉负担大部分，就连成绩斐然的《邮乘》，也很少有人知道一直在唱"空城计"，当年几乎全凭周今觉独自支撑。他在1935年中华邮票会1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演说中，道出了自己的苦闷：

"从前月刊（指《邮乘》）中论文，什九皆出于鄙人一人之手，读者当可覆按得之。殊不知其中尚有其他署名之论文，亦多为鄙人化名所作。此因篇篇皆用今觉之名，未免太觉寒俭，故隐其名而任其实。其用心之苦，又有谁知。然使鄙人一人包办撰稿，犹可力疾从公。无奈抄写也，编辑也，送印也，校对也，出版也，皆萃于我一人之身。虽寥寥一小册子，但以百忙之身，偷闲为之，亦殊不易。近年鄙人衰老多病，加以生计关系，不免分心。又无一人可为将伯之助。试思在如此情形之下，任能支持永久。鄙人在此10年中，糜费无数金钱与心血，终于力绌而止。"（《邮典》1936年创刊号）

这一段颇有牢骚的肺腑之言，道的是真情实意。大有大的难处，能者多劳终究要有个限度。一个连系各省市、影响国内外的全国性集邮组织，耗费极大，会务繁杂，仅赖会长1人的财力精力，哪堪负担。造成这种局面也有一些客观原因。

在20年代，中国绝大多数（包括一些集邮家在内）的集邮者，集邮才入门，主要精力都放在征换求索邮品上，对集邮研究尚不太感兴趣。《邮乘》又以高档票的高层次研究为主，一些有兴趣者亦接触不久，欲言又不敢论而无从论。绝大多数集邮者写不了或不敢写文章，

是症结所在。集邮家陈子绳在一篇《集邮漫话》中，非常形象地比喻：

“偏见以为邮乘等书，已臻高深境界，而国人集邮程度，尚在幼稚。譬之教育，前书固可供大学专院之用，而尚乏小学及幼稚园课文。初步集邮者，若告以海关初次，万寿加盖红印花暂作等，一枚之值，有需数十百千金者，靡不望而却步。”(《新光》5卷1期)

给大量“小学程度”的人看“大学教材”，这确是一种集邮家的脱离群众问题。追求提高，忽视普及，由此难免造成人才缺乏、刊物稿荒，邮会对大多数集邮者失去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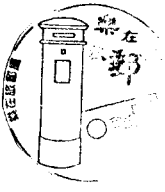
1932年“一二八”和1937年“八一三”日军先后两次武装进攻上海，使中华邮票会、邮刊一再中断。周今觉因营业失败，病体难支，30年代后期数次提出辞去会长职务和邮刊主编之责。但董事会一再挽留。1939年11月，周今觉等13位老会员在银行俱乐部以聚餐会形式召开会议，讨论修改新章程、改组会务管理等工作，并决定采取两项具体措施，以减轻会长的过重负担。一是在会内设立总务、基金、发行三部，其中总务部专门协助会长工作；二是要求各董事均负一部分责任，不能徒担虚名，并推举张赓伯、谢鄂常负责《邮典》编辑工作。与会者还一致表示希望中华邮票会能多造就国邮专家，恢复以前《邮乘》时代的国际声誉。这些使周今觉深受感动，同意暂时继续留任会长。

周今觉不仅在华邮研究方面贡献杰出，而且还为提高华邮的国际地位始终不懈努力。他多次在国际邮展中被聘为董事、评审员。1936年，纽约“万国邮票展览会”无视中华民族尊严，公然要把华邮降格为镀金奖级。周今觉闻知，愤然撰文斥责：“华邮降级，实为美国侮辱我国之见证，如该会不更正此点，余不愿担任任何名义，并不愿为丝毫之赞助(法、奥两会余皆捐款)，苟来聘书，当力掷还之。”“上海为一商埠票，乃得列入金牌级(与日本同级)，而堂堂一国正式邮票，乃屈居商埠之后，不亦怪哉！”“吾为美国邮界羞之！”“最后该邮展不得不将华邮升为金奖级，他才答应担任评审员，但未出席。权权报国心，感人肺腑。作为国际知名的集邮家，周今觉还曾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

发出的访美邀请。他因为惮于远涉重洋，没有成行。

华邮的国际地位，虽因周今觉的一再力争晋级升格，但是历届国际邮展上，还从未有中国集邮者的邮集参展。从1912—1936年，勒夫雷司、施塔等外国集邮家曾以华邮在国际邮展上先后赢得了4枚银奖、金奖、大金奖。这些虽然为华邮争了光，可中国集邮家脸上却未感到增加了什么光彩。由此，当时国内集邮界都希望周今觉能以他无与伦比的珍罕华邮去参加国际邮展，夺取金牌，使华邮和华人扬眉吐气。可惜这种愿望始终未能实现，被集邮界引为憾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日军铁蹄下的上海，限制私人汽车使用，周今觉即足不出户，以还巢居士为号，终日与几位朋友以诗书自娱，排解心中烦闷。周今觉善长书法诗赋，曾刊有《今觉庵诗集》。1944年6月，应陈志川之邀，撰书诗两首，表达自己爱国爱邮之心：



一寸山河一寸金，只余片叶在邮林；
落花三十三年梦，不见黄龙直到今。

未见龙飞第四春，轻帆细雨最愁人；
宫门颓倒生秋草，却守千年纸上尘。

1948年5月，周今觉在出席交通部邮政总局为祝贺邮展举办的宴会上致词："国际邮展有金牌、银牌与铜牌奖，我国邮票未能受人重视，未尝得高级奖牌，病在国际地位未能提高，国际宣传未尝努力。提高国际地位，有待乎举国上下之奋斗努力。"(《国粹邮刊》32期、5卷1期)他虽退隐邮坛之外，恋邮之情、弘扬国粹之志仍难以忘怀，闻者无不动容。

1947年，在周今觉手中保留23年的"红印花小字当壹元"四方连新票，以黄金330两转让给集邮家郭植芳。

郭植芳(广东中山人，1921—1967年)(图12)，生于澳大利亚，先后在香港、美国、英国上学，是一位纺织机械工程师，40年代担任上海永安纺织厂第一厂厂长。他30年代后期开始集邮，国邮新旧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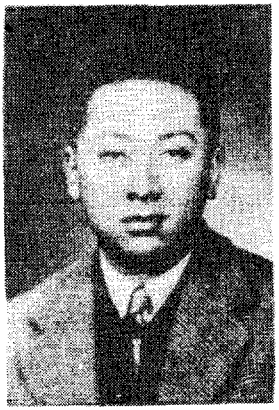


图 12　郭植芳

致齐备后，即倾全力搜集各种漏齿票，后来又收集研究实寄封和中国航空票。经过频年不懈努力，他的邮集蔚然可观。像著名的华邮珍品“新省航空”，不仅新、旧罗列，其实寄封达四五套之多。此时藏品之精已远在周今觉之上，享有“新邮王”之称。郭植芳搜集邮品不仅舍得巨资，而且比较全面。他的“大龙”实寄封有 99 枚之多，还有“大龙”票全张、万寿上海版大方连等。而周今觉的“大龙”邮票虽然在国内堪称首位，但“大龙”票实寄封在其巨藏中仅有几枚，相形见绌。原因在于，周今觉只注重新票，对于旧票，除非销戳特别清晰者外殊无兴趣，对实寄封的收集也因此忽略。海关大龙实寄封应属早期邮品中的奇珍，它不仅罕见难得，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为考证“大龙”票发行历史提供特殊证据。郭植芳集邮所以成功很快，除了经济实力雄厚外，还在于他肯倾听别人的意见，处事当机立断，邮识极精。

新邮王的出现，在集邮界成了轰动新闻。关于周今觉转让“红印花小字当壹元”四方连有各种议论，如“倦于集邮”、“经济拮据”等。当年集邮家严西峤曾撰文详述事情原委：

“邮王周今觉先生珍藏之天下一品红印花小字壹元四方连，近已让于吾友郭植芳君。年来郭氏大事搜求珍邮，所获相当繁富，而邮识亦突飞猛进。周氏鉴其热烈追求之诚，慨然以其最得意之鸿宝让与。或有以为周君乏资而货此者实谬。”

“抗战后，周氏年老多病，所有珍邮尘封于铁箱中不亲者经十易寒暑。周氏自思以绝代名姝深闭幽宫，将使年华老去，不如嫁之，听其择知音，诚达哉！”（《新光邮票杂志》14 卷 1 期）

郭植芳 1948 年定居美国。临终遗嘱：“红印花小壹元”四方连可

低价出让，但卖于中国人。后为香港集邮家林文琰购得，保存至今。

“红印花小字当壹元”四方连的事迹给人启迪。周今觉垂暮之年忍痛割爱，成人之美，郭植芳弥留之时不求善价，只售国人，使这枚华邮珍宝像接力棒一样，由“邮王”传给“新邮王”，再传给更新的邮王，始终稳操华人之手。近年，大陆集邮界有一种成见：见集邮家将珍邮捐赠国家就赞之爱国；闻集邮家出让珍邮就叹之散失。孰不知这两者都很正常，无可非议。集邮活动也像长江之水，后浪推前浪。当一位老集邮家告老、去世或别的什么原因出让自己的珍邮，对他是散失；可对后来者却提供了丰富收藏、提高邮集水平的机会，对这些人是网罗。有失有得、交班接班，正是集邮活动能延续下去的发展规律。邮人来复去，珍邮总存在，而且收藏、研究水平一代更比一代强。国家邮票博物馆保存完整的珍邮作资料很必要，但一份足矣。否则，都送到那里去，早期珍邮对集邮界的后来者岂不成了一去不复返的黄鹤。高水平的华邮邮集从何而来？对推动集邮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来说，捐赠和出让都有益处。不应厚此薄彼。

两代“邮王”，成就岂止对集邮收藏和研究的贡献，他们的钻研精神和爱国热忱，更值得后世敬仰。

在周今觉亲属中，儿子周煦良、外孙唐无忌也都是杰出的集邮家。周煦良（1896—1984年）是周今觉次子，著名的翻译家、教授。主要收集解放区邮票及早期明信片，邮识深厚。50年代，周煦良向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后转到北京）捐献了2500册外文邮刊，其中包括英国皇家集邮协会会刊《伦敦集邮家》300余册，著名的《大英集邮杂志》200余册。这批邮刊中许多是周今觉的遗物。唐无忌80年代成为上海市集邮协会专职干部，在集邮研究方面卓有建树。

周今觉三代均出集邮人才，是国内不多见的著名集邮世家。

第三节　上海、苏州的集邮图书和邮商

在上海、苏州地区的集邮者中，由于中青年知识分子较多，加上

吸收了国外的一些集邮研究成果，撰文著书的集邮者开始出现。

随着集邮活动的深入，我国一批集邮研究著述及工具书相继问世。

1926年3月，苏州卢义思邮票公司发行《中国邮票汇编》。此书由陈复祥、卢赋梅合著，对各种邮票刷色及变体（目录中称之为"奇特票"）搜罗的较齐全，成为后来集邮目录的典范。例如，书中排列的"大龙"邮票分为40余号，"小龙"邮票分为20余号，对民国邮票的各种纸质及刷色区别也一一注明。书中标出的邮票价格，比较符合当时的市场情况，很有参考价值。可惜由于当时中国集邮者为数不多，此书质量虽高，销路却不佳，印量很少。20年代中文集邮图书大都面临这个问题。

1927年，苏州还出版了五洲邮票社张景孟著《集邮须知》。书中介绍了许多邮票史实掌故，是中国最早以普及性、大众化为内容的华邮著作。

1928年，上海集古社先后出版了朱世杰的两本集邮图书。一本是《中国邮票目录》，内容还包括了商埠邮票和明信片，附图均刊载于卷首。此书被认为不足之处在于各种邮票均限正票，变体不列，亦无刷色之分，甚至不注明邮票发行年代。另一本是《中国集邮图谱》。这是中国最早的中英文并列、图案正变兼收的贴票册，出版后很受欢迎。该书编排分为正票、加盖、变体、纪念、慈善、航空等类，并附录客邮。每页1套邮票，标有齿孔、刷色等中英文说明。每票都附空格，供读者贴藏邮票。书的装订印刷亦很考究，漆皮封面，西道林纸彩印，八开横式、活页以丝绳联系。

30年代，集邮书籍的出版发行更加兴旺。

1930年出版的黄汉强编《中国邮票图谱》，由于"内容零乱不堪，附图新旧夹杂"，不受欢迎。同年，由北平迁沪的华北邮票公司主人李镜海，发行了一本英文卖品目录。其中附有蒙古邮票，每票前均注明斯科特及香槟目录上的票号。这一年，在上海的希腊邮商泊泼道拉夫也编辑出版了英文华邮目录，全书100多页，再版五次。

1931年，新光邮票会出版谢鄂常著《中国邮戳纪略》。1935年，中华邮票会曾出版秦瑞斋翻译小说《邮王》。1937年出版钱万能著《和尚也爱集邮》，是中国人最早编写的一部集邮小说。1938年，苏州五洲邮票社出版张景孟编译《邮苑珍闻》，汇集了50多篇各国邮票、集邮的轶闻。1939年该社又出版《标准中西地名表》，是国内首次编译的外邮参考工具书。一批集邮著作家随之脱颖而出。

1936年，上海邮商陈复祥等发起成立了“中国邮商公会”，成为中国第一个邮商界团体。在中国邮商公会的成立宣言中申明成立的缘由是：“鉴于吾国邮界日趋消沉，各地同业虽如雨后春笋，而市侩之流充斥其间，变谲百出。集邮家认为此中黑幕重重，致半途灰心者指不胜屈。吾同业若再不奋起，改善旧例，纠正恶习，则不免自甘堕落。而正在萌芽之我国集邮前途，亦将摧残难兴，不克普及矣。”这篇檄文愤世疾俗之情、溢于言表；倡导行业道德之心，难能可贵。公会成立后，各地邮商闻讯纷纷加入，人数达到几十人。1937年“八一三”战事爆发即告停顿。

1939年冬，陈复祥、朱世杰、张承惠、张包子俊等人筹议恢复中国邮商公会。鉴于以前组织不健全等问题，将会章重新修订，名称改为“上海邮商协会”，会员实行聘请制，凡正式邮商及集邮家业余兼作邮商，经该会加以聘请者，成为会员，如此可提高会员的声誉。会员会费每人每年10元。协会每月还编印月报，进行各项业务宣传，附在《新光邮票杂志》内发行。

从邮商公会的成立、改组到实行各项新规章，这个组织所追求的目标是弘扬邮德，鼓励敬业，交流信息。这样的组织，有利于促进邮商业务水平提高，有利于抵制唯利是图、欺行霸市的歪风，从而有利于广大的集邮者。实在是益人利己难能可贵的善举。

华人业邮者，继老邮商李辉堂之后，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上海最著名的邮商当属陈复祥、朱世杰、张景孟、陈志川、张包子俊、钟韵玉、徐子珊、钟笑炉等。张景孟原在苏州，张包子俊原在杭州，均为1939年为避战乱迁沪开业的。

邮商作为一种新兴的行业，具有其特殊的规律。陈复祥是其中邮识和素养俱佳的佼佼者。陈复祥(江苏苏州人，1902—1970年)在公共租界华童公学读书时开始集邮。从20年代起，他在上海蓬路住宅建立“中华邮票公司”(后改称陈复祥邮票社)，经营邮票业务。以售价低廉，品相上乘，绝对保真著称，是我国邮商元老之一。他邮德高尚，常向国外交换或收购早年外流的华邮珍品，转售给国内集邮家。他邮识精深，阅世之目，淘沙沥金，当年中国邮商所盖的“保真”戳，只有陈复祥的最早在国际上得到承认。如：“新疆航空票手盖木戳”，在国际邮市经他鉴定签章，须付200元(法币)。陈复祥先后被新光邮票会和中华邮票会聘请出任审查部主任。

陈复祥对清代发行的万寿票鉴别极为精到。一位集邮者买了1枚万寿上海版6分改8分大字长距离旧票，送到陈复祥处请求鉴定。经他辨认后发现是伪造品。造假者把小阿拉伯8字细心描成大阿拉伯8字，用的墨油颜色虽一样，但执票在强灯光下一照，就看出8字的颜色特别浓厚。于是陈复祥以新光邮票会审查部名义在票背面盖上“以小改大”4个字，让他去向出售者交涉。邮坛名家袁寒云邮集中的许多珍品，亦曾被陈复祥鉴定出是假票。例如1枚万寿6分上海版旧票，经他识破是用药水将加盖字体洗去改成，造假手段十分罕见。

陈复祥对邮品鉴定十分严肃认真，对自己把握不准的邮品绝不轻易下结论。40年代初，四川集邮家叶季戎曾请他鉴定“福州对剖票封”真伪，由于缺乏这方面资料，陈复祥回信表示“恕不能为兄签字保真”。为了信誉不怕丢面子。

陈复祥生平撰写的邮学论著很多，亦著有《红印花暂作小二分版号识别法》一书，被誉为研究红印花邮票的经典之一。

陈复祥的多部早期华邮邮集也很著名。其中《海关邮戳集》和《商埠邮戳集》都是海内罕见的邮史资料。前者1957年荣获莫斯科国际邮展银质奖。集邮家陈葆藩曾在《新光》第8卷第4期撰文介绍陈复祥的集邮成就：

“复祥君潜心于国邮之研究二十年矣。学识湛深，经验丰富，为当

代邮界不可多得之人才。其邮集悬格甚高，非双连以上不能入选，前清名贵之品，有藏至数全格之多者，大方连四方连更无论矣。其于版式异同，刷色浅深，以及齿度纸质之差别，蔑不罗致骈列，蔚为大观。君虽为国内著名邮商，而集中所有，虽重金不让，盖亦向吾所谓以集藏为主售让为从之俦也。匪特以集藏为主，抑且钻坚研微，惟日不足，是即于集邮贩邮之外更致力于邮学之研究者也。”

20—30年代，国家邮政部门尚无专为集邮者服务的门市部或窗口，邮票商成了向集邮者提供早期华邮和外国邮票的唯一渠道。各种邮社，也是向广大市民宣传集邮知识的橱窗，所以，凡是集邮比较活跃的地区邮商必然繁多。

30—40年代上海的主要邮票社(公司)有：

名　称	地　点	负责人
美古邮票公司	爱文义路	休门(俄)
奥伦多邮票公司	爱文义路	张包子俊
罗门邮票公司	环龙路	罗门(俄)
现代邮票社	同浮路	严西峤
黄浦邮票社	南京路	包志良
民主邮币社	福建中路	王松龄
大同邮票社	四川南路	俞虞臣
大同邮票公司	林森中路	胡新
万象邮社	南市万竹街	包正力
恒茂集邮所	四川路	柳至川
光华邮票社	贝禘尘路	黄德光
万能邮票社	康脑脱路	钱万能
中国邮票公司	中正南二路	陈海忠
华外邮票社	环龙路	谈贵生
国宝邮票公司	富民路	吴乐园
合众邮票社	成都路	徐美嶷
近代邮票公司	浙江路	钟笑炉
新生活邮票公司	海宁路	王明才
华中邮票社	四川路	梁绵洪
德浮邮票社	静安寺路	沈德浮
中国通讯之友社	戈登路	傅湘洲
国粹邮票公司	霞飞路	陈志川

集古社	吕班路	朱世杰
真光邮票社	霞飞路	陈志新
五洲邮票社	愚园路	张景孟
绿光邮票社	新闸路	张天铎
成记邮票社	四川路	袁必成
陈复祥邮票社	蓬路	陈复祥
上海邮人服务社	宁波路	徐茂君
中国邮学图书公司	吉祥路	谈佐麟
斯蒂芬邮票公司	静安寺路	泊泼道拉夫（希腊）

到40年代初，整个上海的邮票店多达40余家，比较集中的地方主要是南京路、静安寺路和霞飞路一带。而不挂市招兼营邮票作副业者也有50余人，此外还有许多摊贩。当时一些邮社的服务项目颇广，例如上海邮人服务社的业务范围包括：

(1)代售集邮用品书报杂志；

(2)代购代卖各种日用物品；

(3)代办邮包报送运输保险；

(4)代理出让邮票及集邮品；

(5)代买邮局最新发行邮票；

(6)代查上海邮界征信事件。

中国邮学图书公司做为全国唯一的专营邮社，具有自己的特色。业务范围包括买卖绝版图书，经销全国各地邮刊。为了方便读者选购、选订各种邮刊，该公司还开办试阅业务，附款30元即可将各种邮刊各配一份奉寄。这样灵活周到的服务，自然受到集邮者欢迎。

中国通讯之友社则是另一种经营风格。它出版一种《通讯之友》特刊，以刊会友，以友促销，因而在全国各地拥有数千名社友。该刊除报道集邮消息、介绍邮友相识、为社友代办购买邮票(不取手续费用)外，还专门开辟专栏指导初集邮者，解答集邮方面的各种问题。这种以研究切蹉邮识为纽带，以自办邮刊为媒介的经营方式，当年有不少邮商相延成习。

为了扩大影响，各邮票商社还大量在各种报刊上登刊广告。当年

上海各种邮刊上邮商广告占的篇幅很大，有时达到总页数的三分之一。广告费亦成为许多邮刊的一项收益。

各邮票社为了招徕顾客，还不断推出花样翻新的促销宣传，很能吸引集邮者。例如，上海绿洲邮票社曾设计出售一种邮囊，每个放有50枚外国邮票，顾客交国币5元可以预定全年，每月收到1封，里面邮票不重样。更有趣的是顾客还有可能获得4次连环赠品：

(1)邮囊袋中封入各种名贵票，如"万寿"全套票、商埠票之礼券20余种。

(2)邮囊袋上印有号码两个，如与航空券头奖末两字相同者，赠德国活动电影机一部，影片500尺。

(3)积满不中奖邮囊空袋3只，可换赠邮券1张，依照中央储蓄会开奖，如中特奖得各国不同票5000种。

(4)积不中奖之赠邮券两张，可换小小克罗米银邮票钳一把。

如此连环奖品，颇能引人乐趣。经营有道，各施其妙，灵活的经营作风是上海邮商的特色之一。

上海的邮商业务对象除了国内各地的广大集邮者外，有许多还打通国外渠道，从事邮票进出口业务。有时，邮商还协助为国家邮政档案提供收藏品。

全国各地集邮活动的逐步开展，影响所及，引起了国家邮政当局的反思。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邮政主管部门都将本国从第一套至今发行的全部邮票，留出若干份，作为邮政历史资料档案长期保存。早在30年代，中华邮政当局也曾有过这样的计划，由于当初没有专人保管，到后来进行整理的时候，才发现清代邮票缺少很多。

1936年，邮政当局决定补上这一课。于是专门将所缺邮票开列出清单，向上海的几位著名邮商招标求购，以便能凑成多部全集。最后大部分由邮商朱世杰中标，总共售出7000多元的邮票。据说由于标单是以斯蒂芬目录价格为依据，普遍偏低。这些邮票实际按当时市价，要超过3万元。其中包括石印蟠龙2元票10枚、5元票6枚，北海票10套，商埠票大全套3部，上海工部局未加盖票全套等。这也是

邮商对国家邮票档案的一份贡献。

朱世杰为了解决邮局支付巨额票款资金困难，主动提出，可以邮局库存的限滇省双单圈票各100套、限滇省京烈票100套按面值计算，楷字民国欠资票100套按香槟目录价计算，折成票款。这一次空前绝后的官方与民间的交换生意，既成全了国家收购珍邮计划，又为集邮界保留了一批后来极难得的民国邮票。

邮政总局经过补充完善的这些邮集，共有10部，其中完全是正票，变体和旧票都不列入。这些邮集来之不易，既是国家文物收藏品，又可作为邮政业务研究资料。总局原计划分发给全国的管理局各藏一部，因抗战事起，即将这些邮集密藏于上海银行的保险库中。

苏州是一座建城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古城，名胜园林遍布全城，保持着“人间天堂”的秀美风韵。苏州还是文萃之邦，受上海的影响，民国初年就有了两家邮票社，一个是卢赋梅开设的卢义思邮票公司，出售中国邮票为主。一个是张景孟开设的五洲邮票社，中外邮票兼备。30年代初，陆志新又开设了真光邮票社。抗战爆发后，五洲、真光两家先后迁沪营业，苏州又新开设了5家邮票社。

徐逢生、俞大雄是苏州最早的集邮家。20年代，这里曾成立“大华邮票会”。1943年前后成立新光邮票会苏州分会，徐逢生任会长。会员们常在观前吴苑茶叙，来者不一。

1936年苏州邮人联谊会开始出版《苏州邮刊》。

受上海影响，1929年9月1日由谢慎修、林祖光等人发起成立了“芜湖大同邮票会”。1936年8月，该会曾举办邮展。

1936年5月5日，“嘉兴邮票研究会”成立，正副会长是崔福隆、基础民。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的半个世纪中，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不仅是中国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也是中国集邮活动最活跃的地区。无论从邮品收藏、经营、邮会组织、活动、邮学研究、出版等各方面，都拥有雄厚的实力，成为中国集邮事业最宝贵的发源地，它对全国集邮活动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宣传、指导作用，也成为与全国各地、

世界各国交流信息和邮品的主要集散地。因其老集邮家多、珍贵邮品和邮史资料丰富、邮学水平首屈一指，时至今日，上海仍被中国集邮界视为潜力巨大的“邮”矿。

第四节　北平邮市

北平是一座古城，曾为清政府国都所在。北平城里，前清遗老、民国新贵众多，不仅地上地下保存着大量历史文物，在一座座豪门富户的深宅大院中，还蕴藏着无数的珍邮佳品，可惜无人识之，任其毁散。清末，不少外国人以“客卿”身份杂居京师，他们之中有很多人从事集邮，影响了一些与之交往的中国人热衷此好。但是，老北平民风淳朴、思想保守，具有搜藏癖好的人士，多以古玩、金石、字画自娱；对洋人搜集邮票，多视为雕虫小技，不屑一顾，因而北平集邮风气兴起较上海等地晚得多。中国北方、西南等地区情况也大致如此。

清末民初，在外国集邮者影响下，从事集邮活动的中国人逐渐增多。他们对中国早期邮品的刻意搜求，使北平出现了一个新行业——邮市。

北平白纸坊曾设有造纸作坊，收购大量废纸作原料。从清代起数百穷人在此拣卖烂纸为生，烂纸中旧信封很多。集邮在北平出现后，这里一下成了老票旧封藏龙之地，被誉为“邮票之乡”。

昔日的“废纸”成了宝贝，于是逐渐地出现邮市活动，并有了分工：有些人常去富庶人家挨门逐户收购废旧杂品；有些人专对收购来的废品进行挑选，将其中旧邮票、信封整理加工；有些人则专在出售废旧品的晓市上，摆地摊做起卖邮品的生意来。清末起，牛街出现了5个回族家庭20多人经营邮票，这里又被称为“邮票之街”，成了一些邮商和老集邮家经常用心查访之处。

牛街的杨启明父子，世代经营收购出卖烂纸行业，人称“烂纸杨”；后改经营邮票生意，改称“邮票杨”。

早在民国初年，北平的各大商号门前，都挂有一个竹编篓子，上

写“敬惜字纸”4个大字，店里用它存放废纸、旧信封。杨启明的父亲杨永福每天走街串巷，收拾篓里的破烂废纸。回家整理分类后，废纸卖给造纸作坊，把旧信封上的邮票带纸边剪下，水泡后分类。每100枚捆成一捆，取名“豆腐块”。一般种类的邮票售于出口商，其中稍好些的售于国内邮商或集邮家。最忙时，全家出动加工配制种类繁多的袋票。幼时的杨启明在家中深受熏陶，也爱上这一行。

1932年，杨启明开始和父亲一起串街收买旧信封。天天与邮票和邮商打交道，谈论各种邮票知识，使他的邮识与日俱增，对各种邮品的印刷特点、版式区别了如指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杨启明兄弟5人，全部经营邮票。哥哥杨启增在北平东安市场摆邮票摊，弟弟杨启亮和杨启勋在天津劝业场开设东亚邮票社。杨家的邮票生意越做越大，转而向收烂纸的人家去收购。例如，北平邮局每年将大量废旧的挂号信封及废纸卖给“泉聚德纸庄”。他们就少付些钱从纸庄收的废纸中拣出信封，售给集邮者，获利甚丰。40年代杨家还专门让老五杨启彬上大专学英文，并参加美国集邮协会和邮商协会，重点开展邮品进出口业务，使在天津开办的东亚邮票社成为国内外闻名的邮社。

杨启明（北京人，1918年生），早已从“邮票杨”变为“集邮杨”了。杨氏父子创办的天津东亚邮票社于1956年公私合营。1958年，北京东亚邮票社被并入中国集邮公司，杨启明成了国家干部。昔日的邮商和今日的集邮行家判若两人，集邮使他的生活道路发生变化，令人欣慰。

20—40年代，北平牛街居住的5个经营邮票回族家庭概况：

（1）韦诚起、韦崇亮开设北平诚记邮票社；韦崇福、韦崇泉、韦崇岐开设天津诚记邮票社；韦景贤开设北平邮币社。

（2）李长海在上海开设邮票社；李长山开设天津国华邮票社。

（3）杨永福、杨启增、杨启明开设北平东亚邮票社；杨启亮、杨启彬、杨启勋开设天津东亚邮票社。

（4）黑玉珍、黑文彬开设天津国华邮票社；黑玉祥设摊售卖邮票。

（5）沙伯泉、沙永泰、沙永华开设北平志生邮票行。

5个邮商家庭父子上阵、兄弟合作，在经营中还互相扶持、两家联营，这种情况在中国集邮史上确属罕见。此外，当年开办北平"中原邮票社"的沙琪（家住崇文门）也是回族人。如此众多的回族邮商，也是北平邮市一大特点。

牛街对从事邮商业者来说确实是个理想的地方。这条街上不仅有很多废纸商店，还邻近北平财政部印刷局，民国邮票大部分由这里承印，时常有一些试印样票流出。这里距离晓市也不远，摆摊或收购都方便，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占全了。

昔日北平的东安市场是个别具风格的小天地，各种风味小吃、民间玩具吸引着妇女儿童驻足，古旧书摊古玩店则令文人墨客留连忘返。1925年前后，由班子华在这里开设了北平最早的邮票店"华通邮票社"，其后陆续出现10余家，成为北平最大的邮市，吸引中外集邮者长期光顾。一些外地集邮者来北平，邮市也成了必去朝拜的"圣地"。北平老集邮家许多珍邮绝封都是从几处邮市购换来的。当年，北平没有集邮团体，邮市无形中起到了联络集邮者、交流集邮品的桥梁作用。许多老集邮家至今仍怀念那时在邮市上结识的邮友。

用今天的眼光看，早期拣拾收购旧信封的小贩和加工出售旧票封的邮商，他们当年从事的职业称得上是抢救文物，使大量早期珍贵邮品、邮史资料免遭化为纸浆的恶运。对中国集邮事业来说，"邮乡"、"邮街"、"邮市"功不可没。

集邮家施秉章（福建长乐人，1904—1970年）少年时代开始集邮，毕业于燕京大学。20年代即参加国外集邮协会，开办寰环邮社，是北平早期著名邮商之一。1926年成立的北平邮票交换会，他是发起人。因为他邮识邮品均丰富，交友遍天下，当时欧美集邮家大多都与他通信交换邮票。他还编过《集邮说丛》两期，介绍中外邮讯。解放后，他念及邮市清淡，于1953年陈书国务院，建议国家成立集邮公司，满足集邮者需要。郭沫若亲自回信表示赞同。1966年"文革"时期，因他多年与各国集邮家通信往来及信仰佛教，被诬陷为"里通外国"，被捕入狱。不经审理就关押4年之久，1970年病死狱中。他一生

收藏的邮品全被抄光。

20年代中期，北平的邮商还有李纪润，他在东交民巷瑞金大楼开办华北邮票社，是当时北平规模较大的邮票店，以从国外购进早期清代邮票，售价优惠而闻名。

当年北平还有几位外籍邮商。如东交民巷曾有一个英国人芬太太开的美术社，她把中国邮票寄回英国，换来外国邮票在门市部出售。王府井大街大阮胡同犹太人古孟开的古孟洋行也收售邮票。

20年代初，北平地区的集邮活动已有较大发展，尤其在文化教育界、工程医学界的知识分子中，人数较多。其中邮识藏品均比较丰富的有：

燕京大学教授陆志苇，因为与美籍校长等接近，吸收了国外集邮经验。他藏有多种变体票专集。当时北平邮人都乐于听他纵谈邮经。

篆刻家吴南愚（江苏人）在北平绒线胡同开设金石字画店铺。镌刻印章并出售美术品和集邮用品、邮票等。他自己专集民国邮票，早年还搜集了较多的邮票试印样票和各种趣味品。邮集编排的十分细致，每页都写有详尽说明。吴南愚还担任了甲戌邮票会北平通讯处主任。日军侵占北平后，因生意清淡，他被迫将收藏的邮票全部出售，放弃集邮，举家南迁。40年代初病逝。

早年，集邮者多是重票不重封。曾留学法国的北平集邮家赵品三独具慧眼，以搜集民国早期票和实寄封、邮戳、明信片为主。著名的限新疆省贴用木戳航空票实寄封，就是他当年辗转托人收藏的，成为绝品。许多有历史价值的首航封能流传至今，赵品三都付出过心血。30年代，赵品三担任新光邮票会华北分会负责人，影响很大。可惜北平沦陷后，他失业在家从事邮票通信买卖，藏品逐渐散尽。

北平当时还有两处集邮者比较集中的单位。一个是铁路系统。1921年起，集邮家赵善长、王聘彦等在陇海铁路驻京总工程处任职，他们后来成为甲戌邮票会的发起人。集邮家吴福保、李纪润在北平铁路局任职。吴福保曾于1927年在东单三条胡同口开设“协昌邮票商行”，专营邮票及集邮用品。

另一处是北平协和医院，中外主任医师中有很多集邮家。如美籍华人谢和平、美国人劳克斯、德国人伊大夫、中国医师伍长庚、赵孝博等。在谢教授的影响下，他的得意学生，后来的医学专家林崧也成了著名的集邮家。

北平当年知名的集邮家还有中国银行行长许伯明、银行职员水泗宏、海关职员梁芸斋、育英中学教员崔显堂、电报局职员杨历清、爱新觉罗氏裔族裕崧庭、邮商汪子年、王敬斋等。

集邮家邹毅（辽宁人，1915年生）1934年赴日本留学时开始集邮，30年代末来到北平，广泛结交邮友。他回顾自己的集邮生活十分感慨："在旧社会，一些人以吃喝嫖赌作为消遣，最后走向身败名裂的地步。而我由于热爱集邮，稍有富裕，就想购买邮票；稍有时间，就想整理和研究邮票。因此也就无暇也不想做其他浪费金钱和浪费时间的事情了。在我熟悉的很多老集邮家中，很少发现有不良嗜好或恶习的，这不能不算是集邮的功效吧。"（《集邮回忆录》1987年版101页）

当年北平的集邮爱好者虽未组织集邮会社，但相互间的往来、晤叙还是经常不断。一些人还不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提倡集邮活动。1925—1926年间，当上海的中华邮票会和杭州的新光邮票会成立后，北平的许多集邮者闻讯纷纷参加这两个邮会。成为两会的骨干力量，使北平与上海邮友间的往来联系日益增多。

1926年，在集邮家施秉章的倡议下，"北平邮票交换会"成立。这是北平创建的第一个集邮组织。先后吸收了50多名北平和外地的会员。在北平的会员每星期日在北平青年会聚会，谈邮研戳，互通有无。还编印出版了两期《北平邮票交换会会志》，上面登载了几十位早期集邮家的姓名住址，成为方便邮友联系的通讯录。交换会由艾德殷任名誉会长，王翰祥任会长，施秉章任书记员。

1934年9月1日，国民政府交通部决定建立邮票特销课，专门负责向国内外集邮者出售集邮邮票。不久，北平邮政大楼设立了集邮组（同期上海邮局也设立了集邮处），向集邮者出售集邮邮票、明信片等。但因为品种很少，集邮者不满意，名存实亡。

第五节　天津邮坛

距北平 140 公里的天津，乃京东巨埠，工商贸易、经济文化自古繁盛。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开放为通商口岸，出现众多外国租界区和外商外侨，使这里弥漫着一种殖民地特有的气氛。

集邮家杨耀增曾撰文谈到天津早年的集邮状况："20 年代中期，天津的集邮交换活动，还只局限在一些外国人（有极少数中国人参加）之间进行。天津邮人们的邮友定期集会，是从 1930 年以后开始的。内容包括谈邮、交换和聚餐。天津的第一次邮票展览和成立天津邮票会，全是在聚餐会上定的局。"天津不愧是商埠城市，早期开始的集邮活动和上海的邮会一样，以聚餐会形式联系晤面，吃喝玩乐融为一体，既时髦又气派。当时天津著名的集邮家有：欧国材、黎自牧、雷润生、宋莘耕、严台荪、范兰如、陆逵九、李东园、郭望渠、孙宝琳等。

李东园（1901—1979 年）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受神甫、修女影响，开始集邮。他主要收集清代票、商埠票、样票、变体票及邮史资料，兼集钱币。他较早重视收集实寄封，当年"大龙"实寄封在天津集邮家手中仅有 3 件，其中 2 件为他所藏。他对集邮研究也很精道；1940 年被选为天津邮票会副会长。《天津邮刊》头两期文章，几乎全出自他的手笔。1947 年，李东园因经商去台湾，一直滞留，以制做蝴蝶标本为业，继续从事钱币、邮票研究。1959 年在台湾《中国集邮半月刊》上发表《五十年集邮回忆录》，成为天津邮史的参考资料。1979 年李东园病逝台湾。

范兰如（天津人，1903—1976 年）早年经营裕丰永酒店，30 年代末开始集邮。由于不惜重价搜求珍罕品，使他的清代、民国邮集除"红印花小壹元"和"大龙"宽边黄 5 分银新票外，大体齐备，还有大量样票、试印票、变体票等。解放战争时期的各解放区邮票，他多整版收集。

孙宝琳（河北沧县人，1906—1942 年）早年在法租界任电灯房职

员，重点收集变体票和封片，不仅藏品宏富，而且见解独到。他曾撰文自述搜集变体票的四大益处：①1枚有1枚的趣味，绝不雷同；②价值不如珍罕品高贵，但趣味不在珍罕品之下；③不受套数限制，即使1枚亦可为一集；④可遇不可求，无意得之，妙趣横生。他的这些新颖观点，在当时集邮界中影响较大。他1942年病故时年仅36岁，甚为可惜。

1930年5月，爆发了军阀大混战，战祸蔓延，使北平等地物价飞涨。在中共领导下北平邮局员工在向邮政总局提出要求改善员工生活待遇的要求遭到拒绝后，成立了怠工委员会，从7月23日起举行怠工。怠工中，除向各地停发新印的邮票外，还对北平邮局收寄的全部平信实行免费寄送，在未贴邮票的信件上加盖“怠工期间免费寄递”的圆形戳记。

天津邮务工会随及响应，于7月25日也举行怠工，亦使用与北平相类似的特制邮戳。这场怠工风潮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答应复工条件，北平于7月27日，天津于29日先后复工。这种怠工邮戳引起了集邮者的兴趣，成了热心收集的珍品。当时，天津有一位姓赵的集邮者，从天津邮工怠工首日到尾日，每天都向各地寄出盖有怠工戳的信封数10枚。同年，天津出版的《北洋通报》刊载了他收集的首日、尾日实寄封照片，为这种特殊的邮品留下宝贵的史料。

由于天津集中了许多有钱的中外集邮家，大量邮商应运而生，生意兴隆。当年北平的邮商，也视天津为销售珍邮的“宝地”。30年代，各家尚未在天津设点，遇有名贵邮品，往往不辞辛苦专程来津送票上门。杨耀增对30年代中期北平与天津邮商的经营方式作了比较：

“我感觉到北平邮商的售货方式，与天津有些差别，因为那时天津的沛记、小琅环、文利诸家，基本上是以经营邮票为主，他们备有大量的贴票本，供初集者自选（贴票本上像大、小龙、万寿及加盖等旧票很普遍），哪怕挑选时间长些，也是热情接待。北平的邮商则不然，早年在东安市场设肆的几家，几乎全是经营古玩、玉器、字画、金石为主，柜上大多摆些袋票或者外国票，如果顾客指明需要何种邮品才从

插册中取出供选购。”

“我对北平邮商的另一个印象，认为他们虽然起家于北平，但当生意做到稍有规模后，都另辟码头到天津去开设分店，而这些分店的营业规模、名望，往往要超出北平的本店。40年代的东亚、诚记即是如此。一些活动范围小的，像国华、寰球、谊和、良友（后改名新中华）邮票社，索性一古脑搬到了天津。”（《集邮回忆录》1987年版151页）

天津20—40年代的邮票社（根据《津门邮事》资料整理）

名　称	地　点	负责人
（1）20—30年代：		
维兼邮票社	张庄大桥义庆里	张维廉
沛记邮票社	西门脸115号	王沛臣
小琅环邮票社	南门西路	唐伯昆
盛大邮币社	法租界26号路	钟耀琦
文利邮票社	泰康商场楼下	樊文炳
万国邮票社	古楼西九道湾胡同	刘钟元
环球邮票社	（北平邮社的分社）	施秉章
（2）沦陷时期：		
国华邮票社	天津市场楼下	黑玉珍
昌记邮票社	滨江道天津书店内	柯缓庭
红星公司邮票部	英租界56号路	王日礼
万邮馆	海大道74号	黄钟善
久华邮票社	海大道思庆里	雷润生
寒洋邮票社	黄家花园	杨汝泉 韩绶铭
东亚邮票社	（北平邮社的分社）	杨启亮 杨启勋
北京邮票社	（北平邮社的分社）	韦崇亮
（3）抗战胜利后：		
艺光邮票社	河东金汤大马路	乐美琮
国际邮票社	小白楼	詹庆宝
春记木器行	徐州道口	赵鹤龄
科学邮票公司	兰州道际昌里	张宝良
陶然集邮社	河东娘娘庙街	张子明

除上述邮社外，天津还有一些不开门市、在家兼做邮品通信交易

者。凡此种种，使这座商埠城市的邮票市场显得非常活跃。邮票社繁多，是天津解放前集邮活动的另一大特色。

天津的邮市也和北平一样，许多邮品来源于废纸店。像天津第一家正式开业的沛记邮票社，其中国邮票主要靠门市收购和废纸店供给。当年天津西马路一带废纸店很多，王沛臣（回族）最早动手，从这里买到大量的旧信封，经过挑选、剪洗出售、大发利市。小琅环邮票社原是书画铺，店主唐伯昆除把收购来的旧信封分成实寄封和零票出售外，把一些残破的、品相不佳的邮票也不扔掉，精心拼剪贴成花卉、人物等美术工艺品出售，新颖别致，把邮票生意做活了。

1931 年 3 月，在天津中山公园举办过一次世界邮票展览，这在华北地区是首次。邮展是天津邮友们在一次聚餐会上发起的，大家公推市立美术馆馆长、集邮家严台荪负责操办。展品中，外国邮票占1/4左右，中国邮票从“大龙”至 1937 年为止的普通票、纪念票、限省票等基本齐全。展出 7 天，不收门票，观众达 4500 多人次。以后，西沽北洋工学院的友联集邮会也举办过一次各国邮票展览，规模较小，展期 1 天。

1936 年，天津出版的综合性小报《语美画刊》上，开辟有《集邮专页》，由胜芳、王一介主编。每期连载《国邮图要》，刊登原票图案。提供邮票的是来自北平、太原、天津的 3 位集邮家吴南愚、黄绍斋、郭望渠。郭还担任甲戌邮票会驻天津办事处主任。由于天津华人的邮会、邮刊均创办较晚，这份小报上的专刊，成了天津较早的中文集邮专刊。

30 年代天津出版的《北洋画报》也刊登过一些有关集邮的文章。

第五节　走向全国各地

当集邮在京、津、沪、杭比较快发展的时候，随着各种传播媒介的宣传和国内外集邮人士的交流，集邮逐渐向全国各地扩散，形成各自的不同特点。

东北地区清末即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染指。民初，受日本人集邮影响，少数中国青年学生开始爱好集邮。20年代，辽宁地区集邮组织和邮刊相继问世。“沈阳市邮票会”成立后，创办邮刊《沈阳邮乘》，集邮家白子宪担任理事长。

白子宪（辽宁人，1894—1967年），号铭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赴日本留学，学习矿业，从那时起开始集邮。回国后在长春煤矿任职。这时他大量收集日本和伪满邮票，每种都是买几张整版。他的藏品中珍品很多，如1921年未能发行的京奉航空邮票、马占山部队在抗日时期发行的邮票和实寄封、日本侵华时发行的关东局邮票等。有一些票在日本也极少见。特别是他的航空邮集最为出色，从1917年意大利发行的世界第一枚航空邮票起，到50年代止，各国的航空邮票大致齐全，其中包括德国发行的名贵的飞艇邮票。他还收集各国小型张。

1945年日本投降后，白子宪迁居北平，随身仅携带部分邮集，大量的集邮书刊等都因无法带走而遗弃。在北平继续从事集邮。50年代他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50—60年代初，因生活困难，他将邮票陆续出让。“文革”中受迫害去世。

20—30年代，东北地区主要华人集邮家有袁香举、徐必达、邓学攸、丁少田、柳秉钧、韦介夫等。他们大都以收集研究日本邮票和伪满邮票见长。袁香举曾撰写《（伪）满邮票发行十年史》（1942年出版）等邮史著作和文章，可惜大部分已散失。

集邮家赵世暹，字敦甫，20年代就职于哈尔滨铁路局，是上海中华邮票会早期会员。他以收集实寄封片为重点，多而且精，堪称国内首屈一指。其中包括有海关一二次万寿及大小字加盖红印花等实寄封百余枚，变体票实寄封亦十分丰富。

赵世暹还有几部专门邮集：蒙古邮集、哈尔滨加盖俄国客邮邮集、洪宪元年戳集，都是难得的珍品。其中洪宪元年戳集，实寄封及单票达五六百枚之多。袁世凯称帝83天内的戳封完整无缺，国内仅见。赵世暹邮识精深、文笔俊逸，1929年写过集邮小说《新婚之夜》，发表在《邮乘》第3卷第3期上。

1932 年秋，赵世暹调职张家湾车站，携带的全部集邮珍品两大箱，途中被土匪劫车抢走。他从此停止集邮，60 年代病逝南京。

北平邮商韦景贤，少年时代在沈阳上学。他曾介绍他三叔韦向纯 20 年代中期在沈阳的集邮情况："他任第一商场内真光电影院售票员，有时也去沈阳工夫市小摊收集旧信封邮票。他集邮一直延续到伪满发行一二版票。1940 年春，我因在家赋闲，就找出我三叔所存的邮票、片、封等，内中有'团结'、'帆船'、'农获'、'宫门'等票，其中伪满邮票、日本邮票及日本客邮封等居多。各色邮票都浮贴在本子里，复品则装在纸袋内。"（《集邮回忆录》1987 年版 262 页）

20 年代后期，集邮家王纪泽、张赓伯分别在沈阳、哈尔滨的银行供职多年，通过与当地和上海集邮界的交往，收集了不少中外邮品和邮刊。

1926 年 10 月，辽宁海城蓉郎俱乐部成立，出版邮刊《邮趣》，由宋尧阶任主编，至 1937 年 9 月停刊，共出版 50 期。该组织后来先后更名为"华北邮票交换俱乐部"、"蓉郎邮票会"、"蓉郎邮泉商会"等。这是 20 年代除沪杭外，成立邮会、创办邮刊较早并且持续时间较长的集邮团体。

30 年代初，沈阳邮社以大南门里雷振甲开设的邮币社为最大。在哈尔滨比较有名的是良友邮票社，1935 年开业，主人徐必达，40 年代先后迁往北平、天津，主要经营伪满邮票和民国近代票。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侵略军制造了举世震惊的"沈阳事变"，随即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1932 年 9 月 18 日，长春伪满邮政局专门刻制了 1 枚"满洲事变一周年纪念"纪念戳。中国集邮者对此极为冷淡，前往销印及收藏者很少。同日，关内各邮政局，为唤起人民抗日救国热潮，也使用了一种宣传戳，该戳无框，刻有"御侮救国、誓复失地"两行字。使用一星期，集邮者纷纷前往销印及寄发有此特戳的封片，表达了人民的心声。

20 年代湖南、湖北等地的集邮者已不少。湖南的一位集邮家熊宴秋还兼营邮业，很早就编印了一份集邮小报，与全国各地集邮者通

信交流。据张包子俊介绍，这张邮报似乎还在神州邮票会会刊之前，可惜什么名称回忆不起来了。1935年汉口圣潮集邮研究会出版《圣潮邮票半月刊》。

广州历来是中国南方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早。但由于文化教育不发达，集邮风气不如上海、天津等地。20年代开始出现集邮者，后来还成立过新光邮票会华南分会，但在国内影响不大。

广州集邮家莫星白，7岁开始集邮，起初特别喜爱帆船邮票，以后逐渐扩大收集范围，中外并蓄。1925年新光邮票会一成立，他立即加入，成为第9号永久会员。不久被任命为新光邮票会华南通讯部主任。抗战期间，他又加入甲戌邮票会，担任该会的广州通讯部主任。

集邮家张文光（广东新会县人，1914年生），祖父是旅美华侨，他14岁开始集邮。1932年在师范读书时，他受一位爱集邮的美术老师指点，开始掌握正确的集邮方法。1936年，已成为中学教师的张文光参加了甲戌、新光邮票会。同年，他在侨乡新会县民众教育馆举办邮展，展出了几千枚藏品。他还不断为各种邮刊撰稿。1946年成立的广州集邮会和1963年成立的广州市工人文化宫职工集邮小组，他都是发起人之一。

西南地区因交通不便，经济、文化不发达。长江航道使上海等沿海城市的集邮之风传播进四川省。1928年5月1日，在重庆市陕西街青年会第一招待所，举办了一次邮票展览。在当地实为不易。参展者有一部分是上海新光邮票会的会员。邮展共展出24框，中外邮品均有。还展出了新光邮刊两种。

直到抗战前，重庆一直没有集邮组织和集邮商店。只有教场老衣服街有几家小古玩店，偶尔出售一些新旧中外零星邮票。1934年左右，成都市昌福馆有一家名为“成都市”的商店，专售化妆品，同时卖集邮邮票。在店门外悬挂两只镜框，里面贴满各国邮票，逐枚标出价格供集邮者选购。这个店的老板是方瑞麟，可称作成都第一位邮商。

1927—1932年，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这次由

中国学术团体促成的考察活动，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考察成果。由于民国政府不重视，到1930年考察团经费无着。为筹集考察经费，经批准于1932年6月专门发行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纪念”邮票，1套4枚。全套邮票出售时装在特制的白色小纸封内，正反面印有中英文对照的说明文字，全文如下：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纪念邮票
民国廿一年发行

此项邮票之三个特点：

(1)中华民国政府为学术团体发行纪念邮票，此为第一次。

(2)票中中国文字与拉丁文字对照，此为第一次。

(3)票中图画为故宫所藏元代无名画家所作沙原散牧图之缩本(故宫周刊第五十八期)，以古名画制邮票，亦为第一次。”

这段新颖别致的说明文字非常精彩，突出强调这套邮票包含的不同寻常的3个“第一次”，既为推销邮票做了宣传广告，又可帮助中外集邮者增长邮识，实在是有利集邮活动的高明之举。遗憾的是，虽然这套邮票设计的很成功，受到中外集邮者的欢迎，但是在发售过程中却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因而招致国内外集邮界一片指责。

这套邮票面值共2角，印量2.5万套；其中仅将1500套象征性地在5个邮局窗口按面值出售，而把2万多套交西北考察团按面值购进包销，每套定价5元，在国内外销售，所赚厚利作为该团的经费基金。对于这种独家垄断，高价倒卖的作法，国内集邮者极为反感，甚至出现号召联合抵制的呼声。由于这套邮票没有在邮局窗口敞开供应，不能广泛使用于邮政通信，因而国际集邮界将其归入以敛钱为目的“集邮邮票”，不予承认。好心办了坏事。那批计划用作抵押银行借款的邮票就此被打入冷宫，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才卖完。

旧中国，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盗匪横行，邮票在运送途中被劫事件时有发生。出于无奈，邮政部门想出一个对策，将运往这些地区使

用的邮票，用胶戳加盖领用邮局(所)所在的地名，并限制在该邮局(所)出售使用。万一被劫失，就宣布这些邮票作废，也易于查获。集邮界称此类邮票为“防劫加盖票”。采用这种加盖办法的地区以四川境内的地方最多，还有云、贵、陕、甘、宁、青等部分地区。此类加盖邮票数量较少，种类很多，戳式复杂，墨色不一，收集研究都极为不易。除“防劫加盖”邮票外，旧中国加盖邮票的名目繁多，有因印刷新邮票不及加盖，政权更换加盖，也有因通货膨涨、币制变更加盖等。

1934 年 5 月，由集邮家赵善长、闫东魁、郑汝纯、王聘彦等发起的“甲戌邮票会”在河南郑州成立。该会的宗旨为：“提倡高尚娱乐，研究集邮学识”，“独木难支大厦、众志始可成城。”同时创刊的《甲戌邮刊》发刊词中声言：“鉴于国内邮声之消沉，爰组织一邮会，藉继先进之未成，现复发行创刊号，俾各同好砥砺攻错，互通消息。”

《甲戌邮刊》(图 13)每月一期。自 1934 年 5 月至 1949 年 9 月连续 16 年共出 16 卷。该刊除报道新邮消息、组织通信交换外，主要登载邮学述评和专论。1935 年，在比利时举行的国际邮学刊物展览会上，和《新光月刊》一起荣获奖状(图 14)，成为“万国邮学刊物联盟”会员，为中国争得荣誉。

甲戌邮票会成立之初，会员仅 50 余人。到 1949 年 9 月，登记的会员近 3000 人，遍布全国各主要城市，邀请各地热心会员担任通讯处主任，从事宣传和联络会务。在英、美、法、比、泰国等国设有通讯处。美国华邮专家詹姆斯·司塔、英国华邮专家阿格纽等 20 多位外籍集邮家也加入了甲戌邮票会。在众多的集邮团体中，中华、新光、甲戌堪称中国早期三大邮会，对中国集邮界影响深远。

赵善长在其 1989 年 5 月撰写的《甲戌邮票会史略》中曾详述了该会成立的初衷：

《邮乘》和《邮票新声》，只限于寄给会员阅读，每期印数极少，1934 年相继停刊。正在邮声沉寂的时候，集邮同好提议另外组织邮会，于 1934 年 5 月 1 日发行了《甲戌邮刊》创刊号，因 1934 年是甲戌年，故定名为“甲戌邮票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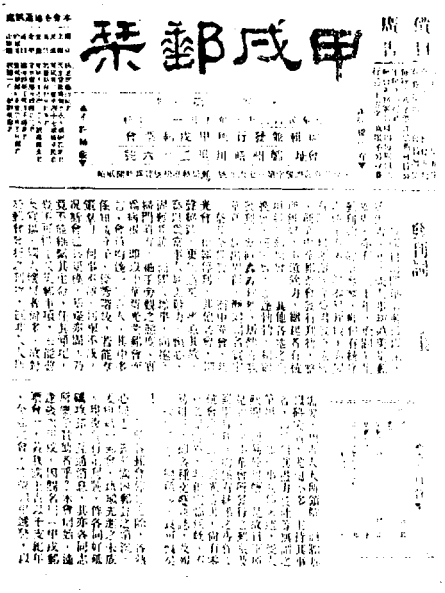


图 13 《甲戌邮刊》

图 14 《甲戌邮刊》在 1935 年国际邮学刊物展览会上获得的奖状

1934 年 12 月，按照会章印发选票，分寄各会友，选举办理会务人员。结果王聘彦任会长兼审查部主任，赵善长任副会长兼流通部主任。总务部主任吴济民、会计部主任李弗如(图 15)(兼地名票流通部

主任)、出版部主任周啸湖、图书部主任闫东魁。

图 15　李弗如

1937 年 1 月，甲戌邮票会聘请周今觉任名誉会长，陈复祥、陆志书、卢赋梅、张包子俊任顾问。同年 6 月，聘请孙君毅担任该会法律顾问。

甲戌邮票会还曾聘请华北邮坛名家黄绍斋担任该会名誉会长。黄绍斋时居山西太原，他的华邮收藏中珍品如林，著名的“红印花七宝”，他已藏有其六，其中的“小壹元”票等照片，还刊登在《甲戌邮刊》上。正当这位卓有成就的集邮家期望邮集再添佳绩之时，抗战爆发，使他的邮集遭受灭顶之灾。

抗战初期，黄绍斋担心自己心爱的邮集受损，于是将之交托给太原一座天主教堂的法国神父代为保管。当时日本与欧洲各国尚未宣战，藏邮于此应该是最安全的。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位自诩上帝使徒的神父，竟然背着他，私自将邮集送到国外出售了。为逃虎口竟入狼穴，嗜邮如命的黄绍斋后来得知此事，气恼难平，不幸忧郁以终。

中华失国宝，邮坛丧元勋。流落异域的大量华邮珍品和为邮丧生的集邮家，同样是中国集邮界不可挽回的损失，令人为之感叹和痛心。

1937 年 6 月 5 日，甲戌邮票会在河南开封青年会举办了第一届邮展。篆刻家吴南愚是该会北平通讯处主任，专程赶来参展。他亲手雕刻了 5 件银器、象牙雕作品，捐赠给甲戌邮票会作为邮展奖品，既隆重又有纪念意义，为此次邮展活动增添了光彩。集邮家捐赠自制邮展奖品，这种作法在中国集邮界尚属首次。

甲戌邮票会 1936 年推选的第一届会长兼审查部主任王聘彦(浙江宁波人，1900—1941 年)，系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毕业，在陇海铁路管理局任工程师。他主要收集中国早期票及首日封、地名戳，藏集

中多有珍罕品。他热心集邮社会活动，先后加入中华、新光邮票会。创建甲戌邮票会后，以卓有成效的宣传联络，使甲戌邮票会得到迅速发展。在集邮研究中，王聘彦也倾注了大量心血，曾撰写一部《邮学邮典草案》，尚未完稿，1941 年因工作劳累成疾抱憾而去。对这位英年早逝的邮坛宿将，《甲戌邮刊》特发行《王聘彦先生纪念号》，各地邮友均致以沉痛的哀悼。

甲戌邮票会会长赵善长（江苏武进人，1903－1989 年）（图 16），本名赵国园，“善长”是他专为集邮起的笔名。毕业于汉口法文学院。1921－1948 年在陇海铁路管理局任职。他从 1917 年开始集邮，以搜集华邮为主，兼集首航封及地名戳，所有早期票品均极齐全。他的“旧中国首航封集”，珍品纷呈，1933 年在布鲁塞尔国际首航封展览会获银牌奖。他的邮戳藏品达 2 万枚，成就杰出。赵善长一生集邮研究挥笔不辍，斐然成章。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自勉：“积微不择细流，学贵穷年矻矻。”他除大量为《甲戌邮刊》撰稿外，晚年还著有《中国航空邮政史略》，从 1980 年 4 月至 1984 年 4 月在日本《中国集邮》杂志连载。“文革”期间，赵善长被抄过家，由于他把四厚册 16 卷《甲戌邮刊》合订本转移到安全地方保存起来，才躲过了这场浩劫。据他介绍，《甲戌邮刊》“现在国内就剩 3 部完整的了。”

图 16　赵善长

综观甲戌邮票会与《甲戌邮刊》的发展历史，给人以特殊的感觉。因其主要骨干成员多为铁路系统职工，故其办会办刊作风与沪杭等地以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为主的集邮团体有很多不同之处。甲戌邮票会内部互助合作的风气较浓，《甲戌邮刊》经常发表讨论文章，作者可以畅所欲言。一般邮会常见的闹意气、泄私愤之类的事在此绝少。仅举几例，可见一斑。

1934年,《甲戌邮刊》的"邮林漫话"专栏上,曾展开过关于"华邮"与"国邮"名称问题的争论。集邮家谢鄂常在《"华邮"应速正其名曰"国邮"议》一文中提出:

"国人自称本国邮票为华邮者,实为大不敬。盖人须自尊始得使人尊。人自侮而人始得以侮。……'华邮'一名拟不能不早正其名,援以我国文字之曰国文,武术之曰国术,钱币之曰国币,医之曰国医等先例。则我中华民国之邮票,应立正其名曰:国邮。"(《甲戌邮刊》1卷4期)

随后,该刊又发表了一些讨论文章,各抒己见。集邮家王聘彦在《华邮与邮片名称之商榷》一文中提出不同看法:

"我国夙称华夏,以自别于蛮貊,固含自尊自重之意。……总之,为一种简略名称,并无丝毫自侮自辱之意。华有光华、华贵等意,华胄、华族,皆属自尊而非自渎。且中华华邮,似对内对外俱可适用。而国邮两字,则仅限于对内。"(《甲戌邮刊》1卷5期)

这场类似集邮名词审定的讨论,由于坚持平等研究,以理服人,求得共识,因而显得心平气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甲戌邮刊》很注意与读者建立密切的思想交流,多次组织过各种专题讨论。例如,1936年6月1日,该刊曾向读者发出《问题征答》启事:

"兹有下列各项问题,征求会友答案,不论文言白话,以实事求是及简洁有趣者为合格。本会当于收集稿件略有成数后,宣布截止日期,临时评定甲乙。入首选者酬国币拾元,第二名以下酌酬价值捌元递减至贰角五分之各国邮票及会花。并将佳作就本刊披露。……"

征答的问题有6个:

一、试言君立志集邮之原因及其目的?

二、现在君之邮集中,有若干种最为希特,自觉颇有意味?

三、君之集邮方针如何,所注重者是何种类?

四、本会已发行会花以助集邮雅兴,尚有何种轻而易举之事业,足以鼓舞兴趣,试举一二端,以备采择施行!(本会经济所不能任者不

录）

五、本会邮刊有无应行改良之处，试切实言之？

六、本会日下之缺点何在？应如何设法改进，请就可能范围以内直言之。（大而无当者不录）

这种虚心求教、诚恳交流的态度，自然受到会员读者的欢迎。1941 年，《甲戌邮刊》上还开展了组织集邮互助网的讨论，读者纷纷投稿献计献策。集邮家赵善长在《集邮必须互助论》一文中提出：

“夫研攻邮学，一如其他学业，必须彼此分工，始能专精，彼此合作，始能成功。如资料之搜集也，邮品之考证也，无一不有赖于彼此连系，互相合作。各将其搜藏种类，加以研考，发抒心得，公诸会刊，俾使邮学得以日渐增进，愈趋光明。”“次如搜集邮品，所有各地镌用之纪念特戳，各地发行之邮票种类，咸各有其特殊情形。各邮区就地加盖的暂作邮票，倘各依照集邮互助原则，各自购集当地发行者若干，彼此交换，既得集邮之乐，又感互助之情，且亦可免祛邮商之操纵。”（《甲戌邮刊》8 卷 3、4 期）

会员李绍我在《建议组织集邮互助网》一文中，还具体提出组织集邮互助网的办法。其中包括：在会刊公开征求会员加入互助网，并在会刊上按期公布加入互助网的会员姓名、地址及其征集范围。在同一地点的会员，应时有联络，彼此商定分担代办邮品任务。加入互助网的会员，对其所在地新发行邮票，或纪念票，或特戳品，照互助网名单分寄各需要之会员。一俟收到，即将费用（包括票款、寄费或其他应摊任之杂费，普通以平信寄，价值在一元以上者挂号寄）全数归还寄件人。（《甲戌邮刊》8 卷 10～12 期）

在组织者的热心倡导下，甲戌邮票会会员之间的集邮互助活动开展的很有特色，促进了邮友之间共富收藏，增进友谊。更难能可贵的是，甲戌邮票会除了组织会员开展邮品收藏互助外，还组织对生活困难的会员进行经济资助。1941 年王聘彦病逝后，其子女年幼，家境陷入经济困难。为此，甲戌邮票会在邮刊上发出启事，号召会员们“量力资助，以尽友谊”。倡议得到会员们积极响应，共收到 36 名邮友的

捐款 820 元(铁路局发给王聘彦家属的抚恤金仅 2000 元)。《甲戌邮刊》在公布捐款名单及款额时,感谢会友们具有"古道侠肠"。

在提倡和发扬互助友爱的邮德邮风方面,甲戌邮票会当年在国内集邮界的确称得上是言行一致,与众不同。

30 年代集邮已在文化艺术界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据记载诗人柳亚子、作家巴金、柔石、戏剧家梅兰芳等都是集邮爱好者。

当年,集邮者们邮趣浓厚、雅兴很高。各邮票会还自行设计印制"会花",作为供邮友贴用或收藏的趣味品。中华邮票会印的会花是龙球图,四周有齿孔,宛若邮票。新光邮票研究会印的会花分不同刷色,每一小开张 12 枚,亦有齿孔。图案是 3 颗五角星和两束弧形的光芒,上有中、英文"新光邮票会"和英文"中国杭州"字样。甲戌邮票会印的会花图案是松树和地球,题有"来鸿去雁"字样,如同邮票一般,四周打孔,50 枚一大张,分 4 种刷色。"会花"虽系集邮闲品,但亦是集邮活动的历史见证。闲品不闲,如今要收集齐全它们已非易事。

综观 20—30 年代的中国集邮界,分为两个发展阶段。20 年代,中国实际出现了两大集邮群体。一个是集中在上海、杭州等地的集邮组织,一个是集中在北平、天津地区的集邮人士。这一南一北两大群体各有特点:南方群体集邮人数较多,与在沪外籍集邮人士和国外集邮界交往密切。集邮会和邮刊创办得早,集邮活动对国内外的影响很大。北方集邮人数相对较少,有组织的活动开展较晚,集邮者中科技、文教、医务人员较多是其特点。虽然没有像周今觉等那样经济实力雄厚的集邮家,但利用了北平旧朝国都的条件,挖掘收藏了许多早期珍贵邮品。与国内外的交往和开展邮学研究、以及邮商的文化素质、邮识水平等,均比上海相对逊色。这两大集邮群体均为开创中国独立自主的集邮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全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集邮人才。

30 年代中期开始为第二阶段,形成"中华"、"新光"、"甲戌"三大邮票会鼎足之势。不仅使集邮交流、集邮学研究向深度、广度发展,集邮队伍进一步扩大,而且向东北、西北、西南等地扩展。使集邮活动在全国各地扎根开花。那个时代的集邮家们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树

立了注重邮德、热心事业的典范。

第六节　三足鼎立

中华邮票会、新光邮票研究会、甲戌邮票会成立的时间和背景不同，发展方向和活动特点有别，它们在中国邮坛各树一帜，各显神通，都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的奋斗历程留下了集邮文化在中国发展壮大的时代足迹。

中华邮票会的创立，对中国以后集邮活动的影响深远，尤其对早期华邮研究贡献突出。如果没有《邮乘》的指引呐喊，中国集邮者们还一直在迷恋杂俎西邮，不会高度重视对国邮的收集研究，华邮也不会赢得国际赞誉。后继成立的集邮组织大都借鉴了该会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模式。中华邮票会成为中国集邮事业的奠基者。

新光邮票研究会则以会风开放见长，影响力后来居上。自成立的20多年中，举办过6次邮展活动，规模越来越大。拍卖、交换、图书等各项活动都搞得有声有色。该会的邮学研究很活跃，汇集了一批深有造诣的集邮家，使新光邮刊25年中，共出版16卷及丛书二册。绵延相继，卷帙浩繁，成为中国邮学宝库中的传世精品。该刊除国邮宣传研讨外，对外邮亦很注意，这是有别于中华邮票会的特点之一。

甲戌邮票会成立于动荡之际，发展于国难之时，为推动中国内地集邮事业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甲戌邮刊》在集邮研究方面突出特点，一是大力宣传提倡收集研究封片简戳以及近代邮票，并取得累累硕果；二是注意收集各地邮政和集邮史料，保存了大量珍贵资料。

三足鼎立，各有千秋。从这三个邮票会的活动历史，可以看出如下一些共同特色：

一、完全民间性质。以交流研究集邮学识为宗旨，坚持业余活动为主。明确声明不以赢利为目的，并能认真履行。

二、会员来源广泛，遍及全国，远自海外。如新光邮票研究会会则中规定："本会征集会员不限国籍、性别、年龄，凡品行纯正，能守信，

赞成本会宗旨，而有一人以上介绍者，均得为会员。”其他邮会也有类似的条件。而且会员可以同时参加几个邮会，相互不设壁垒，思想很开放。

三、组织机构完善，职责明确，管理比较严格。会员入会手续认真，有介绍人、有会员证和编号，还以在邮刊上公布会员名录的方式，便于会员交往。同时各会会则中都有退会条款。如中华邮票会规定：“会员于邮界有诈欺行为者，有毁坏本会名誉者，有迟纳会费至三个月之久，经职员决议，得宣布除名退会。”

四、普遍收取会费，以会养会。如中华邮票会当初规定所有会员会费一律每年 2 元，新会员随同入会请愿书缴纳，旧会员九十两月必须缴纳。后改为本外埠会员会费不同，本埠 2 元，外埠 1.5 元，永久会员一次交足 20 元。到 1939 年改为本外埠会员一律每年法币 3 元，新会员另加入会费 1 元。对国外会员收取外币会费变化不太大。各邮会还定期在邮刊上公布会费收支报告，经济上完全自负盈亏。

五、重视编印邮刊。其中中华邮票会的邮刊编印精美，大多还附有英文版面，便于向国外宣传交流。会刊印量一般都很小，《甲戌邮刊》第一年每期仅发行 300 份，以后最多时每期也不超过 1000 份。邮刊一般都发赠会员，不零售。各邮刊上还刊登许多集邮者、邮商、邮社的启事、广告，为集邮者提供征让邮品的信息。

六、活动形式多样。其中委托服务、通讯拍卖交换、鉴定邮品、借阅图书等项深受欢迎。为保证这些活动顺利进行，对各方面都有严格规则。例如新光邮票研究会的通讯邮品交换部规定：使用统一印制的交换簿和交换手续单，由交换部依次排列出传递的人员名单。会员收到交换簿、单最多存留 3 天，即转寄给指定的下一位会员。凡已选取的邮票，要在原处盖章，票款立即汇交换部。凡本人无交换品（价值在 50 元以上）而欲看其他人邮票时，要酌收其信金。

这些为会员服务的项目和管理措施很有特色，充分考虑到会员遍布全国各地的特点，实行通讯交往。连借阅图书亦如此，规定借阅图书以收到 7 日为限，并担负往来挂号邮费。这些好作法今天亦鲜

见。同时经济手续极认真，许多活动需要有保证人或保证金，先小人后君子，防止出现漏洞。

七、为会员开办一些特殊服务。其中以“保证委托”和“近偿委托”最引人注目。

当相互不了解对方信誉的会员要进行邮品交易有顾虑时，双方把欲求让的邮品和货款邮费都寄交委托部，由该部根据双方意愿分别转交。这种事成之后收取双方手续费的服务项目称作“保证委托”。“近偿委托”则是专门代理会员间追索欠款，追回后亦收取一定手续费。邮会还规定“如欠款不能追回，其负债之会员由本会宣布除名以为无信者戒。”如此为会员雪中送炭、排忧解难的邮票会，怎能不深受会员拥护和爱戴。

八、聘请法律顾问。较大规模的邮会都聘请长年法律顾问，保障其合法权益。

在三大邮票会的各项组织活动中，由于受人员素质、管理经验、活动场所、经费来源等各方面的条件限制，也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问题。比如活动经费，一直是困扰各邮会的头号难题。当年仅靠有限的会费难以应付办会刊和各种活动的支出。因此，中华邮票会由周今觉独负经费、主持会务达 10 年之久。柴冠群、张包子俊、赵善长等许多集邮家都曾为各自邮会慷慨解囊，聊补无米之炊。再加上时局动荡、物价飞涨，更难以支撑。在 1932 年发生日本武装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前后，大批会员因故停交会费，使中华邮票会出版发行仅 4 年的《邮学月刊》也被迫停刊。周今觉不无感慨道：“本会经过之历程，虽有十年之久，但前五年是花团锦簇，后五年却是雨打风吹。”新光邮票会亦是多次会址搬迁，会刊中断，会员离合。甲戌邮票会处在大后方，交通信息闭塞，遇到的困难更多。

组织邮品拍卖是邮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可是很长时间里，除了几次特别大的拍卖会之外，一般的拍卖会成绩往往不甚好。《新光》第 11 卷夏季号曾分析病根所在：

(1)由于无良好会所；

(2)出品不能在水准以上；

(3)出品人有疵品常不肯或忘于标明，拍入者不能满意；

(4)会场秩序太坏，声音嘈杂，有碍工作，虽主拍者声嘶力竭，亦不能使人注意；

(5)由于以上数点之结果，高等集邮家平常不大愿意出席，出品水准这般低，拍价安得能高。

"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

凡此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并没有使这些邮票会畏首不前。它们都能不断摸索经验，改进管理，千方百计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

当年许多集邮者同时参加这三个邮会，身兼各邮会数职者亦不少见。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在20—4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为什么始终没有成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全国集邮组织？造成这种状况，有一些历史的原因。

中华、新光两会都成立于1925年。当新光邮票会在杭州成立时，张包子俊等人亦不知道上海数月前已成立了一个中华邮票会，否则他们也许不会另立新会。当得到这个消息后，张包子俊给周今觉去信，一方面自愿加入中华邮票会，一方面邀请周参加新光邮票会。张包子俊回忆当时情景："周今觉先生立即有回信，词句中于称颂我们之间，还加了些孺子可教的意思在内。对于加入新光会的话，一字不提。杭州几个会员看了也有反而不自在的。但是我觉得上海是世界邮票市场之一，人才荟萃，《邮乘》内容充实，比《邮票新声》真是大巫比了小巫了。我除了佩服之外，反觉自己胆子不小，决心继续出版。"(《新光会刊》1946年3期)

周今觉的自负态度，直到1936年，他在中华邮票会《十周年纪念宣言》一文中仍表露无遗："余敢断言，本会对外之声光，在本国任何邮会之上。虽三年以来黯淡无色，然对全球邮商邮会，苟一言及本会之名，殆无不知者。故凡为本会之会员，其声价与地位，实与入外国著名之邮会无异。"

由于周今觉恃才傲物的作风，不仅使两会从此分道扬镳，而且使中华邮票会的发展大受影响。会员中许多人协助或加入新光邮票会。像当时的集邮名流柴冠群由中华会改弦更张，被推选为新光邮票会会长，凌能夏不入中华邮票会而愿努力于新光邮票会，被推为副会长，“勤于著达，发扬甚多。”中华邮票会元老张棣村及谢鄂常、张赓伯、梁芸斋、叶颂藩等大批集邮家都成为新光邮票会的热心分子。使新光邮票会不到一年，会员人数超过中华邮票会。到30年代后期，新改选的新光邮票会理事中，大多数是原中华邮票会骨干，会刊影响也与中华邮票会并驾齐驱。

甲戌邮票会成立后，也慕名邀请周今觉入会，被尊为该会第1号会员。抗战中，当中华、新光两会恢复活动和邮刊时，甲戌邮票会曾热烈祝贺。但有一段时间，《甲戌邮刊》和周今觉在《邮讯》等刊物上打了一阵笔仗，积怨甚多。

周今觉虽为当时首屈一指的集邮名家，在国内外邮界享有崇高地位，但由于其过分追求以名流专家为友，邮刊视考证高深为贵，结果对内会务、会刊一人唱独角戏，对外以老大自居，使许多集邮者望而却步，无异为渊驱鱼。在这种气氛中如何能奢谈统一。

以后，在事实面前，周今觉也不得不承认新光邮票会获得的成绩与影响。周今觉参加新光邮票会后，成为第229号永久会员，积极地与新光邮票会合作，送展品参加新光邮票会举办的邮展。1939年，经张赓伯等人努力又沟通了与甲戌邮票会的联系。在1940年《邮典》1卷2期刊登了《甲戌邮票会、中华邮票会启事》：

“畴昔我两会尝从事意气之争，甚无谓。兹承张赓伯先生出为仲连，言归于好。今后当本一致精神，与国内各邮会共同健全邮人之组织。努力邮学之广宣，冀副全国邮界同志之愿望，掬诚奉告。”

以此开端，捐弃前嫌，40年代成为三大邮会互助合作、共襄其成的最好时期。当年虽然存在诸多不愉快之事，但新光、甲戌等邮会对中华邮票会特别是周今觉本人，仍抱有由衷的敬佩。

张包子俊曾经有过多次促成合并统一集邮组织的设想和努力。

抗战初期，他曾与张赓伯一起专门去拜访周今觉，提出三会合并的建议。几个人推诚相见，谈得比较融洽，还提议统一后的会名为“中华新光邮票会”。但是，许多人或认为新名称不妥，或认为新光邮票会一直没有停顿，与处于停顿状态的中华邮票会合并太可惜，不赞成统一邮会，此事只得延搁。

1948年，张包子俊在《新光邮票杂志》第15卷第3期发表了《统一刍议》。这是张包子俊提议，复经上海当地会友18人附议，并将原议推广而扩大申述，文中提出四点理由。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编辑部收到大量来函，纷纷表示支持。于是在该刊第4期摘登了部分来自南通、四川、广州及香港、台湾、印尼等地的邮友来函。其中建议统一的名称有：“中国集邮协会”、“华光邮学会”、“中国集邮学会联合总会”等。

台湾高雄沈嘉济在信中说：“吾国各种事业均落人之后，自当奋起，如弟为各地邮会会员者想必甚众，如能捐弃成见，合并为中华集邮协会，以各地原有邮会名为各地分会，则事务组织有一致，如是对于力量可以集中。”

四川罗哲智在信中赞之：“具有远大抱负、崇高理想，为发扬集邮学术、争光国际，意善策美，不失明智之举。”

全国各地不少邮刊也纷纷发表文章积极响应。例如：重庆《邮侣》发表志圣文章《三会合一》、广州《广州邮刊》发表叶清余文章《统一我见》，均表示集中力量，三会合一，刻不容缓。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张包子俊等人多年合并统一邮会的宿愿终未实现，但他不计私利、顾全大局的襟怀在集邮界有口皆碑。当年，新光邮票会会风活跃、广纳邮友；新光邮刊群策群力，博采众长。这些好传统值得发扬光大。

万事不如公论久。周今觉与张包子俊同为安徽籍集邮家，分别主持中国早期同一年成立的两大邮会，实在是巧合。两者一位长于邮学研究，以著述醒世；一位长于邮会运筹，赖德才赢人。设想当年如果实现成立统一的全国集邮组织，两人扬长避短，各施才能，一定会开创

出更新的局面。

人才难得，人才的最佳组合更难得。这段邮坛往事，发人深思。

第四章　抗战期间的集邮活动

第一节　沦陷区内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烽烟四起，大片国土陷入敌手，无数同胞遭受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之苦。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日伪统治时期，东北、华北、东南沿海地区邮坛冷落、邮市萧条。

残酷的战争动乱，常使邮票与它的主人一起流离失所、险象环生，给集邮者留下难忘的记忆。原在北京铁路局工作的王席儒谈到：

“我从十几岁开始集邮，后加入甲戌邮票会，是一个普通的集邮者。1937 年‘七七事变’后，11 月 7 日太原被日寇攻陷。我随机关逃出太原城。我的邮集及衣物等全部丢失在城内。这是我第一次丢失邮集。1938 年 5 月 1 日，日寇在冀中军区实行‘大扫荡’，机关化整为零坚持斗争。行前遵照上级指示，将随身不用的衣物包括我重整旗鼓的集邮册，统统交给村政府埋藏地下。解放后，我曾前往该村寻找，竟一无所获。这是我第二次丢失邮集。”(《集邮回忆录》1987 年版 135 页)

集邮家王纪泽(江苏镇江人，1900－1982 年)(图 17)，1917 年进入北平汇文学校(后更名为燕京大学)读书。他在学校集邮的外国教师和同学影响下开始集邮。20 年代初，在北平大有银行工作，开始致力于中国早期邮票的收集。抗战前在沈阳银行任职。抗战期间，他的邮集经历了三次劫难。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王纪泽从东北退入关内，历尽艰难才回到北平，他的全部邮藏，都在战乱中丢失。1937 年爆发了“七七事变”，他随河北政府机关仓惶撤退汉口。他重新搜集的邮集无法带走，

又损失殆尽。1940年到上海后，他仍经常和新光邮票会邮友陈志川、张包子俊、张赓伯、钟笑炉、郭植芳等10人，举行聚餐式“邮星小集”，在叙会中纵谈邮史和戳记。一天，深夜返家，突遭歹徒抢劫，将他唯一的一部新疆木戳加盖航空邮票专集抢走。真是国家不幸集邮家也不幸。

图17　王纪泽

1942年，王纪泽在上海开设万寿邮票公司，兼做邮商。在经营中，以购进售出邮品又多又快闻名，因而邮商界送他个“搬场汽车”绰号。他倍尝艰辛搜得的珍贵邮品多次遭受劫难，仍毫不气荏。1940年他有感前藏在战乱中大都损失，恢复不易，决心缩小收集范围，以仅剩下的2枚“红印花”加字邮票为基础，专集“红印花”专题。由于他全力以赴，矻矻终日搜求，加之得益邮友，逐渐奠基进宝，规模初备。

在此过程中，王纪泽也饱尝有得有失的甘苦，始终以勇往直前的精神，昕夕奔走，弗以为劳。1943年，王纪泽的《红印花专集》基本告成。这部“丰富伟大、得未曾有”的邮集中包括“红印花”加盖票全套8枚单枚新票、7枚双连新票（缺“小一元”一种）、6枚四方连新票（缺“小一元”和“大五元”二种），还有许多全格的和各种珍贵变体票等。集邮家周今觉欣然在邮集上题词：“纪泽先生专集红印花，积有年月。其美备在世界中足当第三、四位。可羡也。”王纪泽潜心研究了“红印花”加字邮票的发行数量、加盖程序、纸张刷色、齿孔、变异等，多有建树。

王纪泽在《红印花邮集自序》中说：“但以今日之浮生若梦，人事全非，有家归不得，流浪复流浪，翘首前涯，白云在望，斯景斯情，欲其逸兴湍飞，又焉可得。况专门邮集，非经长时间之研究罗致，适当之环境机遇以育成之不可。”

《红印花专集》的问世轰动邮坛，国内外不少邮人慕名而来，高价

求售，特别是对“小字一元”票开出惊人价格。但王纪泽不为所动，另有追求。1965年，他将这部珍贵邮集献给了国家。

王纪泽曾在《新光》第11卷春季号上发表文章《闲话集邮》，谈了自己几十年集邮的心得：“集邮本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第一要有恒心，非经长时间的研究揣摩，才能坚定他的兴趣。所以经过打击愈多，愈对成功的途径接近。尤其对于物资学三者的力量，一样不能短少。物是指邮票的本身，资是购买力，学是丰富的邮识。”

有的集邮家成功得益于贤内助。王纪泽有一个幸福的集邮之家，其夫人张包平之也是一位集邮家。她曾长期协助兄长张包子俊处理新光邮票会日常事物，诸如各地会员来信回复、会刊编校发行等繁杂工作，多靠她料理。她也因此获益多师，爱上集邮。当年《新光》邮刊上即刊有她写的一些文章，思考细腻，文笔清新。张包平之与王纪泽结婚时，王的聘礼竟是“万寿纪念双连票全集”，奇趣高雅，寓意很深，当时在集邮界传为佳话。她几十年中，成了王纪泽收集研究“红印花”邮票的得力助手。

日寇入侵，使中国邮票发行遭受到严重的破坏。1937年9月，交通部邮政总局曾在《申报》上连续刊登启事，公开征求“航空救国”邮票图稿。金石书画家钱君陶受其弟钱君行爱集邮的启发，设计了6幅邮票草图应征，他设计的图稿以各种不同飞行状态的飞机为主。不料图稿寄往邮政总局后不久，南京失陷，这套邮票图稿在溃退中不知下落，“航空救国”邮票终于未能发行。抗战时期，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月刊1卷3期上曾披露这件堪称中国最早的公开征求邮票设计图稿活动。

抗战爆发后，上海遭到日寇进攻。杭州的集邮界面临战争的威胁。日军的炮火曾迫使集邮家张包子俊全家逃离旧居躲避。仓卒中，他随身只带一个包袱，主要是中国邮票。留下两大柜无法带走的复品、外国邮票以及成堆累帙的实寄封。待炮火硝烟一散，他惦念自己的邮藏，不顾危险偷偷回家察看。只见家里柜倒箱翻，院子里纸片狼籍，邮票和信封已被日寇乱扔乱毁，又遭受雨淋，蹂躏完了。接下来日

军又强行占住了他家的房子，家里的东西和大量邮品、集邮资料等都被烧毁。张包子俊任职的旅馆也被日军改作铁路俱乐部。万般无奈，张包子俊只得遣散旅馆职工，携带一小箱仅存的邮票和一条被子，怀着满腔悲愤逃离杭州。就这样，万恶的法西斯强盗使张包子俊一家失去了家园，使新光邮票会失去了会所。

1939 年 3 月，张包子俊举家来到上海，另谋职业。在沪的新光会员们慢慢又开始恢复活动，先后举行聚餐会、座谈会等，不久成立了拍卖部，每星期日举行邮品拍卖。中断的会刊也逐步在上海恢复发行。因限于资金、物质条件，一度改印成单张的副刊或年刊、季刊，不绝如缕，苦苦维持。会员万灿文在《新光》第 8 卷第 2 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道出了当时所面临的各种艰难处境：

“此在军事期间，不惟会基全失，会址变更，而会友则流离颠沛者有之，死于非命者亦有之，种种惨象，备极凄怆。是以本会兹次再度复活，其艰辛困难，甚于初创。从基金方面云，会员星散，收费维艰，而子俊会长不惟家产荡然，生活变迁，列入难民，甚且避灾之沪，免为糊口，情况之糟，得未曾有。然卒赖其坚强毅力，以拍卖邮卷所得佣金三百之数，而使会刊复活，使内地会员得通声息，此不得不令吾人额首相庆。盖内地会员之连系，全恃每月一册之会刊，舍此即互相隔绝矣。”

“军兴以还，交通梗阻，运费激增、物价陡昂。本刊出版后首受打击者，厥惟交通受阻。沪邮局拒收印刷品，以致交邮之件什九皆被退回或没收。偶有收到者，不啻漏网之鱼。内地会友得之，弥如至宝，互相传阅。一部会友不明此事，每有质难，实则会中一再补寄，已尽最大之努力，邮资成本皆受极大损失。故自七卷七期起改由香港转发，虽多数已能收到，而邮资一项则平均每期须在一角六分以上。”

“次之为本刊成本之增加，初则每期不过六七十金，今则猛增三倍，一刊成本即须二角五分以上，再加邮资，已逾四角，是以会中负担极大，苦不堪言。”

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新光邮票会的中坚骨干们，仍以顽强的精

神，想尽办法开展邮会活动，咬牙坚持办刊，还先后举办了两次邮展，这是值得敬佩的。

1940年5月5日，为纪念世界第1枚邮票诞生100周年，新光邮票会在上海维多利亚饭店举行了小型邮展、特别拍卖、聚餐等活动。同时以“黑便士”邮票为图案，印制了两枚纪念张，数量500套，分赠会员。1941年11月3日，该会在上海大新公司举行邮展，分为10个展室。中国邮票不仅新、旧、方连票齐全，而且许多著名的变异诸品无不列入，著名的“红印花小一元”旧票，在这次邮展上初次公开露面。展品中的外国邮票也比较丰富。在展室外还设了邮票市场和临时邮局，为集邮者加盖纪念戳。成为新光邮票会“最具规模之展览会”。

与新光邮票会较快恢复活动相比，中华邮票会就显得缺乏生气，像个大病初愈，步履艰难的病人。中华邮票会的各项组织活动始终不如新光邮票会正常、活跃。会务和会刊一停就是几年。曾蜚声中外的《邮乘》不足3年停刊了。1932年发生“一二八”事件后，《邮学月刊》也停办3年。直到1936年才出版《邮讯月刊》和《邮典》，又因1937年发生“八一三”事件再度停刊；前者出刊1年半，后者仅出1期。又过了3年，1940年才恢复出刊《邮典》，但仅出5期，到当年11月又停刊，从此再无声无息。日军两次入侵，战火危及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是该会组织不健全也是个致命弱点。会长周今觉在1936年10月纪念中华邮票会成立十周年时出刊的《邮典》发刊词中，道出了心中的酸甜苦辣：

“《邮典》发刊之动机，起于10周年会之际。当时董事会讨论本会前途，原定有两种办法：一消极，一积极。消极者，开过纪念会后，即宣布解散。积极者，如不解散，即须筹备复兴方案，不能听其长此陷于不死不活之状态中。但解散则10年之功，隳于一旦，于心不忍，人有同情。复兴则以前之《邮乘》月刊，殷鉴不远，成效可知。苟中途仍陷于《邮乘》月刊之覆辙中。则有初鲜终，不如其已。然则月刊季刊咸不可行。庶几改为不定期刊，尚可有伸缩之余地乎。然外埠会员散居四方，

与本会消息不通，势如秦越。若仅令其每年静候一二期不定期刊物，又奚足以羁縻之。”

1940年1月再度恢复出刊的《邮典》由张赓伯任主编，发动了一批集邮家撰稿，所载者为长篇钜制，专门杰作，内容较前丰富，连载文章也明显增多。如周今觉的《园寿庐邮话》、陈葆藩的《寄寸楼随笔》、陈复祥的《华邮漫谈》、张赓伯的《邮林散记》、翻译小说《邮宝珠还记》等，有史料、有见解，引人入胜。

集邮家马任全1931年大学毕业后，同父兄一直在上海从事工商业，集邮只是业余爱好。上海沦陷后，日寇和汉奸横行霸道，业务无法开展。他只能将“实业救国”的雄心转移到集邮上。整日深居简出，同陈志川、郭植芳、严西峤、张赓伯、梁芸斋等集邮家探讨邮识、深研邮学，开始了著名的《国邮图鉴》编撰工作。他曾自述当时的苦闷心情：“方当抗战后期，风雨如晦，晨曦未现，忧世之念方切，初无付梓行世之意，亦聊自排遣云耳。”

具有爱国民族气节，以集邮排遣对侵略者愤恨的集邮者岂止马任全。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也是一位。梅兰芳（江苏人，1894—1961年）爱好集邮是从30年代开始的。一次，他到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家作客。赵家璧是一位集邮爱好者，请他观赏了自己的集邮册，使梅兰芳对集邮产生很大兴趣。从此以后，他一有空，就和孩子一块泡洗信销票，分类整理购来的新票。他还托日本友人从东京寄来一本《万国邮票目录》，作为参考资料。抗战爆发后，梅兰芳全家从上海搬到香港。他蓄须明志，决计不为敌伪演出。那期间，他杜门谢客，常拿着镊子摆弄他的邮票，专心集邮，苦中作乐。

陈志川和张赓伯是当年上海的两位“邮坛才子”，均以勤于研究，善长写作著称。

陈志川（浙江杭州人，1916—1977年）（图18），曾就学于沪江大学、浙江省财务专门学校，开始集邮。他初经营祖业和丰水厂，杭州沦陷后避居上海。1940年6月开设国粹邮票公司。

陈志川集邮侧重于海关一次“大龙”邮票，有“大龙”专家之称。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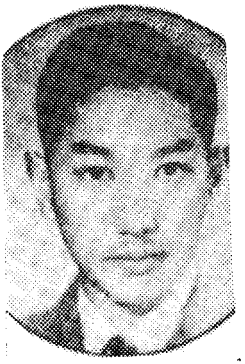


图 18　陈志川

原有一辆自用顺风牌新汽车，后因汽油价格飞涨等原因，1939 年出售，所得数千元钱又全部用于集邮上。亲友中都对他“以崭新汽车换方寸废纸”的作法深感惊讶。为了集邮他花费了大量财力和心血。他原是《新光邮票杂志》编辑，为提倡邮学，1942 年 3 月创办《国粹邮刊》(图 19)，至 1946 年共出版 42 期，1950 年在香港复刊一期后停刊。该刊在邮票版式研究、珍邮发现等方面有很多创见，是当时国内水平很高的邮刊之一。

陈志川重视文献集邮，对中国早期邮票精于研究，集邮著述非常丰富。发表过《海关首次大龙票设计绘图者之考证》、《海关首次票版模印铸等问题》、《红印花加盖程序之研究》等力作，著有影响较大的《她的集邮生活》等书。去台湾后，亦成为当地很有名望的集邮家。台湾出版有《陈志川邮学论著》。陈志川深知“集邮是娱乐，而研究是刻苦。”但他仍以考源探根的精神从事研究。当年，新光会员陈葆藩曾以“一芹”笔名在《新光》第 8 卷第 1 期撰文，对陈志川刻苦钻研的情景，有一段生动的描写：

图 19　《国粹邮刊》

“吾友陈君志川之于邮票，非一味以网罗名贵之品为能事者也。君专集国邮新票。有当其意者，不惜重金，必获之而后快。而于一八七八年之海关一次大龙票，一八九七年之红印花暂作票，搜藏尤力，故其成绩亦斐然可观。闲居他无所事，惟展其邮票，孳孳于版模、齿

度、刷色、纸质、图案之研究，往往有所发明。居室中文几餐案，均复玻版，而置票于其下。即膳食时亦必时时辍著赏鉴以为乐。又夜深人静、四壁寂然，君每于此际，以研究所得，绘图说明，达旦不倦。谓为废寝忘食，岂溢辞哉。余尝谓集邮家集一邦一类之大成，五色纷披，琳琅满目，固足乐矣。苟能进而研，研而有得，得而著文以扬之。俾后进者有所凭借，有所启迪，其乐不更博乎。如志川者，盖亦兼有二乐者也。”

集邮研究到了如此忘我入迷的程度，其精神令人钦佩。陈志川笔力沉稳，妙语连珠，撰写的大量集邮佳作发人深省。例如，关于“变体是什么?”他在《她的集邮生活》中解释：“邮票上一切错误，就称为变体。他的意思是原来不应如此，现在变成了如此。”一语中的。

陈志川在《邮学研究如何进行》一文中谈到：“研究本是任何学识最后的归途。集邮既原来建筑在各种文学、美术、史地、常识的上面，当然难逃乎专门性的学识，此即所谓‘邮学’者也。”“没有经过研究的集邮家，怎能达到成功之境?”他主张研究邮学应执“博核、疑古、自疑、善悟”的态度，即通过多读书刊、大胆探求、自问、善加思索的方法，以求得邮识的真谛。“谚云：‘百闻不如一见’。邮学研究离不开邮票，所以邮学研究家必须要有见闻并重的态度，尤其是有关研究上的资料。”(《新光》15卷2期)

陈志川积极提倡集邮者阅读邮学书刊。他在《国邮杂闻》一文中写道：“邮学书籍为吾人集邮者一日不可缺少之品，其重要性质，当胜于吾人购邮赏玩千万倍之上。余心爱邮学书籍远较于偶得一二珍品为甚。”爱邮者必爱书。陈志川为此曾准备将国内出版的各种邮学书刊汇集成室，供集邮同好阅读抄写之用。但由于战争迁移和个人力量所限，使他这个多年心愿未能实现。

1949年，陈志川迁居香港，后定居台湾。1977年病逝台湾。

张赓伯(江苏常州人，1902—1972年)(图20)，20年代在哈尔滨银行任职，东北沦陷后来到上海，成为邮坛活跃的集邮家。先后担任新光邮票会理事、《新光》编辑、中华邮票会《邮典》主编，并大量为《近代邮刊》、《国粹邮刊》等撰写文章。他引经据典、邮海识珠，有“邮史

图 20　张赓伯

矿”之誉。

张赓伯极为注意收藏各集邮会的出版物。早年举凡中华、新光、甲戌及天津等地各类邮刊，全部搜罗齐备，“令人见而生羡”。张赓伯在 30 年代收藏了一部他自己称之为《趣味集》的邮集，内容包括大量世界各国有特殊意义的实寄封、样票、假票、假邮戳及对它们的分析研究。还藏有世界第一枚邮票、最大的和最小的邮票、最大面值的邮票、最便宜邮费的实寄封、中国信封上各种有趣的宣传戳记等。这部邮集蕴藏了极丰富的邮政发展史、邮坛掌故、趣闻轶事等史料。张赓伯曾在《新光邮票杂志》上撰文介绍这部邮集，并申述自己的集邮主张：

“国人之集邮，重罕贵而不重趣味。其实罕贵只有少数人能办到，趣味则不论贫富均可得之。趣味并不需化巨大代价，即在极普通之邮票中，亦可求得。要在各人能运用一己脑力，庶可自得其乐。若梦寐于罕贵之间，又力不从心者，则自寻苦恼矣。”(《集邮》1981 年 1 期)

强调以集邮之趣味性设专题收集研究，在当时中国邮坛盛行重金求珍的集邮风气中，真是另辟蹊径，特色独具，令人耳目一新。

张赓伯为人耿直，守正不阿，嫉恶如仇，当年在上海集邮界以“好管闲事”出名。一位外国医生公然侮辱中国邮商，他联合邮友与之力争，使该医生不得不书面道歉。一位外国邮商在拍卖场中营私舞弊，他当众痛斥其非。1942 年 4 月一天晚上，他在路旁见到一外国醉鬼欧打中国人力车夫，义愤填胸，上前制止，结果也惨遭毒打。邮友闻之无不钦佩。

张赓伯为了揭露各种假邮票骗局，还专门下功夫研究假邮票。他在《新光》第 7 卷第 7 期发表的《无尽藏室邮话》中说：“我对于假票是极喜欢研究的，搜集这类参考品，已有一二百种。”对一些少见的假加

盖、假漏齿邮票，他甚至不惜用比真票高数倍的代价买下来研究，而且非研究个水落石出而后快。由于他搜罗的正票、伪票、样票、变异票资料宏富，因而能对邮品研究考证精细入微，成为集邮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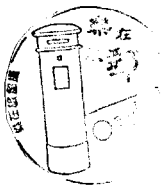
占领上海的日军，对所怀疑的一切活动都采取严厉镇压，许多集邮者为集邮亦难免招致种种迫害。

1939 年，中华邮政为庆祝美国建国 150 周年发行一套纪念邮票。后来，经辗转途径流入上海市，一些邮商开始销售。不料被日军查知，认为是敌对行为，出动军警搜查五洲邮票社、绿光邮票社和奥伦多邮票公司，将这些纪念邮票全部抄走。就这样还不罢休，后来竟根据查出的新光邮票会会员录进行挨家抄查，一时搞得人心惶惶。有两位会员因不明真相不敢开门，被抓进宪兵队拘留。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收集自己国家的邮票竟遭到如此迫害，怎能不使集邮者们更增添对侵略者的仇恨。

日寇侵华期间，侵略者肆意侵犯中国主权，扶植傀儡政权发行“满洲国”、“华北自治”等伪邮票。中国人民对此愤慨万分。

40 年代，伪满洲国邮票大量涌入北平。由于伪满洲邮票种类繁杂，其中有不少变体票。一些集邮者出于保存历史见证的责任感，收集伪满票和敌伪发行的华北六区加盖票。其中著名的是集邮家伍长庚。他是协和医院医师。民国票和伪满票中一些极罕的和未正式发行的票品及变体票等，他差不多都齐备，邮集蔚为大观。在今天，我们应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集邮家在艰难岁月中为国家搜藏的珍贵历史资料。

抗战胜利后，关于伪组织邮票的身分问题，《近代邮刊》曾作过专题讨论。钟笑炉撰写的编者按语认为，不应“以身分问题与应否搜集混为一谈”。该刊第 22 期发表的萧伯青文章《伪组织邮票的身份》提出“集尽管集，伪仍是伪”、“伪虽是伪，集仍可以集”的观点。



第二节 “孤岛”集邮热

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那时天津的英法租界日寇尚未入侵，许多达官贵人纷纷迁往租界当寓公，使天津租界里集邮活动一度兴旺起来。许多北平邮商都赶去天津劝业场等处开设邮票社。

这段时期前后，天津的外国邮商也比较多。波兰人瑞乐尔在英租界达文波路宅中经营邮票，主要以出口华邮换回外邮，售与在津的外国集邮者，也向中国集邮者出售中国邮票。法日混血儿马丁小姐在英租界中街开设古玩店，兼售邮票。还有几位白俄邮商在小白楼一带经销邮票，其中斯徒宾是吉本斯邮票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之一。

1939 年夏天，在天津邮友的一次聚餐会上，与会者有感于抗战爆发后，沪杭的中华、新光邮票会一度停顿，中原的甲戌邮票会西迁，北平等地集邮活动陷入低潮，倡议在天津组织一个邮票会。经数月筹措，年底草拟了成立宣言和会章，宣言中提到：

“年来津市集邮之风日炽，同志虽多，平日缺少联络，致邮识未能互相贯通，同志每谈及此事无不引以为憾。按津市为华北通商巨埠，人文荟萃，集邮人士日益增加，极应组一研究集邮的团体，藉资联络，共同研讨。盖邮学一道，虽属微小，而极复杂，不有研究，何能进益。”

1940 年 1 月 7 日，“天津邮票会”正式成立，选举雷润生、李东园为正副会长。邮会设立了审查、会计、编辑、拍卖、交际、出版各部。天津邮票会在当时是华北较大的集邮组织，许多北平、上海等地的集邮者也纷纷参加，会员一年内发展到 400 多人。

会长雷润生（河北冀县人，1891－1963 年），是天津资格最老的集邮家之一。早年任天津新泰兴洋行华帐房职员，因与外国集邮者接触，受影响开始集邮。1925 年上海中华邮票会成立后即加入。他以收集国邮旧票为主，兼集新票和变体票。因信销票不易得，有时为了获得品相好的旧票，不惜以新换旧。抗战时失业在家，开设邮社作了邮商，经营中以从不欺诈赢得邮友赞誉。

天津邮票会每月举办一次邮票拍卖，持续2年多，共举办27次。先后由冯国栋、黎震寰任拍卖部主任。拍卖所得佣金收入，作为邮会经费主要来源。1940年3月创刊《天津邮刊》（双月刊）（图21），先后由李东园、黎震寰负责编辑，2年共出版10期。天津邮票会一时如异军突起，风行海内。

图21 《天津邮刊》

但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加强对沦陷区的控制，禁止集会结社。1942年，华北伪政权宣传部门通令各报刊，必须加印反共反人民的标语才准出版。天津邮票会对这种丑恶行径加以抵制，宁可停刊也不接受，遂以经费不足为由停刊，邮会也被迫停办。当年集邮者们深明大义，不畏高压的爱国精神令人起敬。此后，劝业场的几家邮票社和每周在会芳楼的聚餐会，成为天津集邮家们聚首联谊的场所。

1938—1941年，占领上海的日军尚未进占“租界区”，使这里成为“孤岛”，附近人士荟集一隅，使租界内人口倍增，百业均成畸形发展，集邮活动也因此日见兴盛。抗战期间，租界内的外国人集邮组织有增无减，除英国人组织的上海邮票会外，在沪的俄国人还成立了二个集邮组织。特别是由各处迁来的大小中外邮商云集，造成了热闹非常的集邮气氛。在许多地方沿街设摊携篋的邮票小贩比比皆是，较有规模的邮票店一家接一家新开张，其中不少是由从欧洲逃难来的犹太人临时开设。

精明的犹太邮商，为了招揽生意，还挖空心思雇用儿童，在胸前背后各挂一块1尺多见方的牌子，上面彩绘一些邮票图样，在北京路一带大街上做流动广告，并向行人分送宣传品。

随着集邮热潮的不断升温，华邮价格一涨再涨。以往在华外国集

邮者中专集华邮的人不多，价格变动极微；而这时情况大变，由于笼罩战争阴云，汇率降低、物价上涨等因素，中外集邮者争相把投资保值的目光投向中国邮票，造成华邮供不应求，价格屡创纪录，几年内使稍名贵一点的华邮，几乎从邮市上绝迹。

华邮暴涨，表面看是邮票受宠，实质是货币贬值缘故造成的。据租界工部局报告，上海地区战前与 1939 年 11 月的物价上涨了两倍以上，老百姓称之“钱毛了”。在这种情况下，一枚邮票即使比战前售价上涨 3 倍，按货币购买力计算，实际仅涨 1/5。上涨价不到 2 倍多者，实际还是下跌。

在这股风潮中，一些精明的邮商使许多在暗中沉睡多年的珍贵邮集，被推上争抢竞购的风口浪尖。俄国籍邮商罗门就是一位出尽风头的新闻人物。罗门供职于上海一家运输公司，起初业余兼营邮票，所售都是一般邮品。后来求教于一位老邮商，茅塞顿开。“至若应市之品，则如求泉得源，不虞涸渴亦。”他在抗战期间经营的邮票业务中，有两件颇具传奇色彩的得意之举。

有一位法国传教士常去罗门的邮票店购买法属地邮票，并协助罗门经营成功一笔地产生意，两人过从甚密。一天偶尔谈起华邮，传教士告诉他一个秘密。1914 年法籍集邮家、律师费满因有急需，以五千两银将其一部早期华邮专集典押给教会。结果久不来赎，一去 25 年无音讯。真是天赐良机，于是罗门以 2400 元将这部邮集买下。虽然因教会不懂保管方法，许多邮票已胶粘色褪，但仍不失一部极难得的华邮宝藏。消息传出，罗门店里挤满了求购者，很快以 10 倍以上的售价抛出。罗门也因此在上海邮商界名声大振，更加倾其全力于华邮。当他掌握了德国人费拉尔著名华邮遗集的下落后，又施展各种手段作成了第二笔大生意。

费拉尔因当年任职清政府海关邮政，假公济私获得大量极名贵的华邮变体票。其遗集虽经遗孀售出一部分，余下的珍品仍袭藏多年。日军进攻时这位夫人在沪东的寓所被炮火击毁，半年后才去清理，从颓垣败瓦中找出邮集基本完好，喜出望外。这时罗门通过该夫

人的亲友，几经周折，终于又从中获得大量华邮精品。上海著名邮商陈复祥闻讯，立即找到罗门，先下手为强，购得其中精华 9 组，内有“北海票”四方连全套、“红印花”小肆分四方连、“万寿票”多种漏齿等。

抢购风中，鱼龙难免混杂，供求双方矛盾频出，给热门邮品不断增加热门话题。1940 年 1 月，上海发生了一件两名新光邮票会会员因购买假票对簿公堂的新闻。

新光邮票会会员俞薇生（广东人）是国府高级职员，早年以高价购集的名贵邮票很多。后因经济困难准备卖出一些，委托光明书店寄售。一位外籍医生罗伟廉（后加入中国籍）是新光邮票会永久会员，打算购买。经鉴定，发现其中伪品很多，认为俞有意欺诈，报告新闸捕房将俞拘捕。此案解送法院后，经双方聘请律师，起诉辩护，最后法庭宣判俞薇生无罪释放。法院判决书中有一段话，读起来好似在普及集邮知识：

“查收集旧邮票，亦如收集古玩。收买出卖，纯系基于赏玩心理，鉴别能力，又属因人而异。被告收进邮票，自己亦难自信辨认精审，故于每页邮票注明价额，一面又注明如系真品，当值价若干。显非以假作真。而此项邮票，又系被告以相当代价购来标价亦低。又未如同真品之同一高价出售，显无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故意。此次罗伟廉向光明书店出价购买，亦非被告施用诈术，自无诈欺未遂罪责可言。合予依法谕告无罪。”（《邮典》1 卷 3 期）

说得在理，判得公道。为了集邮吃官司，在上海虽已不是首次，但当年仍很轰动。不少报刊都报道了案情进展情况。

在租界内日益兴起的“孤岛文化”中，文物亦成荟萃之地，各种收藏爱好者显得十分活跃。经常举办的展览会、座谈会等内容广泛，使大量“经世稀见之品，今得一一罗列于各届之展览会中。其中关于文献者，实居较多。”1940 年，为筹款救济难民，由袁履登等人发起在沪还举办了一次私人“古今柬帖展览会”。这次展览会上，附设有邮票、古币、烟标等展览，使各种趣味集藏汇聚一堂，别开生面。

参展的邮品有120架镜框，均由新光邮票会提供。同在一展室的钱币展品由丁福保提供，他本人也是新光邮票会的钱币会员。所以这两部分实际都由新光会协助。邮展部分还由大会聘请了一些女校学生担任讲解。由于她们不懂集邮，为满足观众的进一步询问，新光邮票会的张包子俊等人不得不在会场担任临时讲解。整个展览会历时10天，参观者超过2万人，取得很大成功。但许多对集邮有一知半解的观众，对展出中有大量新邮票，认为毫无价值，大肆抨击，使在场的集邮家们大感头痛。张赓伯为此专门在《新光》第7卷第4期上加以辩驳：

“近有一极可笑之口号，普遍印入初集邮者之脑中，即新票不值钱也。所谓新票不值钱者，即邮票非用过者不能保障其为真品，未用过之票，大半系假货，故不值钱。此种学说，不知何所根据，初集邮者十有七八深信此说，大足喷饭。此次柬贴展览会陈列之邮票，即有许多参观者深信此说，因陈列品中新票占十之六七，遂生鄙视之心。此种奇怪学说，高等集邮家中亦有深中此毒者，视邮戳为保障票之真伪唯一法门者，不乏其人。贤如寒云，亦不能免此，在其日记中可略窥一二。”

1943年2月28日，旅沪的俄国邮票会在上海举办邮展，在展览现场设有临时邮局，并刻制了纪念邮戳。这次邮展有一项新颖别致的创造：在中华邮政1941年6月发行的“节约建国”小型张上用中、英、俄3种文字加印“旅华俄国邮票会邮票展览纪念”字样。

抗战期间，上海集邮界有一些新变化，涌现出几位较有成就的集邮家。

宋醉陶（浙江吴兴人）（图22），童年时得到其父所集的一册外国邮票，开始集邮。他在收集国邮时，重点研究清“万寿票”版式，曾发表一些研究文章，有许多重要发现。被称为“万寿”专家。

谢鄂常（浙江嘉兴人，1900—1942年）开始集邮也较早，他的主要兴趣集中在收集研究中国各时期明信片及邮制笺简，收藏品极繁富。他撰写的中国片笺著述很多，散见于各邮刊。被称为“明信片专

家”。

刘子惠(山东烟台人),早年经商欧洲,收藏欧洲各国邮票很多。1926年阅读《邮乘》邮刊后,开始专门收集华邮,为此不惜斥巨资高价搜求。1931年瑞士伯拉斯可拉公司拍卖德籍华邮收藏家克利伯的邮集,其中华邮部分几乎都被他购得。

图22　宋醉陶

刘子惠1940年来上海定居后,又专致力于清“万寿”及其加盖票的搜藏,其中方连大张之类很多。由于他的邮集中珍品纷呈,如号称海内孤品的“红印花小字当壹元”八卦戳旧票、汉口临时中立旧票全套等,被誉为国内第二大收藏家。

这个时期的上海,集邮方面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有众多的集邮家兼做邮商,人数之多令人吃惊。严西峤在《闲话上海邮商》一文中曾有这样的描述:

“抗战时期,上海的邮商,可谓群贤毕集:有抛弃粉笔生涯的大学教授,有视金饭碗若蔽屣的银行经理,有不谈柏拉图学说且打商业算盘的哲学博士,有专治他人精神病而治不好自己精神病的医生,有寄榻沪上的旅馆老板和买户口米吃的米行小主,真是极一时之盛。那个时候,未必一定是大家孳孳图利,无非谈邮解愁,以消泄彼此的精神苦闷。所以歌台舞榭酒楼餐肆,时常有联袂的游踪。”(《近代邮刊》3卷3期)

张包子俊也曾道出集邮家做邮商的苦衷:

“回想自己在上海做邮商的时光,虽然遭受置身沦陷区的苦难,但是在集邮乐园中,依然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热闹得很。那时集邮家也是成天无事,他们上我店里,赛过到写字间一样,一日不来,倒有三秋之慨。”(《近代邮刊》1948年3期)

当年集邮家业邮较多的原因,一是迫于生活困难,二是为了以邮

养邮，三是由于国难业芜，生活苦闷，交友心切，以此作为精神安慰。其中尤以原工商人士和文教公务人员居多。

这一时期，上海的华邮目录书籍出版呈一时之盛，且多为外籍邮人编写。

1940年，俄国邮商罗门和休门分别出版了华邮目录。罗门的目录是在陈复祥指导帮助下编写的，内容详尽，图解极精，加之以铜版纸印制，全书200多页，被集邮界誉为"空前之作"。休门的目录相比之下较简单，商埠邮票未列入。这两本目录当时销路很好，都曾增补再版发行。

1941年，罗伟廉编撰出版《中国商埠邮票史》一书，内容丰富，并附有一些彩色插图。这本书是用英文编写，很受国外集邮界欢迎，罗伟廉竟因此书而成名，被吸收加入英国皇家集邮学会。

由中国集邮家编写的华邮目录主要有两本，一本是陈志川编撰的《国邮简目》，一本是马任全编撰的《国邮手册》。这两本书最大的特点是，作者有感于战乱时期通货膨胀，邮票价格不稳定，与其标注不准确的票价，不如不标，所以都采取了各种邮票一律不标价的作法。但为方便读者参考使用，又各想出"绝招"：《国邮简目》中，把各种名贵珍罕邮票，用红色字体标出，非常醒目；《国邮手册》则采取在邮票目录后面留有空白表格的办法，供读者根据需要自己随时填写价格之用。二者均不失为标新立异。《国邮手册》另一个特点是比较注重实用，内容包括较广，有国邮年谱、国邮目录、版式图解、中华邮界出版物书目、邮人通讯录等。篇幅不大，内容丰富，因而很受一般集邮者欢迎。

上海成为"孤岛"后，中共地下组织利用这个条件，开展一些文化活动，组织抗日救亡宣传。其中如在麦伦中学组织了集邮会，每星期一次观摩交换；编印了一份油印刊物《邮集》；还举办过夏令营邮票展览，展品由20多名成员提供。集邮家沈曾华当时参加了地下党，是这个集邮会成员。他将收集的数百枚苏联十月革命后发行的邮票参展。邮展还专门刻制了纪念戳，起到了团结同学、宣传抗日的作用。1941

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麦伦集邮会被迫停止活动。不久，沈曾华和一些同学离开上海奔赴抗日前线，并继续他的集邮活动。

第三节　在大后方

抗战爆发后，中国东部广大地区被日军侵占。1940年，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各地各界人士大举入川，使西南偏僻地区经济文化发生极大变化，集邮之风也兴盛起来。

1939年，新光邮票会的会员刘恒生在重庆太华楼巷马路口办起了“同歆邮票社”。这个邮社在重庆是首家，在西南地区也是第一家专业邮票店。因为出售和收购的中外邮品较多，在重庆集邮者中很受欢迎。那时邮社店牌使许多过路人好奇驻足。进店后方知平日见过的“邮花花、纸飞飞”（四川人当年称呼邮票语）竟然还是有人收集的值钱东西哩。邮票社的开办，对重庆扩大集邮宣传产生了影响。该社还出版《同歆邮目》。

刘恒生1926年在江苏泰县面粉厂任职时，见到国外厂商寄来的宣传品封皮上各国邮票十分好看，就剪下保存起来。直到1931年他从报纸上看到邮票社的广告，才逐渐懂得集邮的方法。

1940年，由重庆山城邮票会出版的《山城邮讯》，是重庆较早的邮刊之一。

1941年，重庆曾筹组成立“交通部国人集邮会”，发起人之一是集邮家赵翔云（江苏丹阳人，1912—1976年）。他30年代开始集邮，主要收集中国早期邮票，先后担任过重庆邮票研究会理事兼研究部主任、首都集邮学会顾问。赵翔云酷爱钻研，勤于集邮写作，常为邮刊撰稿。

筹建重庆地区集邮组织的活动曾几度出现波折。1942年，由赵达甫倡议发起成立“山城邮票会”，结果因人事问题告吹。其后郑大镛等人又组织了“陪都邮人座谈会”，研讨邮识，报道邮讯，交换邮品，参

加的人数逐渐增多。于是在此基础上，1943 年 7 月正式成立了“重庆市邮票研究会”，出版邮刊《陪都邮声》，会员达到 1000 余人。邮票会设总务部、宣传部、研究部，理事长是郑汝纯，常务理事先后有郑大镛、张枕鹤、吴乐园、艾元俊等。

集邮家郑汝纯（江苏人，1904—1980 年），名郑熙，汝纯是他在集邮界的名字。一生在铁路系统任职，是中华邮票会的永久会员，新光、甲戌邮票会的创始人之一。从 1947 年起任北平邮票会理事长。他德高望重，为人憨厚，对宣传组织集邮活动极为热心。他邮识精湛，早年所藏清代和民国邮票规模可观。不幸 1939 年 2 月日本飞机轰炸贵阳时，他一家 6 口人遇难，邮集尽毁，实属令人震惊的惨案。他以后重搞集邮，已无法恢复原有水平。50 年代初和 60 年代又两次因家境拮据，卖掉邮集，心灰意懒，不问邮事。一位一生热爱集邮的集邮家，国难家祸屡遭不幸，实在令人痛惜。

抗战期间，重庆及附近地区是敌机经常袭击的目标，使邮递运送遭受很大损失。有时行驶在江中船上的邮件被炸沉江，幸而能被捞获的，邮局就加盖木戳印章“被炸捞获邮件”。1939 年 8 月 19 日，18 架敌机轰炸乐山，邮局被炸毁，20 日邮局刻制 1 枚木戳“本局被炸票款全失　请向收件人补贴邮费　乐山邮局批”。另外还刻一木质临时日戳，代替被炸毁的钢戳。类似的事件还有不少。这些战争灾难的邮戳和实寄封，是历史的见证，珍贵的史料。

限于蜀道之难，当年进出重庆的交通极为不便，险象丛生。客居重庆的集邮家周伯琴，是一位制片商，在川滇几年中，收藏了大量华邮早期和近代票、商埠票及外国票，在陪都集邮界名震一时。抗战胜利后，他与儿子携带影片和邮集搭木船赴沪，行至三峡船触礁沉没，其子会水遇救，周伯琴不幸与全部藏品同葬江底，令人痛惜。

直到抗战胜利前，重庆集邮界中的新光邮票会会员已有数十人。其中文若川的实寄封片、罗伯昭的集邮兼集钱币都较有名气。集邮家吴乐园的珍贵早期邮票当时已很出色。他 1949 年去台湾，现已成为著名的“红印花”研究专家。

当年重庆集邮热潮的兴起，受到邮政当局的支持，像地处太平门的东川邮政局还专门腾出房间设置“集邮组”，为集邮者服务。其营业方式很灵活，经常公布“存货表”，集邮者可根据自己需要预定票品。后来，由于国统区通货膨胀，集邮组的销售也开始不景气。1945年，他们又改变售票方式，将若干张整版邮票搭配一些零票卷成一卷，论卷卖，每卷法币500元。不想这种售票办法竟外流出了民国第二种中心倒印珍邮。

当时，重庆一个集邮不久的中学生郑晴初购买了一卷后，过了几天才发现其中有一版(50枚)邮票上的孙中山像印倒了。消息传开，上门求购的邮商使他家不得安宁。倒印票除被邮商换去一部分，其余的在上海售出，成了轰动中外的民国之珍。如果当时东川邮局不用成卷的办法售票，此张倒印票可能不会流入集邮界，至少不会一下子聚在一人手中。

抗战期间成都集邮活动发展迅速，出现了许多邮社。其中时间早、业务好的是设在中西顺城街的“蓉锦邮票社”，由集邮家李弗如主办。店内悬挂镜框详陈出售的中外邮票样品，还经销和代销明信片、首日封、各地邮刊、集邮册等。1941年11月，创办私家邮刊《蓉锦邮牍》，除刊载集邮文章，还登出蓉锦社邮品出售目录。该刊直到1949年9月共发行32期，最高时订阅6000余份。集邮家李弗如(山东济宁人，1894—1979年)曾是新光、甲戌邮票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国第一个提倡收集盖有地名邮戳的人。他准备大量四方形的纸片，贴好邮票，分别寄往各地邮局，请求加盖邮戳后寄回，作为收藏品。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他共集得地名戳票4000多枚。使许多集邮者眼界大开，纷纷仿效，新风渐开。

1942年7月，“成都集邮会”成立，负责人是吴昭孔、汪剑魂、李弗如，曾举办寄售等活动。10月出版会刊《邮苑》，王育中任主编。该刊初为单页，后改为24开本，每期12—30页。抗战胜利后改为双月刊，主编是集邮家叶季戎。成都集邮会会员曾达到700余人。

此外，成都还有由建国中学学生组织的“怡友邮票研究会”，会刊

《行远邮刊》，由会长丁昌佑编辑。西南邮票社编印的《西南邮刊》，主编李友年。

抗战期间，四川重庆、成都地区是中国集邮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其影响所及，远至西南、西北、华南、华中等地。仅重庆一地，40年代先后出版的集邮书刊有20多种，且多为铅印本，盛极一时。

贵阳地区的集邮活动是抗战后兴起的。1941年7月成立"金竹邮会"，主要负责人是许庆民、任善震、郭润康。会员分布各省，至1945年发展到1000多人。该会曾举办过几次邮展。1942年9月创刊《金竹邮刊》，是抗战期间国内水平较高的邮刊。该刊曾发表乃弃套用唐代诗人刘禹锡《陋室铭》韵所撰《邮室铭》：

"票不在多，专精则名；集不在繁，有龙则行。斯是邮室，惟吾所欣。驿使上阶绿，票色映帘青。谈笑有邮儒，往来无俗丁。可以调我性，怡我情。无笙歌之乱耳；无奕枰之劳形。南著园寿庐，西蜀刊邮经。列子云：是迷之邮。"文章幽默风趣，耐人寻味。（注：《园寿庐"为上海周今觉撰《园寿庐邮话》，"邮经"系重庆张枕鹤撰《邮经》。）

集邮家郭润康（江苏丹阳人，1917年生），集邮笔名邑丹。从40年代开始他先后创办《金竹邮刊》、《黎明邮刊》、《万寿邮刊》，担任主编，是一位以集邮学研究见长的专家。他15岁在蚌埠药房当学徒时开始集邮。抗战爆发后，来到贵阳五洲药房。他集邮的道路是"收集—研究—写作"，自称："我注重邮识，邮票反在其次。"由于他精于钻研、胸藏万汇、笔底波澜，从40年代到80年代，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的邮学文章数以千计。当年仅在《金竹邮刊》上，他就先后撰写了127篇文章，10余万字。台湾集邮家公孙柳赞誉他："著作如林，文思洋溢，下笔千言，瞬息立就。"更可贵的是他一生以"尽力之所及，助人为乐"的邮德，热心辅助集邮后来者。"文革"后，这位医学院副教授将自己全部珍贵邮品和资料无偿送给修文县一位勤于钻研邮识的年轻邮友。

1935年8月8日，云南基督教青年会曾举办过邮票展览。云南省集邮者的大量出现则是抗战带来的结果。身居昆明的新光、甲戌邮

票会会员万灿文在《新光》邮刊第8卷2期上介绍说："昆明因时势的变迁，顿改昔日面目。即以集邮而言，向日同志呼稀可数，今则邮人云集，邮市活跃，初集邮者尤不可胜计。仅云瑞中学一校，经不佞之提倡指导，集邮者竟达百余，占全校同学三分之一而强。"

万灿文（云南蒙自人）从北平燕京大学毕业后，回云南偏僻地区当过几年教师。他曾游历过西南许多地方，出于对集邮的挚爱，常常是随时随地留心考察邮政情况，不断将收集到的各地邮政轶闻趣事，写成旅途通讯，寄给《甲戌邮刊》刊载。例如，他在一篇文章中将穿行于穷乡僻壤、深山密林中的邮递员们颇具传奇的经历描述的栩栩如生：

"一位局员告诉我，滇省思茅一带，森林密茂，毒蛇猛兽，栖息其中者，不知凡几，而又数百里无人烟。某次有三夜班邮差，行至林中，日已下山，远闻虎豹之声，大骇，乃亟登树梢以避之，及天暮月升，俯视地下，只见虎豹狼熊巨蛇等往来不绝，且时相斗，又恐蛇上树，皆不敢出声，苦守一夜，不敢合眼，及天明日出，视地下无动静，乃互相问曰：'你还活着否？'斯亦可见夜班邮差之苦况。又夜班邮差出班时，身负邮袋，手腕挂灯，左手持小马锣，右手持锤，且行且敲，以便惊散野兽。锣上以鸡血粘鸡毛鸡冠，据谓如此，可以避鬼怪云。"这类邮史资料，真是国内邮刊中难得一见的佳作。万灿文在旅途中还留意收集边远地区的邮戳，大量给各地邮友寄实寄封。

抗战期间，因中华、新光邮票会几度停顿，甲戌邮票会成为国内影响最大的集邮团体。由于战火迫近，以及业务变动，会址曾多次迁移。1938年迁往西安，1945年迁往开封，抗战胜利后1948年又移至柳州。但邮票会的活动一直坚持开展。当时，处在抗战极端困难时期，经费无着、纸张奇缺，通过会员捐款和投稿，含辛茹苦，仍保证《甲戌邮刊》连续出刊。1937年还在西安出版《甲戌邮刊》英文版，发行国外。该会对推动我国内地省份集邮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甲戌邮刊》上刊登的文章很有特色，许多佳作读起来轻松活泼，颇耐品味。例如，有一首荻轩所作集邮诗：

“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方寸之纸，可使弥布于全球。是知学贵积微，不择细流，精粗赅博，矣勤求；穷年矻矻，曾不觉岁月悠悠。”

在《甲戌邮刊》4卷1期上，刊有集邮四点要诀：

“一曰始易，集邮譬如行远，每步一尺则舒，每步二尺则急，每步三尺则喘。谚云：欲速则不达也。二曰以恒，恒者，常也，不间断也。谚云：滴水成渠，撮土为山。三曰考据，四曰辨真。”

抗战期间，甲戌邮票会在古城西安7年多时间，对陕西地区集邮活动的发展推动极大。加之抗战中，东北、华北等地的大批学校、研究所撤退到陕西的西安、汉中地区，其中也有大量集邮者，为西北大后方吹来了集邮之风。1941年2月，西北联大、东北流亡大学等大批集邮者在陕西城固附中举办邮展，并刻制纪念邮戳，向身在陕南山区避难的各界人士作抗日宣传。1941年8月13日，陕西邮政部门专门刻制1枚“八一三沪战四周年抗战纪念”圆形纪念邮戳，供集邮者销票、收藏。西安也举办过邮票展览。

抗战期间，兵荒马乱，交通受阻，身处文化落后的西北地区集邮者，欲增补邮品甚感困难。只能从外地邮友、邮商处购进。往来收寄邮品也非常不易，不但路途上可能造成意外丢失，而且邮局内部还会出现偷“邮”鼠，真是雪上加霜。西安就曾发生过一件奇闻。

当年，国民党军统组织在各邮局派有邮电检查员，对认为可疑的函件可以扣留处置。1943—1945年，陕西邮政管理局挂号组的检查员朱均生，凭此特权，借机大量侵吞装有集邮邮票的挂号信函，或抽窃内装邮票，或盗走整件信函。东窗事发后，朱被处决。对此，1945年6月《甲戌邮刊》第4—6期合刊中作了报道：

“陕西邮电检查员朱均生，因利用职务，窃取邮件，贪污渎职。并竟诬‘良’为‘奸’，从中敲诈。经多方告发，由当局查得真情，始乃大白。呈准处于死刑，于本年4月20日下午4时枪决。本会会友先后附函寄陕之邮品，时常不翼而飞，近来遗失较少。当亦我邮友乐闻之一端也。”

为盗窃集邮函件掉脑袋，恐怕在中外邮坛绝无仅有，此事颇惊

人。集邮家李容，当年就是该局挂号组的邮政职工。据他分析，如果仅以窃取邮件论，绝不致判处死刑，很可能朱均生在军统内部另有要案在身。

1945年，陕耀县成立华原邮票研究会，出版《华原》邮刊。

抗战爆发后，沿陇海线撤退到甘肃地区的大批职工和商人中，有许多30年代初开始从事集邮活动的活跃人物，在当地产生较大影响。其中较著名的有兰州铁路局职工任绍安（浙江人）、天水邮电局职工盛悟生（北京人）等。这两位集邮家不仅收藏的清代、民国、解放区邮票非常丰富，而且注重邮识，尤其精于各种版式、加盖的考证研究，40年代常为各地邮刊撰写文章。盛悟生曾在一封信中叙述他研究华北六省大小字邮票的体会，从中颇能见其严谨的研究精神：

“邮集称套，故集者莫不愿其全，已集之票，亦莫不愿其真。但自集六区加盖票以来，竟事与愿违，因集邮常识不足，盲目求全，凡不能由邮局按面值购到之票，不辨真伪，均加价购进，往往认伪为真。后有一知半解，偶尔发现部分字体有异，又往往疑其为伪，本可购进之票，因犹豫不决，而坐失良机。一部邮集，曾费九牛二虎之力，始克大体完成。为研究版式，征得若干整张及多种零票，埋首案头三年，观其加盖字体一横一竖之粗细，一撇一捺之长短，一点一勾之大小等。一人之票，终属有限，此之存在于各集邮家之总量，不过九牛一毛，沧海一粟，尚未发现之变异为数尚多，希望集者将长期埋没无闻在邮集中或复品中的各种变异全部挖掘出来，并留传下来，不使后集者骤见之引为未见径传之品，而怀疑莫释。”

1943年春甘肃兰州成立“金城邮票会”，出版了会刊《金城邮刊》。电力工程师杨世昌是该刊的组织者之一，80年代他担任甘肃省集邮协会副会长。他回忆当年《金城邮刊》创办的情况时说：

“《金城邮刊》是一份普及邮识、商讨邮学的刊物。为了应付国民党的各种检查，我们千方百计地托报社里的熟人帮助排版、印刷。经过大家不懈努力，先后出版17期。直到1947年，由于我们收集解放区邮票引起特务的注意，才被迫停刊。”（《集邮家》报1985年11期）

金城邮票会理事长是陈明述，张田宾、丁宝铨、杨世昌、马鸿宾、章联翔为理事，第二届改选张田宾为总干事。1945年8月，邮会在省立兰州图书馆举办了“兰州市第一届邮票展览会”，并刻制了纪念戳。1946年2月，又举办了第二次邮展，时值元宵节，参观者达3000人次。

平时，金城邮票会为便于邮友观摩和交换邮票，每星期六组织“金城邮票周会”活动，先后在一些单位进行聚会，由服务部出售一些集邮品，邮友相互交换，参加的人很多。该会成为西北地区比较活跃的集邮组织。

1945年1月，甘肃老君庙业余集邮会成立，发行《集邮生活》，主编张秋厂。1946年3月16日，该会曾举办一次邮票展览。

在抗日前线的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一些集邮爱好者坚持集邮，留下许多动人佳话。

集邮家汪剑魂时任师长，率部转战各战场。他的邮集虽未能带在身边，但邮票始终不离左右。他常于“天沉月黑炮声稀”之夜，把玩爱邮。在他的指挥部里，军用地图上用中日两国邮票作为敌我双方攻守进退位置的标识，根据每天的情报，用邮票在地图上作业，实为古今中外战场所罕见。

1937年9月5日，国民政府决定在各方面军后方成立“军邮收集总处”、“军邮承转局”，在各军师及独立旅成立“军邮业务局”。汪剑魂当时率部途径沧州，他即于当日去沧州邮局加盖“军邮业务局”军邮特戳。刚进邮局不久，敌机前来轰炸，躲避过后，他又继续盖戳，然后将盖了戳的信封实寄给各地邮友。在台儿庄战役中，汪剑魂负伤回四川休养，始得有较多时间与后方集邮者密切交往。当年国内许多邮刊都报道过他自前线来书及他的集邮传奇故事。

汪剑魂发表的集邮文章也很多。例如，1937年8月，他写自前线的《玩物丧志与集邮》一文中，批驳了一些人对集邮的偏见和错误作法。文中谈到：

“言集邮为个人主义的娱乐。一经集邮，便成了古董，变为金字塔

中的木乃伊，争奇斗异，独善其身。'手中有邮票，晴雨不关心'。至言集邮是有钱或有闲阶级的事，作这事情的人，则为玩物丧志派。"(《甲戌邮刊》4卷8期)

1946年，汪剑魂曾组织率领军中文化列车赴各地巡回宣传，并在郑州市举办了军中邮票展览。

抗战前，民国邮票均由北平财政部印刷局和英国德纳罗公司印制。北平沦陷后，自1938年改由香港中华、大东两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承印。三个厂印制的邮票，数量大，版式、齿孔、刷色、纸质等差别很多，从而引起集邮者的收集研究兴趣。如香港中华版前期所印的"孙中山像"邮票，版式繁多，成为当时各地邮市上的热门票品。直到40年代初，香港沦陷后，港版邮票的高潮才逐渐平息。

抗战爆发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大批难民扶老携幼向西部逃亡，他们饥寒交迫，处境凄惨。中华邮政总局于1939年提议发行"赈济难民附捐邮票"，以其收入拯救饥溺。该套邮票为6枚，1枚小型张，委托美国纽约钞票公司代印。岂料战火四起，祸事横生。1940年，由美国寄来的邮票样张因途中飞机失事被毁。1941年，印好的邮票在海运途中因船被击沉，又全部损失。运送小型张的邮船为避开日军，被迫绕道改航始运抵中国。有张无票，仍无法发行，只得重新在美国补印邮票。几经周折，才于1944年10月正式发行。

一套邮票从付印到发行历时4年多，其间机毁船沉，使为拯救难民而印制的邮票也成了战争灾难的牺牲品。抗战岁月，不仅集邮艰难，通邮艰难，发行邮票也艰难。今天，看着这些饱经战火，以血的代价换来的邮品，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1942年11月，蒋介石为寻求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派夫人宋美龄作为特使出访美国。临行前筹办礼品时，其智囊献策：美国总统罗斯福以酷爱集邮闻名于世，何不送些珍贵的华邮呢？这位善解人心的蒋夫人遂找到交通部长张嘉璈。张说，珍贵的成套华邮在大后方很难觅成册，唯现仍在上海胶州路原邮政总局的保险柜内有四巨册邮票，属存档之物，从清代第一套"大龙"开始到民国各个时期邮票

都齐全。于是专门派人几经周折，居然从“孤岛”上海安全将邮票取出，运抵重庆。宋美龄除将其中两册交国库继续保存外，1册自己留下，1册作为礼品赠给罗斯福。这是中国首次将珍贵华邮作为国礼馈赠外国元首，为国际邮坛留下了一段轶闻。

抗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空前的灾难，也使国家集邮档案遭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损失。邮政总局迁往重庆时，曾将两箱中国早期珍贵邮票寄存于东川邮局。当年因空袭警报频繁，就将这些箱子放置于防空洞内。哪里料到重庆地区雨雾多，空气潮湿，长期密封于洞中更是雪上加霜。抗战胜利后，人们从洞里取出票箱时，大吃一惊，所有邮票已全部霉烂，并被虫蛀成空洞，其中全是整张的海关“红印花”、“大龙”、“小龙”、“万寿”、“飞雁”、“临时中立”等价值连城的珍品。当时，重庆《邮侣》第10期对此作了报道，深为国宝玉碎痛惜。

抗战八年，山河破碎。每一位集邮者都失去了专心集邮的宁静，激发起爱国救亡的民族感情。他们在战乱中颠沛流离，仍坚持集邮，收藏珍邮；在困难的条件下出版邮刊，举办邮展，显示了中国人民为中国的文化事业而不屈不挠的大无畏气慨。这种坚韧顽强、百折不挠的精神令人感动，将永载中国集邮史册。

第五章　40年代后期的集邮活动

第一节　集邮著作与邮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经过八年抗战后的中国内战又起。尽管时局动荡不宁，集邮活动仍出现了一个复苏发展的非常时期。反映出人民大众渴望和平安定的心愿。

集邮家张包平之抗战胜利之时的几则《邮人日记》，生动记述了当年上海集邮界悲欢离合，度日维艰的情景。

“1945年8月12日

连日集邮界皆大欢喜。同好如周今觉、李友芳、马任全、宋醉陶诸君，因空袭关系，皆将邮集疏散，分存各处。甚有携至外埠或深埋土中者。今已着手整理，陆续复原。”

“1945年12月31日

岁暮矣。八年沦陷，悲欢离合，几家欢笑几家愁。邮人中环境变迁，亦多有今昔不同之感。此八年中，吾大兄、吾姊丈、吾夫皆以辗转流浪，困于沪滨，不得已以集邮而业邮。此外坚贞自守，忍痛生活，或散其久藏，或藉以经营，以求一饱者，即吾所知，亦大有人在。”

“1946年1月2日

胜利前沪上人民以储币一无保障，多购买物资以谋自保。邮人自亦不能例外，营利所获，以近水楼台，仍趋重搜罗邮票。复以古邮之不易多得，于是近代票乃为最适宜之目标。甚至集团行动，一时大户有八君子之称，蒋锦松君实此中健者。计迄今尚藏有纽约版近万套，有无水印航空相等，还都约两万套，复兴四万套，国币加盖五万套，香港欠资万余套，单双圈、新生活、大东版及各种新发行票约各二三千套

云。蒋君昆仲为沪滨第一流舞厅米高梅、维也纳之大股东，并掌握两舞厅之会计实权，经济自易周转。"(《新光会刊》1946 年 3 期)

可见当年的上海滩，靠山吃山，以邮养邮，已成时风。形形色色的集邮者和投资者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使沉寂多年的邮市票品充盈，热闹非常。

但是，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集邮活动出现了令集邮者不安的状况。一方面民国新邮票发行和各地的临时加盖品种繁多，情况复杂，难以收集。另一方面民国新邮市价风涨甚烈，难以购求。如曾轰动一时的华北加盖票，大全套索价达联合券 6000 元高峰，在沪、津等地仅有少数大集邮家能搜集齐全。造成这种"畸形环境"的主要原因，一是某些品种的邮票发行数量过少，二是一些邮商欺行垄断，凡市面紧缺的热门票(包括样票以及所谓黑票等)，不惜代价，网罗尽净，借以向集邮家狠敲竹杠。如此黑道，怎不令广大集邮者叫苦不迭。

新光邮票会的发展十分迅速，1946 年会员增至 1300 多名，成了当时上海影响力最大的集邮团体。

1947 年 11 月中旬由张包子俊、陈志川、钟韵玉发起，新光邮票会组织上海、无锡、杭州会友及家属 40 多人，举行了"第一届邮人旅行年"，作杭州西湖三日游。这次活动搞得丰富活跃，张包子俊在清泰餐厅为客人们准备的 11 道菜，用红纸标出以邮票取名的菜单：

纪念冷盆(小全张)　　共和蟹粉(无齿)
油汆大龙　　登极全鸭(老版)
炸红印花　　对剖胶菜(倒盖)
清炒小龙　　暂作古老肉(变体)
煎黄念块　　万寿大汤(水印)
光复金鱼(错体)

幽默风趣，别有余味。这样的游乐活动真不多见，能够促进结交邮友、增进邮谊。

上海邮坛有几位以研究邮史、编撰邮文见长的知识分子集邮家，他们的集邮文章当年在国内均有较大影响。

陈葆藩(福建闽侯人,1897—1984年)(图23),长期在上海担任教师,做过中学校长。他是中华、新光邮票会的骨干,担任《邮典》、《新光邮票杂志》编委,并应邀为《国粹邮刊》等撰写专栏文章。他的集邮研究述著极为丰富,大量散见于各种邮刊,其中最著名的《寄寸楼随笔》、《寄寸楼邮话》、《海上邮人小志》史料珍贵、文笔生动、哲理警策,有着广泛的读者。

图23 陈葆藩

邵洵美(浙江余姚人),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归国后从事写作兼营印刷和出版业,先后发行过10余种期刊,其中亲自编辑的有4种。1940年开始集邮,学藏并重,论文很多。1943年3至5月间,邵洵美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连载长篇文章《中国邮票讲话》,约7万多字,分60次刊出。该文熔邮票历史、集邮知识、邮坛轶闻于一炉,影响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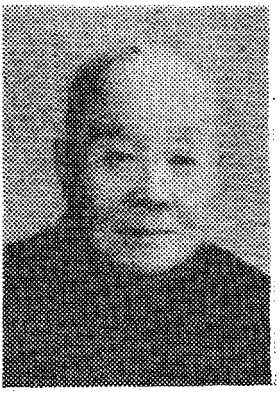


图24 陈湘涛

陈湘涛(上海人,1894—1982年)(图24),早年留学美国,获文学学士和铁路管理学硕士。1936年任职上海银行,兼任中国旅行社总经理,曾几次环游世界。他开始集邮是抗战期间客居重庆,经集邮家郑汝纯指点后才对集邮的真谛心领神会,从此进展很快。

1945年,陈湘涛赴英国,虽非英皇家集邮学会正式会员,但被视为正式会员参加该会中国集邮小组活动。在国外时,他十分注意收集中国早期邮票,带回不少一直流落异邦的珍邮。抗战胜利后,陈湘涛任上海永安公司英文秘书,兼美国中国邮票会在中国的代表、《新光邮票

杂志》编委。由于他精通英文，集邮研究文章多刊于《英国皇家集邮会会刊》，也散见于各地集邮报刊。

陈湘涛在集邮研究上孜孜不倦、锲而不舍，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大龙”邮票专家。他不仅收藏有“大龙”邮票1000枚以上，而且对“大龙”邮票的纸张、版式、水印、齿孔、变体等一一加以细致探讨。收集的图案照片积成巨册，其邮集几乎所有贴页上都记满文字，逐枚注出版模特征和演变过程，钻研极深。每有灼见，深文周纳。他对“大龙”邮票版式的分析，被公认为权威性的结论。陈湘涛在“万寿”票、近代票、解放区票和邮政史料收集等方面，也都有突出的研究成果。

40年代后期，上海集邮界在集邮研究论述和书刊出版发行方面，有两件在国内外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事。一个是《国邮图鉴》的出版，一个是《近代邮刊》的创刊。

图25　马任全

集邮家马任全（江苏常州人，1908—1988年）（图25），1931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化学专业，继承父业任顺昌石粉厂经理。在与国内外厂商交流产品说明书和业务往来中，信函上的各种邮票引起了他的兴趣，开始集邮，数十年搜求和研究不倦。以往集邮者不太重视全张邮票，为了供研究，马任全收集近代票时多为全张，“虽费金钜万，亦所不计”，其收藏斐然大观。“红印花小字当壹元”旧票存世仅1枚。从这枚票发现后的47年中九易其主，两次外流。1944年被马任全重金购得。1955年，他将这枚传世孤品及大量中国邮品都捐献给国家。这批捐献品是马任全几十年心血汇成的一部自清代至50年代中期的中国邮票正集，共有6167枚邮票，其中包括各解放区发行的邮票1619枚。这一爱国行动，为研究中国近代邮政发展史，特别是解放区邮政发展史，为充实国家邮票档案作出了宝贵贡献。1981年中国邮票博物馆成立后，马任全又捐献了一批邮品。1982年，邮电部举

行授奖仪式，表彰他对中国集邮事业的丰功伟绩。他的变体和样票邮集1957年荣获莫斯科国际邮展银奖。马任全曾谈及未获金奖的原因是他的邮集从不收入实寄封，令人引为憾事。

过去中国邮票目录多是外国人用英文出版的。马任全为了编一部中文目录，集多年研究成果之大成，1944年编著了《国邮手册》，1946年再版时冒风险增加了解放区内容。1947年，在其父马润生遗稿的基础上，又完成了《国邮图鉴》。此书几十万字，配有600多幅插图。被各国集邮界称为"马氏图鉴"，是一部公认的研究中国早期邮票的权威著作。

《国邮图鉴》编撰不易，排印亦难。马任全曾倾吐了当年心中的焦虑：

"全书俱以铜版纸精印，封面布纹皮面精装，所有铜图，亦审慎周祥，俾读者按图索骥，一目了然，共有五百余方之多，排版工作，视平常书籍有异，欲求变更增删之便，特雇用手民在家办理，并由余亲自督促，惟每因日间公务牵系，而须工作至夜分。全书约五百余页，每页所费铅字等材料殊多，故全重共达五十余担之巨，均属自行购置，耗资极大。而物价增涨之激骤，实令人不知措手，举凡手民工资、材料代价，无不直线腾踊，为始料所不及。如铜版纸一项，去夏间每令价仅二十余万元，最近购进竟达壹佰万元，激增四倍有余。个人财力有限。"

"是书最感困难之工作，厥为票价之订定，历来目录，容多难免主观，而际此物价激荡之时，恐其值甫经订定、不待付梓即已明日黄花。经集邮先进多人，共相商讨逐一评定，以众意为归趋。惟此法既属初创。"(《新光》14卷1期)

《国邮图鉴》的编撰，也是集思广益，汇聚当代集邮界一系列研究成果的结晶。但该书刚一问世，却在国内邮坛引起过一些非议，尤其邮商界反响强烈。他们对该书中西文合璧，高档印装，书价昂贵(国币25万元)，超出国内一般集邮者购买力和书中所订邮票美元价格偏低，影响邮商对国内外的销售和声誉等，批评最多。《北平邮刊》23期甚至刊出《马任全的〈图鉴〉，大吃蹩脚》文章，副题是"人人看完一遍，

全都感觉头痛，此书害人不浅，请束之于高阁。”重庆《邮侣》14 期也发表署名文章《谈谈马氏国邮图鉴引起的纠纷》。围绕这部著作的评价，几乎成为国内集邮界一时的热门话题，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利者见利，功过是非，褒贬不一。

尽管存在某些不足，《国邮图鉴》仍不失为中国集邮界 40 年代最重要的研究著作，它的学术价值经得起历史的考验。1988 年，经马任全重新修订后的《中国邮票图鉴》(1878—1949)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再版发行。同年，该书英文版在美国出版。

当马任全等集邮家们在中国早期邮票王国里追根穷源，大显身手的时候，有一位邮坛后起之秀却把自己的研究目光集中到了近代邮票。

图 26　钟笑炉

集邮家钟笑炉(广东花县人，1903—1976 年)(图 26)，原名钟流，继承父业在上海经营广东袜厂。1939 年 8 月，他的外甥女拿来几十枚外国邮票想请他协助分辨国名。一向办事极认真的钟笑炉为此专门去购买各国字典仔细地查阅，从此也爱上了集邮。他集邮起步虽然较晚，但在接受了各种邮刊和集邮家的指点后，经过刻苦钻研，只几年功夫就逐渐成为国内闻名的集邮研究家。为了摆脱工厂事务缠身，致力于集邮研究，他毅然放弃袜厂，联络集邮家成立了“近代邮学研究社”，转为邮商。

钟笑炉对待集邮活动和邮友满腔热忱。1941 年当《新光邮票杂志副刊》出版发行遇到种种困难时，他自告奋勇，主动承担发行任务。当时因战事关系，邮路被阻，许多地方邮局不办理印刷品邮寄。为了使各地邮友都收到新光杂志，他不怕麻烦，提出并办理将杂志拆开分成几个信函寄递，受到集邮者们的欢迎。

抗战胜利后，各地邮友纷纷来函询问各种集邮事项。有感于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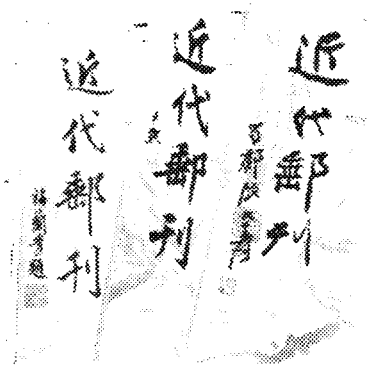


图 27　分别由张大千、沈尹默、梅兰芳题写刊名的《近代邮刊》

及时交流，钟笑炉与钟韵玉、黄维等集资于 1946 年 1 月创刊《近代邮刊》(图 27、)，由他任主编。为集中精力于此，钟笑炉又将邮票店委托邮友代理经营。该刊至 1951 年底出版 72 期，不论什么困难，从未脱期，发行量达到 2000 份，是当时中国邮刊中发行量最高的。钟笑炉撰写的发刊词中写道：

“集邮虽小道，以其能陶养性情，增广知识，不失为高尚之癖好。且可以遣兴，可作储蓄，非声色犬马能比拟。而鉴辨精微，评值准确，犹为金石书画所不及。”

画家张大千、溥儒、沈尹默、吴湖帆和戏剧家梅兰芳、荀慧生等曾为该刊封面题字题画。

当年写邮刊文章，不但无稿酬可得，主办邮刊还要费时费力贴补资金，实在不易。在《近代邮刊》上登载的一篇《钟笑炉谨启》有这样的话：“自即日起所有关于买卖交换邮票等事暂时停止，但关于新光邮票会会员科及代订《国粹邮刊》、《邮话》等事务，暂仍照常办理。”为了办好邮刊和履行邮会理事之责，他宁可停办自己的邮票生意。

40 年代初，中国集邮界兴趣偏重于华邮早期票。钟笑炉深谋远虑，意识到并积极倡导收集近代票，成就卓著，被誉为研究中国近代

邮票的权威。集邮家陈志川曾在文章中介绍：

“钟笑炉对近代票已入辨物入微之境地，为近代票中唯一之邮学专家。他研究版式常于二百枚一全张之票，从数十百全张票中追寻微细之版式特点，考究暗记，废寝忘食，日以继夜，不达成功之境，决不稍辍。……每日午后用放大镜细览他的近代票，获得了许多版式、暗记、纸质、齿孔的种种发现。”(《新光》15卷2期)

正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钟笑炉还较早重视收集研究解放区邮票和有关资料。《近代邮刊》从创刊号起，在“新邮消息”栏内报道了大量解放区邮票，且图文并茂，影响很大。

钟笑炉还以关心辅导后起之秀而蜚声中外。上海中年集邮家邵林(1939年生)在伯父老集邮家邵洵美指导下，少年时代开始集邮，受到了钟笑炉的器重和培养。当年为了安全，钟笑炉的50多本大邮集都存放在上海外滩的银行里。为了帮助邵林开阔视野，每个星期六，钟笑炉从银行保险柜里取回一本，利用第二天星期日让邵林详细观看，并向他讲解各种邮票知识。就这样持续看了一年，邵林如同学了一门中国近代邮票研究课程。锱铢积累，博见高登，为他以后从事集邮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功底。

40年代，钟笑炉曾热情帮助集邮家黎震寰编《近代中国邮票图鉴》和《中国人民邮票图鉴》。此后，黎震寰对他十分钦佩，赋诗相赠：

“夫子何为者，栖栖一镜前。研邮尊近代，校稿忆当年。暗记探奇迹，分型亦最先。敫敫上尊号，教主是通天。”(镜：指放大镜)

近代邮票研究的“通天教主”，此尊号何其大雅。

1948年，钟笑炉在《近代邮刊》第3卷8期上发表诗作《集邮十年有感》，表达宿愿：

“寝废餐忘只为邮，亲疏业芜未能休。
牛角钻穷双镜下，邮缘结遍一笔头。
虚名误我成老马，蚁力从公作垦牛。
十载劳形今未觉，集重人轻顾影羞。”

1948年是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发行70周年纪念。邮政主管部门为此决定于3月20日在南京举办一次邮票展览，并宣布将每年的这一天作为邮政纪念日。这是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3月20日，光绪皇帝颁布诏书，下令邮政脱离海关独立，从此中国正式开办国家邮政。

著名学者胡适是位火花收藏家，应邀为邮展题词：“古人说‘家书抵万金’，邮政局做的事，是替千千万万人传达他们的心灵——传达母子之间的慈爱，男女之间的恋爱，朋友之间的敬爱。”南京的邮展在社会服务处展出，展品共64框，只是将中国邮票按年代顺序放置在镜框内，再标注简短说明。新光邮票会协助主办，并建议再增添一些个人藏品，移往上海继续展出。同年5月19日，邮展在上海南京东路大新公司二楼展出。展期7天有5万人参观。参观券每张2万元(相当于当时4封平信邮资费)；另有一种荣誉参观券，每张100万元。主办者将门票收入全部捐给上海的慈善机关。

在上海的展览内容比较丰富，邮政主管部门的展品全部是国邮新票，有110框，比在南京展出时增加了一倍。由新光邮票会向会员征集来的展品共160余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闻名遐迩的“红印花小字当壹元”等珍罕邮品，“将30多年来大龙邮票、万寿对倒票、红印花邮票等研究成果充分展现。”使参展集邮家们感到遗憾的是，明信片、商埠邮票、变体票等因邮政主管部门有意限制，“难以尽情发挥”。

这次邮展展品数量之多，水平之高，影响之大，均属空前。张包子俊当时总结邮展所获效果：第一，邮政当局得与集邮家打成一片；第二，观众重视搜集国邮；第三，新旧邮票比较结果，觉得旧票收集为不易；第四，观众集邮之心理转向正体票及研究。

这次邮展还创造了两项中国集邮事业的历史纪录：

一、首次由国家邮政当局确定邮政纪念日，主办邮展，并提供展品。

二、首次专门为举办邮展发行纪念邮票。这次发行的一套2枚邮票，图案为“光复纪念”邮票和“邮政开办五十周年”邮票，并分为有齿、无齿两种。这套邮票是中国首次发行的“票中票”和无齿邮票。(图28)

图28　中国首次发行的票中票和无齿票

民国政府由陪都重庆还都南京后，大量客居重庆的集邮者也随之东返。南京集邮人士一时剧增。经过一年筹备，1947年8月，先在南京各报登出征求集邮会员启事。不久登记者有200多人。9月7日举行“首都集邮学会”成立大会，选举张枕鹤为理事长。阐明学会宗旨为：“联络同好，宣扬国粹，研讨邮学，提倡集邮。”10月出版会刊《首都邮刊》。

1947年4月26日，南京邮政局成立集邮组，办公地点先在新街口邮局，9月1日迁往鼓楼邮局。新址房间宽畅，室内摆放有沙发和书架，放置的各种集邮书刊供人随便浏览。橱柜内还陈列了不少集邮用品和外国邮票，作为广告宣传。所发售的邮品基本都是抗战胜利后发行的邮票，没有各种改值、加盖票。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一位姓陈的老邮局职员，对集邮比较有经验。他还曾与不少集邮者联系，希望各

地邮会的会刊和各种集邮书刊都能按期寄赠该组一份，既作为宣传品，又可为集邮者提供阅览。由于有了这样一位认真负责的有心人，当年南京集邮组颇受广大集邮者好评。

南京的各种邮票商社有十几家，其中绝大多数是40年代后期开业的。总数在全国城市中仅次于上海、天津、重庆、北平。

1947年10月9日，中华全国美术会在南京举办美术展览，其中也包括邮票展出。邮政主管部门应邀展出了21框中国各时期邮票，这是邮政当局首次提供邮品参加民间展览。

第二节　寒风笼罩的一阵热潮

抗战胜利后，集邮活动在全国各地有了较快的发展，各种集邮组织和集邮刊物大量涌现，集邮展览等活动比以前明显增多。

自1946年初开始，中华邮政总局开办了出售集邮邮票业务。首先在江苏、上海和北平三个邮政管理局的会计处票款科设置集邮组(台)，1947年又推广到浙江、贵州、河北、河南、甘肃、新疆、广东、陕西等省。在集邮台出售的中华邮政现行邮票大致齐全。有的邮局集邮台还备有出售的邮票目录，供集邮者索取。后来进一步改进，在北平等地集邮台还举办存款预购邮票业务。每发行新票，用挂号免费寄送，令集邮者大感方便。这些集邮组(台)大部分一直保持到1949年左右。

为了扩大集邮宣传服务，邮政当局还发出通知，决定及时发布集邮新闻，供各界利用，并向已登记的各地集邮团体和集邮刊物随时寄送有关新邮预报、邮品预订等类资料。同时要求各邮刊须逐期寄给该课及总局所办《现代邮政》月刊社各1份，作为参考。

邮政当局采取的这些有利集邮活动发展的措施，并非尽善尽美，但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说明了随着全国集邮人数的逐渐增多，集邮的社会影响已不容忽视。

抗战胜利后，各地集邮人士逐渐回到北平。由于与国内外联系恢

复，邮票来源畅通，北平的邮市很快复苏。1945年9月1日，北平邮商韦景贤创办了《北平邮刊》。至1948年春筹组北平邮票会期间停刊，共出版三卷，这是抗战后华北第一份铅印邮刊。该刊早先请天津张宝良任编辑。其特点一是报纸形式有变化，创刊号为16开两版，第二期起改为8开四版。二是以普及邮识、研究近代邮票为主，比较大众化。发刊词中称："此刊志在提倡邮风，而尤注意于如何协助新进集邮家，引起集邮之兴趣，故不欲高谈阔论。"《北平邮刊》发表的重要文章有：张宝良的《现代中国邮票略述》、岳增的《漫谈近代国邮》、施秉章的《世界邮票丛谈》，还连载了崔显堂的几篇纸币研究文章。该刊还大量刊登各解放区发行邮票的消息，这在当时国内邮刊中不多见。

韦景贤还编印过一本《中国邮友通讯录》，介绍400多位集邮者的收集范围，还附有大部分人的照片。这在全国是首创，非常难得。当时，北平集邮界以中低级公务人员、教师、学生为主体，还有一批邮识丰富的邮商。邮市上不仅中外邮品较充足，而且大量解放区邮票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北平。形成一股集区票的热潮。

1948年2月，由集邮家刘麟、白子宪、刘铭彝、郑汝纯、韦景贤等人发起，筹备成立北平邮票会。在递交申请准予备案的呈文中，他们写道：

"窃查集邮一事源自欧美，为近代高尚娱乐，举凡高雅之士率皆嗜之。我国近数十年来，邮政当局提倡集邮不遗余力，是以国人集邮风尚一时随之蓬勃进展，且国内各大都市，如南京、上海、重庆、青岛、天津等地，莫不有邮会之组织研究集邮事宜，以其不但研究中外学术，兼而提倡储蓄，实为有益身心之高尚娱乐也。"

"北平为文化故都，战前邮人荟集，曾拟创立邮票会，惜以抗战军兴，限于环境，未能赓续进行。胜利以还，各地集邮人士多复员回平，复呈昔日之盛。兹拟筹组'北平邮票会'，以资研究邮票学识，提倡高尚娱乐。"当时会址设在北平西单北大街。

1948年6月6日，"北平邮票会"成立。会章中提出："本会以研究邮票学识，提倡集邮及联络友谊为宗旨。""本会会员有质疑、鉴别、

代办、交换、拍卖、流通邮票及订阅会刊等权利。”该会理事会下设总务、出版、服务、研究四个组。集邮家郑汝纯任理事长。北平邮票会创刊出版了《北平邮刊》，由于刊载的新邮消息迅速、介绍的广告和邮人地址也较多，受到欢迎，每期发行量上千份。后来编印《北平邮刊》合订本，封面是请著名画家徐悲鸿题的字。

《北平邮刊》曾发起过端正邮风的讨论。集邮家张包子俊为此致函郑汝纯理事长，提出当时集邮风气的主要问题，一是忽略旧票，二是不专集正票而好旁骛，三是利甚于义。他还建议成立“中国集邮联谊会”，作为纯集邮家组织，提倡集邮新风尚。该刊全文发表了这封来信。

北平邮票会除举办邮展、邮品拍卖外，最有特色的活动是通过北平广播电台举办“集邮之趣味“系列讲座节目。由邮票会的理事、监事分别播讲了《集邮与储蓄》、《集邮与科学》、《集邮之意义》、《邮票的诞生和集邮用具》、《近代航空邮票版别之研究》、《世界动物邮票介绍》、《集邮与邮德》等 20 个专题。从 1948 年 6 月至 11 月，共播讲 20 次，北平、天津、唐山等地都能收听到。这项集邮普及活动，形式新颖，内容丰富，雅俗共赏，开中国集邮广播宣传之先河。1949 年北平解放，北平邮票会 5 月解散，历时一年，有会员 400 人。

集邮家王藜青(1905—1984 年)，早年致力于中国早期邮票的系统研究，不惜重金，搜集了丰富的邮品和许多珍贵资料。1947 年，他在天津《国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邮票发行史略》，以后仍不断有学著行世。王藜青还是一位火花收藏家，从 50 年代开始，他又潜心于收集研究火花，藏品达 10 多万枚。当年中国集邮者中兼收藏火花或钱币者为数不少。

东北地区 40 年代集邮发展比较缓慢。1941 年 12 月，长春艺光邮票社出版高升著《满洲邮票大全》。1944 年 6 月，大连日华邮票研究会出版《邮海》双月刊，西川编辑，同年 11 月停刊。到 40 年代中期，东北的沈阳、哈尔滨、长春、锦州等地，各种邮票商社已有 20 余家，但集邮团体和书刊发行始终寥寥无几。

1946 年 1 月，东北邮票会会刊《集邮先声》创刊，从第 2 期起改名《东北邮刊》。主编丁少田曾在长春开设邮友服务社，主办过《邮友》。由于战事关系，东北有组织的集邮活动较少。

抗战期间发展起来的四川地区集邮活动一直持续不断。仅重庆市 40 年代发行的集邮书刊有 20 多种。刊物大多数是 1945 年后创办的，数量之多，居全国之冠。其中由景侶邮票社出版的《邮侶》，发行持续时间较长，1946—1950 年，共发行 40 期。编辑是刘瑞章、蔡保德。

1946 年 2 月 3 日，四川陪都邮票会在重庆七星岗江苏同乡会还举办了一次“陪都邮展”。展品分五个部分：(甲)国邮之部，(乙)陷区之部，(丙)边区之部，(丁)西邮之部、(戊)附属之部。展出邮票 1000 多套，邮学书刊 26 种 400 余份，还有集邮用品及文艺作品等。邮展不收门票，观众很多。我们仅从这次邮展包括内容之丰富，就可看出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集邮者收集兴趣是很广泛的。解放区邮票不但被集邮者收集，还在陪都公开展出，表达了集邮者们希望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

1947 年 11 月 12 日，在重庆中央公园市立民众教育馆举办了“重庆第二届邮展”。这次邮展由该馆馆长屈义林发起，展品由重庆的同歆、劳生、景吕三家邮社和傅锐钦提供，陈列有中外邮票、纪念戳和实寄封等 30 多个镜框，还有各类集邮刊物 50 余种。虽然规模不太大，但展出的 7 天中，参观者仍络绎不绝。

1947 年 1 月 5 日，四川资中县成立了“资中侠勇邮票会”，后更名研究会。该会每月召开月会 1 次，邮票拍卖会 2 次，一些外地邮友也来入会。该会创刊《蜀资邮刊》，共出版 3 期。集邮家钟笑炉应邀为邮会题词：“能助人者为侠，能自强者为勇，集邮需侠勇，可侠勇集邮。”言简意骇，耐人寻味。1946 年 5 月 12 日，四川绵竹集邮研究会成立，同时在民众教育馆举办了首次邮展。

1947 年 6 月 15 日，“广州市邮票研究会”成立。林萍湘、王君诚先后担任理事长，集邮家张文光、莫星白、容源辉等都是该会的骨干。邮会还广泛吸收海内外集邮人士参加，会员达到 590 多人。当时全国

集邮界中的知名人士几乎都是该会会员，并有泰国、马来亚、新加坡、日本、香港、澳门的会员。研究会会址，初设在广州市六榕路非园，后迁至汉民北路。先后举办了多次邮品交流会和拍卖活动，还热心慈善事业。1947年夏，广东暴雨成灾，该会先后举办3次邮品拍卖，将所得260多万元国币捐赠灾民，颇受赞扬。

该会会刊《广州邮刊》，初为双月刊，自第9期改为月刊，共出版24期。由黎熯生任编辑，内容除邮学文章外，还有会务活动信息、新邮报道、邮人介绍等栏。该刊研究水平较高，并始终有别于一些北方省市邮刊偏重古典票的倾向，着重报道和研究近期华邮。1947年后，民国金融混乱，币值暴跌，邮票频频加盖。该刊着重报道了这期间广东地区加盖邮票、无面值单位邮票及戳记情况，保留了许多邮史资料。

广东地区集邮家中许多是归侨、商人和高级职员，这是一大特点。集邮家林敬夫的父亲是位旅美老华侨，热爱集邮，不惜耗去大量家产。林敬夫从1914年开始集邮，继承了父亲的邮集后又不断增加。由于他收集对品相要求极严，邮集规模和水平都非常可观，总数达5万多枚，基本全是外国邮票，其中英、法等国的珍贵古邮很多。《广州邮刊》主编黎熯生曾任越南海防《侨声报》主编。集邮家林萍湘是和平药行林治平药局老板。张文光是盐业商人。老邮商林浩，早年经营浩记邮票公司，兼收旧书，其子林敏中一门专袭，开设了广州和平邮票社。黄文绿曾任粤省沦陷区留守员，故对广东各种加盖票研究得非常详细，曾在《广州邮刊》第2期广东加盖专号上撰文介绍。张瑞森亦为粤省自由区曲江粤邮管局高级职员，收藏颇丰富。

1945—1948年，各地新建立的集邮团体逐渐增多，其中较有影响的还有：

1945年10月15日，无锡集邮研究会成立，推选敖恩涛为会长。10月10日，为庆祝抗战胜利，举办了无锡首次邮展。由于观众拥挤，原定展期5天，后来延至一周才结束。1946年创办会刊《邮友》，集邮家孙君毅曾任主编。

1945年11月15日，济南邮友联谊会成立，1946年1月改为新生邮票会，主要负责人是王耕春、周绍庵、严诚等，会刊《新生邮刊》同时创刊。1946年4月20日，该会在济南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举办了一次邮展。

1947年5月，青岛集邮同志联谊会成立，会刊《青岛邮刊》。后来分别更名为青岛邮学会和《青岛邮学月刊》。

1946年9月，汉口武汉邮学研究会出版季刊《武汉邮坛》，主编陈维瑞。

1947年1月15日，福州绿榕邮学研究社出版《绿榕邮刊》，主编朱金誉。

1946年9月29日，萧伯瑜、李玉良、唐靖华、周仁樟等一批铁路职员发起组织了"湘桂黔铁路同仁邮学研究会"，会址设在广西柳州鹅山新村的湘桂黔铁路工程局内。该会1947年3月出版了会刊《西南邮风》。这个以铁路系统员工为主的邮学会，是中国第一个行业集邮组织。该会还与甲戌邮票会合作，从1948年4月30日起编辑出版邮刊联合版。第一期即为《甲戌邮刊》第15卷第1—3期和《西南邮风》第2卷第2期。这种集中两会人力，携手联合办刊的作法，在中国邮坛亦属罕见。

湖南地区的集邮活动发展的也很迅速。1947年1月，长沙尚美邮社出版月刊《尚美邮刊》，主编吴伟俊。同年5月17日，在受降名城芷江，为纪念美国邮票发行百年，画家曾淡人发起在"淡人美术馆"举办邮展，和邮友藏品一起展出中外邮品，当地军民、学生纷纷前来参观。

1948年元旦，在长沙青年馆友谊厅举办了长沙首届中外邮票展览，展出约2万多枚邮票，由当地集邮界曾国华、曾宪、汤麟圃、吴伟俊等提供，展期3天，观众达1万多人。

1949年4月3日，长沙市路、电、邮、航四系统，在民众服务处举办的"长沙市交通机关春节联合业务展览大会"上，同时展出各种邮票50多框。

抗战胜利后，虽然甲戌邮票会自西安迁往开封，但陕西地区的集邮活动仍有较大发展。主要的集邮家有常志廉、王建申、任德孚、叶增英、李容、吴廷琦等。

1947年春，西安市出现了一批私营邮票社，如世界邮票社、邮票流通社、南院门邮票社、泉石邮票社和文化集邮社等。另外在西安和宝鸡的一些寄卖商店里也出售邮票。但好景不长，当时物价飞涨，集邮者不多，邮商生意萧条。到1948年春，邮社纷纷停业。仅剩下南院门邮票社一家，由新光邮票会会员杨玺山经营，出售古董兼售邮票，而且只卖外国邮票，光顾者稀少。

为了宣传和推动集邮活动，1947年9月，陕西邮政局专门设立集邮组，开设了门市部出售当时发行的各种新邮票，同时还专门在西安广播电台开办集邮节目，利用广播宣讲集邮知识。但是，由于邮政局集邮组业务人员素质太差，引起集邮者强烈不满，怨声载道。1948年4月，上海《近代邮刊》曾为此登载了一篇尖锐的批评文章，颇有趣：

“集邮组虽成立有数月，但因该组的售票先生态度傲慢，头脑糊涂，更缺乏集邮知识，购票一次，往往须等上两三个钟头。而他的帐目尚未算清，叫购票的人站得比在学校受体罚还要难受。而欲购之四方连，他常将它撕成三连和另一单枚。甚至有的时候将票品都撕破了，弄得集邮人哭笑不得。陕西邮政管理局近来为提倡集邮起见，曾请局方的某职员在陕西广播电台作关于集邮知识的讲演。局方的宣传虽然努力，但得来的效果我想并不一定宏大。一个集邮的人，只要到集邮组去一趟，见售票先生那一种傲慢的态度，迟缓的动作，决不想再去第二次。如果要使西安的邮人增多，集邮的风气开展，无疑地只有希望局方将现今集邮组的售票先生调到另一部门去。另请精明干练、态度和霭的职员来主持集邮组。唯有这样，才是西安邮人的福音。”

在当时，由于西北地区经济文化落后，连邮局集邮组的业务人员都缺乏起码的集邮常识。这对集邮活动的开展影响确实不小。

1948年11月1日，集邮爱好者奚定一借西安出版的《经济快

报》创办了《邮风》周刊。该刊对联络当地集邮人士，扩展集邮风气，发挥了一定作用。其中连载的鲁深所撰《给初集邮的朋友》一文，当时还在西安的广播电台集邮节目中播出。《邮风》出至第8期停刊。

各种集邮刊物不仅研讨邮识，还不时撰文呼吁维护集邮者利益。《甲戌邮刊》第四卷第十期曾刊登一篇啸父写的文章《争一戳的体面》，由集邮戳而引起对邮局盖戳方法的非议，文笔辛辣幽默，读来十分生动有趣：

“我每次接到外国寄来的信片明片，他们邮戳设计的精致和盖销的慎重，实值得我们效法。无论经过几处邮局的销盖，大半都是一票一戳，浅淡明晰；仿佛知道人家爱玩这个，特别小心似的。回头看看我们本国的怎样——往往多数的去说，他们用的戳子，大约从启用之日起，一直就很少去揩擦，灌的墨汁，总是浓溢淋漓。拿起来盖销的时候，好象怒气冲天的，拼命使劲一戳。可怜小小的邮花怎能经得起如许暴力的摧残；再经手指衫袖带拖，信挨信的互相揩磨，连票带封就成了糊涂一塌，叫你接到之后，啼笑皆非，只有堵得难受而已。”

据不完全统计，从1916—1949年，全国各地先后创办出版的各种类型集邮刊物有近200种。其中上海地区最多，约占1/5，其次是四川地区。这些邮刊20年代前后创刊的有20多种，30年代创刊的有30多种。绝大多数是40年代创刊的，其中1946年以后创刊的约占半数。反映出中国集邮界重视集邮研究和宣传，集邮者人数和水平不断增长的发展历史。

在那个时局动荡、民不聊生的年代，集邮同样艰难。福州王谢燕主编的《邮椷杌》1948年登载了一篇题为《在洪祸仅见下米价乘机突破二千万元声中话集邮》的文章，读来令人震惊。文中谈到：

“洪水为灾，田园湮没，庐舍为墟，财物漂没，人畜死伤，灾情惨重，为百年所仅见。米价且从而飞涨，竟破二千万大关。昨接徐某某先生寄来目录，红印花倒盖一枚十二万元，山西小字大东无水印20元一枚一千五百元。邮价几与米价落霞与孤鹜齐飞。吾侪既非豪门，复非富贾，在此穷措大仅一公务员身份，惟有嗟叹。”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

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人民群众生活困苦，朝不保夕。就是经济条件尚可的集邮者，在米价邮价暴涨的巨大压力下，也深感无力再坚持集邮。

1948年，法币贬值的巨大阴影笼罩着各地集邮市场，邮商们日益为捉摸不定的邮票跌价而惶恐不安。例如，发行“中华民国邮政总局成立五十年纪念邮票”时，邮局办理预订，要用相当于5石米的价格才可以订购1000套。时隔不久，邮局开始大量对外出售时，却只需1石米的价格就能买到1000套，使不少邮商为此遭受极大损失。

到1949年4月，集邮界更称物价为“一日千里”。例如，重庆地区金元券暴跌，与银元的比价，4月13日为1∶3.3万，14日为1∶5万，15日涨到1∶8.5万，16日竟达1∶12万。这样一来，邮商不敢进货，集邮者无力购买邮票。各种集邮刊物都难以维持，许多邮刊被迫停刊；勉强支撑的，也不得不一次次提价，有的甚至停止预订，采取一期一订价，使发行量锐减。再加上邮费不断涨价，邮品、邮刊寄费都大幅度增加，更使邮商、邮刊主人愁肠百结，度日如年。

邮品大量丢失，是当时集邮者们深感焦虑的另一个大问题。举办邮展时的被窃事件时有发生。例如，1945年，客居桂林的王劳生将自己的苏联邮集送去参加当地举办的中苏文化协会展览，邮品全部被盗。1947年，广州市举办的世界青年生活照片展览中，也陈列了各国邮票，其中十几枚比较珍贵的新西兰邮票竟不翼而飞。举办各类邮展时邮品的安全无保障，常使举办者和提供者有望而却步之感，这也是各地邮会举办邮展不多的原因之一。

集邮者之间的来往函件更是经常丢失。在许多地方，几乎不论挂号平信都被私拆，其中附的邮票全部窃空，这种现象在西北、西南地区尤其严重。有时甚至连挂号信整个失踪，使集邮者投诉无门。1949年《邮侣》第30期曾发表文章批评这种失德失责行为：

“我们的信件怕遗失，特地多化一百五十元的挂号费，请求邮局代为登记。却逢函件真的遗失时候，请邮局去查询一下原因，为什么

就要大敲竹杠，再要补化一笔四百元的查询费，实在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邮资暴涨，对遗失挂号信的处理变成查询费要 2 万元，而赔偿只有 1.25 万元，真是形同虚设，得不偿失。因此，当时内地一些集邮者发出这样的感叹：生活如同逐鹿（物价飞涨）、买不到成套新发行邮票、信函邮品失窃和一道国内封锁线（国统区、解放区通邮难），是紧紧缚在邮人身上的四根铁链。

第三节　旧中国集邮纵谈

光阴似箭，往事如烟。集邮来到中国不觉已半个多世纪。综观旧中国的集邮活动，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清末民初，在中国邮坛扮演主角的基本都是外国集邮者。中国集邮者步其后尘，沿袭了很多习惯作法。集邮活动起步于一个范围较小的阶层，不是以普及型、大众化为目的，而属于有经济实力中上层人士投资型的文化享受，因此起点不低。早期集邮者们就注意研究邮品的刷色、变体，随后又专门研究邮戳、封片、邮史。由于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集邮者通晓外文，他们既注意大量吸收国外的集邮经验和研究成果，又不断向世界各国宣传中国邮票和集邮活动，并屡次到国际邮展上参赛夺奖。从集邮的专门化来说，旧中国的集邮家很快就适应了国际上的集邮发展潮流。邮识水平与国外相差无几。

从某种意义上说，外国集邮者和西方集邮文化是中国集邮事业早期发展过程中的良师，不但造就出一批精通邮学的中国集邮家，而且为中国保存下来大量珍贵的早期华邮。但是中国集邮者们并没有在西方集邮文化面前止步，人云亦云。他们结合本国特点，在集邮一系列领域都有所创造、有所发现，很快成为中国集邮事业的主力军。对一个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国家来说，这是历史性的成绩。

二、20 年代初期，受国外影响，中国集邮者大多数收集外国邮票，或对中外邮票兼收并蓄。20 年代后期开始，人们逐渐感到外国邮票国别种类繁杂，不如由博返约，专集华邮，于是纷纷提倡发扬国粹，

着力收集研究早期国邮成为集邮活动的主流。对这段时期内中国集邮界的主攻方向和特点，集邮家陈志川曾论述：

“清万寿票与大龙票、红印花加盖票，鼎足而为搜集中国早期票之三大目标。”“万寿票之错综复杂，奇珍异宝包罗之富，为早期华邮中各类票之冠。大若大小龙之质朴古茂、红印花之庄严典雅，万寿之奇彩纷呈，以每套而言，即已多至九枚之多。而此九枚邮票，非但色彩不同图案异殊，抑且至加盖时期后有大小字长短距之分，姑不论版别，已有数十种之形式。”（《新光》15卷2期）

虽然早期国邮的资料比较缺乏，但是集邮者们仍不惜化费大量精力和时间，辨别入微，不顾重重困难，刻苦钻研，使中国早期邮票的绝大部分历史背景和版式变异特征等基本搞清，编写出一批高水平的国邮目录和研究专著。

30年代后期，集邮者开始重视民国邮票和解放区邮票的研究，及时收集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获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并及时开展对近代邮品的收集研究。这是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性贡献。

几十年努力，取精容宏，使中国集邮界对华邮的收藏和研究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涌现出一代才华横溢的集邮群体，树立了热爱祖国、维护华邮的优良传统。

三、爱好集邮的动机比较复杂。除一部分人以邮票作为投机发财的手段之外，视集邮为一种娱乐性的储蓄是集邮者们比较普遍的目的。陈志川在《国邮见闻录》中谈到：

“余以为集邮原系娱乐之一，世间娱乐之法固多，然娱乐者均耗费金钱以为付偿娱乐之代价，从未闻娱乐之后尚可将已付出之代价收回者。惟集邮则不然，既可随时娱乐，而复含无穷之学识，足以探讨，更可在不需要时转让他人。”（《国粹邮刊》1942年3期）

这在弥漫金钱享乐至上的社会里已属难得。集邮界还十分提倡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端正集邮的目的，追求质朴高雅的集邮情趣。虽然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多少带有理想化的色彩，但这种洁身自好

的精神更为可贵，它使中国大多数集邮者的心灵得到净化。集邮家邵洵美在《新光》第15卷第2期发表的《如何集邮》就是一篇代表作。文中写到：

“集邮的嗜好，直接可以使你空闲时不感到寂寞，要知道世界不知有多少罪恶是寂寞所造成的；可以使你训练艺术的趣味，因为邮票品相的讲求，本身便是爱美的教育。”

“收集邮票正像收集金石书画，不容你打破沙锅问到底。要我回答个‘究竟有什么用处?’我们也可以说为的是鉴赏艺术、研究文化、参考历史地理与风俗、储蓄或是投资，但是这些决不是集邮真正的目的。要知道，无论何种收藏，他本身便是目的。客观地讲，我们可以称它是人生的点缀。主观地讲，我们可以认它是心神的安慰。所以，简单地讲，收集邮票便是去享受收集邮票的快乐。”

这段论述非常精彩，道出了大多数集邮者的共同愿望。在旧中国的集邮者中，许多人收入有限，生活并不富裕，却不惜化去大量财力购买收藏集邮品和书刊，还要化去无数时间和精力进行整理、研究、撰文。如此辛劳破费，他们集邮究竟为了什么？

不同的人从事同一件事，会有不同的目的。从2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的以自娱为宗旨的邮会，以交流为目的的邮刊，以营利为追求的邮商，以及以投资储蓄为动机的集邮者，构成了五光十色的邮苑。但当年集邮界最主流的集邮目的始终是为了结识朋友，维持邮谊，满足人际间的社交需要。

四、邮坛联络交流比较活跃，集邮者思想和活动都很开放。不仅邮会、邮社、邮展、邮刊、邮品拍卖繁多，集邮者们与全国各地、世界各国的邮谊交往也十分密切广泛。像“新光”、“甲戌”等集邮会，开门办会，以邮会友，来者不拒，会员愈千，遍及全国。邮会内外研讨气氛浓厚，邮识交流不保守，不仅有利于提高集邮水平，而且对联系培养后起人才十分有利。这也是一些邮票会长盛不衰，对会员充满吸引力的原因之一。

当年广大集邮者心目中憧憬的集邮组织是什么？加入邮会的动

机何在？集邮家陈葆藩曾在《邮典》1卷1期上撰文，作了这样的描述：

“学记上面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研究学问，要有益友在一起，可以收切蹉琢磨的功效，使德业的进修，事半而功倍。所以凡是集邮的人，都应加入一两个邮会，时时和同志同道的相接触。看看他人的邮集，可以激发自己努力前进的志愿；听听会友的谈话，说到某人受骗、某社售欺，可以引为前车之鉴；说到某票价涨，某票价跌，可以作为投资与买卖的参考。人的精神有限、财力有限，而邮票的种类浩繁，若漫无穷尽的搜集，结果像杂货店旧货摊一样，一无可观，枉费宝贵的精神和财力，最不合算。入了会，就有机会向成功的集邮家讨教。他们是航海的灯塔，识途的老马，乐于指示迷津的长者。得到他们的指导，就不至暗中摸索，不至受到无谓的损失。还有贴票的方法、保藏的要诀、品相的优劣之类，也是着手集邮的人所不可不知的。”

“社会是人类互助的表现。人人努力地舍己为群，不图私己，只图利他，那么我利人人，人人利我，结果助人便是助己。我们集邮界，同样的应该热心互助，不可存了私见。”

当年中华等邮票会为便于会员增进邮识与交流，设想得非常周全。在提倡热心互助的邮德方面，更是有远见卓识，许多主张至今读来仍令人倍感亲切。

文化需要交流，交流才利发展。文化需要开放，开放始能传播。中国早期集邮者们继承了中国自古文人墨客、博物藏家皆好会聚切蹉、以增雅兴的传统，并吸收了西方集邮界的一些作法，使集邮文化一开始就重视联络交流。从而使集邮者走出家门，使集邮活动社会化，并注意不断吸收来自国外的各种新理论、新方法，注意扩大集邮宣传。这是对近代存在于封闭保守环境中的中国文化传统继承中的发展。

在阅读20—40年代邮刊上的一些好文章时，人们常能被文中许多幽默生动的话语深深打动。潇洒的文风使人对深邃的邮学理论不觉枯燥，读之思之，余味无穷。

五、出于各方面的原因，许多知名集邮家“下海”做过邮商。有些人长期身兼三业（本身有职业，又办邮会和邮刊，又做邮票买卖）。采取“以邮养邮”的办法，丰富自己的藏品，或赚取薄利，聊补维持邮会、邮刊的费用，从而造就了一批鉴别邮品真伪的鉴定行家。

对于集邮家以邮养邮应如何看待，陈葆藩在《寄寸楼随笔》中谈出了当时集邮界的共识：

“而今之号称集邮家者，间亦从事于贩贱鬻贵、操奇计赢。若是将何以异于邮商乎？谓之曰：以牟利为主，集藏为从者，邮商之事也。以赏玩为主，集让为从者，集邮家之事也。夫邮商亦未尝不集邮也，自其积贮信息坐列贩卖言之，为邮商。自其搜罗鉴赏考订著述言之，则又不失其为集邮家尔。”

“今之名集邮家，估其邮集，动辄钜万。叩其所费，往往不逮十分之一，胥由于此耳。故集邮家之牟利，志在补其购藏之不足、而非一意以权子母为事者也。”

这里划出邮商与集邮家的区别界限还是很有道理的。限于经济条件，为集邮而业邮，这样的集邮家谁能不理解其用心之良苦？话又说回来，对于旧中国大量存在的邮商，也不能轻视。他们在中国集邮事业中同样是一支重要的生力军。著名邮商陈复祥1940年1月在《邮典》封底刊登的一则启事中曾说：

“君欲集成一专门邮藏乎？则不能不藉各专门邮商之助力。国内外之专门华邮钜集无有不得敝处之助力者。凡不易得不轻见及价高贵罕之品，他人所一生未见者，敝处每能获得之。”

集邮家周今觉也曾经说过：“夫邮商固恃集邮家之购求，收获利润，而集邮家亦未始不赖邮商之货品丰足，有求必应，而扩大其搜集之范围。是二者固相需为用者也。”（《新光》6卷1期）

的确，绝大多数成功的集邮家，其周围都有几位为其长期寻觅提供邮品的邮商朋友，彼此以诚相待，情谊甚笃。因为许多邮商邮识之丰富非一般人可比。他们苦心奔波、鼎力扶植，常常在一些关键之处雪中送炭，成为集邮家攀登集邮高峰的得力助手和参谋。

不仅如此，邮商在旧中国集邮发展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很值得重视和研究。

从中国集邮早期活动开始，在国内各大中城市里，往往都是先出现邮票商社，后出现邮票会；先有邮商办的售品目录、小邮刊及发行的集邮图书，后有邮会办的集邮刊物。大量初集邮的青少年在寻找指导和帮助时，往往最先接触邮商，因为他们身分公开，目标显著。许多不集邮或中止集邮者欲出售手里的邮品时，最方便的途径是去找邮商联系。在没有集邮团体的城市，集邮者们要相互进行联络和交流，理想的场所往往是热情好客的邮商小肆。

无论是地处闹市的邮社，还是深居陋巷的邮商，他们每日从事的邮品经营活动，无形中都是在宣传集邮活动，联络集邮同好，交流集邮学识，传递集邮信息。所以，广大邮商既是向新集邮者普及邮识的宣传者，使集邮家提高邮集的协助者，又是挖掘邮品、发现珍邮的尖兵。经济界认为，要发展经济“无商不活”，对集邮界而言又何尝不如此。

无利不起早自是商人的秉性。但是，确有不少邮商热爱集邮，肯钻研邮学，对邮品邮史研究得颇有造诣，且自办邮刊，热衷交流，精于鉴定，长于撰文。这样的邮商，利人利己，是集邮界难得的人才。

从 30 年代起，集邮界一直有提倡“集邮大众化”的呼声。为了说明这种观点，不妨先摘录几段当年集邮家们发表的文章。

邵洵美在《如何集邮》一文中提出：“集邮绝对不是有钱人独有的享受。没有钱的人，一般来说也可以集邮，也可以成为集邮专家。原来集邮有各种门路，有各种方向，你不妨指定一个范围，或是一个时期，或是一个种类。”(《新光》15 卷 2 期)

郭润康在《集邮概论》一文中呼吁：“在现阶段的邮坛上，有集邮大众化之说，其出发点为简化邮票的收藏而已，意义不免狭窄。在今日应对集邮大众化重下定义。所谓集邮大众化，是要鼓励每一个大众都有集邮的机会，这才是真正的集邮大众化。”(《新光》15 卷 4 期)

这些美好的愿望出发点是善良的，真诚的。即使像周今觉在《邮

学诡议》一文中提到“集邮与政治无关，不但不分国界，亦且不分友敌”(《新光》6卷1期)，也反映出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渴望大众平等幸福的心愿。但是这些理想难以实现。

在旧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凋蔽，物价飞涨。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温饱尚难以维继，从事集邮的只能是极少数人。在当时，集邮者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职员阶层。他们大都因珍爱文化艺术、追求博物新知步入邮坛。其中一些学贯中西、邮识渊博的饱学之士，广证博引，境大格高，成为中国著名的集邮专家。如燕京大学校长陆志苇、湖南大学教授姜治方、贵阳医学院教授郭润康、剧作家夏衍等。

二、传统的收藏家。大都为工商、金融界人士，有经济实力作后盾。中国素有嗜古遗风，一些书画、钱币、古玩收藏家，博览今古，兴趣入时，也悟出邮票的历史价值，于是不惜重金搜求，以绝品自娱。其中有的成为邮藏宏富、著书立说的名家，如民族资本家周今觉、马任全等；有的成为精通邮史、长于鉴定的邮商，如在实践中自学成才的陈复祥、钟笑炉等。

三、纨袴子弟。既有钱又有闲，兴之所至，挥金如土。最典型的要算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河南项城人，1890—1930年)，字寒云。1927年，山东督军张宗昌交袁3万元赴沪办报。经邮商李辉堂介绍，以数千元购得“红印花小字当壹元”旧票、民国“四珍”等绝品，一跃成为中国邮坛巨子。袁克文对待邮票也像他的其他收藏爱好一样，“今日以千金购得之品，明日略有厌倦，则或以易值只数十金。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张赓伯评语)兴趣来去无常。

1924年，有才子之称的袁克文还在上海《晶报》撰文《说邮》，对早期华邮研究论述详尽，受到集邮界推崇。内称：“人之集邮也为人，予之集邮也为己，何以言之？盖人之集邮，或待善价而求沽，或将争雄于站坛，或矜奇炫异，或夸富斗豪。若予则不仅求自善者存之，赏心悦目，聊以自娱，不拘泥于其贵贱多寡也。”这段话是对旧中国这类集邮

者的生动写照。但仅两年有余，袁因办报财尽事空遭通缉，于是贱售票品，仓惶出逃。成为集邮界昙花一现的过客。

集邮家陈复祥1964年忆及当年的中华邮票会时曾说："当时会员都是资产阶级派头，集邮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此观点，话虽说得尖锐些，却也不无道理。因为当年能涉足华邮珍品领域的集邮家，大多是工商企业家、高级职员。但是，对待历史事务终究还要历史地看，全面地看。正是这些为数尚不多的集邮者们，为了中国集邮活动的发展和集邮水平的提高，勇做开拓者，甘为奠基石，辛勤地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作出了历史性的业绩。更重要的是，他们以热爱祖国，注重邮德的高风亮节树立起中国集邮者的良好形象。

"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古人曾用诗句赞美竹子的君子风度，这也正是中国集邮前辈们一代风范的写照。

第六章　解放区邮票的早期收集

第一节　解放区的收藏者

从1927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重点从城市转入农村，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形成武装割据的局面。部分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赤色邮政，发行赤色邮票。根据现有资料记载，1930年五六月间赣西南赤色邮政发行的邮票，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最早的邮票。

从1927年至1950年6月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内，在中国解放区70多个地区170多个邮政机构先后发行了400余套、2000余种邮票。这些分别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发行的邮票，习惯上称为中国解放区邮票，简称“区票”。它们是国家邮票的组成部分，在世界邮政史和邮票史上堪称奇迹。

由于长期遭受严密包围封锁，各解放区物质和印刷条件极为困难。这些邮票大多数设计简单、印制粗糙，许多还是靠油印、石印、木刻版印制而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例如，福建、江西群众称邮票为“邮花”，闽西交通总局发行的邮票图案上就标明“赤色邮花”。闽西地区闽南语对铜元单位称为“片”(即枚)，赤色邮花的面值就以“片”为单位。

更重要的是，当时发行解放区邮票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革命战争，因而邮票图案设计的战斗气息浓厚，政治性很强，起着鼓舞革命斗志的宣传作用。这种一反中国邮票设计传统的风格，使区票更加具有独特的魅力。解放区邮票成为国内外集邮界刻意搜求研究的新领域。

由于各历史时期斗争形势不同，各解放区环境条件不同，使得解放区邮票发行背景复杂、特点各异；由于其发行多系随军转移，使用地区窄、时间短、发行量较小，加之损毁严重，资料不全，更使区票的收集和研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当年战斗生活在解放区内的革命军民，还是千方百计收藏保存下来许多珍贵的邮品资料。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解放区邮票和实寄封能够保存下来极为不易。其中不少珍品经历坎坷，渗透着解放区军民对革命政权的深厚感情。

1934 年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队对苏区进行疯狂报复，一片白色恐怖。在福建永定天德乡，赤卫队员将乡苏维埃政府使用的文件、印章、旗帜和邮票秘密藏在宗祠的匾额后。1940 年冬，十几位乡亲在翻修宗祠时，发现了这些东西。为了不使它们落入白军之手，大家商议全部烧掉。这时，在场的青年张暖祥把其中一卷“闽西赤色邮花”取出，带回家小心收藏起来。由于白军在山上到处“追剿”共产党游击队，一旦发现苏区邮票，不仅全家遭祸，还会殃及全村。一天晚上，他父亲硬把这些邮票拿走，说是烧掉。

1990 年 1 月，张暖祥的孩子们在洗一张旧桌子时，意外发现抽屉内底板上藏着那 7 张残旧的面值为肆片的“闽西赤色邮花”，共 116 枚。张暖祥这才明白这些邮票原来当年是被其父秘藏起来了。

新四军老战士洪流 1940 年冬赴苏北盐城参加工作时，随身带着两本集邮册，以后在解放区内坚持了 10 年的集邮活动。他回忆当年的集邮经历时谈到：“起初，各种邮票我都收集。但到了解放区，看到了我们抗日民主根据地里自己印刷、发行的邮票、钞票，心情就不一样。久而久之，我和解放区邮票、钞票的感情越来越深，并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解放区很少有人集邮。在盐城，人们都知道我是唯一爱好集邮的。一些好心者，特别是交通站的同志，发现有好看的邮票常常主动送给我。同时，交通站分发给县委机关的信件大都经过我手，为我收集解放区邮票提供了方便，到 1946 年夏，我已收得新票 360 多枚，信销票 700 多枚，另有实寄封 20 多个。可惜后来奔波跋涉散失了不

少。

在战争环境里，接到信件阅后都随即烧掉。实寄封很难保存下来，信销票存世也为数不多。"(《集邮》1981 年 1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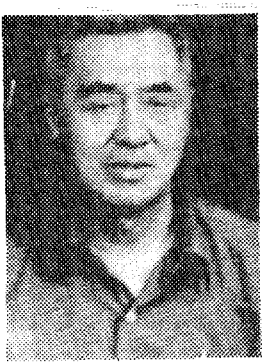


图 29　居洽群

集邮家居洽群(江苏宝应人，1912 年生)(图 29)，原名居秉苏，洽群是集邮用名。出身书香门弟，1928 年在杭州加入新光邮票会。1941 年参加新四军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财经和教育工作。当他接触到苏中解放区邮票后，就下决心专门收集各个解放区的邮票。他一直把精心收集来的邮票整理好，带在身边。同时，还注意研究这些邮票的真伪、制版、印刷、发行及使用等。经过他的努力，较早辨别出皖省的几种印有"十月决战"、"全民生产"等政治口号的邮票是伪造品。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邮票和邮政资料收集困难，保存亦难。

1946 年冬，居洽群跟随部队北撤到山东。行军中轻装时，他宁可丢掉衣物，也绝不丢弃背包中的几本邮册。一天，当部队行军到一个小镇，居洽群发现邮局门口贴着一张苏皖边区邮政总局发行新邮票的通令，上面还贴有邮票样张。他便请假离队，将通令揭下来保存起来，然后去追赶部队。由于他既重邮品，又重邮史资料，因而积累了丰富的解放区邮品研究知识，尤其在辨别伪品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居洽群的邮集包括了苏中解放区发行的全部邮票。其中 1 枚加盖第四版"内用平邮"2 字倒印票，世所仅见。他对苏中区邮票颇有研究，论文很多。为了收集解放区邮票，居洽群不惜平居恬淡，倾尽全力。1957 年，江苏泰州有人保存着苏中区有面值无齿"便"字邮票和"印"字邮票，共 24 枚。他得知后，去函求售，花去 200 元钱，分 6 次付款，欣慰购得。这笔钱相于他当时 2 个月的工资。

当有些求珍的邮迷三番五次要以重金购买他的区票珍罕品时，

均被一一谢绝。但在1958年和1981年，居洽群先后两次把自己几十年集邮成果中的精华——解放区邮票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其中包括区票388枚，另有样票及区票实寄封等大量珍罕邮品，为丰富国家邮票档案做出宝贵贡献。1982年3月，邮电部在杭州隆重举行授奖大会，表彰居洽群的爱国奉献精神。

淮南解放区1942年发行的一种“稿”字邮票，专供记者和通讯员向报社投寄稿件时使用。而1枚“稿”字四方连邮票为传世孤品，1980年披露时，轰动邮坛(图30)。它是被另一位新四军中的集邮家沈曾华珍藏下来的。当年送给他这枚四方连票的解放区《淮南日报》通讯员周世民，几十年来与他失去联系。1980年，周世民从喜欢集邮的女儿那里看到《集邮》杂志上刊登的这个四方连邮票和介绍沈曾华的文章后，才意外地与老战友重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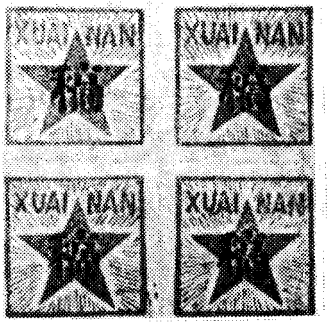


图30 “稿”字四方连邮票

沈曾华(江苏淮安人，1922年生)，集邮笔名沈丰秧。(图31)中学开始集邮。1942年参加新四军。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从未中断集邮。他长期珍藏的一部《解放区邮集》，是他从1942—1949年收集的各苏区、边区和解放区邮票之精华。在2200多枚区票中，珍品很多。他还收藏有几十枚新四军、八路军实寄封。当年，他常利用战友去其他解放区工作的机会，托人收集各解放区邮票，还请机关通讯员送完信把信封要回来保存。回顾战争岁月集邮的艰难，沈曾华深有感触：

图 31　沈曾华

“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收集这些东西固然不容易，能保存下来也很不容易。1947 年 5 月，国民党四个军向胶东半岛进攻。一天下午，我们突然接到轻装突围的命令。每人只准带一支枪、一个干粮袋、一个背包。我把其余东西都减了。就是邮票说什么也没有舍得扔。三个晚上跑了三百多里路，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集邮》1980 年 9 期）

1949 年以后，沈曾华曾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副厂长等职。繁务余暇，仍坚持集邮。“文革”中他的新中国邮票大都散失了，唯有解放区邮票被他的孩子们给保存了下来。再次化险为夷。

新四军老战士杨雪林（江苏人，1915 年生），1942 年在部队开始集邮。他同样经历过战斗需要轻装，宁可扔掉各种物品，也要保存邮票的难忘时刻。他珍藏的淮南区无面值邮票上加盖“暂作”有面值票、盐阜区“改新抗”邮票、苏中区“暂作平邮”等珍品，1986 年在《集邮》杂志披露，被称作区票又一重大发现。

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总局 1935 年发行的“中华苏维埃”竖四连邮票，世所仅存。它是由当年曾在延安八路军电台工作的吴元亮珍藏下来的。1937 年 3 月，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总局改为陕甘宁特区邮政管理局后，发行了“中华邮政”邮票，至 1938 年 3 月停止使用。吴元亮收集其中的第一版 2 分战士图信销票，是目前所见唯一的珍品。

1937 年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县参加革命工作的冯星明，当年也购买保存了一些“中华苏维埃邮政”邮票，珍藏了 40 多年。1984 年 10 月，他把其中的 1 分、2 分、8 分各 1 枚、1 分竖 16 连邮票捐献给了延安革命纪念馆。

集邮家周之同(山东沂南人,1914年生),1936年在师范学校读书时,从《大公报》的"集邮小说"专栏上第一次接触集邮,产生了兴趣。1936年从延安抗大毕业后任八路军教导员,战火之中不忘集邮。解放战争时期,每到一地,安排好部队工作,周之同总是去找邮局买些邮票。当时过着供给制生活,他不吸烟,不喝酒,每月领到的几元生活费,大部分都用来买了邮票。几十年坚持不懈,使他的解放区邮集极佳。

集邮活动家李清万(祖籍山东新城,1920—1989年),15岁起当邮差,1937年参加八路军。1944年任山东郯城县战邮局长时,开始对解放区邮票产生兴趣。当时没有邮识,李清万只是将收集到的各种邮票都贴在日记本上,转战几年,一直断断续续地贴着。直到解放后仍然珍藏在身边。

集邮家李振华(河北冀县人,1914年生)(图32),解放战争时任西北野战军师参谋长。1946年秋,组织完成横山起义后,率部进驻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接见。时逢陕甘宁边区发行第一版"宝塔山图"邮票不久,他特意买了几套留作纪念。以后南征北战一直带在身边,没想到这些邮票成了他集邮的开端。80年代,他的区票邮集曾多次在国内外邮展获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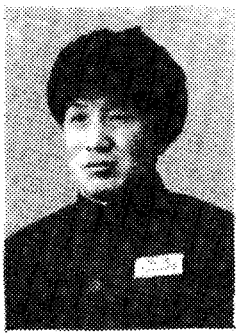


图32 李振华

李振华在回顾当年收集区票的困难时曾感慨万分:由于缺乏资料,他常盲目购进,甚至误购假票。因为缺少邮识,他基本没有收集区票各种加盖票和实寄封,非常可惜。

向往解放区,热爱解放区邮票的真挚情感,也感染着许多来自异国的集邮爱好者或友人。

1931年底,湘鄂西省赤色邮务总局发行的邮票,仅使用近一年时间。当年担任难民救济总署署长的外籍人森逊曾赴湘鄂西根据地

救援水灾。在苏区里，他收集携回了一些邮品做为珍藏。其中的一件贴有湘鄂西省赤色邮务总局1分邮票的实寄封，1987年5月出现在瑞士的一次邮品拍卖会上，立即引起国内外集邮界的极大关注。虽然至今此封的真伪尚有争议，但这件事是目前有关苏区曾出现过邮品收集活动的最早记载。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1936年7月秘密访问了陕甘宁苏区后，在他撰写出版的《西行漫记》中有这样的记述：

“1934年和1935年间，陕西红军迅速扩大，提高了素质，多少稳定了他们所在地区的情况。……苏区有自己的银行、邮局，开始发行粗糙的钞票、邮票。”

这是有关区票向国内外最早的公开报道。

为帮助中国抗战，美国第14航空队于1940年来华，穿梭于缅甸、印度和中国云南四川运送物资，被誉为“飞虎队”。其间有不少飞行员到过延安。陈纳德将军是该队指挥官。1946年春，中苏友好协会在重庆胜利大厦举行晚会。有1名延安的记者孙艾一喜爱集邮，收集了不少解放区邮票。他在晚会上特意请陈将军在1枚贴有才发行的延安宝塔山图邮票的纪念封上签名留念。陈纳德签名后表示自己对延安邮票很喜爱，这位记者当场送给他1个延安宝塔山图邮票四方连。陈纳德把它一直保存到去世。

1946年底，美国有一个军事参观组来到延安。他们看到延安宝塔山图邮票很高兴，就整张地购买，并要求盖销做为收藏。可当时边区邮局人员从未听说过集邮是怎么回事，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没人敢盖。后来，还是一位业务科长出面才给他们全盖了销。由此，这些边区邮局职工才知道世界上还有集邮这么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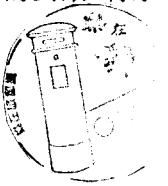
1946年1月，中共与国民党达成停战协定，由美国和国共两党三方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美国派出千余名官兵参加各地军调组工作。中共派出的首席代表是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美军中许多集邮爱好者多次向中共代表索要解放区邮票和纸币。为此，1946年4月30日，叶剑英专门给“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写了

一封信，信中说："为着有利于工作的进行，此间各工作同志需加强会外活动。而有些美国人想找我区的邮票（最好用过盖过章的）及边币样子，请将你区各种各色的邮票及边币样子各搜集几拾份托妥人速带来平为荷！"

当时晋冀鲁豫边区邮务管理局接信后，很快搜集了一些邮票送往北平。虽然将此举作为一种"加强会外活动"，通过邮票宣传解放区、增进美方人员的理解和同情，但是，中共高级领导人关心并亲自协助美军集邮者收集解放区邮票，实属罕见。

长期遭受围攻、封锁的解放区，除极少数人外，始终未能开展集邮活动，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限于艰苦的战争环境，解放区也没有条件收集保存各时期的邮政和邮票资料，使大量珍贵邮品自然损失，因而造成解放区邮票史研究中许多疑点至今仍难以找到准确的答案，这是非常可惜的。

当年在解放区内收藏解放区邮票的军民，大多不是出于集邮的动机。他们怀着革命感情把解放区邮票作为宝贵的纪念品珍藏，寄托对战斗岁月和革命友谊的怀念。虽然他们中以后仅有少数人一直从事集邮，但是，他们在战争年代为收存解放区邮票作过的贡献，将永载集邮史册。



第二节　敌占区的收集热

在各个斗争历史时期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像一颗颗星罗棋布的明珠，闪耀在敌占区人民的心中。当解放区内发行邮票的消息传出后，许多集邮者不顾安危，设法辗转收藏解放区邮品。以后，对区票的收集和研究，逐渐成为敌占区集邮界十分重视的一项热门课题。在那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这种远见卓识和奋不顾身的精神非常可贵，流传下来不少动人的事迹。

1931 年，集邮家张包子俊曾请几位即将奔赴江西苏区的中央大学学生寄些苏区邮票来。3 年后，他竟直接收到邮局送来的信封贴有

“湘赣边省赤色邮票”的平信，未按欠资处理。内寄苏区这种票1分一全张，2分一大方连。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苏区邮票，真是惊喜万分。他把邮票撕开分赠给新光邮票会邮友，实寄封被邮友、杭州青年会干事狄而耐（美国人）换去。这些来自苏区意义非凡的邮品，一直被邮友们视若珍宝，精心收存，并在邮会中秘密传看。

抗日战争时期，敌占区的集邮者仍然冒着各种危险收存解放区的邮品。1枚珍品“胶东战邮敬赠免费拥军信封”的搜集经过，发人深思。它的收藏者韩居宣回忆说：

“我自幼喜欢集邮，尤其喜欢集实寄封。1944年，日本鬼子与伪军下乡抢粮、抓人，我到根据地去暂避几天。那时我三哥王子义在中心区政府工作。来到根据地后，就请三哥帮忙搜集解放区的实寄封。过了两天，三哥给我向别人要到的2个实寄封和4个未用过的拥军信封。那时我很喜欢它，就夹在书里。返胶县后，将其中的3个拥军封赠送给邮友，自己留下1个，珍藏至今。”（《集邮》1985年3期）

兵荒马乱，在逃难之中仍然不忘收集解放区邮品，对解放区的热爱和对集邮的虔诚，确实感人。

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解放区邮票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渐多，成为集邮者特别钟爱的藏品。因此，各地的邮商小贩纷纷做起偷运买卖解放区邮票的生意。

1945年11月，晋察冀边区在张家口发行大型“抗战胜利纪念”邮票。消息传到北平后，引起收集热潮。当时国共控制区没有通邮，国民党军队还经常对解放区所属各地邮局进行袭击，杀害员工，劫夺邮件，仅1946年1至6月，平均每5天就有1名解放区邮工被杀害。特别是在北平西青龙桥一带，双方军事对峙，来往要越过几道封锁线，风险很大。尽管如此，两边的老百姓经常在怀来交界处过境往来，不少商贩掺杂其间跑买卖。其中有许多老太太专程赶往张家口，晚上露宿街头，一早等邮局开门就大量购买大、小型“抗战胜利纪念”邮票，然后冒险返回京、津，售给邮票社，有的人还往返多次。当时张家口物资缺乏，有些“跑单帮”的也冒险把解放区邮票偷偷带到北平、天

津，卖给邮商，再购回物资。仅天津“东亚邮票社”经手售出的“抗战胜利纪念”邮票就近万套。

1947年以后，解放区面积扩大，这时北平市的四周均为晋察冀边区。大量的解放区邮票通过无数条民间秘密渠道流入北平。东北解放区邮票则是由进关的集邮者捎来的。所以在北平邮市上，当时各解放区邮票均有出售。同时，解放区邮票更为一些外国集邮者重视。他们在邮市上广为搜集，寄往国外的解放区邮票很多。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集邮者购买交换解放区邮票，往往要担政治风险。特别像东北区发行的“双十二纪念”和“西安事变十一周年纪念”等邮票，图案上有蒋介石漫画像和政治口号“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这些邮票一旦在邮寄时被国民党特务查获，后果不堪设想。就是其他邮品，也常发生被窃。集邮者们为了邮寄解放区邮票的安全，绞尽脑汁。有的用两层较厚的土纸糊制信封，把邮票细心夹藏在双层中间，不留破绽。有的则采用互相邮寄精装书籍，把区票藏在书中。钟笑炉甚至想出一个“绝招”：在信封上贴1个四方连邮票，把要寄的邮票暗藏在其下。经过许多集邮者们斗智斗勇，才一次次成功地躲过了特务的检查和偷窃。

集邮家林崧也谈起过1949年以前收集解放区邮票的各种风险：“那时都是偷偷地从邮商或朋友那里买的。当时解放区邮票发行极不统一，小到一个县都可发行邮票。因此版式很多，有时真假难鉴，这就要担当经济上的风险。至于政治上的风险，那就更不用说了。那时，有些从解放区寄来的信封，我就没敢保存。”（《集邮家》报1985年4期）

40年代后期，在国民党统治区，集邮界对解放区邮票的研究和宣传在无声无息中暗地进行，甚至有的半公开化。像上海钟笑炉主编的《近代邮刊》、张包子俊等人主编的《新光邮票杂志》、北平韦景贤主编的《北平邮刊》等，都专门刊登解放区邮票的消息。（图33）

《近代邮刊》上报道解放区邮票，有许多是首次公布于众，例如：“大抗战加盖冀东区暂售四元”、“晋冀鲁豫鸟球图”、“冀鲁豫毛泽东

图 33 《近代邮刊》登载解放区邮票资料

像”、“安东版毛泽东、朱德像”等邮票。从第 4 卷起则进行长篇报道。《近代邮刊》介绍解放区邮票时图文并茂，还多次刊登毛泽东像邮票图案。为此，1948 年钟笑炉被特务抄了家。1949 年 6 月上海解放后，《近代邮刊》在总第 42 期集中篇幅，将 1929－1949 年 20 年间解放区各种邮票的发行情况作了全面介绍，影响所及，远至国外。

40 年代后期，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区的物质条件大为改观，在设计发行新邮票时也考虑了集邮需要。1948 年 12 月东北解放后，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发行过 2 枚纪念邮票的小全张和 3 本邮票汇集，供集邮者收藏。1949 年 1 月，北平和平解放。6 月，华北邮电总局发行《邮票汇集》一册，采取预订方式在北平集邮台发售 100 册。其中包括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交通局发行的各种邮票 50 余枚。华北人民邮政在发行庆祝“五一”纪念邮票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28 周年纪念邮票时，还发行了无齿孔邮票。这些都是专为满足集邮者的需要发行的，也采取预订的办法出售。

上海 1949 年 5 月解放，6 月 8 日即在《解放日报》登载文章：“自 5 月 30 日起，开始发售人民币新邮票。最新拨到‘南京、上海解放纪念邮票’、‘淮海战役胜利纪念邮票’及华东邮区普通邮票四种，全套共计 31 枚。该项邮票图案新颖精致，颜色鲜明，惟数量不多。请集邮人士迅向该局集邮组购置，以免向隅。该组备有邮票目录，函索即

寄。”通过报纸及时向集邮者通报新区票发售信息和在大城市出售解放区邮票的作法，提高了集邮者收集解放区邮票的兴趣。这是人民政府重视支持集邮活动的良好开端。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解放区邮票倍受青睐，也出现了一些伪造解放区邮票的不法投机商。其中臭名昭著者当属上海邮商钱万能。1944年前后，他用木刻手工伪造了数十种“解放区邮票”，而且数量很大，贻害非浅。全国解放后，钱万能的丑行受到应有惩罚，被捕后死于狱中。

40年代，中国收集解放区邮票有两支重要力量。一部分是战斗在解放区的少量干部、战士。他们的工作生活环境艰苦，又缺乏邮刊等资料，除个别人以前有些邮识外，大多不懂集邮方法。另一部分是分散在敌占区的集邮者，解放区邮票大多数是靠他们收集保存下来的，他们成为收集区票的主力军。

50年代以后，经过这两支集邮队伍的相互交流，共同努力，中国集邮界才逐步摸清了解放区邮票的历史全貌。

第七章　中国集邮的新时代

第一节　崭新的风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十年的战乱结束了，中国大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的集邮活动也像其他文化事业一样，跨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朱学范为邮电部部长，同年11月1日，邮电部宣布正式成立。新中国第一套邮票是华北邮政总局于1949年10月8日发行的。

千头万绪，百废待兴。新中国将如何迈出设计发行邮票的第一步，是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反复考虑的问题。为了便于邮票发行管理和集邮者的收集，首创了邮票志号，成为新中国邮票的特色之一。

当年提出这一建议的是邓连普。他回忆道：

“筹印新中国第一套纪念邮票从1949年初夏开始。作为经办此事的我非常兴奋。我联想到年轻时的集邮活动。那时北方文化水平与京沪等地相差很大，集邮活动落后，消息闭塞。一个初学集邮者拿到一枚邮票，要想知道其发行年代、全套几枚等是很困难的。特别是邮票社卖的袋票，一袋一般为百枚至五百枚或更多些。有人说：‘一付中草药产自全国各地，而一袋邮票来自世界各国’。要将一袋中的各国邮票分清国别、套数、每套是否齐全是难以办到的。我想到将来，当一个初学集邮的人收集到一枚新中国邮票时，是否也会象我年轻时一样？一个外国人看到新中国邮票，是不是同我当年看到外国邮票同样糊涂？为了帮助集邮者解决这个困难，我决心找出办法。经过反复

考虑，设计了邮票志号。送给一些同志看，他们都能看懂志号的涵义。最后经领导同意，新中国第一套纪念邮票就开始使用志号。”(《集邮研究》1985 年 3 期)

新中国邮票题材广泛，设计典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深受国内外集邮者喜爱，其中不少佳作在国际邮坛享有盛誉。

孙传哲(浙江宁波人，1915 年生)，出身于书香门弟，是中国第一位专业邮票设计家，曾任邮电部邮票发行局设计室主任。孙传哲 1936 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从师美术家徐悲鸿、张玉良。从 1947 年设计民国“颐和园风景”邮票开始，至 1985 年，共设计或参与设计各种中国邮票 150 余套，题材变幻，神韵高雅。由他设计的《林业建设》、《关汉卿戏剧创作七百年》邮票，50 年代被国际上评为世界最佳邮票。60 年代初设计的《金鱼》、《梅兰芳舞台艺术》、《丹顶鹤》、《黄山风景》等邮票，均为新中国邮票中出类拔萃的精品。孙传哲成就卓越，固与家学师承有关，但他对邮票艺术的苦心钻研是最宝贵的源泉。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策的原因，以及大量集邮者职业变动，解放前的各种集邮团体基本上解散了或停止活动。老的集邮刊物绝大部分停刊，只有少数维持了两年多，如上海的《近代邮刊》、南京的《伟光邮录》、江苏溱潼的《集邮月刊》等。另外还有几种新邮刊问世(图 34)。

1950 年 4 月 15 日，天津邮学月刊社自办出版《天津邮学月刊》。集邮家杨耀增(天津人，1925 年生)任主编。他是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公司天津分公司干部。早在上中学时开始集邮，并着重收集邮史资料。1983 年起曾撰写《天津集邮史话》，在《天津集邮》连载。后来在此基础上编著出版《津门邮事》，该书内容涉及天津早期的邮政、邮票和集邮活动等，将大量濒临散失的集邮史料收集整理出来，是一部系统全面的地方集邮史专著。杨耀增回忆说：“1950 年天津出版的《天津邮学月刊》，主要是韦崇福和我搞的。当时我俩都是 20 刚出头的青年，血气方刚。一次在会芳楼的邮人聚餐会上，范兰如、李信甫等几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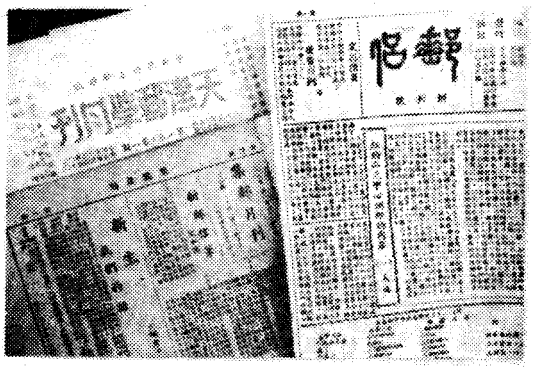


图 34　50 年代初的集邮刊物

人倡议出版一份邮刊，并点将式指定韦和我负责联系和筹办。我俩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跑军管会，跑印刷厂，约稿件。印刷费用统由韦崇福代垫。”韦崇福当时在天津经营诚记邮票社。《天津邮学月刊》出版一年多，于 1951 年 7 月被迫停刊。

1950 年 7 月，北京东方集邮研究社自办出版了《东方邮刊》，由该社负责人吴嘉祥主编。每月一期，每期 10 页，有少量彩色插图，并贴有邮票实物做为附图，实不多见。但仅出刊三期就停办。其中较有价值的文章，如“华北区人民邮票之研究”，对石家庄版邮票的印制版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可惜因停刊未登完。

北京的《诚记邮讯》也是解放初期少数民办邮刊之一。

上述邮刊成为研究建国之初集邮活动的宝贵资料。到 1952 年底，全国各种邮刊（除个别地方的油印刊）基本全部停刊。

新旧社会两重天，时代的巨变不免引起许多旧社会过来的集邮者对新中国产生不少疑问。《集邮月刊》从 1949 年 10 月至 1952 年 10 月的两年中，断断续续发表了很多文章，专门讨论诸如“集邮是小资产阶级的娱乐品吗？”“如何作新邮人”、“关于收集帝国主义国家和旧社会的邮票问题”等，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这些文章非常典型地反映出当时国内集邮界的精神面貌。在该刊第 3 期上一篇题为《谈集邮》的文章中谈到：

“过去，国民党统治时代，有些集邮家有一种偏向——好钻牛角尖，甚至于有些朋友就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集邮观念，这些都要好好地研讨研讨。有些邮商们操纵囤积，投机欺骗，无所不为，这也要彻底地检讨了。

在今天，我们每一个集邮者应确立新的态度，邮商们也应树立新的作风。今后我们的集邮，要从纵横方面研究，因为过去一些集邮家们只研究齿度、背胶、水印、大全套、组外品……从不研究图案，因此，对于文化、艺术、历史、地理各方面轻视了。我们的邮学家，应该研究如何使集邮成为人民文化科学之一。”

在该刊第2卷6—8期合刊上发表的《集邮是小资产阶级的娱乐品吗》一文中，是这样说的：

“集邮是不是小资产阶级娱乐品呢？乍看起来，好像是的，不错，集邮的同志们大多是知识分子，而这种娱乐在我们中国又不怎样普遍，无怪有些人有这样的看法。

有人说：‘集邮在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很流行，因此这种娱乐不一定是好的。’这样的观点是极其错误。举一个例子吧，如跳舞这项艺术，在荒淫的美国，是靠大腿和肉体的暴露，麻醉观众，毒害观众，根本毫无艺术可谈。但在苏联，跳舞有着高深的艺术和技巧，尤其富有教育意义的内容，让观众去欣赏，是人民艺术的一环。”

该刊第30期发表的《积极清除旧的集邮观》文章中，进一步列出旧集邮观的种种表现形态，其中之一是：

“自鸣清高为保护‘国粹’而‘殉’忠，看到龙头、帆船恋恋不舍，对新中国的邮票则不感兴趣，因此他就专集清朝邮票或北洋军阀时代的邮票，表面上好像是些‘专家’，实际上这些象牙塔上的朋友，也就是‘遗老’。”

仅从摘录的这几段文章就生动说明，解放初期集邮界关心和讨论的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是两点，一个是新中国能不能集邮，一个是该怎样集邮。第一个问题通过对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广泛开展集邮活动的事例，很快得到了解决：集邮不是资产阶级独有的娱乐，

社会主义国家也应提倡集邮。第二个问题却比较复杂，争论了很长时间未能真正解决。

强调更多地研究邮票图案所包涵的丰富历史文化知识，无疑是对的，这比旧中国集邮单纯围绕邮票特性进行研究是个极大的进步。但是把对邮票各种特性（齿孔、背胶、变体等）的研究全盘否定，一概拒绝的作法，是短视的。这样的结果，只能导致集邮水平无法提高。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不久中国组织志愿军赴朝参战，抗美援朝。志愿军英勇顽强、浴血奋战，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胜利。值得一提的是，在对敌作战的前线，我志愿军还利用美国军人中爱好集邮者众多的特点，用邮票开展了“对敌工作”。

1952 年 7 月 7 日，中国发行一套《抗日战争十五周年纪念》邮票。志愿军政治部将它们制成对美军展开反战的宣传品。在每枚邮票背面印上两行英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共同打击过日本”。当时，志愿军指战员将这些邮票和书信、糖果等宣传品一起分装成小袋，夜间由侦察员把它们挂到美军前沿阵地的铁丝网上，甚至挂到美军营地房门上。利用集邮活动展开瓦解敌军的宣传战，是中国军队的一种新战术。

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中也有一些集邮爱好者，只是由于战斗十分残酷激烈，他们的集邮活动非常有限。北京鼓楼集邮研究会会长朱祖威（江苏无锡人，1936 年生），小学开始集邮。1951 年参加志愿军，带着几本集邮册奔赴朝鲜前线，在高炮部队任文化教员。他在《集邮经历杂忆》一文中谈到：

“我们连队和孟中里的朝鲜群众接触很多。房东朴妈妈对我十分关心，当她知道我喜欢收集朝鲜邮票时，就从自己残存的箱子中，翻出十几个旧信封送给我。可惜当时我不懂收集实寄封的重要，把这些邮票都洗了下来，成为我入朝后收集到的第一批邮票。我把收集到的邮票单插在邮册里，到阵地给战友们看。在战争环境下，这种欣赏是别有风趣的。在朴妈妈的宣传下，孟中里不少群众知道我喜欢邮票，都主动送给我一些邮票和旧信封。这些邮票在战友中间传阅着，在我

邮册中珍藏着。它体现了朝鲜人民对志愿军战士深切的爱!”

1953年7月,朝鲜停战不久,祖国派出第三批赴朝慰问团。在向广大志愿军将士赠送的礼品中,有一套军邮明信片,共10枚,图案是祖国风光和中朝军队欢庆胜利,背面印有“军邮”和“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赠”字样。这套富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明信片,如今和志愿军家信实寄封一样,成为大陆集邮者收集研究的热门邮品之一。

1950年7月10日,江苏东坎县邮局因为缺少200元和400元(旧币制)的低面值邮票,就将500元和300元邮票沿对角线剪开,各取半枚凑成400元一并贴用。在短短的几天内该局先后两次制造这种“对剖票”发售。用这种邮票贴发的信件有几十封,均寄往滨海县的各区合作社和供销社。这种作法惹来不少麻烦,响水口邮局致函提出责问,一些投递局(所)认为此种邮票无效,信件作欠资处理,引起收件人不满。由于该局自行其事,沿袭旧法,造成了新中国邮政史上罕见的使用“对剖票”轶闻,近年已引起集邮界的研究兴趣。

1953年8月1日,邮电部与解放军通讯兵部商定,为了优待军人免费寄信,决定由邮电部发行一套3枚“军人贴用”邮票。图案均以“八一”军徽为主图。1953年8月24日发行后,由于使用范围难以控制,邮电部决定停用。其中蓝色的(俗称“蓝军邮”)存世极少,成为新中国邮票的珍品。

第二节　邮人、邮商、邮展

新中国集邮活动是在旧中国集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具有新的模式和特征。这个发展过程,不仅是量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质的飞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观念如何重新认识集邮活动,怎样正确管理集邮活动,是摆在有关部门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同时,从旧社会过来的大量集邮者,也有一个逐渐认识适应新社会、新形势中如何继续自己原有的集邮品收藏、研究和经营活动的问题。新的时代,新的要求,必然会产生新的变化,新的事物。

新中国像一轮初升的太阳，它的巨大感召力使远在海外的游子归心似箭，心驰神往。集邮家姜治方当时任国民党政府驻波兰代办，1949 年 10 月 3 日毅然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1951 年 9 月 30 日回到北京。

姜治方（湖南长沙人，1907－1980 年）（图 35），集邮笔名姜子勋。早年留学日、法、比，立志专集华邮，以后在民国驻外使馆工作。为了求获华邮珍品，几十年来，姜治方奔波跋涉于欧亚的港口、码头、城市和乡村。巴黎热闹非常的露天市场，布鲁塞尔邮票商店林立的中街，阿姆斯特丹、柏林、马德里、里斯本、苏黎世、布拉格、华沙的大小邮票店、拍卖行，莫斯科的国际书店，北京大街小巷的旧货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同政府官员、教授、医生、牧师、法官、邮商和穷乡僻壤的老人，甚至沿街打小鼓的小贩等形形色色的各界集邮人士打过交道。

图 35　姜治方

赴欧洲以后，姜治方始终与国内集邮界通信联系。很早就加入中华、新光、甲戌等邮票会。30 年代，他请曾任湖南常德税务局局长的邮友李相銮，帮助收集了许多贴有最早解放区邮票和盖有红军宣传戳的珍贵实寄封。在国外，他是法国、比利时、葡萄牙等国许多全国性或地方性、专业性集邮协会中唯一的中国籍会员。

姜治方经过几十年博采广蓄，择奇而藏，收集到许多有历史价值的集邮品，如八国联军侵占中国天津、北京时“客邮局”发行的邮票、明信片和实寄封；甲午战争后台湾人民反抗日军侵占时发行的邮票；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时期盖有“洪宪元年”、“宣统九年”邮戳的实寄封等。其中袁世凯称帝时使用的“洪宪元年”日戳，姜治方收集到了78天的，只缺其中5天的，契机难得。

他的中国珍邮专藏名噪中外：我国早期票中，海关“大龙”票有近900枚，“小龙”票有300枚，最珍罕的是6枚“大龙”阔边实寄封；我国第一条航线往返首航封和20余枚中央苏区实寄封。其可谓超然不凡，逸趣天成。从30年代起，他先后参加过3次国际邮展，获得3枚金、银质奖章，载誉甚丰。1966年“文革”之前，姜治方将全部邮集捐献国家，幸免遭劫。他一生撰写的集邮论文很多。特别是1979年发表的长篇回忆录《集邮六十年》，在国内外反映强烈，已译成日、英、法、世界语出版。为中国集邮事业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姜治方50年代初回到北京后，在羊毛胡同买了一座小四合院，其中一间书房兼作会客室。当时他与全国各地集邮家、邮商联系密切，还多次为一些集邮家穿针引线，介绍换让一些珍贵邮集。不但北京的集邮家常去他家切磋交流，外地的一些邮友们到北京时也多去登门拜访，他的家无形中成了集邮聚会场所。当时外地集邮家有这样的说法：到了北京，只要找到姜治方，就能联系上其他集邮人士。姜治方1961年调往长沙湖南大学任教，这个“集邮者之家”才逐渐停止活动。

集邮家夏衍（浙江杭州人，1900年生），20年代东渡扶桑求学，1949年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职。他从中学时代开始集邮，在几十年紧张的革命活动和文艺戏剧生涯中，他仍然邮册从未稍离左右，忙里偷闲，还热心于中国邮政史的研究。他主要收集中国邮票，以清代票、区票和新中国票为重点。“大龙”邮票收藏了近200枚，珍品有光齿四方连全套新票、阔边5分新票2枚和全套新旧单枚票；“小龙”邮票100多枚，内有毛齿四方连和“北海加盖”四方连新票；“红印花加盖

小 4 分”有 6 枚之多；解放区邮票所缺有限。

从 1950 年至“文革”前，夏衍与京沪等地的集邮家交往甚密，无拘无束，成了许多集邮家的知心朋友。1953 年他在姜治方家里索观邮票时，见姜治方的邮集装在皮箱里放在床底下，既不方便，也不安全，就提出应该买个保险柜。不久保险柜买好，夏衍见了非常高兴。

夏衍在谈到自己对集邮的体会时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但同时，人也是可以或应该有一点爱好和情趣的。集邮就是一种可以增长知识、陶冶情操的高尚的文娱活动。”他又说：“我认为集邮不能性急，更不能求全。有些邮票，常常是无意中得到的，就是所谓‘可遇而不可求’的意思。不能把集邮当作正业来搞，有机会，收集一点；工作忙，放一放也可以。任何一种‘收集’都容易‘入迷’，入了迷，就被动了，就会发生副作用了。我还有一条原则，就是不收集‘变体’。我认为刻意地收集这些，不但花钱，而且是一种集邮界的‘邪道’。这一点也许是我的偏见，但我是很坚持的。”老集邮家这些由衷之言，对新中国年轻一代的集邮者不无益处。

1991 年初，夏衍把自己的数百枚清代邮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其中有不少珍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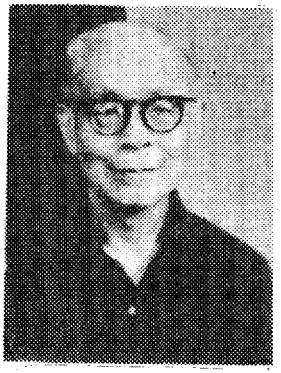


图 36　黎震寰

天津集邮家黎震寰（广东南海人，1901—1990 年）（图 36），字猷尚。从 1924 年考入铁路部门任职开始集邮。30 年代起，结识集邮家赵善长、孙君毅二位“邮坛同龄人”，私交甚厚。3 人均善诗文，平素诗来文去，相互酬答，切磋邮学，在集邮界被传为佳话。在集邮过程中，有感于当时有关中国邮票的专著绝大部分是外文的，黎震寰便暗下决心，立志写一本中文的中国邮票参考书。为此他在搜集资料上花费了极大的功夫。坚持十几年收集各类集邮书刊 3000 多种，披览所及，信笔存录，作分类卡片 2000 多张。于 40 年代先后编写出版了《近代中国邮票图

鉴》、《近代中国邮票图鉴补刊》。1943年8月，天津出版了他编撰的《中国邮票图鉴全集》。这是中国第一本中文版中国邮票图鉴。1947年集邮家马任全的《国邮图鉴》出版时，在序言中也肯定了黎震寰取得的成就。

1951年10月，黎震寰又编写了一部《中国人民邮票图鉴》，在香港出版，重点介绍抗战时期发行的各解放区邮票。全书采用中英文对照编排，目的是为了更有利于向海外宣传，扩大解放区邮票的影响。

黎震寰不仅邮识渊博，而且为人正直，对损人利己之事深恶痛绝。解放初期有人伪造了一批清朝万寿样票在邮市出售，经他细心鉴别是假票。消息传出，许多邮商写信叫他少管闲事，甚至施以威胁利诱。但黎震寰不为所动，毅然在1950年5月出版的《天津邮学月刊》上撰文揭露此事，轰动邮界。被触痛的不法邮商送他"邮魔王"绰号相辱。他却针锋相对，自刻1枚"邮魔王"图章，引以为荣。老集邮家高尚的邮德令人起敬。

黎震寰因年轻时体弱多病，较早离开了工作岗位。60年代初，他受聘于天津历史博物馆，代为整理和鉴定馆藏邮品。经他介绍，从国内一些著名邮商处搜求到不少名贵邮票，丰富了馆藏。80年代，他担任天津市集邮协会常务理事和《天津集邮》副主编。

集邮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离不开交流。

50年代初的几年里，因为邮会解散，邮刊停办，中国集邮界一时竟变得无声无息。活跃邮坛多年的知名集邮家大都消声匿迹，集邮研究活动在高层次处于低潮。

值得一提的是，集邮家吴凤岗当年作为在邮政总局从事邮票发行及集邮业务的干部，从建国初期到1964年，曾经手过数次筹建全国集邮组织的工作。他在《建国以来几次筹组集邮协会的经过》一文中谈到了有关的情况。

1949年，全国大部分地区解放，解放前立案的社会团体停止活动不复存在，但新光邮票会在上海有大批会员。当时上海集邮商也还有几十家，营业虽较前清淡也还勉强维持。建国初期全国集邮人士极

为关心集邮的前途，人民政府对集邮事业的态度是提倡还是反对？集邮会还能否获准成立进行活动？集邮商业还能否继续经营和发展？当时邮电部邮政总局对这些事对外虽没有明确表态，但实际上是热心邮票发行并重视集邮工作的。当时邮政总局局长苏幼农，在他原担任华北邮政总局局长时，即发函全国各解放区，让把接收的旧中华邮政邮票，不要毁弃，好好保存，以备日后对外出口换取外汇。随后又着手筹建邮票印刷厂，主张对纪念邮票降低面值，扩大印量，长期出售，尽可能满足集邮者的需要。

1951 年夏季，吴凤岗因公出差上海，应在沪的集邮家之邀，到原新光邮票会会所参加了一次集邮座谈会，到会集邮人士 50 多人，由集邮家王纪泽主持。会议中心内容是对集邮活动长此缄默不安，决定联名发出倡议，筹组一个全国性集邮会。会上大家推举王纪泽、钟笑炉、陈复祥、居洽群、周煦良等 9 位作为发起人代表，通过当时尚未停刊的《近代邮刊》作为总通讯处，向全国集邮界进行联络。这次座谈会后，各地集邮家纷纷参加发起筹备工作。

集邮家钟笑炉对即将诞生的集邮团体寄于厚望，倾注了满腔热情。他兴奋地写成一篇《为新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全国性集邮团体告全国邮友》。1951 年 9 月 25 日，《集邮月刊》刊载了此文，文中写到：

“根据本人主编的《近代邮刊》经常与各地邮友接触的经验，我们可以证明，全国邮友的确都在殷切地盼望有一个新型的全国性集邮团体，来指导集邮的新方向，并团结全国邮友，开展新中国的集邮活动。

我所编的《近代邮刊》十分荣幸地接受了新邮会首批发起人的委托，在他们做准备与联系工作期间，由《近代》担任他们与全国邮友之间的桥梁，作为临时的总通讯处，向全国集邮界发出如下的号召：

(1)请参加签名为发起人。(2)请提出关于新邮会组织希望与意见。(3)请在各地集邮界进行广泛的准备宣传。”

吴凤岗回京后曾将此事向邮政总局领导作了汇报，当时的意见是待发展有一定基础时再研究。但半年之后，全国掀起“三反”、“五

反”运动，《近代邮刊》也停刊了，此事再无人谈起。

1956年，为酝酿筹备成立全国集邮协会，集邮公司经理王安国和吴凤岗根据领导意见，分别走访了北京著名的集邮人士。如邮电部部长朱学范，文化部副部长夏衍，集邮家姜治方、郑汝纯、陆志伟、崔显堂、许伯明，戏剧家梅兰芳等。各方都表示愿意参加发起筹组，夏衍、梅兰芳还同意在集邮协会中担任名誉职务。

他们将征询的意见向部局领导汇报后，研究的结果是：集邮是一项文化活动，集邮团体应由文化部门来领导。不久“反右”整风运动开始，接着大炼钢铁、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不断，集邮协会的事又石沉大海。

1964年5月，吴凤岗随王安国经理去广州参加出口商品交易会。当时在广东外事部门工作的常增书组织了广州集邮小组，向吴、王两人建议筹建全国性集邮协会。同时广州市副市长林西还约请也在广州的苏幼农局长一起商谈此事。但回到北京后，苏局长转告常增书、林西，筹组邮会事宜，还是应由文化部门领导为好。邮电部不便出面组织，此事再次搁浅。

吴凤岗（陕西西安人，1920年生），1936年开始集邮，是新光、甲戌、首都集邮学会等的会员，《首都邮刊》编辑。他长期潜心学术研究，1945年发表的《邮学与集邮学》一文，最早提出集邮学观点。80年代他还担任了《实用集邮辞典》、《中国邮票全集》二书的主编。

吴凤岗对集邮研究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例如他认为：

“集邮，可能是由于兴趣或艺术欣赏而开始，但归根结蒂却不能不进入学术领域。所以说，集邮是一项富有教育意义的文化活动。人们常说集邮者热爱生活，追求真理，是博物的。”（《邮票中的动物世界》序）

解放初期，集邮活动出现过几年的波动，表现在：一是各种集邮团体消失后，广大老集邮者依然希望恢复或新建集邮组织，这种议论和联络影响很大。二是对待新中国集邮品的收集范围一时难以适应，过去热衷于清代、民国、欧美邮品收集研究者，看到号召抵制反动邮

票的宣传，思想有压力，也有抵触。三是大量新加入集邮行列的干部、工人、教师、学生、军人等，基本都是收集新中国和苏联东欧邮票。随着这部分人数不断增多，邮票市场不得不以向为这些低收入者提供低档邮品服务为主转移。

盼望邮会的复苏，老邮人和邮商面临新形势的挑战，这些矛盾和疑虑，经过几年的适应，才逐步有所缓解。广大集邮家们在没有邮会和邮刊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自己热爱的收集和研究，内容和方法仍然我行我素，自得其乐。见解无处成文发表，就相互访谈面晤，鱼雁往来。因此，50年代，集邮界形成两个群体：一是以收集社会主义国家邮票为主的新形成的普及型集邮群体，人数众多；一是收集研究中国早期邮品及欧美邮品的群体，这是原有的集邮群体，人数已不太多。

解放初期，国内只有北京、上海、武汉、湖南等少数几个省市的邮局设立了集邮组，出售的品种也只限于新发行的新中国邮品，影响较小。

50年代初开始，中国国际书店曾向苏联国际图书公司进口过苏联邮票。经销处分别设在北京市苏州胡同国际书店总店和上海市福州路国际书店上海分店。

1952年初，第一批苏联邮票品种约80余套开始公开出售，有关部门并编印了目录供集邮者参考。目录上说明："如蒙选购，请注明邮票号码并按定价汇款（或用国内通用的邮票代替亦可），本店立即寄奉。"为了解决售价较低的邮品汇款不便，当时国际书店规定可以"新邮代币"。这种处处为集邮者行方便的作法受到赞扬。在中国集邮公司成立之前，国际书店成了向广大集邮者提供外国邮票的窗口。

从1949—1950年的一年左右时间里，国内各地集邮者收集解放区邮票一度达到"狂热"的程度。过去一直神秘莫测、不敢公开的区票一下子大量涌来，广大集邮者的收集热情自然高涨。但从1951年初开始，区票收集热逐渐降温，购买势头减弱，原因主要有几方面：

首先是经济原因，建国初期，国家职工、文教人员工资都不高，购买力十分有限。其二是市价不稳，当时受整个物价影响，票价波动剧

烈。比如南京加盖区票，几个月就由三四百元下跌到二三十元，致使集邮者心理上受到很大打击，开始观望。其三是缺乏参考资料，心中无数，不敢贸然购进，这个影响最大。当时国内谁也说不准解放区邮票的品种数量、辨别特征等一系列至关重要的问题，盲人骑瞎马，怎不令人心有余悸。

因此，从 1951 年左右开始，大量集邮者的收集重点逐渐转向新中国邮票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解放区邮票的收集人数有所减少。

解放后最初几年，全国各地原有的邮票商社大部分仍然继续营业，有个别的业务还有所扩大。许多过去邮人云集的邮票市场也十分兴旺，所不同的是增加了许多新面孔。

北京的东安市场一带是北京市的繁华所在，这时开张营业的邮票社有 7 家，出售的清代票、区票、民国票、外国票及各种实寄封都比较多，仍然是集邮者常来搜奇探宝的地方。杨启明回忆说："解放初期，集邮业务开展不起来，后逐渐好转。由于解放区邮票种类很多，国家又扶植对外贸易，奖励出口，国家银行还代收贷款，所以我的出口业务又恢复了。加之物价稳定，给获利奠定了基础，我的邮业走向了兴旺发达时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美国封锁交通，扣留外汇，邮票出口业务不得不停顿。但国内业务依然活跃。"（《集邮回忆录》254 页）

这时，天津原有的东亚、国华、国际、良友等几家邮票社，都重新开业，有的改了名称，如"久华"改为"大新"，"北京"改为"诚记"。各邮社这一时期生意做得比较灵活，"良友"开始印制售品目录，在天津尚属首次出现。"东亚"和"诚记"采取每遇某地一城镇解放，即给当地邮局局长汇款，要求全部购买当地使用的邮票的办法，收购到大量新解放区的邮票，由此赚了不少钱，也使集邮界能够收集到不少珍贵的地方临时加盖票。1955 年天津全面公私合营后，将这些邮社合并到劝业场，在四楼设立了一处邮票柜，由原来的邮商负责。1961 年 10 月，天津集邮分公司成立，这里开辟为代销点，兼营收购、寄售、函购业

务。

过去被称为邮市乐园的上海，解放后变化很大。以往那种由少数人投机操纵，进出的邮票交易辄以万套计算的时代结束了。虽然许多邮商叹息解放初几年门市生意不及盛时十分之一，但仍不肯放松机会对各种邮品量力吸进。价值较高票品的成交，也时有所闻。出口邮商因与国外通信不畅等原因，停滞了一年多后又恢复了，开始出现结汇数百美元的邮品出口，零星交易更多。外滩惠罗公司旁边的小巷里，邮店林立，每逢节假日集邮者把这里挤得难以通行。

直到1950年，上海仍有两处举行邮品拍卖活动。一为新光拍卖会的拍卖活动，每星期三和星期六举行，兼拍卖钱币；一为俄侨邮会的拍卖活动。

老邮商们也比较活跃。解放初期，一份外国报纸曾发表文章说中国政府出售伪造邮票。陈复祥看到后很气愤，一方面与国内有关部门联系，一方面与英国邮友共同追查谣言来源。最后终于查明源出于澳大利亚邮商，澄清了事实，维护了新中国的国际声誉。

1950年初，上海邮局供应处鉴于尚积存大量民国邮票，如金元加盖、梅花版、大东版、单位基数等，拟作为剩余物资作价处理。对这数亿枚邮票的售价，局方和邮商们酝酿了一月多，始终未能达成协议。主要原因在于邮商们担心如此巨量的邮票一旦入市，必然会使近期票大幅度跌价，对国内外邮坛影响太大。所以双方提出的售买价相去悬殊，最后只得作罢。

50年代初，虽然没有集邮组织，但是天津老集邮家们仍然定期聚首，谈邮甚欢。1950年9月24日，还在天津新华北路永安饭店举办了天津邮票拍卖会。

从总体上看，当时国内邮市普遍不振，早期华邮在上海邮市上暴跌，对各地影响巨大；而天津邮市却能相对保持平稳，价格仅稍落。主要原因之一是，大批外侨纷纷返回各国，临走之前许多人在邮市上大肆购买各种较有价值的华邮，以备作为归国后的一项生财之道。同时，香港邮商也在这里大量收购。这样一来，邮市上出现的世界邮票

混合 5000 种、解放区邮票百组不同、伪满及国邮袋票等，都很畅销，成交价常有四五十万元者。

面对这一时期一般普通票品乏人问津，较罕贵的早期华邮及解放区票难以到手求者甚多等情况，天津集邮者不禁发出感叹，称邮市是“要嘛没嘛，有嘛买嘛”。（天津语）

1956 年，全国开始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波及分布各地的私营邮商。当时，在中国集邮公司的指导下，对各种私人邮票商社采取了两种改造方式：

一种是由当地邮政或集邮机构吸收邮商为职工，既有利继续发挥老邮商们的一技之长，也有利于提高国营集邮机构的业务素质。但是限于各方面的原因，被吸收为国营职工者为数并不太多。

一种是加强管理，给予批销权，使邮票商社继续维持。对比各地做法不尽相同，例如，上海采取成立工商部门管理下的集邮大组，统一协调分散经营的个体邮商。天津则是在劝业场百货大楼内设立集邮专柜，使一些邮商相对集中从事经营。

但是，从总体上讲，国内的邮商人数大幅度减少，几乎没有再新增或扩展。有不少邮商弃门市而改为“散兵游勇”，从事通信或上门收售集邮品，拥有自己长期固定的老客户。

建国初期，全国一些城市还举办过小规模的邮展活动。

1950 年 2 月 26 日，在沪俄侨的中华俄国邮票会为纪念该会成立 15 周年，在上海毕勋路犹太总会举办了一次邮票展览，由该会会长范仑斯基主持。展期 2 天，参观者近万人。展品以苏联及各国邮票为主，中国集邮家王纪泽的早期华邮，钟笑炉、范广珍的解放区邮票应邀参展。展场设有临时邮局和集邮台。俄邮会还印制了 3 种纪念封。由于当地各报均无报道，观众比以往邮展显得要少。展期内还举行了邮品拍卖。

1950 年 11 月 5 日，厦门集邮家陈天晨为配合当地复华小学校庆，在该校举办中苏邮票展览，并邀请林澍、徐鸿基等邮友提供展品。邮展仅 1 天时间，观众约 500 多人。这次邮展是厦门市首次举办的邮

展，规模虽小，意义很大。

1952 年 11 月 22 日，为配合全国开展“中苏友好月”活动，贵州省和贵阳市邮电局在贵阳市省立人民图书馆举办了一次“中苏邮票展览会”。共展出 80 个镜框，分中、苏邮票两部分，展期 14 天。当地报纸作了宣传报道，参观者近万人，有的机关还组织集体参观。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集邮面貌发生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无论是集邮品、集邮活动，还是宣传和提倡的内容，都已经逐渐与旧中国集邮有了明显的区别。集邮家和邮商的思想作风也都有了新的变化；不论是自觉还是被动，新中国集邮的目的和意义是每一个新老集邮者都必须认真考虑和对待的问题。这是一场社会观念的大变革，促使集邮文化完全脱离旧的发展轨道，开始走上新的道路。

第三节　集邮公司和书刊

集邮做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集邮品的流通和集邮知识的交流，必然会成为广大集邮者最迫切的需要。建国初期集邮者的大量增加，使这种呼声日益强烈。

1955 年 1 月 10 日，中国集邮公司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规模的集邮服务公司。中国集邮公司的成立，令国内外华邮收集者为之振奋。

当中国集邮公司在北京东安门大街正式开业时，集邮者蜂拥而至，营业厅里挤满了顾客，排着长队购买邮票。因为柜台内部一时加工不及，只好采取先给排队者发登记“号牌”，改期再凭牌来取票的办法应急。随后邮电部邮政总局机关动员干部前来协助加工邮票。

为了满足广大集邮者的迫切需求，同年 10 月 23 日，在上海南京东路设立了中国集邮公司上海分公司。开幕当天，盛况空前，原来预计逐日发售的 1 万份售品价目表，一天就卖出了 9 千多份。

截止 1959 年，全国已有 230 个邮电局先后开办了集邮业务，其

中包括出售新中国邮票、解放区邮票、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邮票和集邮用品。集邮公司还设计印制首日封，供集邮者选购收藏。另外，集邮公司还办理国内邮票函购和邮票对外出口业务。到1959年，全国已有函购订户9500多个。

1958年，中国集邮公司专门成立了集邮册生产厂，生产的集邮册畅销国内外，很受欢迎。

60年代初，中国集邮公司的机构有所扩大，在全国几个大城市分别成立了分公司：

1961年10月1日，天津分公司开业。1962年1月，哈尔滨分公司成立。1962年8月1日，广州分公司开业。1963年11月1日，沈阳分公司成立。

1966年8月，随着“文化革命”暴风雨的来临，中国集邮公司被迫停业。

在中国集邮公司成立之日，还出现了一件在国内外集邮界产生很大影响的事情，即邮票再版风波。

由于解放初期国内的邮政业务量有限，加上对全国集邮活动发展的形势估计不足，国家对新中国早期纪念和特种邮票的印量和留存都很少(印量一般在30—40万套左右)。再加上当时集邮者较少，这些邮票被大量消耗在邮寄业务之中。结果几年后，新出现的集邮者们，欲收集这些最早的新中国邮票已深感困难。为满足国内外集邮者的需求，邮电部决定于1955年1月10日，将1949年至1952年发行的24套纪、特邮票重新制版印刷发行。这些再版邮票每枚印量均达250万枚，比原版增多了六、七倍。邮电部在(55)邮票字第33号关于邮票再版发行的通知中，对这一决定是这样说明的：

“一、开国以来所发行的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大体反映了几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上的重大成就，邮票质量上也有提高，因而逐渐为国内外人民群众所喜爱，纷纷来函请求购买，有的并针对若干邮票早已停售的情况，建议我们以原版添印后发行，或以库存票重新出售。为了适当地满足国内外人民的需要，经请示前中央人

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核准，决定将存量不多的部分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以原版添印若干，重新发行（简称再版发行）；同时决定将库存的其他已停售的纪念邮票、特种邮票，重新出售。”

“二、……上述再版发行的各种邮票，都是我部代表国家发行的邮票，除印有东北币面值的且业已停用不能用作交纳邮资外，其他各种邮票，如购买者粘贴在各种邮件上使用，应该和其他邮票同样发生邮资的效力。”

“三、为便于各局识别版别起见，本部正在将再版发行的邮票和原版邮票的主要区别点制成图案，另行下达。……”

纪念邮票的发行特点是一旦发行，就不能再版，其发行量还必须定期公布于众。邮票再版历来属集邮界之大忌，因为这种失误，不仅将使再版邮票倍受歧视，而且对发行国的信誉也会造成损失。虽然当年邮电部规定这批再版票可以同样用于邮政，有别于以敛钱为目的的商业邮票，并公布了再版票与原版票的种种差异，但仍难免在国际上授人以口实，结果引来种种猜测和误解，被集邮界长期褒贬不一。目前，当年的两种原再版邮票价格已相差悬殊。动机虽好，效果欠佳，有鉴于此，中国以后没有再版过纪、特邮票。

在“文革”前，许多集邮公司门市部还举办邮品寄售业务，主要是早期华邮、封、片和少量苏联早期邮票等，向票主收取 1/10 的手续费。

当年，在北京、上海等地集邮公司门市部的营业厅里，都悬挂有这样两块横匾：

“邮票不仅是邮资凭证和精美的小型艺术作品，而且是一种宣传教育工具。它通过现实主义的艺术，反映现代生活的内容。收集邮票可以丰富知识，提高艺术鉴赏能力，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和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邮票反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鼓舞人民向共产主义迈进。”

这些内容，表达了新中国对集邮活动目的、意义、范围的理解和要求。可以说，是新中国的集邮宣言。

50至60年代初期，中国集邮界的收集内容主要是两大主题，即新中国邮品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邮品。这是当时国内绝大多数集邮者收集的重点，也是集邮公司经营的重点。各地集邮门市部或服务台除销售新中国邮品外，还大量销售集邮公司进口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友好国家的邮品。为满足广大青少年和初集邮者的需要，集邮公司还仿效苏联和东欧的作法，大量发行新票盖销票，售价一般为面值的1/3。这种低价出售的盖销票非常受欢迎。

由于当年国内一直没有集邮团体，集邮公司和各地的邮局无形中起到了指导和组织全国和地区的集邮活动的牵头作用。集邮公司单独或与其他部门联合举办了一些集邮展览及其他活动，集邮公司与各地集邮家们的往来也比较密切。50年代中期，集邮公司还组织中国集邮界开展了一些国际交往活动。

1955年9月10日，在捷克举办的布拉格国际邮展上，中国邮电部送展新中国发行的各种邮票和出刊不久的几期《集邮》杂志，成绩平平。在1956年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国际邮展和1959年9月柏林举行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二届邮票展览会上，中国均派员前往参加官方级展出，收获甚微。

新中国也曾选集邮家邮集参加国际邮展，如1958年11月送白金林的《俄罗斯和苏联地方邮政机关发行的邮票》邮集参加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1958年罗马尼亚国际邮票展览会，获得铜奖。1961年，又选送白金林的另一部邮集《新中国纪念、特种邮票的版式》，参加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国际邮展，也获得铜奖。白金林是天津的一位中学教师。在当时能取得那样的成绩也是不容易的。

当年，中国集邮界对外交流有限，组织参加的国际邮展极少，在国内外的影响比较小。其中，较隆重热烈的是参加莫斯科国际邮展。

1957年7月28日，在莫斯科举办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莫斯科国际邮票展览开幕。中国集邮公司组织了中国7位集邮家提供展品参展：

姜治方：首航封、“大龙”票实寄封、驿站排单、苏区票实寄封。

陈复祥："大小龙"邮票上的各类邮戳。

王纪泽：红印花加盖暂作邮票全组版式和早期旧票。

高开弟：解放区邮票。

马任全：变体票和样票。

史济宏：商埠邮票。

梁芸斋："蟠龙"加盖"中华民国"邮票。

还有北京4位少年集邮者的展品：

肖立昂：列宁邮票。

毛远新：新中国邮票。

杨绍明：为了和平与友谊(按照周恩来总理访问亚欧各国路线，用各国邮票贴成和平鸽)

樊渝杰：苏联邮票。

这些展品基本代表了中国集邮界的最高水平，因而取得很大成功，10部获奖。其中，姜治方荣获一等奖，陈复祥、王纪泽、高开弟、马任全、史济宏荣获二等奖。亲自赴苏参观展览的马任全载誉而归，受到国内各界热烈欢迎，国内电台、报纸都作了详细报道。这次参展的全部展品，从9月6日起在北京中国美术家协会公开展览了两星期，供广大集邮者观摩，以后又赴上海展览。

这是解放后中国集邮者在国际上第一次获得的最高荣誉。为了这次展览，中国集邮公司的领导事先走访京沪集邮家，作了认真的准备。有趣的是，选送的邮品中有一多半都是当时不提倡收集，甚至公开指责的清代、民国、商埠及变体邮品。这充分显示出，当时邮电部及集邮公司的领导对华邮瑰宝的重视，对宣扬传统国粹的支持。

这一时期，受整个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中国邮票的进出口业务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与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交往，仅与日本有民间往来。1957年8月，《集邮》杂志编辑部和中国集邮公司邀请日本集邮家水原明窗访问中国。

水原明窗侵华战争时期到过中国，30年代后期开始集邮。1946年起编辑《邮趣》杂志，对介绍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颇为注意。水原明

窗以收集研究中国解放区邮票见长，因此，他与中国许多集邮家已神交多年。1955 年，他在集邮家钟笑炉的帮助下，编辑出版了一本中国解放区邮票目录。他的中国解放区票邮集多次在国际邮展上荣获大奖。水原明窗访华期间，分别访问了中国集邮公司、《集邮》编辑部，同京沪集邮家举行了座谈和会晤，增进了友谊。水原明窗对这次访问印象很深，30 多年后他回忆道：

“在中国集邮公司的柜台上，公开出售从地方邮局收回的解放区票。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能够买到新疆伊塔阿十分罕见的邮票。这种邮票是我寻觅已久的。”“我空余时间里就去北京东安市场拜访邮商，寻找所需要的邮票。因为那时收集区票的人还不太多，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此重视，所以，我能够得到很多很有趣味的材料。”“在这次访问中，我会见了许多笔友，如姜治方、马任全、陈复祥、钟笑炉、王纪泽、孙君毅等。他们非常友好地向我出让他们非常珍视的邮票。33 年后的今天，我回忆起在成马全家与上海集邮家的亲切会见仍历历在目。”(《集邮研究》1990 年 3 期)

“千呼万唤始出来”。在集邮界的期待中，1955 年 1 月《集邮》杂志创刊了。(图 37)这份全国唯一的邮刊，也是中国第一个官办邮刊，在当年似一枝关不住的出墙红杏，格外引人注目，成了集邮界的独生子。

图 37 《集邮》创刊号

《集邮》杂志创刊号原发行 25700 份，很快销售一空，又加印了 18000 份。第 2 期增加到 5 万份。以后每期保持在 4 万份左右。发行量之大是空前的。1956 年起，每期篇幅又由创刊的 20 页增加到 30 页。

但是，在 60 年代初，由于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集邮》杂志的页数和定价曾被迫多次变动，页数减少，纸质变差，发行量剧降。1960 年 7 月出版的第 67 期，印数为 24500 册，是其发行量历史最低点。更糟的是，此

期以后曾停刊一年，直到1961年7月才恢复出刊，页数也一度进一步减少。当年维持办刊的确不易，算上“文革”，《集邮》创办以后共停刊两次，一次是经济原因，一次是政治原因。

《集邮》杂志在宣传普及集邮知识，树立健康的集邮风气，介绍新中国及部分外国邮票等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也为中国集邮史保存了大批历史资料。它像一面镜子，既能反映集邮界的兴衰冷暖，也能反映国家各个时期的政治气候。

《集邮》第1期发表了题为《树立新的集邮风气》的发刊词。其中写道：“在人民民主国家里，集邮是一种正当的文化教育和娱乐活动。人们集邮，不是为了赚钱居奇，也不是把它当作少数人把玩的古董，更不是为了满足那些畸形的癖好，去搜求印刷上有错误和缺点的邮票为乐，或者只当做单纯的消遣。”“毛主席号召我们，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集邮活动也是这样，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丰富多彩的邮票，由于它的杰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常常使我们爱不释手。我们从这些邮票中可以吸取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宝贵经验和鼓舞力量；苏联人民广泛的集邮活动，是社会主义人民美好的高尚的文化生活的一方面。”

这一期还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反对邮票商攫取暴利》，内称：“现在一部分邮商把邮票作为投机的工具，高抬票价。”“对于国家改版发行的废邮票，不法邮商也拿来居奇投机。”编辑部的“编者按”同意读者的观点，提出“废品是不值得收集的”，还点名批评了上海绿光邮票社、汉口艺光邮票社“恶劣的骗取暴利的投机行为。”

在这一期刊登的12篇文章中，有6篇是介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邮票或集邮活动。

在捷克邮电部部长诺曼博士写的《邮票的使命》一文中谈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集邮的附带一个特征，无疑是企求不劳而获的利润和剥削，真正集邮者成为被剥削的对象。对他们说来，集邮不仅仅是一种聚集财富的方式。同样必须公开说明的，从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来看，集邮是一种文化活动，利润的因素是不容许存在的。”

苏联集邮局副局长米哈依尔·米尔金在《苏联集邮情况》一文中，强调："收集苏联邮票，人们通过这种美丽的邮票，可以明确地知道苏联人民所走过的伟大而勇敢的路程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和力量。"

50至60年代初期，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是兄弟般的同盟关系，与这些国家的邮品交换量大面广，非常活跃。我国收集外国邮票的集邮者几乎都收集了社会主义国家邮品。《集邮》杂志也以大量篇幅介绍这些国家的邮品和集邮活动。集邮界持续出现了"苏联东欧热"。

《集邮》做为新中国唯一的官方邮刊，它的权威性和号召力都是极大的。仅从《集邮》创刊号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一、当时把宣传收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邮票放在极重要的地位。该刊介绍的范围仅限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区发行的邮票（以后又增加清代邮票）。而民国（包括后来的台湾）和西方国家邮票则被视为反动邮票，集之就有立场、爱憎问题。从该刊的第二期开始进一步强调这种观点。

二、提出集邮活动不是为了收藏和消遣，而是为了接受教育和配合政治形势。

三、反对收集变体票和研究版式等，变体票被斥之为"废品"。反对邮社、邮商提价倒卖。

这实际上涉及到对集邮收集研究范围的认识问题。对收集变体票，集邮界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收集变体票之风盛行，使其价值岐异绝钜，给邮商提供了哄抬价格的牟利手段，使集邮由求知益智的目的走上追求怪异离奇的邪路。另一种认为，对变体票的收集及其版式、特征的研究，可以帮助挖掘邮政史和邮票史资料，培养集邮者的钻研精神和观察分析能力。正票人人都有，事事可知，变体票则存世稀少，踪迹难觅。这种"钻牛角尖"式的研究，正是集邮活动中最令人眼热心痒的"尖端"领域。在国际邮展和交流中，变体票占有极重要的位置，是集邮家们显示自己水平和实力的"高难动作"，

岂可等闲视之。

集邮需要普及也需要提高，多数集邮者和少数集邮家追求的目标不应该强求一律。不应在丰富多彩的邮票世界里划出禁区，规定这可以集，那不能集，限制的又窄又死。

1953年10月1日，人民邮电出版社成立。直到"文革"前，《集邮》杂志及集邮图书均由该社编辑出版。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至1960年，人民邮电出版社共出版集邮图书42种（其中邮票目录19种）。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宣传集邮知识的，如马然著《新中国的邮票》、孟宪义著《新的集邮活动》、楼祖诒著《中国邮驿史料》，还有《邮票集锦》（四集）、新中国邮票目录等。

一类是宣传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邮票知识的，如俞彪文著《邮票上的莫斯科》、奚丁乙著《丰富多采的匈牙利邮票》，以及《信和报纸的旅程》、《苏联邮票的故事》、《苏联邮票上的文学家》、《苏联邮票》和多种苏联邮票目录，此外还有东德、捷克、朝鲜、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越南等国的邮票目录，其中大部分是没有图案的小册子。

1958年，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外国邮票地名译文手册》，印数2800多册，在当时印量已不算小。该书内容包括1840年以来世界各国和地区邮票上的外文地名，并注明各自首次发行邮票年代、货币名称及地理位置。该手册对于中国收集研究外国邮票的集邮者来说，是一部难得的工具书。

《外国邮票地名译文手册》是安徽集邮家陈印白编译的。陈印白（安徽庐阳人，1920－1992），早年就学于杭州艺专，学习绘画，以后曾长期担任教师。集邮从30年代开始从未中断，即使抗战期间全部邮票及资料被日寇飞机炸毁，"文革"期间千余枚解放区邮票和万余枚外国邮票损失殆尽，他都矢志不移。

陈印白非常重视收集资料，对邮票进行深入研究，1950年开始发表大量的集邮研究文章。解放区邮票和外国邮票是他的收藏重点，

更是他的研究重点。笔耕不辍，屡有建树。仅1955—1957年，他即在《集邮》上发表了关于解放区邮票的文章10多篇。

《外国邮票地名译文手册》出版后，受到集邮界欢迎。1986年3月，经过修订改名为《世界邮票地名译名手册》出版。一部集邮工具书几十年多次修订再版，畅销不衰，在国内尚不多见。为了编写这本书，陈印白耗费了大量精力，曾精心制作了2000多张资料卡片，绘制了全部小语种外文的字形，历时3年业余时间始完成。无数经验证明，一部著作的深度和价值高低，与作者学识水平和付出的心血成正比。

50年代和60年代出版的集邮图书中，还有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朱翊新著《通信的故事》，上海儿童读物出版社出版的周小童著《怎样集邮》，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邵伦炘著《集邮趣味》，等。

第四节　普及的东风

建国以后几年的集邮实践，使国家有关部门对集邮活动的认识逐渐有了深刻变化。从社会各界到大量的文教单位，纷纷为集邮发展提供支持和方便，集邮文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有了较大提高。这些有利条件对促进集邮普及是极为重要的。

随着集邮公司的成立和《集邮》杂志的出版，全国的集邮活动总的趋势是逐步发展，不断普及。许多大中城市的学校、工厂成立了集邮小组。像上海市区的文化宫、俱乐部、青年宫、少年宫和市郊的文化馆大多都有集邮小组，经常举办讲座、邮展、交换等活动。各地的集邮门市部营业厅，都成了广大集邮者购买、交换邮品，交流邮识的场所，每逢节假日更是人满为患，热闹非常。

50年代中期，各地开展集邮活动比较活跃的，往往是大、中、小学。各种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的活动灿若繁星，不胜枚举。

1955年4月15日，陕西平利县三仁小学利用少先队的队日活动举行了一次邮票展览会，队员们参观以后，还举行了关于集邮的座谈会。这次有意义的队日，在天真的孩子们心中播下了热爱集邮的种

子。

1955 年 9 月，四川简阳第二中学初二班的一些少先队员，在大队辅导员和班主任的支持指导下组成了集邮小组。他们每周出一次集邮黑板报，还举办过小型邮展。

上海市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在 1955 年 7 月暑假举办的夏令营辅导活动中，开设了一项特别节目——集邮俱乐部，活动内容包括集邮讲解、邮票展览、互相欣赏各自收集的邮票等。此后，组织少年集邮成了少年宫经常性的活动，对培养孩子们热爱集邮，掌握正确的集邮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6 年 6 月 1 日，山东大学的校园里举办了一次“美术、邮票展览会”，吸引了全校师生前往参观。展览会还专门设立了邮票交换处，青岛邮局在会场设服务台出售纪念邮票，使集邮迷们欢欣鼓舞。

1956 年 5 月 13 日，北京大学集邮工作组和中国集邮公司联合在学校学生宿舍区举办邮票展览会，内容包括新中国邮票、解放区邮票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这次邮展，在北大校园掀起了集邮热潮，爱好集邮的师生日益增多。

与此同时，许多大、中学校结合俄语教学，还组织和鼓励学生们开展与社会主义国家青少年学生友好通信活动，其中有不少热爱集邮的异国集邮迷，广泛建立了交换邮票和书刊的集邮通信联系。例如，北京外贸学院的许多中国学生与苏联、东欧留学生经常互相交换和欣赏邮票，分别后仍保持通信联系。北京第四十一中学高二一班有 46 名同学，其中 44 人用俄文与苏联中学生通信交朋友。有几位爱集邮的同学与苏联小邮友互相寄邮票。广东湛江市第二中学的女初中生陈少桃，爱好俄语，参加了学校的“卓娅俄语小组”。这个以苏联卫国战争女英雄名字命名的学习小组活动内容很丰富，其中有与苏联索奇市第二中学的“刘胡兰中文小组”以及其他大中学校的学生邮友建立通信联系。陈少桃还与卓娅的母亲柳·德·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书信往来，亲如母女。虽然后来因中苏关系破裂，联系中断，但 20 多年来，她一直将来自苏联的 200 多枚实寄封精心收藏，即使十年浩

劫中，也毫不动摇。

1988 年 5 月，苏联《少先队员真理报》以《永志的纪念——中国来信》为题，发表了陈少桃用俄文写的一封信，立即在苏联集邮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4 个多月时间，她收到了几乎遍及全苏联的 1500 多位邮友的信件。她从中精选组成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实寄封》、《苏联海港城市实寄封》专集，被集邮界誉为“中苏邮谊大桥的架设者”。

全国各地青少年集邮活动的宣传和普及，凝结着无数辛勤园丁们的心血。他们结合青少年集邮的特点，循循善诱，寓教于乐。

江苏江阴顾头初中在举办邮展时，指导教师精心为每件邮品配上新颖别致的说明，引人入胜。例如，在一组中国清代邮票的展框上，标题是：“为什么有些老伯伯称邮票为‘龙头’？”在展出的实寄封旁边写着：“信封上的邮票曾引起过你的注意和兴趣吗？参观这次展览会以后希望你成为一个喜爱邮票的人。”如此生动的语言，自然对求知若渴的青少年能够诱之兴趣，启之灵机，何愁小邮迷不增？

上海市青年宫、《上海青年报》社和上海集邮分公司从 1956 年 12 月开始，在中苏友谊馆联合举办集邮晚会，每月一次，每次邀请 400 多名青少年集邮爱好者参加。活动内容先是邀请集邮家作有关集邮方法和邮票知识的专题报告，并进行现场指导。二是分成几个集邮交换室，大家互相进行交换活动。像这样边学边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晚会，无异于一所培养造就新一代集邮家的大学校。

集邮活动在全国城乡和部队的普及发展也比较迅速，各种形式的集邮小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

1955 年底，广东顺德县勒流区成立了“新风集邮小组”，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农村集邮组织。集邮小组 1958 年元旦曾举办了顺德县第一届集邮展览。

1956 年 7 月 15 日，广西南宁市集邮小组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市级集邮组织。当时南宁市有集邮者约 70 多人，参加小组成立会的 24 名代表中有干部、工人和学生。在市邮电局的领导下，小组还建

立了集邮交换站，每两周的一个星期日组织一次邮票交换或欣赏活动。他们还举办过一次较大型的集邮展览会。

1957 年 6 月 11 日，北京中国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俱乐部主办的邮票展览，吸引了医护人员、干部和住院休养员，参观者达 500 多人。中国集邮公司在现场设售票台，并出售美术明信片和《集邮》杂志。

1957 年是全国举办各类集邮展览较多的一年，且规模逐渐扩大。

下面再举几个例子：南昌市邮电局、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联合举办的全市性春节邮展，观众踊跃，展览期间还举办集邮讲座，由市邮电局副局长主讲。

铁道兵某部侦察连，在国庆节举行邮票展览，展出的新中国和苏联、东欧邮票，使广大官兵大开眼界，引来军营集邮热。

1957 年 10 月 13 日，成都市邮局和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联合举办全市性邮展。此次邮展不同反响之处在于，除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邮票外，还展出了“一部分解放前的邮票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邮票”。整个邮展共展出邮票 1300 余种，美术明信片 280 种，还有邮票印制过程的照片和各种集邮用品等。市邮局还刻制了一枚纪念戳。

1957 年 11 月 2 日至 7 日，为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40 周年，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苏联图片展览，其中还展出 546 套苏联邮票。展览会观众如潮，影响很大。朱德副主席、陈毅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出席开幕式并参观了展览。（图 38）

在此期间，北京俄语学院、厦门、重庆等地的一些学校，天津、贵阳、九江等地的邮局，漳州等地的中苏友协分别举办了苏联邮票展览，使全国收集苏联邮票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

自 50 年代中期开始，集邮能够在全国如此广泛地开展，是一系列的因素促成的。首先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青少年大多有了上学的机会，使集邮普及发展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物质条件。其次，新中国邮票具有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吸引广大

图 38　朱德、陈毅观看"苏联图片展览"展出的苏联邮票

群众爱好集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除了一天天在不断扩大的集邮队伍之外，更多的不集邮的人，往往也喜爱收集一些美丽的新中国邮票，把它们压在桌子玻璃板下或贴在日记本上。

50 年代后期，新中国邮票设计和印刷取得了极大的进步。1956 年 7 月 1 日邮电部邮票发行局成立。一批才华横溢的专业邮票设计家，既借鉴国际上先进的设计思想，又不断从中国传统艺术中吸取营养，使邮票设计达到了中国特色和现代风格比较完美的结合。

1959 年 9 月，由捷克援建的北京邮票厂建成投产，成为中国第一家现代化的邮票印刷厂。

从清朝一直到民国时期，中国邮票的图案多由外国人设计，并送到日本或英美去印刷。如今，中国拥有了第一流的设计家和邮票厂，使邮票的选题、设计、印刷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时期发行的"金鱼"、"菊花"、"唐三彩"、"丹顶鹤"、"黄山风景"等一大批精美邮票，令中外集邮者惊叹不已。1959 年，特 27"林业建设"邮票的第一枚"森林资源"被英国《集邮者年鉴》评为 1959 年度世界十大最佳邮票之一。

党和国家领导人很关心支持集邮活动。上海市少年宫是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亲手创办的。一次，她去少年宫视察，走过"集邮窗"时，听到介绍说孩子们对集邮很感兴趣，她就一直记在心里。1957 年 11

月，宋庆龄参加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特意从莫斯科给上海少年宫负责人用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封寄去了一些苏联邮票，并在附信中说："为了你可以给孩子们看到这些纪念邮票。"使少年宫的小集邮者们高兴万分。

1959年10月1日国庆之夜，集邮爱好者杨昭明乘毛泽东主席跳完舞休息的时候，拿着新买的邮票和笔墨走了过去，请毛主席在当天发行的整版国庆十周年"开国大典"纪念邮票上签名留念。毛泽东知道他喜爱集邮，就欣然挥笔写了"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几个大字，使之成为一件富有纪念意义的邮品。

这段时期，文化艺术界对集邮活动给於重视和支持。著名作家老舍在1959年第1期《集邮》上为集邮者题词："集邮长知识，嗜爱颇高尚，切莫去居奇，赚钱代欣赏。"(图39)言简意赅，别有风味。文学家郭沫若不仅常应邀为集邮者签名题字，还特意为《集邮》杂志题写了刊名，潇洒的书法为该刊增添了神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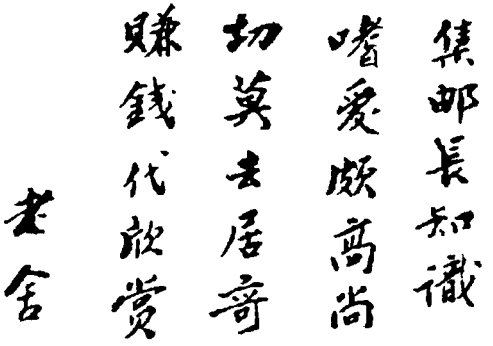


图39　老舍为集邮者题词

邵力子先生也爱好集邮，他特意在1957年第3期《集邮》上发表一篇题为《和家长们教师们谈集邮》的文章，极力倡导关心孩子们的这种有益的爱好。

50—60年代初，限于各方面的条件，广大集邮的青少年面临许多困难，影响这项活动在中小学中的普及。其一是当年很多家长和教

师对集邮的意义不理解，担心影响学习，不支持甚至禁止孩子们集邮。其二是出于家庭困难等原因，拿不出余钱给孩子买集邮册和邮票。再加上当年中国人均用邮量极少，没有大量的信件，孩子们收集信销邮票也就没有来源。

针对这些问题，《集邮》杂志和其他报刊都曾呼吁过学校和家庭要支持少年集邮活动。《集邮》上还专门介绍自己动手制作集邮册的方法。在那10几年中，绝大多数青少年集邮者几乎都自制过各式各样的集邮册，这也是一种邮乐。

1958—1959年，是全国集邮活动的鼎盛时期，各地组织的全市性大型活动很多。例如：

1958年8月1日，为配合总路线宣传，上海集邮公司与上海青年宫联合举办“中国革命的道路邮票展览会”。展品有解放区票、新中国票、实寄封、纪念戳、社会主义国家邮票。邮展的最后部分以毛泽东名言“东风压倒西风”结束，观众踊跃。

1959年2月8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为迎接国庆10周年，举办“中国革命邮票展览”。展品全部是馆藏的解放区邮票。这是我国首次大型区票展览，引起很大轰动。集邮家们更是反复观赏，认真笔记，大饱眼福。邮展原定半个月，因各界观众很多，又延长展期。

同期，包头市工会和邮电局联合举办“东风压倒西风邮票展览会”，历时20多天，观众超过5万人，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次邮展的主题，是通过邮票来证实毛主席对国际形势总的特点的分析：“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1959年9月6日，北京举办了“国庆10周年邮票展览”。展品分三部分：新中国邮票、解放区邮票、社会主义国家邮票，还展出了美术邮资信封、美术明信片、首日封等。

1959年11月，上海、广州、青岛市及一些地区的学校纷纷举办“社会主义国家邮票展览”或“中苏友好邮票展览”，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2周年。

从1952年底开始，民间性质的集邮刊物完全消失了。1959年8

月，一份油印的地方性小邮刊《邮友信箱》在无锡创刊。当时是作为无锡市崇安区工人俱乐部集邮小组的组刊《集邮通讯》第19期的副刊分发的，只刊登邮友的征让广告以及小组的启事等内容。1960年3月《集邮通讯》停刊，它也随同夭折。在集邮家孙君毅的努力下，同年9月，《邮友信箱》独立出刊，增加了内容和篇幅，至1965年10月"文革"前停刊，共出57期。该刊虽是手工油印，但由于稿件来自全国各地，许多著名集邮家也为它撰稿，内容丰富，誊印清晰，订户遍布全国，最高发行量每期达到900多份，是当时民间油印邮刊中的佼佼者。

1962年12月9日，贵阳市南明区文化馆集邮组成立，组长是郭润康，同时编辑《南明邮刊》，也由郭润康主编。集邮组组织了集邮讲座、邮票观摩和交换活动，还先后举办了"革命领袖"、"农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等邮展和"祖国风光"美术明信片展、火花展等活动。这些展览都在市中心举办，又不收门票，因此吸引了很多观众。

当时，国内成立类似集邮组织的城市还有常熟、昆明、哈尔滨等，各地均开展了一些活动。

从60年代初开始，受国内经济形势恶化的影响，全国的集邮活动逐渐转入低潮。然而，邮风南下，广东地区仍较活跃。60年代初，广州的一些大专院校都成立了集邮小组。1963年3月，"广州市工人文化宫职工集邮筹备小组"成立，选出常增书为组长。小组结合政治形势和新邮票的发行组织讲座、欣赏、讨论、交换等活动，到1966年，会员发展到200多人。先后出版油印会刊《集邮简讯》、《广州职工集邮》。同年10月1日小组正式成立，先后协助广州市集邮分公司主办了"辉煌的15年邮票展览"、"新中国邮票展览"、"光辉的16年邮票展览"。

集邮家常增书（河北平山人，1934年生），1949年随部队南下广州后转业，开始集邮。他的收集范围比较广泛，清代、民国、解放区邮票都较有水平，还藏有不少清代实寄封。另外，他还收集香港、澳门邮

票，并有《便士邮票》、《外国绘画艺术》等专题邮集。

常增书在集邮研究中重史料、肯钻研，颇有创见。他根据自己收藏的侨批局实寄封和单据，考证出广东潮汕地区侨批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他编组的《中国快信邮集》，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从1905年至1952年47年间中国邮政快信的沿革历史。他的《省、港、澳轮船邮局邮戳封集》，反映了中国20—40年代广东、香港、澳门轮船邮政发展的一个侧面，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常增书对集邮研究的体会是："集邮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考证，如对邮票版式、刷色、水印、齿孔、纸质、刷胶、暗记、发行时间、真伪等的考证。一种是研究邮票的内容和历史背景。这两种方法都叫研究。我主张重点研究邮票的内容和历史。""要把收藏、邮展、研究三者结合起来。集邮研究首先要有自己的邮集，这是研究的基础。邮集是集邮成果的结晶，邮展是集邮水平的检阅，集邮论文是对一部邮集的总结和深化。"（《集邮文选》第1集37页）

1980年，常增书又联络邮友，成立了广州市集邮协会，并分别被选为省、市集邮协会的会长。在全国集邮联"二大"会议上，常增书被选为全国集邮联副会长。

中国集邮公司广州分公司1963—1964年举办过两次"我最喜爱的集邮邮票"评选活动。1963年的评选收到选票4000多张，1964年的选票增至1.6万张。每次都各评出整套票3套、单枚票3枚，并刻制了评选纪念戳。这项活动影响很大。

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破裂，使全国集邮风向大转变，苏联等国邮票又不吃香了。再加上国家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人民的生活陷入极大困境，全国集邮人数急剧减少。全国好几年没有较大的集邮活动。1962年新发行的"梅兰芳舞台艺术"有齿、无齿邮票及一枚面值3元的小型张，除一些邮商、收入较高的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集邮者外，广大集邮者无力购买，而积压在集邮公司里。我听一位集邮家谈起过，当时邮电部门领导曾动员原工商企业家中的集邮者，多购买包括梅兰芳小型张在内的高值邮票。有些人为了支援国家

建设，慷慨解囊，几十盒地购买。由此可以想见当时集邮何等不景气。

1964 年 10 月，全国有十几个城市为庆祝建国 15 周年分别举行邮展等活动，但声势已大不如前。以后，邮展等活动鲜见。

1965 年 2 月 2 日，广州集邮分公司和广东省博物馆联合在广东省博物馆举办了一次邮展。限于这时的政治形势，邮展只能展出解放区邮票和新中国邮票。同时继续组织“1964 年我最喜爱的邮票”评选活动。

1965 年 10 月 1 日，广州市工人文化宫集邮小组举办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邮票展览”。这恐怕是“文革”之前国内最后的一次邮展活动。

第五节　一叶知秋

集邮活动作为社会文化，受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很大。建国以后，新诞生的人民政权受到国际敌对势力的封锁包围，使国家的外交往一边倒，反帝反蒋成为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同时，方针政策一再出现“左”的偏差，这些不利因素，都对集邮活动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这一点，从《集邮》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就可看出。

《集邮》杂志 1955 年创刊后，在第 2 期上发表了二封读者来信，一封题为《我不主张收集反动邮票》，文中谈到：

“集邮可以增进知识，但是我们不能没有立场，不分爱憎把旧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些反动邮票也作为收集的对象。因为这些邮票对我们有害无益。……这些反动邮票都含有思想毒素，我们不应该收集。”

另一封写道：“我不愿意收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邮票，尤其像‘美国开国一百五十年纪念’这一类的邮票，看了就使人痛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反动邮票，完全不能代表祖国人民的意志，绝对没有收集的必要。我们不是为集邮而集邮，必须注意邮票图案内容、发行意义等。”

1955 年下半年至 1957 年上半年，《集邮》上零星出现一些老集邮家的集邮文章，还少量介绍了一些西方国家邮票。从 1957 年第 2 期开展“一切邮票都有收集保存的价值吗？”专题讨论，编辑部逐步将意见向肯定的方向引导。

1956 年《集邮》11 期上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请老集邮家给我们写稿》。文中提出，老集邮家对中国邮政史、邮票掌故和鉴赏有独到的研究和见解，“希望老集邮家们响应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有什么写什么，使我们获得丰富的知识，提高集邮水平。”这种意见表达了广大集邮者（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共同心愿。发表这封信的目的也是编辑部的一种策略，投石问路，先造点舆论。

在此前一年多，《集邮》上除刊载过陈印白、居洽群介绍解放区邮票的文章外，基本见不到老集邮家们的踪迹。从这期开始，《集邮》开辟了《邮票研究》专栏，先后出现了郭润康、姜治方、史济宏、陈湘涛、张赓伯、唐无忌、陈复祥、赵善长、赵翔云等集邮家们的文章或报道。1956 年 10 月，唐无忌还向《集邮》编辑部惠赠珍贵的《邮乘》等书刊 10 本。《集邮》“邮”味变浓了。

接下来是反右派和大跃进运动，全国到处放高产“卫星”。《集邮》从 1958 年第 10 期开始，又展开“集邮者怎样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邮票”的专题讨论。连续一年发表大量文章，强调集邮“要政治挂帅”。（图 40）这时，老集邮家的文章逐渐从《集邮》上消失（许多人有研究文章也只能拿到无锡的油印《邮友信箱》上去发表。为渊驱鱼，这也是使那份小邮刊在国内集邮界名声大振的原因）。一度出现的介绍西方国家邮票的内容也绝迹。1958 年 12 期《集邮》上曾发表一封读者来信，对这种变化叫好：“由于《集邮》过去政治

图 40 《集邮》1960 年第 2 期发表的漫画

挂帅还不够，有意无意地传播了资本主义的毒素和刊登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邮票，使它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一些有害的影响。”把邀请老集邮家撰写介绍中国早期邮票和外国集邮活动的文章说成是“传播资本主义毒素”，介绍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成了“刊登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邮票”，罪名不小。此后，《集邮》仍然以宣传介绍新中国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为宗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60年代初全国掀起反帝反修、政治挂帅的高潮。曾经“爱不释手”的苏联等国邮票不吃香了，于是《集邮》只能介绍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等国邮票。而介绍一些西方国家发行的邮票，也是“从揭露殖民主义统治和资本主义世界的黑暗出发”(《集邮》1963年第12期本刊稿约)，弄得广大集邮者不知所措，年轻人更晕头转向。仅举一例就可一睹当时的“觉悟水平”：

一位收集音乐专题邮票的音乐学院学生，在1964年第12期《集邮》上登出检讨自己错误的文章《我的一个教训》。文中说：“音乐界提出了以无产阶级观点对待18、19世纪资产阶级音乐遗产时，我才醒悟过来。我打开自己的邮册一看，除了纪念‘国际歌’作者狄盖特的邮票外，其余全是纪念欧洲18、19世纪的各国音乐家的。像莫扎特、海顿、舒曼直到柴柯夫斯基等。回想起自己以前欣赏邮票时对这些资产阶级音乐家顶礼膜拜的错误态度，不禁感慨万端。”

编辑部为该文加的“编者按”进一步上纲：“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各种问题。当然，集邮也不例外。应当看到：我国的集邮风气是从资本主义国家传播过来的，打着资本主义的烙印。如果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观察集邮活动的各个方面，一定会发现许多新的问题。”此时，集邮活动已经和阶级斗争挂钩了。

《集邮》从1965年第3期开始，又连续开辟“怎样实现集邮革命化”专题讨论。发表的文章犹如声讨集邮的檄文，如：《这里就有阶级斗争》、《必须斗争》、《是作“反面教员”吗？》、《集邮是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第5期上一篇题为《关于“集邮家”》的文章中写道：

“原来，‘红印花专家’、‘万寿票专家’、‘近代票巨擘’之类‘专家’，就是专门买卖那一类邮票的大邮商。他们的研究，是为了某些‘罕品’、‘变体’作考据，以证明它的货真价实。他们的研究，很像一般商人鉴别自己的货色。所以，所谓‘邮学’云云，不过‘商品研究’的别名而已。”

《集邮》1965年第6期上发表的《所谓“变体”》一文，说有人肯出高价买变体邮票，是傻子。提出对这个问题要用阶级观点进行分析：“在旧社会，追求‘变体’的，都是那些有闲有钱阶级。他们吃饱了饭，无所事事，把集邮作为消磨时间的玩意儿。他们看惯了一般的邮票，觉得没啥稀奇，而对于其貌丑陋不堪的‘变体’，却觉得新奇好玩。这是一种没落阶级精神空虚，寻找刺激的结果。正如现在美国资产阶级欣赏驴子尾巴扫出来的画和举办砸钢琴音乐会之类的变态心理是一样的。”

针对当时的反常现状，集邮界深感痛心。1962年5月，集邮家孙君毅写了一篇题为《谈无书可读与无票可集》的文章，文中对《集邮》杂志有如下评论：“我觉得该刊内容，偏重于谈邮票的政治方面，忽略了其艺术性的一面。”（《虹口集邮》1989年总38期）这篇谈得中肯，讲得客气的文章，当年自然是不合时宜，无法发表。

我在这里丝毫没有指责当年《集邮》的编辑和作者的意思。我完全理解他们，那些应时之作并非都出自本愿。邵伦炘在《集邮》创刊时担任副主编，30年后，他在《忆〈集邮〉的幼年时代》一文中谈到：

“当时比较难办的问题有三。一是选题范围。那时人们的思想并不一致，不少人谈‘资’色变。经过1957、58年先后关于‘一切邮票都有收集保存的价值吗？’、‘集邮者怎样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邮票’为题目的讨论，从1958年第9期起又回到原来的规定上来（即以介绍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邮票为主要任务）。加以印刷纸张欠佳，月刊发行份数从此一蹶不振。

二是不少读者（包括苏联朋友）要求在杂志上刊登广告，交换邮票。当时的报刊没有一家是有广告的，怎么办？从1956年第7期起

开辟《集邮者信箱》栏。但到1959年第5期起,《集邮者信箱》从杂志上消失了。

三是集邮者要求成立全国性集邮协会。《集邮》也曾刊登读者来信,向各方鼓吹,但未获成功。"(《集邮》1985年1期)

集邮者和邮刊编辑都有苦衷,真是身不由己。1966年,全国突出政治的口号震耳欲聋,《集邮》上的文章随之升级,最后,《集邮》干脆几乎整本地转载"文化大革命"文件、社论、批判文章,并就此停刊。

朔风阵阵、暮霭沉沉,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正向中国集邮者袭来。

第八章　史无前例的浩劫

第一节　雪压冬云

1966年6月，一场来势凶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陆。一切传统文化的精华都被扣上“四旧”的罪名加以横扫，集邮也被作为“封、资、修的闲情逸致”遭到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说了一句“集邮是搞特务活动”，更使一些集邮家变成了“阶级敌人”，被抄家、揪斗，邮品、资料被抢走、烧毁，无数国邮瑰宝化为灰烬。

集邮家居洽群回忆“文革”受迫害的情景时说：当时，我在西安工作。从洛阳传来一位集邮爱好者被揪斗后下落不明的消息，正为自己担忧。果然，不久我被编入“劳改队”，在监督下从事“劳动改造”。要我交待收集邮票的罪行并作深刻检查。我总觉得十分别扭。邮票是国家公开发行的，把它集藏起来，欣赏、研究，能算作“罪行”吗？我想最多只能说是“玩物丧志”、“不务正业”而已。按这样水平来进行检讨，在当时是极不够要求的。只得提高到个人主义的占有欲，根源于资产阶级世界观上进行“自我批判”。可是，集邮当时被认为是“特务活动”。三番两次将我的邮票、书籍、信件、照片、日记、笔记、收音机、电唱机、唱片等全部抄走。由于在反省过程中交代了把在解放区得到的大量邮票让售出去，一度又被定为“投机倒把分子”。（《陕西集邮》1989年9期）

党仁珊是一名酷爱集邮的地质专家，从学生时代起，就与国内各地及苏联的邮友广泛建立通讯交往。他还收集火花、烟标等。1967年6月，身居云南横断山脉地质队的党仁珊，被作为“美蒋、苏修双料特务嫌疑分子”关押起来。当他拒绝承认自己搞集邮是从事特务活动

时，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当造反派从他家抄出一本记有300余人的通讯录和大批信件时，又宣布“揪出了一个以集邮为掩护，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几百人的反革命集团”。一方面对他加紧野蛮批斗，一方面根据通讯录名单，向全国有关单位发函数百封，进行调查，收集“罪证”。在批斗中，无中生有，枉加罪名。甚至把党仁珊在通信中与邮友、花友使用的术语，如“4×1”(表示4枚1套)、“4+1”(表示4枚1套，加1枚大火花)等都说成是联络暗号。

就这样，革委会用了两年多时间，先后到全国12个省市30多个单位，对与党仁珊有联系的人及所在单位进行调查，使党的一批邮友遭受株连。

集邮家崔显堂(天津人，1906—1981年)，本名崔德贵，号显堂，是北京25中学(原育英中学)地理教师，早年在集邮界被称为“怪人”。他虽然收入微薄，但收藏成癖，范围很广。除了从上中学时开始集邮外，火花、钱币、烟标、名片等都收集。30年代开始收藏钱币，为了购买许多珍品，不惜变卖衣物。1957年开始收集火花，藏品达到几十万枚。1949年以前国内各邮票会他都参加了，由于广泛结交邮友，在国内集邮界是个活跃人物。

当年，他的邮品收藏十分可观，其中清代实寄封有不少珍罕品。特别是国内各种邮刊他收集得很全，一期不短，连各地邮票社的售品目录也都保存。此外，还收藏有许多相当难得的书报杂志，家中从地面直到房顶全都塞满了书报杂志。

崔显堂在集邮研究方面也很下功夫。他曾将自己几十年撰写发表的集邮、集币文章装订成三本剪贴册，取名《崔显堂集邮文存》、《崔显堂集币文存》。他真是一位正直博学、与世无争的辛勤园丁，祖国文化遗产的珍爱者。

“文革”开始后，中学教师也受到严重迫害。一群群红卫兵蹬着三轮车来揪斗崔显堂，并抄他的家，其中还有一段插曲。50年代，集邮家姜治方多次来崔显堂家拜访，二人过往甚密。1957年《人民画报》上发表了姜治方的文章《集邮四十年》，并刊登一幅姜治方和崔显堂

等三位邮友一起切磋邮识时的照片。抄家的红卫兵据此说他是“北京四大集邮家”,“罪该万死”,肆意进行侮辱。他的全部珍藏被席卷一空,藏书被烧掉大半。这位卓越的收藏名家,一生事业,无数心血,或不知下落,或化作烟尘,面对空室,凄凉万分。他晚年自称“重整邮集已不存奢望”。

集邮家林崧(福建仙游人,1905 年生)是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教授、天津医学会会长。1936 年,他刚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不久,随老师谢和平教授乘船去西欧留学。船每停泊一地,爱好集邮的谢教授总要上岸去购买邮票,受其影响林崧开始对集邮产生了兴趣,从此爱之成癖,成绩斐然。他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邮票集(华北)》邮集,1984 年 5 月荣获西班牙马德里国际邮展大银奖,成为中国私人展品获国际邮展大银奖的第一人。

林崧并且以邮票光进不出,从未售让过一枚而闻名。可是,邮品也同他一样,在“文革”中倍受摧残。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那时也不知红卫兵来了多少趟,凡是贴在册子里的邮票都被抄走了,整整拉走了一汽车邮票。30 枚梅兰芳小型张被红卫兵当着面撕毁了。幸好我把普 9 和普 5 装在一个信封里面。红卫兵也不懂邮票,检查时见普 9 是新币值可以贴信,便统统抄去。留下的却是珍贵的普 5。要不然我真该哭鼻子了。”(《集邮》1984 年 10 期)平生以邮品一枚不出自豪的集邮家,怎能想到“文革”中会“出”的那样干净,如今回味也只能以苦笑自慰了。

集邮家康福华(陕西人)是西北农学院教授,几十年无论躲避战乱或生活困难,集邮从未间断。特别是与几个国家邮友长期通信交换邮票,外国早期邮品很丰富。“文革”中全部邮品被造反派抄去并展览示众。他向作者讲述时,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幕仿佛就在眼前:

“那些人把我的十几个集邮册像搭被子一样挂在马路边的铁丝上。风一刮,本子里边的邮票掉到路边的水沟里。我被勒令挂着牌子站在旁边,只能狠心看着一枚枚心爱的邮票和树叶、污水一起流进下水道。后来,被抄走的邮票又和其它东西一起被封存在地下室。10 年

后退还给我时，邮册、邮票受潮发霉，许多邮票都不够套。像梅兰芳小型张和一些邮票受潮粘在本子上又被人撕下。简直不成样子了。我越看越心疼、越生气。放了几年不愿再看它们。学校几位集邮的老教师和我差不多，基本都损失完了。”

本世纪初开始，集邮者们从收废纸者手里购买抢救出了无数的邮票和实寄封，使之变废为宝。谁能想到，60年代中期，无数的邮品又变宝为废，像垃圾一样被人毁掉，实在是无情的历史讽刺。

“文革”使我国的邮票发行工作也同样遭到严重摧残。主管邮票审查工作的中央宣传部，被打成“阎王殿”；主管文艺工作的文化部，戴上了“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的大帽子；主管邮票发行和集邮工作的邮电部领导被揪斗。1968年12月19日，邮电部通信组召开了邮票工作会议，传达的领导指示中说：“今后集邮不搞了，集邮本身就是搞投机倒把、玩古董。在国际上，有人利用这点搞特务活动。”随后发出邮电部军管会通知，停办了集邮业务，撤消了中国集邮公司。

1968年正值“革命大批判”进入高潮，对“文革”前发行的邮票也批判得更见“水平”。例如：1960年，邮票发行局上报中央宣传部后，确定了“纪严特宽”（即纪念邮票的选题和发行要严格掌握，特种邮票可以适当放宽）的邮票发行方针，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但这时被作为“文艺黑线”的一条罪行——“邮票上的修正主义纲领”进行批判：“纪严”就是“反对革命路线占领邮票宣传阵地”；“特宽”则是“为封、资、修开绿灯”。

1971年，邮电部军管会在一份给国务院的请示中这样提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原邮电部曾印制了大量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封、资、修内容的邮票，在国内外发行，造成很不好的影响。”（《集邮研究》1989年4期）

“文革”期间，抄抢、烧毁集邮者的邮集时，不但民国、台湾及资本主义国家邮票统统成了“反动”邮票，而且连新中国自己17年中发行的大量邮票也成了“毒草”、“黑票”，归在打倒之列。

1968年，一个以批判建国17年邮票上的“封、资、修黑货”为主

要内容的邮票展览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公开展出。展出的方式是按邮票题材分类，正反对照，大量“文革”前的纪、特邮票被作为反面教材、批判对象押上了展框。当然集邮爱好者此时绝无雅兴来观看这种邮展，因此展厅门可罗雀，观众寥寥无几。

“文革”开始后，纪念和特种邮票的设计发行全部中止。直到1967年为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才开始发行后来被称为“文票”的新邮票。

“文革”年代越“左”越革命，以红为革命的象征，全国城乡处处可见红色的旗帜、标语、袖章、语录牌和“红宝书”，时尚人称“红海洋”。“文1”邮票设计自然要顺应这种时代潮流，整套邮票来了个赤里套金，一片红色。在世界邮票史上像这样纯粹是语录性质的大套邮票绝无仅有。当年，新华社在报道这套邮票的发行消息时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职权……不准毛泽东思想占领邮票阵地”，这套邮票是“冲破重重障碍”才终于发行的。

“文1”邮票还将沿用17年的邮票志号取消了。据当时下发的有关文件称：“今后各种邮票（包括纪念、特种、普通、航空等）改为统一编号。编号不再印在邮票下面。……编号印在邮票的大包封条上。”就这样，无编号邮票历时3年半，发行了19套，在新中国邮票上深深地打上了“文革”烙印。

接着又出现了怪事。1968年8月，发行了“毛主席去安源”邮票。发行这套邮票时，有关主管部门决定，“为了画面（指该枚邮票）不受污损，能保持完美，决定破例在贴用邮件时，不予盖销。另在邮件封面上空白处加盖收寄日戳。如有误盖，立即换贴……”这个决定创现代邮政史奇闻，一时搞得邮电局职工都小心翼翼，生怕一时疏忽盖出差错引来祸端。因而当年的“文票”信销票邮戳普遍只盖一角，品相极佳。当时那个凡贴有毛主席画像邮票的邮件邮戳不销票的决定，后经周恩来总理严厉批评才改正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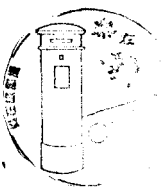
1968年11月25日，为庆祝全国各省市（除台湾省外）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邮电部原定发行1枚“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在邮票

发行前夕，有人指出邮票上地图画得不准确，邮电部军管会立即通知各地邮局取消发行，将邮票全部收回销毁。但是，动乱年代无章可循，有章不循，管理混乱，因个别邮局提前出售，致使少量邮票外流，使之成为“文革”邮票中最具神秘色彩的罕品。

“文革”之灾，集邮家遭殃，邮票设计家更难幸免，这场恶梦毁灭了他们的艺术追求。孙传哲对此极为痛心：

“十年浩劫给我国邮票事业亦带来严重的灾难，邮票设计领域取得的成就被否定，库存邮票被烧，邮票设计工作者被批斗（我当然是在被批斗之列）。形式主义、标语口号式的题材统治了邮票设计领域，古典历史题材被批为封、资、修的大毒草。可惜的是我设计的《梅兰芳舞台艺术》特种邮票全部原稿和效果图亦被焚烧殆尽。不久，又剥夺了我设计邮票的权利，被下放到长江边上的‘五七’干校。1971 年才因病返京。1978 年我重返邮坛，时年已六十有三。”（《集邮回忆录》290 页）

一个人一生有几个十年，一位正处于艺术创作高峰时期的设计家，宝贵的艺术生命就这样白白被浪费掉了。这同样是中国集邮事业不可挽回的损失。值得欣慰的是，凝聚其一生创作心血的《孙传哲邮票设计作品集》于 1991 年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个人邮票设计史料的专著。



第二节　冰下潜流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60 年代后期，处于“文革”暴风雨中的中国广大集邮爱好者，受各种压力的威胁，几乎无人敢动集邮的念头。那时，有名望的集邮家自身难保，谈“邮”色变；一般集邮者得过且过，无“邮”无虑。无数被束之高阁的邮票，能躲过那场浩劫早已是谢天谢地，谁还敢公开谈集邮，自找麻烦。所以，这一时期中国集邮界如同惊弓之鸟，人躲邮藏。曾经是数以万计的集邮大军竟消失得无影无踪；曾经是人声鼎沸的

集邮园地竟荒凉得无声无息。

70年代初，随着部分老干部恢复工作，有关领导试图为集邮活动正名。1971年6月，交通部邮政总局的负责人曾向国务院业务组成员粟裕汇报工作。当粟裕听到集邮业务已经停办时，严肃地指出：开办集邮业务，恢复出口邮票，可以扩大新中国在世界人民中的影响，人们可以从邮票中增加对新中国的了解，增进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同时又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办呢？粟裕最后明确表示应该恢复出口邮票和集邮业务。

于是，1972年7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邮票出口公司正式成立，负责经营中国邮票的出口业务。1972年9月2日，交通部邮政总局发行“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邮票时，中国邮票出口公司还专门制发了首日封，并刻制使用纪念邮戳。以后几年中该公司零零星星还发行过一些新邮票首日封和邮折，神州大地似乎又绽出了邮花。

中国邮票出口公司的成立，主要是因为不少长期经营中国邮票的海外邮商纷纷要求我国重新开展邮票出口业务的结果，所以该公司最初的宗旨仅是提供邮票出口，不搞集邮业务。从1972年起出售有集邮性质的新票盖销票，其目的仍在于为了扩大出口邮票的品种和数量。

但国外邮商很快就提出要求购买中国新发行邮票的首日封。中国邮票出口公司遂使用国际公文普通信封，贴上邮票，盖上首日邮政日戳，只当是向外商出售盖销票。这些集邮品全是为外国人准备的。那时中国邮票出口公司仅在北京、广州等地设门市部营业，全都只接待外宾。1972年10月15日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在广州第32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上举办了新中国邮票展销，与32个国家和地区恢复了邮票经营业务。此后，历届“广交会”上该公司都举办这类展销活动。每一届出口的新中国邮票均以千万枚计。但是，在国内恢复集邮业务的意见，当时根本不可能被“中央文革”批准。

集邮家常增书对那令人难熬的岁月不能忘怀。1976年，他在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看到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展销中国邮票，像遇见

久别的亲人，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在展台前转悠了半天，舍不得离开。

我国集邮出口业务的恢复，给我国集邮者带来了恢复国内集邮活动的希望。

70年代，一些邮瘾难耐的国内集邮者，不顾高压，不怕挫折，暗地里恢复了收集邮品活动。这时的"地下集邮者"有几个特点：一是人数很少，分散活动，互相极少集邮往来，主要是怕传出去惹来是非。二是以收集"文革"时期发行的新旧邮票为主，采取见什么买什么，有什么算什么的办法收集。因为根本就没有新邮票发行的详细资料，许多邮票几枚一套，何时发行的都搞不清楚，更谈不上什么研究。各地邮局出售寄信邮票时既不发通知，也不论成套，想收集的人也不敢公开讲自己是为集邮来买新邮票。三是极个别嗜邮成癖者，千方百计搜寻有关材料，想恢复研究，有些油印或手抄的集邮资料应运而生，并在各地秘密流传。

集邮家朱祖威为了获取集邮资料，费了不少脑筋。他打听到北京国际书店仍与日本邮趣协会互换刊物，存有新出版的日本《邮趣》等杂志。但当时规定这类刊物既不准进口，书店的也不许外借。他便托朋友暗中偷拿出连夜誊抄，第二天归还。经过几年努力，他抄了5大本集邮资料，其中包括"文革"期间中国发行邮票情况。

1972年，一本油印的32开竖式《邮票目录(1967－1972)》开始在国内一些集邮者手中暗地流传。这本17页的小目录，朴实无华，上面没有注编者单位姓名。它是第一本"文革"邮票目录，其诞生有一番不平凡的经历。

韦殿才(辽宁西丰人，1921年生)和居洽群是60年代初来西安铁路局工作的老同事，但这两位同在一院办公的老集邮者竟不知道彼此都爱好集邮。"文革"初期，韦殿才收藏近30年的大量民国、伪满及日本邮票都被付之一炬。心痛之余，他从大字报上看到，批判居洽群集邮是搞特务活动，才知道居洽群和自己一样爱好集邮。不久，两人都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闲暇便互相交谈起集邮的话题，全然不

顾“形势”，竟都犯了“邮瘾”。

1970年开始，他们一边收集邮票，一边收集资料，准备编一本邮票目录。邮票采取见了就买的办法，虽然难找齐（尤其是高面值普票），但总还是多跑几家邮局，花钱能办到的事。邮票资料可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为此，他们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居洽群常去邮局打听新邮票发行情况，查出了一些邮票的发行日期和有关资料。他还与一些原来熟悉的邮友恢复了集邮通信，又多了一条收集资料的渠道。韦殿才用了几年时间，把从报纸、外文杂志上剪下来的邮票资料，经过整理，贴成一册，视若珍宝。

大河集下千溪水，蜜蜂采回万山花。邮票和资料有了一定的积累后，两人即着手编写目录。有一些邮票的名称和发行日期未搞清楚，就空出几个字，以备读者自己随时填入。有的还感到不准确，就在后面加上个问号，提醒注意。目录虽简陋，但项目齐全，一一注明枚数、票幅、印版、齿孔、全张枚数、刷色等。1972年，由韦殿才刻印，《邮票目录（1967—1972年）》终于诞生了。随后，两人又继续找资料核对补充，1973年，由居洽群买纸，韦殿才刻印，又印出了《邮票目录（1967—1972年）》的再版修订本。仍为32开竖式，17页。这两本目录各印20—30本。

第二本目录印出后，两人分别赠送给省内外的邮友，又从各地反馈回来很多补充修改资料。1975年，由无锡的万祚新刻腊纸，印出了200多本第三版的目录。仍为32开竖式，但页数增加到21页，邮票内容扩大到1973年。目录封面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 1975年编印”，第一页还印有一段说明文字：

“我们根据现有资料及同志们意见编成此目录，可能不准确，希指正。

发行日期均以北京为准，上海不同于北京日期的另加注明，其他各地可能有迟延，则不一一注出。

参考资料：新华社电讯消息，英文、俄文《中国建设》，日文《人民中国》。”

由于印量较前增多，第三版目录向外发送和流传的范围比较广泛。有趣的是，这本目录上同样没注明作者或单位，因此说明中的“我们”是谁，当年也只有知内情者明白了。

1973 年 12 月，成都汤德铨也编印过一本油印邮票目录，有 70 多页，范围包括 1966 年 6 月至 1973 年 12 月的邮票，还有邮资封片等。以后又编印了续篇，在说明中提到参考了“西安目录”。

当年，各地集邮者不公开的集邮活动已经波及不少城市。不少嗜邮如命的集邮者，“你批你的，我集我的”，真可谓中国集邮史上值得大树一笔的“地下游击队”。

乱世邮谊贵诚真。一枚邮票，体现出邮友间纯洁的情意；一本目录，又联接着多少颗曾被摧残的爱心啊！

第三节　历史的沉思

集邮是一项社会文化活动，虽然已风行世界 140 多年，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的发展历史还很短。由于邮票题材广泛，价格较低，容易收藏，因而吸引面广，老少咸宜，一般群众有能力收集。加上已有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集邮界成果和经验的积累，对于经济文化相对都比较落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邮完全应该，也完全可能发展成为一项蓬勃兴旺、大众化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但是，它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程。从 1949 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的集邮活动大体可分成两个阶段，经历了两个大起大落，截然相反的历史时期。

一、50—60 年代中期。主要特征是愈来愈多的普通劳动者加入了集邮者行列，特别是城市青少年学生参加者众多。使集邮活动群众性的普及取得一定成绩。但这一时期存在许多隐患，殃及邮人。

50 年代初，在全国解散全部集邮组织、停办各种邮刊，1956 年又停止各地邮社邮商营业，使我国的集邮活动失去了原有的活力。虽然 1955 年出现了国营集邮公司和《集邮》杂志，但是全国的集邮活动仍处于低潮。

二、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后期的“文革”时期。是中国集邮事业全面停滞、倒退的灾难时期，从邮品到集邮人才，都遭受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但恰恰在这段时期里，世界集邮水平有了飞速发展，突破了传统模式，向多层次、多方位、多类别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新观念、新方法、新规范。中国集邮界与40年代末曾经接近的世界集邮水平，进一步拉大了差距，至少落后20年。

关于中国集邮发展史中“文革”时期集邮活动处于什么样的状况，目前的评论尚不完全一致。存在着集邮“空白”说和“非空白”说两种观点。1988年第3期《集邮研究》杂志上曾刊登了两篇较有代表性的文章。

田健行的文章认为：“十年浩劫期间，集邮受到严重摧残是事实，但集邮并非一片空白。不仅集邮者不是一片空白，连官方也不是一片空白。”并举出一些事例，如1967－1968年的“中国人民邮票服务部”；天津在几个门市部出售明显是供应集邮者需求的1970－1976年成套邮票；1967年底在邮电部内部办过一次邮展；文革期间，还有民间邮刊、民间目录流传。

赵珩的文章认为：“‘文革’十年，社会是畸形的，人的心理状态也是畸形的。在这段历史时期中，集邮领域被视为禁地，没有集邮组织，没有公开的集邮展览，没有集邮的流通渠道，更没有任何学术研究，无数珍邮毁于一旦，著名邮人难免一死，以至于青少年不知集邮为何物。”

综观50－70年代后期中国的集邮活动，国家对集邮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总的方面看，既有关心支持，又有政策失误，造成全国总的发展趋势是：在普及方面出现过高潮，在高层次则一直处于低潮。由于始终没有把集邮活动上升为国家组织领导的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没有对集邮的社会文化价值进行认真深刻的研究和宣传，结果，使集邮活动的普及和提高都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发展，最终导致“文革”中从理论到行动上对集邮的性质和意义进行全面的歪曲和否定，甚至划入敌特活动。这场浩劫后果极其严重：使中国整个集邮活

动全面停滞，青黄不接，恢复极难。

第九章　集邮史的新篇章

第一节　空前的集邮热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垮台，“文化大革命”像一场恶梦结束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通过拨乱反正，国家振兴有望。被摧残的邮苑，积重难返，经过2年多的时间，才逐步开始复苏，渐渐有了转机。

1978年1月27日，《光明日报》在“文物考古”专栏里发表了邮票发行局资料室的一篇文章《湘赣边区的邮政》，余音在弦外。同年4月26日，《体育报》的“国际体育之窗”副刊刊登了王扬写的《世界各国体育邮票简介》，文中并附有邮票图案10多幅。这些10多年未见报端的有关邮政和邮票研究宣传方面的文章，在有心的集邮读者中产生了共鸣，他们相信全面恢复集邮活动的春天为期不远了。

1978年1月，邮电部向国务院递交报告，提出由于“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目前我国发行的邮票题材单调，品种过少，数量不足，质量不高，不利于扩大邮票出口。特别是国内集邮业务还没有恢复，不利于通过邮票向国内外人民宣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为此提出建议：

一、扩大邮票题材范围，提高邮票设计质量。认真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做到邮票的题材、体裁、风格多样化。

二、进一步扩大邮票出口。

三、鉴于集邮是一种正常的文化活动，拟恢复在国内开办集邮业

务，恢复《集邮》杂志，在国内外发行。

这个报告很快得到了国务院批准，紧接着逐步恢复国内集邮活动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接踵而来。

1978年7月1日，邮电部决定恢复国内的集邮业务，将中国邮票出口公司改名为中国邮票公司。设在北京东安门大街的原集邮公司国内营业部正式开业，又重新向广大中国集邮者敞开了大门。这项决定，标志着中国集邮活动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长期压在集邮者身上的精神枷锁终于被打碎。这是多少集邮者久久盼望的一天。这个喜讯使全国的集邮爱好者受到很大鼓舞。

在此期间，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平反冤假错案使大批集邮者精神获得解放，多数老集邮家被抄走的邮品部分得到归还。由于创伤太深，心有余悸，他们恢复集邮活动一般都比较晚。

在没有集邮文化的年代里长大的青少年，一接触到集邮，如梦初醒，方知"四旧"竟然是国宝，"毒草"原来是香花，纷纷加入集邮者的队伍。针对大量年轻集邮者缺乏邮识，"只知有汉，何论魏晋"，普及宣传各种集邮知识成了当务之急。在没有集邮书刊的情况，各地集邮者想方设法利用各种宣传阵地。

1978年8月，峨眉电影制片厂摄制了科教片《中国邮票》。10月，《光明日报》先后刊登新华社记者写的通讯《布拉格世界邮票展览》和沙子芬写的文章《漫话邮票》。11月，《人民日报》出版的《战地》增刊第2期登载刘肇宁的文章《我国第一套邮票发行一百周年》。12月，吉林出版的《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又刊登刘肇宁的文章《有毛主席光辉形象的解放区邮票》。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送来了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中国集邮事业从此也翻开了历史性的一页。

1979年1月，为了对邮票的设计、印刷、发行、出口等工作加强领导，统一管理，邮电部决定将邮票发行局、中国邮票公司和北京邮票厂合并成立"中国邮票总公司"，作为邮电部直属单位。其主要任务

是：保证通信邮票的供应，抓好国内集邮业务，管好邮票出口工作。总公司陆续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许多的分公司和集邮门市部。像这样的综合国营机构，在世界上还是第一家，它对推动我国集邮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85年，邮电部根据政企分开的原则，将邮票发行局与邮票总公司分开，邮票发行局负责邮票的选题、设计、印刷、发行工作，中国邮票总公司则改名为“中国集邮总公司”，负责国内外集邮业务的经营管理；明确提出集邮工作的宗旨是“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尽力满足广大集邮爱好者需要的前提下，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资金。”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思想认识的大解放。经过建国30多年曲折反复的教训，终于认识到开展集邮活动的意义是传播精神文明和为国家积累资金，从而使中国的集邮事业真正走上了蓬勃发展的大道。

中国集邮总公司从1985年4月8日发行“中瑞首航纪念封”开始，发行系列编号纪念封。这种专为国内外某一重要事件或重大活动而发行的纪念封，已成为集邮者喜爱的一种收集专题。

70年代末，如同严寒乍尽的早春，恢复集邮仍十分缓慢，为数不多的活动显得格外引人瞩目。1979年2月16日，邮电部在湖南大学隆重举行授奖仪式，嘉奖集邮家姜治方捐献全部邮票和邮史文物的爱国行动，特向姜治方颁发了奖状、《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全集二册和人民币5千元。这是“文革”后国家首次为集邮家召开的颁奖会，在集邮爱好者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79年5月1日，江苏常州曹源福和上海屠松鉴在常州东风区文化馆举办《中日邮票展览》，展期15天，并刻制了邮展纪念戳。这是“文革”后国内首次举办的邮展活动。

1979年8月，“北京鼓楼集邮研究会”成立，这是北京，也是全国第一个地方集邮组织。朱祖威、成志伟等是发起人。1980年，“广州市集邮协会”、“无锡市集邮研究会”相继成立。同年广州邮协主办的《集邮家》报创刊，是全国创办最早的集邮报纸。

图 41　复刊的《集邮》

1980 年 1 月，《集邮》杂志停刊 14 年后复刊。（图 41）不到半年时间，其发行量已达到 20 多万份，以后达 35 万份，一直居世界集邮报刊首位。复刊后的《集邮》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它从纵横多方向、全方位地介绍国内及世界各国的邮票和集邮活动，涉猎广泛，题材新颖，内容兼顾不同层次集邮者的需要。近年又不断增多了邮史资料的挖掘研究文章，大量介绍国际最新的集邮方法和规则，深受国内外集邮界欢迎，多次在国际邮（刊）展上获奖。

《集邮》复刊后仍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1982 年 1 月，成为全国集邮联会刊。

1980 年 3 月，《集邮》杂志总第 127 期刊登了举办建国 30 年最佳中国邮票评选活动的评选办法和选票。从 3 月下旬至 4 月底，编辑部共收到来自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的选票 5.7 万多张。港澳同胞和日、美、英、西德、荷兰、印尼、马来西亚、坦桑尼亚等国的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和外国集邮者也寄来了 369 张选票。这期间，编辑部还收到群众来信 7600 多封，其中有的介绍自己的集邮情况、评论邮票，有的反映订不到《集邮》杂志的急切心情，有的还倾诉自己在“文革”中因集邮而受到的人身迫害和邮品损失。他们对集邮事业的恢复，都表达了发自内心的喜悦，对评选活动，满腔热情地支持。

经过群众投票，评选出了最佳纪、特邮票各 14 套、最佳普票 2 套。授奖大会于 7 月 1 日隆重举行。宋庆龄副委员长特为这次邮票评选题词：“发展集邮，丰富文化生活，传播友谊。”（图 42）这次邮票评选活动取得了成功，对提高我国邮票艺术水平和扩大集邮在群众中的影响促进很大，成为全国形成集邮热潮的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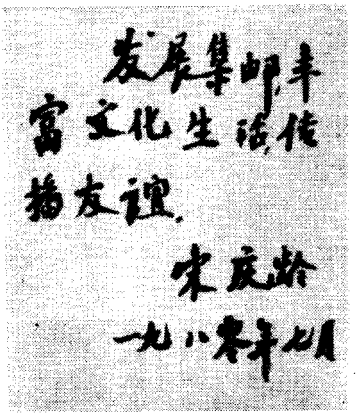


图 42　宋庆龄为邮票评选的题词

从 1981 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最佳邮票评选，评选范围是上一年度新发行的邮票。由于种种的原因和理由，历年最佳邮票评选的方法（如：纪、特邮票是否分开评选，是否有顺序要求，评选的套数等）变动频繁。评选的组织者也在扩大，例如 1989 年的评选活动，由人民邮电出版社、邮票发行局、集邮总公司、全国集邮联、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人民邮电报等联合主办，北京邮票厂协办，选票分为《集邮》杂志夹发和邮局零售两种。

吸引广大集邮爱好者踊跃参加评选投票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向投票选中者赠送评选纪念张。这种纪念张已成为深受集邮者宠爱的收藏品。首次评选活动以“齐白石作品选”小型张加盖评选纪念戳作为纪念张。1981 年后，每年选用名画家的评选年生肖绘画制作纪念张。

一年一度的全国最佳邮票评选，受到国内外集邮者的热烈欢迎，收到选票每年均在 30 万张左右，1984 年投票数达到最高峰，近 54 万张。它已成为与评选电影“百花奖”、体育“十佳”齐名的中国三大群众评选活动之一。每年的最佳邮票颁奖会如同集邮界的节日，长盛不衰。

1980年，是全国恢复和发展集邮活动关键的一年。《集邮》杂志复刊，并成功地举办最佳邮票评选，如同吹响了集邮者整装待发的号角。北京、广州等集邮组织的成立，为全国集邮者解放思想带了好头。随之，全国各省、地、市、县及基层的集邮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集邮人数倍增。广州、上海、邯郸、长春、厦门等地举办的形式多样的邮票展览，以及北京、广州举办的集邮讲座，都起到了广泛宣传、组织骨干，为今后发展做准备的奠基作用。有了从首都到各地的宣传和动员，中国集邮活动又恢复了勃勃生机，无论从规模和实力都超过了“文革”以前。在北京举办的一次大规模邮展，把集邮发展的进程又推向了高潮。

1980年3月23日至4月6日，中国邮票总公司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次“中国邮票展览”。这个展览内容丰富，几乎包括了中国邮票发展史的各个阶段，其中有新中国邮票1600多种，解放区邮票1500多种，清代邮票100多种。此外还展出了从设计、印制到使用过程中的许多有重要研究价值的邮品实物和邮政文物：几十幅特种邮票原图、原画、木刻原版；土地革命时期朱德军长、毛泽东政委签署的“保护邮局、照常转递”手令；清代上海海关费拉尔设计的大量图稿和邮票印样；清代邮驿用的封套、排单、将军火票及民信局信封等。

这次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邮展，也是中国集邮史上第一次包括如此丰富的内容和珍罕的邮品的邮展。展览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赞扬。

国运昌，百业兴。短短几年，饱经风霜的中国邮坛已是人才济济，春色满园，万紫千红的花蕾开始结出丰硕的果实。

1982年1月，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在北京成立，它标志着中国集邮活动开始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事业。中国集邮活动的发展，有了更宏伟的战略目标和有力的政策措施，有了可靠的组织和资金保证。这是中国集邮史上划时代的变化。

1982年12月，由上海市邮电管理局邮政处会同上海市邮票公司在上海举办了我国首届“邮票和集邮知识干训班”。参加这次集邮

干训班的有中国邮票总公司，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山东、广东省邮票公司、邮政局的经理、副经理和业务人员。分别邀请集邮家马任全、史济宏、刘广实、邵林、俞鲁三、王松麟、唐无忌、乐锦祥讲授了旧中国邮票、解放区邮票、新中国邮票、世界邮票、封片、邮戳和集邮基础知识等。

“主帅无谋，累死三军”。要加速集邮发展，改善和提高集邮品供应服务质量，没有精通业务，理解集邮的“火车头”带领，难见实效。召集集邮界的两支精兵强将互相交流，培养人才，这真是有远见的一着高棋。

时盛不如人盛。从1979年起，中国集邮活动开始出现令人鼓舞的新局面：全国集邮者人数成倍增长，各种集邮活动蓬勃兴起，各级集邮组织遍布全国，集邮品的发行持续猛增。80年代是中国集邮发展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全国性的集邮热。

全国集邮人数逐年上升。1980年，大陆集邮爱好者约10多万人，在册会员1万多人。到1989年，集邮爱好者已有700多万人，在册会员已达77万人。全国地市级集邮协会已有322个，占地市总数的95%；县级协会已有1139个，占全国县(市)的51%；厂矿、机关团体、学校、村镇成立的基层集邮组织达到7000多个。十年巨变，发展速度惊人。

集邮在中国城镇中的普及程度已很可观，在许多农村地区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例如：

山东菏泽地区集邮协会1984年5月成立，到1986年，在册会员已有6100多人(这个人数已超过旧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集邮组织的会员人数)。他们为了扩大集邮在群众中的影响，利用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大造舆论，先后采用了办黑板报、广告、广播、放映电影、幻灯等手段，宣传集邮的目的意义，宣传集邮信息和集邮知识。仅1984—1986年三年中，该协会就举办了两届邮票交换周、15次各种类型邮展，而且有的邮展还进行全区巡回展览，方便广大农民群众观赏，参观人数合计达4万多人。

福建永春县集邮协会的会员中，农村会员占 42%，青少年会员占 41%，农村中热爱集邮的人越来越多。1986 年，永寿县集邮协会举办了县首届集邮展览，当这个消息由县广播站播送后，远近乡村的集邮迷们纷纷冒雨前来参观，展期 4 天里观众达 3 千多人。

江西省各级邮协 1988 年共举办各种类型邮展 220 次，观众达 18 万人。10 月 1 日在南昌开幕的“江西省首届农民集邮展览”，先后到 10 个地市巡回展出，历时 64 天，观众达 3 万多人次。

集邮热潮对邮票设计发行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面对千千万万的集邮者如饥似渴的需求，邮政部门既要设计出更多姿多彩、引人入胜的邮票佳作，又要能方便及时地将各种新邮品送到遍布全国城乡的集邮者手中，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为了解决集邮热带来的种种新课题，在邮票的设计、发行工作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85 年 10 月，邮电部成立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这是邮电部为提高中国邮票设计水平采取的一项改革措施。第一届评委会由著名美术家、印刷出版家、集邮家和邮政官员共 15 人组成。其主要任务是评审邮票图稿，对提高邮票设计、印刷质量提出意见和建议，参与全国最佳邮票的评选工作。同时，邮票设计工作也采取专业人员和社会征稿相结合的办法，促进了设计水平的不断提高。

80 年代，中国邮票的选题更丰富多彩。原有的动植物、山水、文物、纪念节日等传统题材得到进一步拓展深化，新增添了一些新颖深刻的系列题材，如生肖、古典文学名著、中共革命家、当代科学家等。同时集邮品的新品种不断增加，新产生了磷光邮票、附捐邮票、附有编钟立体声音乐唱片的邮折、激光明信片和邮折、极限明信片、风景日戳等。

随之而来，我国邮品发行空前繁荣。各种集邮品的发行量一再猛增，仍不能满足广大集邮者的需要。例如：1980 年庚申年猴生肖票发行量 800 万枚；1985 年乙丑年牛生肖票发行量达到 1 亿枚；1990 年庚午年马生肖票发行量高达 1.3 亿枚。为缓解“购票难”问题，全国大多数地区不得不实行办理新票预订证的办法。上海还试行过在发行

生肖票首日，集邮者先买门票坐进体育场，再按顺序购买新发行的邮票。其热烈壮观场面，可想而知。

1990年，全国办理新邮票预订户达到496万户，比1987年增长近2倍。使预订邮票的数量达到704万套。1990年，全国集邮业务总收入达到3.5亿元，比1987年增长了近1.5倍。尽管近几年几度出现暂时的邮市销售疲软现象，但集邮品总的发展趋势仍是供不应求。

全国各地区发行各种纪念邮品、刻制各种纪念戳也空前活跃。面对全国掀起的“纪念张热”(1983—1984年)、“纪念封热”(1985—1986年)、“极限片热”(1987年)、“龙年邮品热”(1988年)、“原地封热”(1989年)，还有“外展封热”、“风景戳热”、“邮刊邮报收藏热”、“邮政附加费凭证热”等，集邮者们褒贬不一，有喜有忧。喜则海阔天高，可富邮藏；忧则封山片海，泥沙俱下，集不胜集。

第二节　全国邮联与邮展

80年代中国集邮活动发展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党和政府对集邮组织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使集邮社会活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82年1月30日，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集邮史上第一个全国统一的集邮组织，几代集邮家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使全国的集邮爱好者无不感到欢欣鼓舞。

1982年8月25日至29日，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听取并通过了邮电部副部长成安玉《发展集邮，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章程》。章程规定：“本会宗旨是团结全国集邮爱好者、集邮学研究者，发展和繁荣中国的集邮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增加与世界各国集邮组织之间的友好合作。”

大会选举产生了全国集邮联第一届领导机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朱学范担任名誉会长，会长成安玉，副会长宋兴民、马任全、张包子俊，秘书长李洪义。

全国集邮联挂靠在邮电部，从而使集邮活动纳入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的轨道，保证了全国和各地的集邮组织得到邮电部和地方邮电部门从人、财、物等方面给予的必要支持。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集邮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反映出集邮活动的社会影响和地位空前提高，在中国集邮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全国集邮联的主要任务包括：制定集邮工作的方针、政策、任务；指导各地及行业集邮协会工作；宣传集邮的意义、目的；举办全国性邮展等活动；组织学术研究；培训集邮骨干；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编辑出版会刊和其它集邮读物；开展国际交流等。1982 年 11 月和 1983 年 11 月，《集邮通讯》、《集邮研究》先后创刊。

1986 年 10 月 17 日至 21 日，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我国集邮事业大发展的形势下，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胜利闭幕不久召开的。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总结四年来的工作；交流经验；拟定今后工作方针任务；修改全国集邮联章程；选举第二届理事会。邮电部部长杨泰芳在大会上讲话时，谈到了全国集邮联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我国集邮事业蓬勃发展的好形势。到 1985 年底，全国在册会员从 1980 年的 1 万多人发展到 25 万人，集邮爱好者从十几万人增加到 500 多万人，其中青少年占 70%左右。我国已形成一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老中青结合的、宏大的集邮队伍。各级集邮组织不断发展、健全。到 1986 年 10 月，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半数以上的地市、五分之一以上的县都成立了集邮协会；城乡基层集邮组织有 2700 多个；还成立了全国行业性的集邮组织。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全国集邮联第二届领导机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担任名誉会长，成安玉任顾问，朱高峰任会长，许宇唐、宋兴民、马任全、张包子俊、常增书任副会长，贾明任秘书长。代表大会通过了《致台湾集邮界同仁书》，热切希望台湾集邮界同仁能为沟通海峡两岸集邮界的情谊、促进中国集邮事业的发展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

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全国集邮联成立以来，举办了一系列规模宏大的集邮展览。

1983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与邮电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在北京举办“中华全国集邮展览”，这是中国集邮界第一次举办的全国性邮展。展出448部邮集，近900框，其中有53部少年级邮集。观众达到12万人次，盛况空前。

1985年10月13日至20日，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在北京举办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邮票展览”，这是我国首次举办全国性区票展览。展品来自国内和香港各阶层集邮家及团体。展出邮集145部、600框。邮展荟萃了整个革命战争时期的邮票。在官方级展品中，展出了相当数量的革命战争时期的珍贵邮政文物、史料。通过邮展，新发现了20余种解放区邮品和许多邮政史料。这是一次对我国收集研究区票水平的总调查、总检阅，意义深远。

1987年7月20日至29日，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了“中华全国青少年专题集邮展览”，这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全国性青少年邮展。本届邮展的宗旨是：促进青少年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为培养“四有”新一代接班人作出贡献。其主题为：理想、道德、文化、纪律。共有155名青少年集邮者的389框邮品参展。按参展者不同年龄分为A(12－14岁)、B(15－17岁)、C(18－22岁)、D(23－25岁)四个组别，分别评比。

在这次邮展上，首次实行了“百分制”的评比办法。按照“编排布局”、“知识体现”、“邮品质量”、“外观效果”四个项目，对四个组分别打分评审。最后，评出金奖7部，银奖25部，铜奖62部，获奖面占60%。这次邮展预示着中国集邮事业后继有人，大有希望。

1989年10月12日至21日，为庆祝建国40周年，在北京举办了“1989年中华全国集邮展览”。这次邮展共展出邮集204部，集邮书刊85种，总计1060个展框和20个展柜，规模空前。参展邮集中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杰作。

这次展览反映出我国集邮水平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在邮集分类方面，按照国际集邮联的规定，分为传统、专题、邮政史、邮政用品、极限、青少年和文献7大类；规定了每部展品必须达到一定的框数，以便能够充分开拓选题，形成完整的作品；邮集的编组基本上符合目前国际上各类集邮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传统和专题邮集类编排得当，质量较高。展出的邮集的外观达到工整、美观。

这次邮展在筹集经费方面有一个重大变化。过去举办全国性邮展的经费主要来源于邮电部拨款和邮票发行局、集邮总公司等单位资助。这次，邮电部邮票发行局决定参照国际上通常的做法，专门发行1枚特殊邮品（10元面值的小型张），将销售所得款项作为举办全国性邮展的经费。这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改革尝试。

这次邮展，在中国集邮展览历史上创造了一系列新纪录：

一、是我国首次举办的竞赛性的全国邮展。第一次在全国邮展中设立金、镀金、银、镀银、铜五等奖牌。10名集邮家成为全国竞赛类邮展的第一批金奖获得者。

二、国内首批国家级邮展评审员，第一次按照国际邮展规则对参展邮集进行评审。

三、邮集类别最多。其中除竞赛类展品分为7大类外，非竞赛类展品分为官方类、荣誉类、特邀类、国际邮展获奖展品、评审委员展品、新发现等6类。

四、台湾省集邮界第一次派出代表来京参观全国邮展。台湾集邮家周鹏明的《民信局》邮集，首次参加大陆举办的邮展。

这次邮展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许多领导为邮展题了词。李鹏的题词是："增长知识、寓教于乐。"薄一波的题词是："集万国邮票，识五洲朋友"。朱学范的题词是："团结奋斗、振兴中华"。刘澜涛、胡乔木、朱学范、钱伟长、程思远等领导出席了邮展开幕式。

全国集邮联成立后的10年中，结合中国国情，开展了一系列有利推动集邮普及和提高的工作，组织了许多重大的纪念、评奖、展览及对外交流活动，使中国集邮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开拓出一条

适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集邮发展道路。

1984年，邮电部、全国总工会和全国集邮联等7单位发出《关于加强集邮工作领导和管理的联合通知》，提出通过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依靠全社会的力量，促进集邮活动更快地发展。由于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全国集邮联在组织的许多重要活动中，都采取与社会各界联合主办的方法，取得积极的效果。工会组织把集邮列入职工文化生活和思想教育的工作计划中，共青团和文教部门把集邮列入德、智、体、美育教学的"第二课堂"。许多地方、部门、行业、团体、机关、学校的主要领导，经常积极参与集邮活动，并给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支持，不少领导应邀担任集邮协会会长、名誉会长。这种集邮依靠各界，各界关心集邮的生动局面，使中国集邮事业的发展有了可靠的社会基础。

在组织建设方面，全国集邮联提出并认真落实把各级集邮协会办成"集邮者之家"的活动，使全国千千万万的集邮组织成为关心、支持、指导集邮活动健康发展的中心。为了总结和交流各地的好经验，1987年11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集邮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各界代表1300人出席，其中先进集体50个，先进个人95名。这是中国集邮界首次群英会。通过经验报告会，使许多先进经验为更多的集邮组织借鉴。北京市西城区邮协，采取"分散下去，集中上来，轮流分担"的做法，在全区内做到月月有活动，次次有收获，受到集邮者的欢迎。湖南省常德市邮协，依靠会员集资和单位赞助筹款2万多元，建设一座"集邮活动中心"，为广大会员提供了进行集邮活动的场所。安徽省邮协同省总工会、共青团、文化厅发布联合通知，要求各地工人文化宫、文化馆(站、室)、剧场、公园、广场都为邮票交换免费提供场所，为基层邮协组织邮票交换创造了方便条件。

在推动集邮宣传普及方面，全国集邮联重点抓了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办好《集邮》、《集邮通讯》、《少年集邮》等刊物；二是抓青少年集邮活动的指导和扶植，树立了工作卓有成效的大庆市集邮协会等先进典型；三是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普及宣传活动，例如，1987年由全国

集邮联等7单位联合举办了“邮票上的科学文化知识竞赛”。这次规模很大的活动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书面预赛，共收到答卷10万多份。第二阶段为电视决赛，18名选手经过4场比赛，决出一等奖1名(辽宁的杨强)，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这是一次空前的集邮知识自学考试活动，收效极佳。四是鼓励集邮宣传报道。1989年全国集邮联与首都新闻出版界集邮联谊会联合举办了“全国最佳集邮宣传报道文章评选”活动。参加评选的有全国49家报社、18个省集邮协会的刊物及香港的一些报社，共推荐文章200多篇，评出一等奖4篇(周正谊的《台大举办新中国邮票展》等)，二等奖7篇，三等奖18篇。

在促进集邮水平提高方面，全国集邮联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步骤。1983年2月18日成立了全国集邮联学术委员会，先后召开了一系列学术讨论会，方向明确，重点突出，既出成果，又出人才。多年来，学术委员会还组织或推动各地调查、发掘、整理一些集邮文献史料，主编《集邮研究》，组织编写《中国解放区邮票史》。使全国的集邮研究活动形成热潮。同时，还抓紧各方面人才的培养，组织了一些讲座和报告会。1988年10月15日至29日，全国集邮联举办了第一期邮展评审员培训班，聘请了梁鸿贵、吴凤岗、俞鲁三授课，内容包括邮驿史、邮政史、邮票史、集邮史及各种集邮知识、国际、国内邮展评审规则等。30名参加培训学员在进行笔试、口试、评审实习的严格考核后，分别被评定为第一批正式的国家级和省级邮展评审员。

另外，还有一项对提高集邮水平有极重要意义的措施，就是1985年7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邮票博物馆。这是自台湾建立“邮政博物馆”之后，中国第二个大型专业邮票博物馆。该馆聚宝集珍，藏品总数在1亿件以上，包括七大部分：

一、1878年以来清代的中国邮票和档案资料；

二、1911年辛亥革命后，至1949年整个民国时期的邮票及档案；

三、1930—1949年各革命根据地及各个解放区发行的邮票；

四、新中国邮票及资料(包括原图稿、雕刻原版等);

五、一些集邮家和爱国人士捐献给国家的邮品;

六、世界各国发行的邮票;

七、各种集邮书刊和文物。

中国邮票博物馆的建立,使国家拥有了一座记载中国邮票和集邮全部发展历史的档案宝库,也为集邮界提供了一处保存、发掘、研究、宣传集邮珍贵文献史料的理想场所。

"邮史灿烂汇万象,方寸生辉论堂皇。"认真重视保护收藏集邮文献,并积极组织进行整理研究,这实在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后世的千秋大业。

第三节　百花齐放

80年代出现的全国性集邮热潮,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工农商学兵,几乎各行各业都有大量的集邮爱好者。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世界屋脊,海角天涯,神州大地到处都有集邮组织在活动。集邮文化在中国的飞速发展,其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

时势造英雄。集邮热潮中,成千上万的集邮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无数的动人事迹。灿若繁星的各级集邮组织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谱写出崭新的时代篇章。引人入胜的活动,新奇绝妙的构思,敢想敢干的气魄,使全国的集邮活动高潮迭起,不断推陈出新。

各地各级集邮组织还非常注意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普及与提高并举,交流与娱乐结合,使集邮活动越来越丰富多彩,充满地方特色。上海、北京、广东地区的集邮活动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上海市集邮协会1980年1月10日成立。当年春节,就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举办了"迎春邮展",展期20天,参观者达到4万人次,是上海集邮界规模空前的一次邮展活动。这次邮展对恢复集邮活动,唤醒沉睡多年的邮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上海逐渐又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集邮品流通和集邮研究基地之一。

上海市集邮协会工作的最大特点之一是重视集邮学术活动与普及宣传的紧密结合，从而使集邮研究人才辈出，成果显著，也使集邮活动波及面广、群众性强。10年来，上海市邮协组织的大型综合性集邮活动几乎年年不断，越搞越热烈，影响很大。

1981年7月1日，上海市邮协举办中国邮票展览，展品由上海30多位集邮家提供，包括商埠邮票、清代邮票、解放区和新中国邮票，及大量实寄封，这是上海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邮票展览。

1985年2月7日，上海市邮协和上海电视台、上海《劳动报》在市工人文化宫联合举办“上海市职工集邮知识大奖赛”，电视台进行了实况录相转播。报名参加大奖赛的有100多个基层单位组成的代表队。经过1个多月的紧张初赛和复赛，选出6个队参加决赛。举办这种规模的邮识大赛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1986年起，上海市集邮协会决定将市邮协成立纪念日(1月10日)定为上海市集邮活动日。在此期间，市邮协主办集邮学术研究和邮品交换活动。区、县、局和工、青、学各级集邮协会举办集邮演讲、邮品拍卖、邮识竞赛、邮展及文艺联欢会等。内容丰富多彩，不断推陈出新。

1988年1月8日至18日的上海市第三届集邮活动日，活动的时间、内容、范围均超过前两届，主要包括：

一、召开集邮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会；

二、由上海海运局举办“邮票与航海知识竞赛”；

三、举办乡镇集邮联展，推动乡镇集邮活动；

四、举办集邮讲演会；

五、举办集邮学术报告会。

集邮活动日在上海市区和郊区同时举行，使参加人数和影响范围逐年扩大。涌现出许多开展集邮活动不拘一格的先进单位。上海市海运局集邮协会，针对海员航行期间业余生活单调等情况，组织开展集邮活动。先后在一些大型客货轮船上成立集邮分会，举办“海上邮展”，赢得了海员们的称赞。该协会还专门为出海的会员定购新发

行的邮票，成了会员信赖的“集邮者之家”。

上海市第四届集邮日还举办过伴有集邮基本技能比赛的邮识竞赛。内容包括查《斯科特目录》和新中国邮票目录、量邮票齿度、票幅、制作贴片等，别开生面，富有情趣。几年来，集邮日活动已成为上海集邮界的盛大节日。

1988 年 10 月 20 日，由上海市邮协与上海电视台联合举办的“’88上海电视节集邮展览”隆重开幕，这是上海首次举办的大型国际性邮展。上海集邮界的 30 部邮集和来自日本、东德、西德、苏联、荷兰、比利时等 6 个国家 14 个县市（其中 7 个是上海的友好城市）的 24 部邮集共同展出。另外还有 3 部国际邮展获奖邮集参加观摩展出。历时 8 天的邮展，参观者近 2 万人次。邮展期间还举行了中外集邮学术交流和邮品拍卖活动。1988 年 12 月开始，《集邮》杂志和上海市仪表电讯局集邮协会还共同举办了“全国集邮摄影大赛”。

上海集邮家钟笑炉十年浩劫中去世。钟氏家属为实现他的遗愿，向上海市集邮协会捐赠钟笑炉遗藏，以其售卖所得，作为发展集邮活动的“钟笑炉集邮基金”。1988 年 6 月基金会在上海成立。计划建立一座集邮纪念馆，陈列邮史资料。这是我国第一次设立以著名集邮家命名的集邮基金。逝者有知，当含笑九泉。

为了关心和培养集邮事业的接班人，1988 年 4 月 5 日，上海市成立了中小学集邮指导老师联谊会，有 40 多所中小学的集邮指导老师参加。联谊会的宗旨是根据中小学生的特点，研究探讨中小学集邮活动的内容与形式，促进这项有益的青少年课外活动健康发展。该会将定期开展第二课堂集邮教研活动，组织观摩交流，编印简报。青少年集邮不但有人关心，而且还有一群勤奋的教师热心研究和指导，这实在是关系中国集邮兴旺发展的功德之举。

1991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8 日，由全国集邮联主办、上海市邮电管理局和上海市集邮协会承办的“光辉的七十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全国集邮展览，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参展的竞赛展品有 167 部邮集和 42 部集邮文献。夏衍捐赠上海博物馆的清代邮

票精华同时展出，引人瞩目。这是我国首次在北京以外地区举办的综合性全国邮展。

80年代，北京成为中国集邮事业的发展中心。北京市集邮协会1981年10月30日成立。著名作家廖沫沙任名誉会长。他挥毫为集邮者题词："宇宙星云皆电迹，天涯海角尽邮踪。"在市邮协成立大会召开的同时，举办了首次邮票专题报告会，邀请红楼梦研究专家和邮票发行局局长作《红楼梦》研究和发行"红楼梦"邮票专题报告，800多人出席大会。以后，北京市邮协经常举办各种集邮讲座。例如：1981—1984年先后举办了"集邮的目的和意义"、"邮票设计艺术"、"邮票印刷艺术"、"王实甫与他的《西厢记》"、"中国古代文学家(第一组)"、"浅谈解放区邮票"、"吴昌硕画选"等专题报告会。内容丰富多彩，听众非常踊跃，对提高集邮者的艺术鉴赏能力和集邮水平大有裨益。

1985年3月，北京市邮协举办了"北京市聋哑人首届邮展"，共展出邮集18部，观众达4千多人。9月29日，在国际聋人节这一天，北京市聋哑人集邮联谊会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聋哑人集邮组织。同年9月初开始，北京市集邮协会又举办了"北京集邮知识竞赛"。这场大规模活动，共收到国内29个省市及香港地区近万份答卷。解放军驻武汉某部参谋马骁获得特等奖。该部队为此还授予他三等功。马骁将这枚军功章赠给北京市集邮协会永久保存。因为参加集邮活动作出显著成绩而荣立军功，恐怕在世界上绝无仅有。1988年，马骁通过了全国集邮联的考核，成为首批国家级邮展评审员，这也是解放军中的第一位。为扩大宣传和交流，北京还举办过群众邮票交换日、爱鸟周集邮展览等活动，规模和影响都很大。

北京市集邮协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重视与文化部门紧密结合。区一级集邮协会大都挂靠在区文化馆，并设有专职干事，充分利用各文化馆的场地设施、联系渠道等有利条件，开展各种集邮活动。由于依靠邮电和文化两个部门的大力支持，使得各级邮协工作都搞得有声有色。

1989年12月，北京市集邮协会授于杜庆云、吴凤岗、沈曾华、赵

人龙、刘铭彝、杨立、朱祖威7位集邮家以会员会士称号，表彰他们在发展北京以至我国集邮事业中做出的功绩。“会士”是我国首次在省级集邮组织中创设的高级会员称号。

1982年1月28日，广东省集邮协会成立，成为中国成立最早的省一级集邮组织。广东省和广州市邮协成立在全国最早，集邮报纸的创刊在全国最早，1980年举办的广州第一届邮展又是1949年以后国内首次大规模个人藏品展览。广州集邮界深为夺得这四项全国“冠军”而自豪。

1985年，广州《集邮家》报主办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义捐拍卖集邮品活动。这项集邮界的首创义举，共有100多位各地和港澳集邮者捐出大量邮品，拍卖所得4万多元人民币捐献给修复长城工程。该报编辑部的编辑们从1985年11月27日开始，组织了每星期三晚定期聚会的“广州集邮沙龙”，成员先后有50余人。每次沙龙活动，都有一位主持人提供自己的专集给到会成员观赏，还要作10分钟专题发言，然后大家对该专题提问，共同研讨。

作为改革开放前哨的广东，集邮活动也很开放。80年代后期，广东地区集邮界逐渐恢复和发展了与港、澳、台地区集邮界的友好交往。1989年11月25日，由广东省邮协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累斯顿区、日本兵库县共同举办的“广东国际友好城市邮票展览”开幕。

1990年3月18日，由广州市集邮协会和广州市邮票公司在市图书馆广场举办了首次“羊城集邮日”，并且确定将今后每年3月份第三个星期日作为羊城集邮日。首次集邮日正逢广州市集邮协会成立10周年、第10次广州集邮展览开幕，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有集邮捐资抽奖、集邮咨询、集邮猜谜及游园、集邮家与集邮爱好者见面、集邮集市等。

1992年3月22日的“’92羊城集邮日”更为隆重热烈，活动项目多达9项：

一、’92羊城集邮日穗、台、港、澳集邮联展。

二、集邮书刊展览。

三、集邮知识团体竞赛。

四、集邮演讲比赛(内容围绕集邮的教育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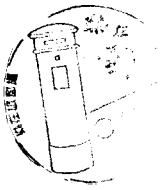
五、邮政业务咨询和邮品供应。

六、邮品集市。

七、集邮咨询。

八、集邮抽奖。

九、少年集邮有奖游戏。



一年一度的羊城集邮日,成了集邮者名符其实的节日。

1990 年 8 月 26 日,由广州市邮协荔湾分会和光扬街文化站共同开办的荔湾集邮图书室正式向集邮者开放,书刊大部分由集邮者捐赠。

在全国各地广大的集邮爱好者中,青少年已经占到 70%左右,成为一支集邮生力军。为了引导青少年正确掌握集邮方法,1983 年 10 月由中国集邮出版社主办的《少年集邮》双月刊创刊。社会各界对青少年集邮活动给予了积极的帮助,例如:大庆市在各部门的热情关怀下,1983 年底成立了"大庆市少年集邮协会",使全市 6 万多中小学生(占全市学生总数 1/3)参加集邮。协会广泛组织集邮讲座、演讲会、知识竞赛、青少年邮展和集邮夏令营等活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辅导员和小集邮家。

全国集邮联和共青团中央等联合于 1984 年 7 月在青岛举办了"中国第一届青少年集邮夏令营"。1985 年暑假期间,各地集邮协会举办的各类青少年集邮夏令营活动逐渐增多,武汉市在黄鹤楼,郑州市在市青少年宫,四川市在灌县,西北五省(区)在西安分别举行开营式。大庆市第二届青少年集邮夏令营先后奔赴大连、青岛、济南、北京等地,历时 20 多天,规模最大。

在青少年集邮蓬勃发展的同时,老年集邮活动异军突起,方兴未艾。随着中国离退休职工的大量出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把集邮爱好作为自己晚年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1984 年 6 月,黑龙江省直属机关离休干部集邮协会成立,是全国最早的一家。到 1988 年,全国

已有20多个老年集邮协会或小组。1987年举办了全国8省市老干部集邮联展。1989年10月，又举办了18城市老干部集邮联展，采取巡回展览形式，为老邮迷们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全国开展的各种集邮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变化很快，既有老传统，又有新发明。

1984年5月15日至7月16日，“西北五省区集邮联展·1984”依次在兰州、银川、西宁、西安、乌鲁木齐市展出。这次历时两个月的联展，不仅密切了西北五省区集邮界的邮谊，而且开创了组织地区间横向集邮活动的先例。

1984年7月28日至8月18日，“第一届全国体育邮票展览会”在北京举行，许德珩副委员长题词：“集邮观天下，体育强国家”，宋任穷的题词是：“集邮树立新风尚，体育为国争荣光”。参展者中有全国各省、市的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邮票收藏者138人，其中还有扬威国际体坛的宿将杨锡兰、李宁、吴佳妮等人的展品。展出的3万多枚各国体育邮票，向数以万计的参观者展示了体育的风姿和集邮的魅力。这是我国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行业集邮展览。1986年4月29日，“中国体育集邮协会”在北京成立，会长郎平。作为全国集邮联和全国体总、中国奥委会的团体会员，它也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行业集邮组织。

1984年12月23日，长春市职工集邮协会和工人文化宫在集邮活动日中，举办集邮谜语知识测验、邮票交换、咨询服务等活动，吸引了广大集邮者乘兴而来。

1985年1月，《集邮》杂志为纪念黄兴诞生110周年，举办了辛亥革命集邮知识竞赛，引起了许多中小学生对民国史的学习研究兴趣。开展集邮知识竞赛，把广大集邮爱好者的视线由单纯搜求邮品转移到重视学习邮识和社会知识上来，活跃了集邮研究的气氛，效果确实很好。现在全国各地各级集邮组织举办的集邮知识竞赛，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活泼。

在全国集邮热潮的推动下，以集邮为内容的社会活动和文艺活

动逐渐增多。在各地(原地)举行的邮票首发式越来越隆重,每年的最佳邮票颁奖会都要伴随一场令人难忘的晚会。

80年代中期开始,松散型的民间"集邮沙龙"不断涌现,继"广州集邮沙龙"之后,长沙的一些集邮者也成立了集邮沙龙,他们的宗旨是"团结邮人,加深邮谊,交换邮品,共研邮识",商定每月月末活动一次。随后,北京、贵阳、衡阳等地也有类似的组织出现。

随着集邮活动的发展和深入,一些集邮者对参与一般性的集邮活动感到不满足,追求较高层次的活动内容,这是集邮沙龙应运而生的重要原因。宜智宜趣,不拘一格,是这类活动的最大特色。例如:1987年起,集邮家张包子俊、居洽群、张长中、孟祖荫、刘光、盛澄世、李少华、汪贤能等相约,每星期来一次集邮聚会。西湖畔茶室点点,风景如画,他们就时常易地品茗,畅谈邮乐。以后浙江省邮协俱乐部成立,他们就在那里定期定点,每周三下午晤叙,少则五六人,多至二三十人,风雨不变。他们的聚谈范围广阔,无一定之规。你得佳品,带来众人细细品味;我有奇闻,道出大家添些趣谈。渐渐这个西湖邮友沙龙远近闻名,来自海内外的集邮家作"天堂"之游时,参加一次沙龙聚会成了必不可少的内容。

80年代后期,中国集邮活动发生的变化确实惊人,全国各地集邮活动的新事物层出不穷,呈现万马奔腾、百舸争流之势。集邮品拍卖是最引人瞩目的新变化。

1987年1月9日,上海集邮协会率先开办邮品拍卖活动。随后,3月29日,西安市集邮协会举办首届邮票拍卖会(图43)。全国的集邮品拍卖、寄售、邮市等活动很快呈燎原之火,燃遍各地。1988年,西藏邮票公司在拉萨市举办了首次邮品拍卖大会,并召开了专门的新闻发布会。

1988年,《集邮》、《集邮博览》杂志和中国集邮总公司联合举办了1983—1987年最佳首日封评选,在全国集邮者中掀起了收集首日封片的热潮。评选活动的颁奖仪式在四川成都市隆重举行。

1988年3月8日至13日,为纪念"三八"妇女节,西安市集邮协

会在西安美术家画廊举办了“中国五位女邮票设计家作品展览”，展出了卢天骄、邹建军、潘可明、陈晓聪、任宇的众多佳作。这是中国首次为女邮票设计家举办展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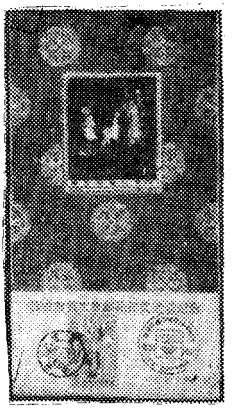


图 43　西安首次集邮品拍卖活动纪念品

1989 年 5 月 11 日，山东省邮票博物馆正式成立，并开始着手对失散于民间及藏于集邮者手中的山东解放区邮票和实寄封等珍贵邮品，进行系统的征集整理挖掘工作。这是国内首家省级邮票博物馆。

1989 年 10 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0 周年，全国举办的一系列集邮活动中，有一些很有特色。

《集邮》编辑部和山东威海钟表工业公司联合举办了“东华杯”征文活动，时间是 1989 年 10 月 1 日至 1990 年 5 月 30 日，内容为中国各时期邮票的学术性文章和与集邮有关的杂文、专访、报告文学等。工交单位赞助开展集邮活动，已司空见惯，但举办大规模的集邮征文却不多见。

1989 年 10 月 20 日至 26 日，“全国石油职工首届集邮展览”在河南濮阳中原油田举行。来自全国石油战线 13 个局级单位的 48 部邮集参加展出。在此期间，还成立了第一个全国产业集邮组织——中国石油集邮协会。这标志着我国职工集邮活动正在向纵深发展。

1989 年 10 月，江西九江市集邮协会与市总工会、妇联、邮电局、电视台、工人文化宫联合举办了“九江市万人集邮活动月”。10 月 1 日的开幕式上，在邮电大楼广场举行了“集邮板报联展”、“集邮知识有奖征答”、“专题邮展”、“集邮咨询”。市邮票公司发行了国庆首日封，在广场上设置了临时邮箱和营业柜台，新华书店设了“集邮书刊服务车”。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但吸引了广大集邮者，更多的过往行人也驻足参观。仅这一天广场上参加活动的人愈万。

在整个 10 月中，九江市邮协还组织了“邮集制作竞赛”、“庐山

杯”集邮知识竞赛，德安、湖口、瑞昌、修水等地也分别举办了国庆邮展、集邮知识竞赛。都昌、武宁、彭泽、修水、永修举办了集邮讲座和邮品交流等活动。11月10日，万人集邮活动月在授奖大会和集邮联欢舞会后降下帷幕。

1991年8月26日至9月1日，“全国职工专题集邮展览”在兰州市甘肃省博物馆举行。这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甘肃省总工会承办的中国工会史上首次全国职工邮展。这次专题邮展，是全国总工会组织的“三热爱”主题系列教育活动之一，也是对全国职工集邮成果的一次大检阅。参展者中有省级领导干部，也有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邮展的成功举办还向人们显示出，各行各业关心支持集邮事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中国集邮活动最值得骄傲的特色之一。

1991年夏季，我国南方部分地区遭受罕见的洪水灾害，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为了支援灾区人民重建家园，1991年9月14日，邮电部发行了T·168“赈灾”特种邮票，将销售收入的1200万元全部捐献救灾，这是新中国首次发行赈灾邮票。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集邮界，也纷纷展开了“向灾区人民献上一片爱心”的赈灾活动。数以千计的捐献集邮品义卖会，汇聚成无数笔感人的捐款。这场声势浩大，范围宽广的集邮界赈灾活动，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人与人之间扶危救困、忧患与共的精神风貌。

集邮文化具有的独特魅力，也吸引着文艺界，以集邮为题材的电影、电视、戏剧、摄影、小说等文艺作品也逐渐增多。

1982年，浙江省话剧团创作演出四幕儿童剧《集邮迷的故事》，是中国第一出反映青少年集邮活动的话剧。该剧同年12月获全国儿童剧观摩演出的创作和演出两项奖。

198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中国第一部集邮题材的故事片《邮缘》，作为向国庆35周年的献礼片。该片导演桑弧和编剧之一李亦中都是集邮迷，这部轻喜剧受到集邮界的极大关注。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中国邮票》。

1985年，武汉电视台拍摄了电视剧《集邮小伙伴》。此后，集邮的

电视片录制接连不断：浙江电视台的《盈盈一水间》；全国集邮联宣传工作部的《无事生非》；陕西铜川市邮电局的《集邮基础知识》等，风格各异。1989年由科学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中国邮票与集邮》，该片在世界各国放映，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1985年第2期《收获》杂志发表了女作家张辛欣创作的中篇小说《封、片、连》。小说以80年代发生在北京的“大劫案”邮票为主线，反映了“集邮热”中普及发展与无知落后交错并存的状况。1988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汪剑光编著的集邮小说《绿衣红娘》。

漫画家华君武1983年9月为庆祝无锡市集邮协会成立，创作了漫画《集邮三戒》(图44)，幽默风趣。1985年1月，他又在《讽刺与幽默》发表漫画《企鹅集邮》，以拟人化手法，表现出中国南极考察长城站邮局开业给集邮者带来的欢乐，构思巧妙，令人称绝。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为集邮撰书的藏字头对联，为集邮者们所乐道：

“集天下名山大川于寸纸之中，时而阅之斯诚美矣；邮世界伟人学者于一匡以内，朝夕可见岂不快哉。”

图11 华君武的集邮漫画

著名宗教人士、诗人赵朴初为“万里长城”邮票展示的“四季长城”，题写了一首《八声甘州》词：

“叹画图百态千姿，如此长城。尽春夏秋冬，星移物换，不改峥嵘。最是春花铺锦，夏绿叠云屏。展向天边去，神往青冥。

漫道红衰翠减，爱丹林浓染，秋气澄青，更冬来莽莽，雪岭玉龙舞。喜风光尽收方寸，望关山无限古今情。凭交付几行征雁，万众心

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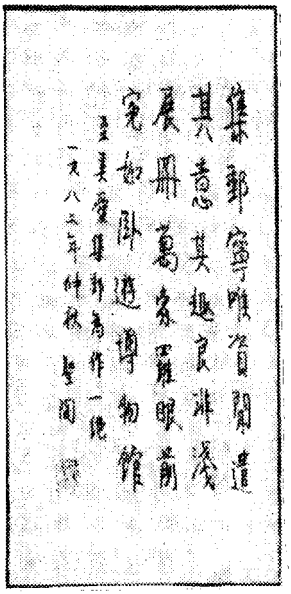


图 45　叶圣陶的诗

这些气势雄浑的大手笔，更使邮坛生辉。

1982 年 9 月 5 日，著名教育家、作家叶圣陶欣闻全国集邮联“一大”召开，赋诗一首(图 45)：

“集邮宁唯资闲遣，其意其趣良非浅。
展册万象罗眼前，宛如卧游博物馆。”

1986 年 8 月第 42 期《陕西集邮》发表了陕西宝鸡市李江林作词、卢振华作曲的《集邮者之歌》，这是奉献给集邮者的赞歌。

纵观 80 年代中国邮坛，繁花似锦的集邮品，引人入胜的集邮活动，余味无穷的集邮宣传，无不使人感受到百花齐放，春色满园的新气象。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春风，这是全国数百万集邮者共同创造的乐园。

第四节　百家争鸣

集邮最大的乐趣就在于它需要研究，既需要掌握人们已知的研究成果，丰富自己的邮识，更需要探索无数未知的研究课题，丰富集邮文化的宝库。

从本世纪 20 年代至 70 年代，中国的集邮研究活动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其间硕果累累，名家辈出，奠定了厚实的基础。纵观中国以往的集邮研究活动有以下几个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研究对象基本以邮票及相关的封、片、简、戳实体为主；研究

内容多偏重于对邮品的考据与辨伪，如邮票的版式、齿孔、刷色、纸质、暗记、背胶、邮票发行与使用情况等。

二、研究活动基本是从集邮者个人兴趣出发，在分散孤立状态下进行，既无组织，也无计划，更无资料、资金、研讨交流等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

三、研究的目的主要是用于提高个人的邮识水平和辨伪能力，因而缺乏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社会责任感，致使不少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和史料未能流传于世。

集邮界把这种偏重于邮品考据的研究，称之为微观研究方式或传统研究方式。时代的变迁，文化的发展，向集邮界提出了新的要求。80年代，中国集邮家们着眼于现代社会意识，使宏观研究成为我国集邮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式之一。全国及各级集邮组织的普遍建立，各种官办民办集邮书刊的广泛兴起，大量中青年集邮研究者的不断涌现，无不为中国当代集邮研究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80年代初，中国的集邮研究和宣传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一批有影响的集邮报刊，如《集邮》、《集邮家》报、《上海市集邮协会会刊》、《中国集邮》(英文)、《北京集邮》、《少年集邮》、《集邮研究》等相继问世，再加上其他省市的集邮报刊，全国呈现出百花竞放的盛况(图46)。各种集邮报刊无论是印刷质量还是发行数量，都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水平，编辑指导思想和学识修养也有了极大的改观。同时，中央级的邮刊注重全和精，以权威性、指导性见长；地方邮刊则突出地方特色，以新和活取胜。

1980年9月15日，广州市集邮协会主办的《集邮家》报创刊，它是全国创办最早的集邮报纸。该报从1985年12月第36期(总第98期)以后停刊，1987年11月总第99期又开始复刊。一度曾改为旬报，以后则固定为月报发行。

《集邮家》报题材很新颖，如“邮苑人物志”专栏几乎每期都介绍一位集邮界人士的集邮经历、经验和成就，并配以照片，使初集邮者从中取长补短，受到启迪。“群言堂”专栏则广开言路，引人入胜。特

图 46　80 年代初创办的部分邮刊

别是 1983 年组织的“集邮学定义”和“集邮票品的流通与交换”两次专题讨论，引起读者共鸣，编辑部收到大量来信来稿，于是开辟专版连续摘登，在报上展开了别开生面的笔谈。介绍集邮图书多，发表集邮漫画多也是该报的特色。

1981 年 4 月，《上海市集邮协会会刊》创刊，1982 年，刊名改为《上海集邮》，主编乐锦祥，副主编邵林。植根于中国邮刊发祥地，该刊自然师法传统，得天独厚。《上海集邮》初期较有特色的栏目有“访问记”、“邮人剪影”、“大家议论”等，以后逐渐发展成“邮坛纵横”、“华夏文化”、“高谈阔论”、“放眼世界”、“邮政足迹”等。一些集邮家评价该刊“文风严谨、文笔简练，有些议论性文章很有棱角”。该刊近年开设的几个随笔连载专栏，如《邮市漫步》(立健)、《太原路邮市见闻》(宝木)、《西湖集邮沙龙散记》(张包子俊)等，生动活泼，富有情趣。

从 1983 年起，《上海集邮》每年举办年度的我国集邮活动十大新闻评选。每年先由该刊编辑部整理并发布该年度的我国集邮活动及中国邮票要闻录，供读者评选投票时选择参考。对选中者寄发评选纪念封。这项寓宣传学习于娱乐的活动，越来越受到集邮者欢迎。

1982 年 7 月，《北京集邮》杂志创刊，它作为北京市集邮协会的会刊，得首都天时地利人和之灵气，如日方升，出手不凡。1987 年更名为《集邮博览》，主编王路，副主编林轩。1991 年其发行量已达 7 万

份，成为中国第二大集邮刊物。现为双月刊。

该刊内容及印刷均属上乘，版面严谨，彩图清新，其最大特色是信息量大，涉及面广，举凡国内热点、国外见闻、邮史掌故、学术研究、集邮市场、台港邮苑，均统筹兼顾，并有所侧重。尤其对国内集邮活动和集邮研究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通过“集邮论坛”栏目经常开展争鸣研讨。其中较有影响的，如对集邮学、集邮文化理论的讨论，关于我国集邮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讨论，若高屋建瓴，给人启迪。

1989 年，《集邮博览》杂志社创办了国内首家集邮书刊服务部，既有门市出售，又办理函购，书刊品种和数量都很多，集邮者对此善事无不称快。

80 年代，《集邮》、《集邮博览》、《上海集邮》堪称中国当代邮刊的三鼎足。与此同时，《江苏集邮》、《安徽集邮》、《湖南集邮》、《天津集邮》、《新疆集邮》、《广西集邮》、《重庆集邮》、《广东集邮研究》等邮刊，出版周期多为季刊，文章雅俗共赏，读者面宽，均在中国邮刊中居重要地位(图 47)。

图 47　江苏、安徽、湖南的邮刊

集邮报纸除早已蜚声邮坛的《集邮家》报，各省市创办的邮报已达数十种，加上许多厂矿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办的铅印邮报，其数量已难以统计。同时，各类社会报刊上的集邮文章激增，不少报刊还辟有集邮专版或专栏，各地的邮电报也不例外。

90年代，国内集邮报纸更趋繁荣，各地纷纷新创刊、新改版，一派兴旺景象。（图48）

图48 各地的集邮报纸

1982年12月创刊的《浙江集邮》，内容丰富，1988年发行量1.7万份，1991年扩版为4开8版，订数突破3万份，在全国16开本集邮报纸中，名列前茅。

1983年3月创刊的《陕西集邮》，一直以4开8版，信息量大，题材广泛居全国16开本集邮报纸版面之首。1991年改版为4开4版的《集邮天地》，面目一新，发行量突破2万份。

1990年4月5日，由山西省集邮协会主办的《集邮报》在运城创刊，这份邮报摘走了目前国内集邮报纸出版周期最短（旬报后改周、

报)的桂冠。

此外,成都的《蜀都邮苑》、云南的《月末集邮》都是4开4版的邮报。《月末集邮》由云南省集邮协会和云南邮电报社联合主办。

另外,私人办的各类自费小邮刊异常活跃。数量估计有300余种。这些邮刊大多是以通讯托售、征换、小量批发为主的售让品目录。有的也夹杂一些集邮知识、邮市信息。形式有铅印、油印、复印等,一般都通过登载广告来接受读者征订,多数订户可达300—500份。各刊内容和质量相差悬殊。其中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的这类邮刊,售让品丰富,早期票、高档票、外国票较多,很受集邮者欢迎。

近些年,16开铅印的民间集邮小报,质量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有:湖南黎泽重主编的《甲子邮刊》、江苏王翔主编的《邮友通讯》、上海张林隆主编的《集邮沙龙》、山东刘刚主编的《水泊邮报》、无锡吴琦华等主编的《原地封研究》、北京朱祖威等主编的《专题集邮》等10多种。(图49)这些邮报大多是集邮者们自己出钱,由热心者义务操办,内容则多偏重某一专门研究领域,焦点集中,钻研自深。

图49 部分民间集邮报刊

80年代,也是中国集邮图书出版的黄金时代,全国各类出版社出版的集邮图书达200余种,其中有一些学术性、史料性的著作。

1982年7月,姜治方著《集邮和我的生活道路》由外文出版社和集邮杂志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集邮家个人传记体回忆录,在国内

外引起极大反响。

1984 年 6 月，孙君毅著《清代邮戳志》由中国集邮出版社出版。(图 50)8 月，孙君毅著《邮学词典》由无锡市集邮研究会内部发行。

图 50　孙君毅和他的著作《清代邮戳志》

1985 年 5 月，《集邮》编辑部编著的《中国的邮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全面系统介绍中国各历史时期邮票发行及内容的资料性、趣味性很强的读物。

1985 年 7 月，中国集邮出版社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这是中国第一部由官方出版的附有彩色图案、标注邮票价格、资料权威的新中国邮票工具书。

1986 年 6 月，由北京市集邮协会编辑的《实用集邮辞典》，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填补了我国大型综合性集邮工具书的空白。

1987 年 3 月，由马骏昌主编的《集邮回忆录》，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图 51)该书收录了 20 多位集邮家、邮商、邮票设计家的回忆文章，回顾了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集邮活动历史，是中

国第一部集邮史资料专集。

1987 年 5 月，《中国集邮年鉴(1986)》由中国集邮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集邮年鉴。(图 52)此后，每年出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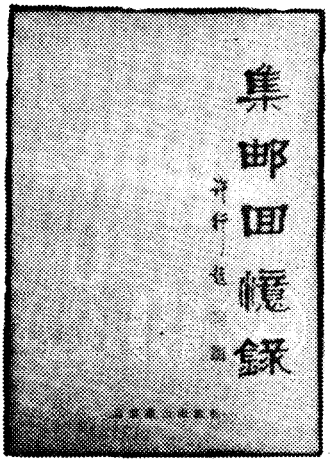


图 51 《集邮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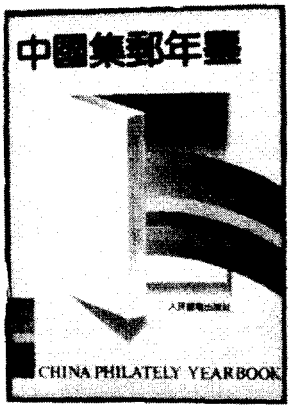


图 52 1990 年《中国集邮年鉴》

1988 年 12 月，马任全著《中国邮票图鉴(1878—1949)》经修订，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闻名于世的“马氏图鉴”，以崭新的面貌再展雄姿。

1988 年被集邮界称为“目录年”，一批权威性的中国邮票目录相继问世：中国集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邮票目录》、《中国清代邮票目录》、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邮票全集·清代卷·中华民国卷》，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邮票博物馆藏品集·清代卷》。这三套各自成体系的工具书，印刷精良，装帧考究，是中国集邮史上的经典之作。

从 80 年代初开始，中国集邮研究和著述活动由恢复到成熟，发展很快。在近十几年中，集邮著述有两个显著特点：一、80 年代初期重点是集邮史、邮戳史类方面，后期开始，则以邮票史、专题类居多。二、80 年代初期骨干是老集邮家，后期开始中青年集邮家成为主力

军。

集邮家孙君毅(祖籍山东章邱,生于无锡,1903－1983年),原名孙祖宏,君毅是集邮用名。1926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获硕士学位,在上海、无锡从事律师职业。1936年开始集邮,对集邮学研究造诣很深。长期担任无锡集邮研究会会长,主编会刊《邮友》、《集邮通讯》、《邮友信箱》,论著精湛,名高誉广。

孙君毅集毕生心血凝成的《清代邮戳志》,筹备于1926年,60年代正式动笔,先后经过四次重大修改。正如前文介绍的,即使在"文革"时期身处逆境,他仍然宁静淡泊,以顽强的毅力著书。这部前后费时近20年的著作中,由孙君毅亲笔描绘了1500多幅图稿,其严谨的学风和渊博的邮识为世人所敬佩。1987年,《清代邮戳志》在加拿大国际邮展上荣获大银奖。是当时中国集邮家在国际邮展文献类获得的最高奖。

1982年,孙君毅当选为全国集邮联理事,1983年被选为全国集邮联学术委员会委员,并被聘为英文《中国集邮》杂志顾问。1983年5月,在他临去世前三个月,仍在病榻上撰写准备在江苏省邮协一大上作学术讲座的讲稿——2万多字的《中国集邮史》,这是他留给集邮界的最后一篇集邮文稿。

史济宏(上海人,1914－1985年)早年毕业于上海同德医学院,是一位医生。(图53)30年代中期,他立志于商埠邮票的收藏研究。为此,他多次在国内集邮报刊上刊登广告,征求各种邮品和史料,结交志同道合的邮友,成为商埠邮票研究专家。他以"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的治学态度,深入钻研,欲穷一理,踌躇月余。他集30多年心血的专著《中国商埠邮票及邮政史》,先后五易其稿,全文20万字,附图近千幅。书中不仅周密考证记述了全部商埠邮票的发行经过和版模等特征,而且深刻剖析揭示了商埠邮票产生的背景及其在集邮研究中的历史价值。这部著作有考据、有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80年代中期,一批中年集邮家在集邮研究与著述方面崭露头角,硕果颇丰。他们既有邮识功底,又兼写作特长,才思敏锐,风格清

新，使近年中国邮坛涌现出大批名篇佳作。

图 53　史济宏

李德铭是一位 60 年代初大学毕业的上海新闻工作者，集邮写作笔名林霏开。他从中学时代开始集邮，特别注意千方百计弄清每枚邮票的全部涵义，为此他大量积累素材。他收集的 1 千余枚各国小型张，每枚的贴票纸上都详注说明。1982 年，上海曾举办“林霏开集邮趣味展览”，引起轰动。周谷城副委员长曾为他题词：“玩物不丧志，集邮亦成家”。

从 1981 年起，李德铭在《上海集邮》发表了两组文章：《邮人剪影》和《旧刊新读小记》，后汇编入《集邮乐趣集》一书。几年中，他还先后编著出版了《集邮与欣赏》、《集邮长知识》两本书，编辑出版了《世界邮票小型张》美术台历。1986 年，他的《集邮长知识》一书被评为全国中学生“我所喜爱的书”，在 1989 年全国邮展上获铜牌奖。

田润德（山西人，1937 年生），集邮写作笔名艾幽，长期在西安从事共青团和青少年教育工作。他从小学开始集邮，主要精力集中在人物专题上，已拥有 1 万多枚人物邮票。为了对各种人物进行深入研究，他废寝忘食，博览群书，将绝大部分邮票逐一建立了资料卡片。

从 1987 年起，田润德以平均每年 2 本书的惊人速度出版了《邮票上的外国文学家》、《邮票上的女名人》、《邮票上的英雄人物》、《邮票上的著名残疾人》等 10 部著作，被誉为“世界名人的录相师”。在 1989 年全国邮展上，《邮票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书获镀银奖，《邮票上的女名人》获铜奖，此书还被评为“1988 年全国妇女儿童最佳图书”。

“十年磨一剑，不敢试锋芒”。喜看今日集邮图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充分反映出中国集邮研究著述领域人才辈出、日趋成熟的丰硕成果。

为提高中国集邮研究水平和邮展评审水平，提高中国集邮界和

邮集的国际地位，中国集邮家又开始向国际邮坛进军。1985 年 10 月，集邮家梁鸿贵被国际集邮联批准为国际邮展评审员，成为第一位中国国际邮展评审专家。1989 年 9 月 1 日，集邮家刘广实成为中国第二位国际邮展评审员。

刘广实（福建福州人，1941 年生），出身于书香门弟，1955 年开始集邮，重点收集和研究中国邮票及邮政史资料。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他即致力于中国各种早期邮刊的收集研究，用节省下的钱，购买了大量的集邮书籍和邮刊。从《邮乘》到《近代邮刊》均罗致齐全；无法买到的，就设法借来一页一页地抄。他还以顽强的毅力博览上海图书馆中各种涉及中国近代史、交通史、邮政史方面的书刊资料。每当夜幕降临，他总在小屋里不知疲倦地攻读，钻研的触角渐渐深入到集邮研究的深层领域。

1958 年，年仅 18 岁的刘广实初露锋芒，在无锡《集邮通讯》第 7 期上发表了第一篇集邮论文《海关邮政谈》，引起了集邮界的重视。80 年代初开始，刘广实集邮研究的思考非常活跃，对包括大龙邮票发行日期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课题提出了新的论点，引起国内外集邮界高度赞赏。他在 80 年代初编写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邮政史》、《中国纪念邮戳图鉴》、《解放区邮政历史》、《19 世纪中国有关的实寄封》、《台湾早期邮政考》等，无不显示出他渊博的学识与出众的才华。

刘广实淡泊名利，诚恳待人，对集邮研究一丝不苟。在他与孙君毅合作编写《台湾早期邮政考》一书时，仅为书中一些内容的深入探讨，先后通信数百封，达六七万字。1988 年，由刘广实、邵林编著的《集邮辞典》由中国集邮出版社出版（图 54），为了使书的内容准确无误，刘广实与同伴不知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近些年，一些重要的集邮专著请他审定，各地邀请他去进行集邮讲座，对此，刘广实从不怠慢，有求必应。

长期的积累，使刘广实的邮集非常可观，从“客邮”、民信局、商埠、清代、民国、解放区、新中国的邮票、实寄封片、邮戳以至各种邮政单式无不兼收并蓄。1987 年 10 月哥本哈根举行的丹麦第二届世界

邮展上，刘广实的《中国民信局(1867－1934)》邮集荣获镀金奖。1988年他的民信局邮集在布拉格国际邮展再获镀金奖。

开展集邮教育是80年代兴起的一项新事物。除了各种讲座活动外，正规化的集邮教学活动也已在中国出现。1986年起，厦门大学的何大仁教授率先开设《集邮学基础》选修课程，并编写了教材，给学生计算学分。现在，全国已有福建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石家庄邮政高等专科学校等开设了集邮选修课。石家庄邮政高等专科学校1991年3月起开设的集邮学选修课，30课时，有40名学生参加，这在全国邮电院校中属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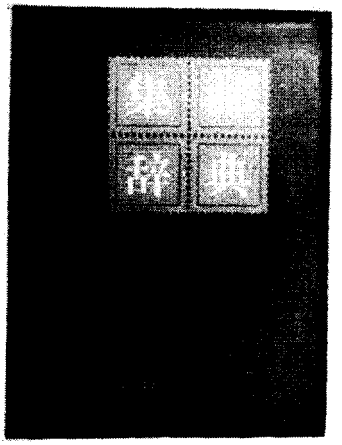


图54 《集邮辞典》

在全国广泛进行的集邮授课活动中，也涌现出一批卓越的教学人才。上海集邮家俞鲁三，在集邮研究方面兴趣广泛，钻研极深。他更善长作集邮教学演讲，多年来全国及各省邀请他讲课非常多。各方一致反映，他讲集邮课条理清晰，语言生动，富有感染力，听者不仅学得轻松愉快，而且是一种艺术享受。

集邮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各式各样的专门人才；专门人才的出现，靠发现、靠锻炼，也要靠培养。目前，对中国集邮界而言，最需要大量能培养人才的人才。

1991年9月19日，全国集邮联青少年工作委员会在大庆市成立。从青少年集邮抓起，从培养人才抓起，面向21世纪，中国集邮界迈出了稳健的步伐，准备去迎接新的挑战。

第五节　学术研究的硕果

1983年，也许可以称作中国集邮活动的“研究年”。在这一年里，出现了几件推动集邮研究的新事物。

1983年2月18日至22日，全国集邮联在广州召开了全国集邮联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这是中国集邮史上第一次成立专门从事集邮研究的组织，它标志着集邮学术研究作为集邮活动的重要内容受到空前的重视。中国集邮研究人才的发现和培养，有了组织和制度的保证。会上选举了第一届学术委员会领导，主任委员吴凤岗，副主任委员沈曾华、梁鸿贵。首届学术委员会任期4年。共有26名委员，除主任、副主任委员外，其他委员是：

张莘农　赵人龙　成志伟　杨启明　邓连普　王庸声
沙子芬　孙志平　史济宏　刘广实　邵　林　杨耀增
罗　真　居洽群　朱国华　俞炳森　蒋国钧　赵善长
孙君毅　常增书　张文光　郭润康　韦介夫

1983年6月25日，中国集邮出版社在北京成立，负责人王庸声、梁鸿贵。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集邮专业出版社，下设5个编辑部：《集邮》编辑部、《中国集邮》(英文)编辑部、《集邮研究》编辑部、《少年集邮》编辑部、图书编辑室。截止到1989年12月该社被撤消，出版的各类集邮图书达40多种，各种集邮杂志的发行量一再猛增。

1983年11月，《集邮研究》杂志创刊。这是一份以研究邮票与集邮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性、理论性、资料性的集邮刊物，通过发表大量有深度、有见地的学术文章，既扶植和宣传研究成果，又发现和培养研究人才，对推动中国集邮研究的深入和普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

1985年底，《集邮研究》发行到总第13期后一度停刊。在集邮研究界的强烈呼吁下，1988年一季度复刊，改为季刊。由全国集邮联主办。但是《集邮研究》命途多舛，发展艰难，1991年底再次停刊。

在《集邮研究》第一次停刊期间，中国集邮出版社为满足集邮研究者的需要，编辑出版不定期的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的《集邮文选》，1987年3月出版第一集，1988年4月出版第二集，1989年10月出版第三集。这是类似《集邮研究》性质的书籍，以约稿为主，同时选登国内外集邮书刊中的有关文章和资料。第三集是“解放区邮政邮票史料文章汇编”专辑，这是为了迎接解放区邮票发行60周年而编辑出版的。

80年代，中国的集邮研究活动，从研究的内涵到研究的方法都有了新的发展，不仅强调它的科学性、真实性、学术性，而且强调了它的社会价值，这是中国集邮研究活动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既重视对邮票实体的微观研究，又强调开展对邮票外延和集邮活动的宏观研究，促进了集邮学理论的建立和完善，极大地强化了集邮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全国集邮联第一届学术委员会4年中先后召开了4次学术讨论会，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专题研究。1983年在广州召开的讨论会上，重点研究讨论“大龙”邮票发行日期问题。1984年在广州召开的讨论会，中心议题是新中国集邮活动和邮票。1985年在黄山举行了解放区邮票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兰州召开的讨论会，重点研讨“专题集邮”的概念与内容。

这4次学术讨论会共收到全国推荐的学术论文320篇，被选用70多篇，其中有不少优秀作品，学术委员会分别汇编出版了论文集或在《集邮文选》上选登。

1986年冬组成的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研究制定了《1987－1990年集邮学术研究工作规划》，确定了包括集邮方针政策、集邮学理论、邮票选题设计印制发行与经营管理、集邮品市场、集邮人才在内的学术研究主攻方向，使中国集邮学术研究工作进入有目标、有规划，多出成果、多出人才的新时期。

同时，我国集邮研究力量呈现出多层次、大范围的发展趋势。除全国集邮联下设的学术委员会集中了一批集邮学术造诣较高的研究

者外，各省、区、市集邮协会也都设有学术研究组织。截至1988年，全国共拥有400多名固定的学术研究成员。集邮学术研究已不局限于集邮组织和集邮者，也引起历史学界和教育界的重视。一些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和高等院校纷纷参加进来，提供或清理、研究有关邮驿、邮政、邮票方面的文物和史料，有的学者还发表了研究文章。

1991年5月9日至12日，全国集邮联在福州召开学术宣传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几项重要成果：

讨论制定了《1991—1994年学术研究计划》，重点是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组织集邮文化理论的研究，近期先就集邮文化的定义、范畴、特点、功能及社会价值五个方面基本理论作初步探讨。

新成立了全国集邮联集邮名词审定委员会，聘任16名委员，专门进行收集、整理、审定、公布、落实使用标准化、规范化的集邮名词、术语，并组织编写《中国集邮大辞典》。1991年12月18日，名词审定委员会发布了第一号公告，发表集邮名词词目80条，广泛征求意见。

这次会议还成立了第三届全国集邮联学术委员会，李洪义为主任委员。

仅几年时间，中国集邮研究活动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显示出新的时代特色：

一、全国和各地集邮学术组织的成立，改变了集邮研究只限于小范围、无组织分散自流的状况，不仅活动经费由协会负担，而且为集邮研究者参加学术活动提供方便，对研究成果优秀者给于奖励。

二、研究课题广泛。学术研究已从单纯对邮品的研究发展到集邮理论的研究，涉及到集邮的目的、意义、集邮史学、美学、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集邮组织建设等领域。

三、从本地实际情况和个人专长出发选择研究课题。不少省集邮协会针对本地区邮驿、邮政史、各时期邮票中的某些重要问题，组织进行调查研究，联合攻关，收效显著。如无锡市集邮协会1991年5月正式印发了《无锡集邮史》，成为全国最早编成地区集邮史的组织。1988年9月6日，广东和福建集邮界的学者在澄海县共同举行集邮

学术研讨会，对粤闽的“特产”——“侨批局”进行探讨与交流。与会者共同认定：侨批局是专为出洋谋生的中国华侨传递信件、汇兑银洋、带物带人的民营信局，是政府认可的。侨批局创始于明末，有记载的侨批史近百年。会上还成立了“闽粤侨批研究会”筹备组。1991 年 12 月 4 日至 5 日，由河北省集邮协会、河北省交通史志研究会、井陉县政协联合举办的“井陉暨东天门古驿研讨会”在井陉县召开。京津文博、集邮界的一些专家应邀莅会。与会者通过实地考察，围绕井陉古道、古递铺有关问题进行了研讨。会议认为，井陉古道开通于秦，明清时建筑的东天门白石岭递铺，是古代交通邮驿活动难得的实物见证。此外，近几年，各地集邮协会通过开展学术研究，组织编写专著也比较活跃。如 1992 年 4 月，陕西省集邮协会组织省内集邮学术研究学者合作编撰的《集邮文化简论》，由陕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部关于集邮文化研究的理论著作，它的编撰出版起点高、周期短、影响大，反映出各级集邮组织对集邮学术活动的重视和推动。

中国集邮界有一个良好的传统：从本世纪初开始，集邮者们就注意把集邮品的收集和研究结合起来，既重邮品又重邮识。在旧中国，集邮家们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对清代、民国、商埠、伪满等邮票、部分解放区邮票及各类实寄封片、邮戳等进行了较全面完整的搜集，掌握了不少早期珍罕邮品。

二是通过对早期华邮的鉴别考订和对中国邮票史的初步探讨，对各时期发行邮票（包括著名变异体票品）错综复杂的历史面貌和背景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三是通过出版发行邮刊和图书，对集邮发展和研究成果作了大量的记载，积累了丰富的史料。这些方面均不乏佼佼者。

在前人的基础上，80 年代中国集邮研究活动进入了一个发展新阶段。不仅著作数量前代无法相比，而且研究专题更加深入细致，研究范围更为拓宽，这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在早期珍邮品的考证方面，当代学者从早期述著中受到

启示，结合新发现的各种史料，对一些珍邮的发行年代、过程、版式等问题提出一系列新见解。

二是对文献史料的搜寻整理取得丰富成果。通过对邮政、文史单位和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的查询，找出大量宝贵资料。为解开一些区票的悬案，还专门组织深入的调查和各种研讨活动。

三是研究范围逐步拓宽，当代国际邮坛关注的研究领域，中国集邮界几乎都有所涉猎。还组织力量，撰写出一些结构博大、鉴别精深的典籍和通论著作。至于发表的各类学术论文，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均令人刮目相看。

近10年来，集邮学术研究的重点是近代华邮。在诸如新中国邮票、普通邮票、"军人贴用"邮票、原地封、极限片、风景戳、附加费等近代邮品领域，都取得一系列学术研究成果。

对集邮理论的研究也很活跃。早在30—40年代，老一代集邮家曾提出并研究过建立集邮学术体系的问题。经过近几十年探索，集邮理论研究取得一定成绩，逐步形成了专门的研究领域——"邮学"。但是，旧"邮学"定义不严密，包含范围比较窄，多囿于对集邮品、集邮技术和邮票史的研究。

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集邮界学术思想活跃，集邮研究在内容上出现了重大变化。许多新老集邮者有感于传统邮学日益明显的局限性，不满足于集邮研究现有的范围和成绩，纷纷提出建议和设想，促使一个新的集邮研究领域——"集邮学"初具轮廓。集邮学术从原来的纵向研究转向横向研究；从单纯研究集邮对象扩展到研究集邮本身。

集邮活动经过100多年的实践，已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笔者认为，集邮学是一门内容广阔的边缘学科，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范畴。广义集邮学是所有集邮研究涉及内容的统称。它包含了诸如：集邮品研究、集邮技术研究、邮票史、集邮史和集邮基本理论研究等。它是旧邮学概念的深化和扩展。狭义集邮学则是特指一个专门的独立学科，它主要对集邮品种和活动中的规律、特点进行理

论研究。它涉及到心理学、商品学、美学、收藏学、历史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内容。据了解，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建立“集邮学”体系。因此，这项学术研究任务艰巨，意义非凡。中国集邮界已经开始探索这项新课题，尝试将集邮学列入高等学校教学课程，有关的著述也即将问世。

中国邮票史是我国集邮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近10年来最主要的收获是对解放区邮票史料的挖掘整理取得重大进展，为解决区票中的问题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其次，对中国一些早期邮品史料研究有新的发现，补充和更正了一些重要史实。

集邮史研究目前还不尽人意。虽然近10年来发表过一些涉及集邮史的回忆文章和资料，但比较零散，尚未形成对中国集邮史从总体到各个不同时期、不同范围的专门研究。老集邮家们是集邮发展历史的见证人，除了继续挖掘档案史料，应该抓紧组织抢救他们头脑中的“活史料”。

现在，中国集邮研究正经历一个开拓领域、深化主题、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进程，前景非常广阔。只要中国集邮界能制定出全方位、多侧面的集邮研究发展规划，并协调主攻方向，新老结合，群策群力，就一定能够闯出独具特色的道路，取得令国际邮坛瞩目的新成就。

对解放区邮票的研究，是近10年中国集邮界学术成果最突出、进展最大的领域。下面就此作较详细的介绍。

中国邮票史中引起争论最大的要数解放区邮票。由于它们大多数诞生于艰难的战争环境，使用的范围和时间均有限，很多史料没有完整保存下来。由此产生的最大悬案是解放区首套邮票何时发行，解放区邮票的品种和数量究竟有多少，因此没有人（包括已出版的一些区票目录）敢断言已收集齐全了全部区票。这种状况在世界邮票史中也属罕见。

在中国邮票史的其它研究领域，人们争议的问题充其量仅是某些邮票发行时间、背景、过程、数量、变异等技术性问题。而解放区邮票研究则不然，除了这些问题之外，一些珍罕品、加盖品是否真实存

在都成了研究和争议的焦点。每当披露某处不见经传的区票品种又有了新发现，立刻成为爆炸性新闻，集邮界都难免喜忧参半。所忧者是究竟还有多少未知的区票将会面世？加上不时传出有不法者臆造伪品，更搞得大多数集邮者们视高深莫测的区票为畏途，不敢轻易染指。解放区邮票史研究是一项难度极大的重要课题，是一座横在中国集邮界面前未被完全征服的高峰。但是，深知历史责任的新老集邮家们迎难而上，乐此不疲，群策群力，日笃弥深，本着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尊重史料、尊重客观事实的求实精神奋力攀登。

中国集邮界从40年代后期开始对解放区邮票进行较系统的研究，经过两代人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集邮界对鲜为人知的解放区邮票历史和特征有了较全面的了解，著述颇丰。据不完全统计，从50年代至今，中外集邮界曾编著过10多种各类解放区邮票目录和专著，其中50—60年代(包括日本)出版了5种，70年代末至今，编辑出版(包括誊印本)了8种，反映出区票研究的水平有了逐步提高，80年代则产生飞跃。

《集邮》杂志从1980年至1981年，陆续发表了沈曾华的《解放区邮票杂忆》、何宏的《东北解放区邮票史话》长篇连载文章，逐渐掀起了解放区邮票研究的热潮。10多年来，集邮界对区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发展，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有了一定的突破。1987年金运扬发表《新发现的鄂豫皖赤色邮政实寄封》、1988年刘玉平发表《新疆伊塔阿三区邮票的属性问题》、李登汉发表《关于东北解放初期地方加盖票归属问题》、1991年叶季戎发表《抗战后期成都出现苏区邮票始末》等，都受到集邮界的好评。

在解放区邮票研究热潮中，许多中青年人大胆探索，屡屡提出惊人创见，被传为邮坛佳话。

集邮界曾长期认为湘赣边省赤色邮票是首套解放区邮票，其发行时间是1929年。否定这个说法的是一位正学习党史的在校大学生王力军。

1981年，王力军在赴江西井冈山等地考察时，结合自己的集邮

爱好，重点考察了这一地区的邮政邮票史。他发现，把“湘赣边省赤色邮票”说成是苏区首套邮票的人，误把1927年10月建立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与1931年10月建立的湘赣省革命根据地当成同一个根据地，因而把后者发行的赤色邮票当成前者发行。王力军由此认为，这套邮票不是1929年发行的，也不是最早的苏区邮票。他认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1930年上半年发行的“赣西南赤色邮政”邮票，才是第一套苏区邮票，并将调查的结果写成了毕业论文。

1982年元旦刚过，王力军与邮友田小利把这个观点写成《哪套邮票才是首套边区邮票》，在《鼓楼邮刊》发表。后来该文以《首套解放区邮票辨析》为题在《鼓楼邮刊》1982年第一期上发表。随即，又专门组织了学术讨论会。这篇论文在国内外区票研究者中引起极大关注，推动了区票研究的深入开展。

1985年，江西省邮政管理局邮电史编辑室从国民党的档案中，发现了中华邮政江西邮务管理局1930年8月8日写给上级的一份报告。从中分析出赣西南赤色邮政发行的赤色邮政邮票才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苏区邮票，其发行时间约在1930年5月底至6月初。可惜的是至今尚未发现这种邮票的实物。

围绕首套区票之谜前后展开的调查和研究，发人深省。它既说明在集邮研究领域不应该有禁区，只有解放思想，勇于开拓，才能有所发现，也表明重视实地考察，重视历史档案，以史实为依据，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许多解放区邮票的身世之谜，也都经历过类似的曲折过程。

1945年，画家华君武曾为东北解放区邮票绘画作图。时代变迁，他早已不记得自己曾设计过邮票。1980年初和1982年5月，为编写解放区邮票目录，赵文义和何宏分别带着东北“五卅廿二周年纪念”邮票草图，“五一”、“七七”、“西安事变”、“青年节”等纪念邮票拜访华君武。他再三仔细观看后，才认出确是自己的手笔，从而使这位漫画家的名字载入区票绘画者的行列。

1986年12月，全国集邮联学术委员会确定编辑出版一部《中国

图 55 《中国解放邮票史·苏区卷》

解放区邮票史》。这部书按解放区发展历史，分为苏区卷、西北卷、华北卷、华东卷、东北卷、中南卷、西南卷。各卷的编写分别由各有关省市的邮电管理局和集邮协会组织力量完成，其规模和权威性均属空前，是对解放区邮票史数十年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1990 年 8 月，首卷《中国解放区邮票史·苏区卷》出版（图 55）。1991 年 11 月，该书在东京'91 日本世界邮展上荣获镀金奖，这是中国集邮书刊首次获世界邮展金奖。

为了解决解放区邮票史中的重大问题，如解放区邮票的定义、上下限问题、史料问题，全国集邮联在北京、九江、青岛等地开过多次座谈会。各地集邮界也不断组织专题性的研讨活动。

1987 年 12 月 11 日至 14 日，辽宁、吉林、黑龙江省集邮协会在大连召开了三省集邮学术讨论会，拟订出东北解放区地方加盖邮票的认定标准，为东北解放区邮票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1988 年 9 月在九江召开的座谈会上，江西和福建两省集邮协会提出研究报告，证实中央苏区最早的邮票——赣西南赤色邮政邮票和闽西交通局赤色邮政邮票都是在 1930 年内发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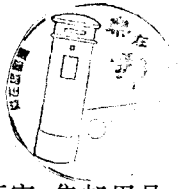
冀南抗日邮政邮票的印制、发行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河北省集邮协会组织召开座谈会，查到有关档案，终于确切证实冀南抗日邮政总局发行过邮票。

为完成《中国解放区邮票史·西北卷》的编写任务，西北五省区集邮界几年来组织了多次深入调查和专题讨论。通过查阅大量历史档案资料，更正了一些过去仅凭当事者回忆记录下来的史实出入，使

许多重要的解放区邮票发行时间及经过获得了有案可查的真凭实据。

解放区邮票史的编写完成，将是中国集邮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不仅这一重大学术成果将对国内外集邮界会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它所展示的集中全国精兵强将大规模联合攻关的成功经验，也给集邮界以极大的鼓舞和启示。

1990年8月，是解放区邮票发行60周年。邮电部、文化部、全国集邮联等8个单位联合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邮票发行60周年纪念活动。主要内容包括：召开纪念大会；举办全国区票展览；组织国际性区票学术讨论会；编辑出版三部区票史专集；摄制《中国解放区邮票》专题电视片。同时还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这次纪念活动隆重热烈，中外集邮家欢聚一堂，表明中国解放区邮票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价值受到国内外集邮界的珍视。



第六节　跻身世界

当60—70年代世界集邮理论、邮学水平、邮展评审、集邮用品、集邮方法等都在飞速变化、迅猛发展的时候，中国的集邮者们正在遭受浩劫摧残。“文革”10年，使中国集邮界与世界集邮水平出现了巨大的差距，与各国集邮界的友好交往几乎全部中断，损失惊人，落后惊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与世界各国的集邮文化交流逐步恢复，日益增多。中国集邮界以崭新的面貌重返国际邮坛。1982年创刊的英文《中国集邮》季刊，发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次在国际邮(刊)展上获奖。1983年，为了使美国和加拿大读者能及时看到《中国集邮》杂志，根据中国集邮出版社和美国万国首日封公司的协议，《中国集邮》从该年第3期开始，增出北美版，由美国万国首日封公司印刷和发行，第一期印量即达6千份。

1983年7月27日和8月12日，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先后被接

纳为“国际集邮联合会”正式成员和“亚洲集邮联合会”正式会员。国际权威的集邮组织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集邮界的身影，并开始在国际邮坛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中国邮票独特的民族风格和崭新的风貌，在国际邮坛卓尔不群。为了加强对外宣传，让更多的各国集邮者了解中国邮票和中国集邮界，1979 年 8 月 25 日至 28 日，中国邮票总公司参加了在意大利举行的“里乔内第 31 届国际邮票博览会”。这是“文革”后我国首次参加国际邮展，邮电部为此特发行纪念小型张（在《万里长城》小型张上加字）1 枚。以此为开端，1979 年到 1980 年，又分别在香港、日本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展览”时发行了邮票和小本票。（图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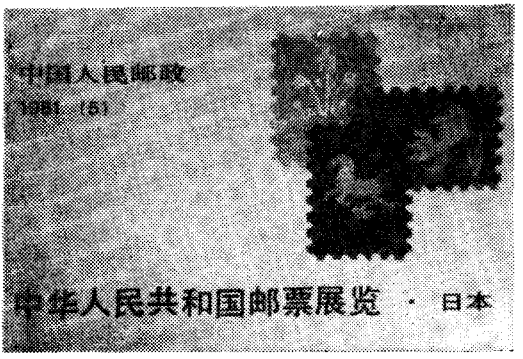


图 56　日本“中国邮票展览”小本票

1979 年 11 月 10 日至 25 日，中国邮票总公司和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联合在港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展览”（图 57），观众达 13 万人次，出售邮票、集邮品收入港币 60 万元，特供邮票成交港币 120 万元。此后，每年中国参加的国际（世界）邮展和接待各国来华举办邮展日益频繁。中国邮票博物馆从 1986 年 4 月墨西哥邮展开始，发行我国参加国际或外国来华邮展系列纪念封，成为集邮界一个新的热门收藏专题。

为了宣传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百多年来中国邮票全貌，中国集邮总公司还经常出国办邮展。1986 年 1 月在新加坡举办了“1986 年中

国邮票展览”，9月在香港举办了“中国邮驿史展览”，分别展出了1865—1985年中国邮票、实寄封和包括从战国、秦、汉一直到明清各朝代有关的邮驿文物、史料，被当地集邮界视为极难得的交流。

图57　香港“中国邮票展览”图册

中国邮票在国际上的声誉一直较好，“文革”虽造成一定损失，近十几年影响又不断扩大，尤其在日本、东南亚等国家收集中国邮票的风气很浓厚。日本邮趣协会每年还专门举办评选中国最佳邮票活动。许多国家的集邮者千方百计与中国集邮者建立通讯联系，交换邮品。一位捷克集邮者1989年在中国《集邮》杂志上刊登征友启事后，收到中国800多位集邮者的信，希望与他建立邮谊，使他出乎意料，惊喜万分。许多中国集邮者还加入了一些外国著名集邮组织。通过无数集邮者之间的民间之桥，世界各国集邮品也源源不断地飞向中国。

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逐步开拓邮票国际市场，扩大中国邮票出口贸易。中国邮票以其独具风采的民族特色，日益赢得各国集邮者的青睐。目前，中国已在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和香港地区建立了10多个中国邮票代理机构，使新中国邮票可以销售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邮票出口额增长迅速。1986年出口邮票创汇200多万美元，比“文革”前增长20多倍。

中国邮票在美国受到很高的礼遇。1979年6月25日，邮电部发行《万里长城》特种邮票1套，美国万国首日封公司为此专门设计印制了《万里长城》邮票首日封、首日邮票样卡和首日集邮画报，并由中国邮票总公司加盖特制的纪念戳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发售。

1980年10月25日，美国怀俄明州夏延市的首日封博物馆开设中国首日封专题，展出他们印制的中国《东北虎》、《云南山茶花》、《万

里长城》等邮票的首日封，刘继卣、任宇、万维生等为这些首日封作画。

1980年4月，中国邮票总公司与日本邮趣服务社签订总经销合同，规定日本邮趣服务社作为在日本出售中国发行的邮票和集邮品的总代理。

1980年11月，中国邮票北美代销局在美国怀俄明州夏延市成立。

越来越多的外国邮商、邮刊更重视中国邮票。美国有一家老牌的明库司邮票公司，30多年来一直看不起新中国邮票，从不办理经销。1983年，当它看到后起之秀——美国邮商海尔泽尔因经营中国邮票大有压倒自己的趋势时，才慌了手脚，转过头来向海尔泽尔订购新中国邮票。

英国的几家集邮刊物都一再发表文章，称赞中国邮票具有迷人的东方民族艺术特色，而且面值低，每个月只需1.3英磅就可以集齐中国新发行的邮票。1983年世界发行量最大的英文集邮周报《林氏邮票新闻》载文说，中国邮票反映了中国的文化、历史、地理、艺术、建筑和风土人情，男男女女以及他们的思想。中国邮票是反映中国灿烂文化的一个窗口。英国《外国邮票》杂志，还以三整页全文转载了英文《中国集邮》杂志的文章《通过普21邮票旅游中国》。通过邮票展示了中国如诗如画的秀丽山水，引起读者极大兴趣。

中国邮票在国际邮坛赢得的声誉越来越多，令世界集邮者对中国邮票刮目相看。

1980年9月19日至25日，“罗马尼亚——中国邮票展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罗马尼亚专门发行了1枚“罗中邮票展览”纪念邮票。(图58)

1981年10月22日，日本集邮家水原明窗中国邮票藏品展览在北京开幕，11月3日起移往上海展出。展品包括许多中国清代和解放区邮票、实寄封等珍品。

1989年7月，在法国佩里格举行的第三次政府间邮票印刷者会

议上，《中国兰花》邮票被评为最佳胶版印刷邮票。

图 58　罗中邮票展览纪念邮票

1990 年 3 月 3 日，中国邮电部发行“诺尔曼·白求恩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邮票，1 套 2 枚。同日，加拿大邮政部门也发行了同一图案的 2 枚 1 套的纪念邮票，邮票图案由中国刘向平设计。这是第一套由中外联合创作发行的同题材、同图案邮票，是中国邮票走向世界的新成果。

但是，中国正规的邮票进口业务却迟迟难以开展。集邮者新添的外国邮品基本是靠少数邮商走私购进或集邮者们与国外邮友通讯交换得到的。这种状况无法满足收集外邮和专题集邮者的需要。多年来，要求国家进口外国邮票的呼声一直不断。

国际交往为我们打开了眼界，启发了新思路。大量国外邮品、集邮理论书刊、集邮用品陆续引进中国，促进和提高了国内的收藏研究水平。广大集邮者由过去单纯搞系列传统收集，转向从事专题、主题收集。邮集和邮展贴片的设计制作大为改进。全国开始按国际规范组织邮展，并拥有了一支国际级和国家级、省级的邮展评审员队伍。从集邮思想方法、人员素质等各方面，都在向国际水平迈进。

近几年，中国邮集参加国际邮展竞赛获奖次数不断增加。1986 年 8 月，天津集邮家游乃器的《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实寄封选粹》邮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邮展”上，首次为中国荣获镀金奖牌。1986 年，集邮家刘汉超在第二届亚洲国际邮展上以《中国解放区邮票》邮集荣获大银奖。1987 年 10 月刘广实的邮集荣获丹麦世界邮展镀金奖。1987 年，《集邮》杂志在加拿大国际邮展上荣获镀银奖。仅 1989 年，在国际集邮活动中，我国就有 15 人(次)的藏品和文献参展，获得大镀金奖和镀金奖等好成绩。1990 年 5 月，集邮家沈曾华的《华东解

放区邮票》传统邮集，在伦敦世界邮展中获金奖。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国际邮联赞助的世界邮展中获得金奖，也是沈曾华继1988年8月在布拉格世界邮展中获大镀金奖后的新成就。这不仅为中国集邮"走向世界"迈出了重要一步，也令国际邮坛对中国解放区邮品刮目相看。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目前中国的集邮还处于世界的中等水平。如何使中国集邮事业走在世界前列，使中国邮集获得更高的国际声誉，这是一个牵动中国集邮界几代人心弦的课题。

1988年4月22日，亚洲集邮联合会在北京召开了执委会(扩大)会议。这是自我国加入国际集邮组织以来，首次在我国举行的国际集邮组织会议。7月，全国集邮联等单位联合组织了"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来自美国、日本和港、澳等8个国家和地区50位集邮人士应邀参加。中国集邮界通过逐步扩大与国际集邮界的合作交流，在国际邮坛发挥着积极作用。

进入90年代，中国集邮界为了实现走向世界的战略目标，着眼长远，立足基础，在培养人才方面又迈出了新的步伐。

1990年6月，针对我国对国际集邮先进经验以及集邮展览、评审的有关规则介绍得不够全面的问题，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专门将国际集邮联合会颁布的、目前仍在实施的集邮展览总规则和评审总规则，及其所属各集邮委员会依据总规则分别颁发的专用规则、实施细则翻译、编辑成《集邮展览与评审各项规则(FIP)》，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全面介绍国际集邮展览各项规则的专用集邮工具书，它有助于中国集邮界了解国际集邮发展动态，提高邮集与征集、评审水平。(注：1992年，人民邮电出版社又出版了《集邮展览与评审规则》一书，收入最新的有关资料)。

从1989年起，全国集邮联邀请了国际邮展评审员、新加坡集邮家陈为乐来中国进行集邮讲学，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福州、广州、西安等地讲课。陈结合国际邮展评审规则和他的实践经验，生动细致地传授，使各地集邮者加深了对国际邮展上如何才能取得成功的理解。

“心以积聚而起悟，邮以渐博而相通”。

通过广泛深入的学习和交流，中国集邮界向世界集邮高峰迈进的脚步将变得更扎实有力。

第七节　邮市风波与新闻热潮

要集邮就得有邮品，但是从80年代初开始，从邮票总公司到各地的公司和门市部经营范围基本都是“三卖三不卖”，即：卖近期邮品，不卖早期邮品；卖新邮票，不卖信销（或盖销）邮票；卖中国邮票，不卖外国邮票。随着集邮人数和水平的增长，搜集早期票、信销票和外国票的集邮者越来越迫切需要有收集和交换的渠道。到后来，新集邮者的大量涌现，使集邮公司连近期邮品也满足不了供应。

这样，从80年代初全国各地就陆续自发产生了许多集邮者聚集的场所，大多是在市区交通便利的马路边或广场附近。这些被集邮者称为“换邮票”的地方，当年的确是以换邮票为主，买卖邮票为辅。为数不多的邮票小贩也仅仅手里拿着集邮册，供人挑选。这里平时人少，节假日人多，既交换邮票，也交流邮识，还传递邮品、邮展、邮票评选等信息，令人轻松愉快，是一方调剂余缺的集邮乐土。

应该说，这类街头集邮交换点的出现，是由于存在买邮票难、找外票难、交换邮票难等问题，群众自发采取的一种临时办法。它是国家集邮品供应主渠道不理想、不畅通，“大路不通走小路”的结果，它对促进集邮普及、交流和发展不无益处。

发展到80年代中期，换邮票的地方渐渐变成了买卖邮票的地方，内容和性质都在发生变化，各种问题也随之产生。一是人数越来越多，邮贩规模日益扩大，摆地摊的、叫卖的比比皆是，影响交通，有碍市容。二是为购买邮票发生的纠纷增多了。这样，集邮者眼中的邮票市场，在城市有关部门眼中成了“黑市”。国家仍然否定集邮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活动。

集邮界对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集邮流通活动极为关切，不断提

出批评和建议，呼吁开放邮市的要求日见高涨。这时，几件邮坛新事物又成了催化剂。

1984年初，上海市邮票公司设立了邮票信托部，专门办理收购寄售邮票业务。所经营的范围包括：中国各时期邮票、中外剪票及封、片、简等。信托部受到国内外集邮者欢迎，每日顾客盈门，当年营利2万元，1985年达5万元，以后逐年大幅度增长。

1986年10月16日，《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工作研究”文章《改革集邮管理体制，开放邮票市场》，文章认为目前国家的集邮管理体制“使得集邮领域成为当今中国在改革、开放、搞活一派大好形势下的一个沉闷的角落。”“开放邮票市场，给我国集邮者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上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在实践上存在着极大的可能。因为开放邮票市场是中国五百万集邮爱好者的强烈要求与殷切的希望。”

1987年1月9日，上海市集邮协会率先主办了邮品拍卖会，取得成功。这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首次举办的邮品拍卖活动，影响深远。紧接着3月29日，西安市集邮协会举办了首次邮票拍卖会。全国一时出现拍卖邮品热潮，规模不断扩大。10月9日，河南郑州、开封、洛阳、漯河、安阳、许昌的市邮协在郑州青少年宫联合举办了“中州邮票交换拍卖大会”。北京、上海、辽宁、新疆等地的集邮者也赶来参加。为期两天的大会吸引了2千多人，成交额达6千多元，当地电视台、电台都作了报道。

经过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国集邮市场的大门终于敞开了。邮票商社、邮商邮贩、邮品拍卖都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国集邮大舞台。

1987年底，广州市人民公园内，挂出了“集邮区”的牌子，围栏内上有瓦棚遮阳挡雨，下有水泥长凳歇脚，门口有人收门票，一切都安顿得井井有条。

1988年5月，北京月坛公园邮票市场正式开办，由北京西城集邮协会主持管理。开放时间起初是每星期4个半天，后来变成每周全天开放。邮协的理事轮流在邮市值班，使这里秩序良好，赢得声誉，星

期天人数达二三千人。

此时，全国各大中城市的邮市也都受到正式承认，许多地方还有了比较理想的固定场所。截至1991年，全国已形成60多个有一定规模的邮票市场，其中最著名的要属北京市月坛公园、上海市太原路街心花园、广州市人民公园、成都市暑袜街。

各大中城市的私营邮票社也纷纷开业，经营的品种越来越丰富，集邮品、集邮用品和书刊等无所不包。有些还开办函购、预订，创办营业性邮刊。

1988年12月11日，由北京东城区集邮协会主办，北京聚雅斋协助举办了“首届东城民间邮品拍卖大会”，800多人参加，其中许多是专程从外省市赶来的。会上拍卖品共261项，底价总金额30多万元，最后成交98项，成交额达26万多元。这次征集的拍卖品珍罕程度、成交数额均在国内拍卖活动中创下了纪录，一时成为国内轰动新闻。

1989年2月10日，邮电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税务局、海关总署发布《关于允许个体工商户经营邮票和集邮品的联合通知》。通知规定了核准、备案等手续，允许经营和禁止经营的业务范围。还明确规定：

“经营所需货源一律自筹，邮电部门及国营集邮企业不承担供货义务。严禁个体工商户与国营邮电企业职工内外勾结，大量套购邮票、集邮品，非法倒卖。”“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先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沈阳、南京、杭州、武汉、西安、成都十城市试行。”

邮海竞渡，百舸争流，一时间全国的集邮市场空前活跃。集邮界对此自然是喜，但对它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又不免担忧。关键问题是对集邮品的商品属性如何认识。

长期以来，对一些特有的经济现象，如集邮品在邮政使用范围外的买和卖，集邮品的增值等问题，常常是被当作集邮活动中的问题受到指责，似乎集邮品一变为商品就带有资本主义的铜臭。这种只承认集邮品文化价值而不承认其商品价值的作法，限制了集邮交换活动

的正常发展。

但是集邮品商品化是一把两刃尖刀，集邮活动既能受益于它，也会受损于它。由于受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影响，看重邮票具有保值、增值效能，把消费和储蓄资金投入购买邮票的“投资型”、“储蓄型”集邮者大量增加。有的老人把养老金买成邮票，以防止货币贬值；有的父母把独生子女费买成邮票，想为孩子的未来造福；还有的家庭把存款都变成邮票，期待比银行更高的增值。这些情况的出现，无形中造成市场票源和集邮者心理上的紧张和混乱，使买票难变得更难。

且看1989年第5期《集邮》杂志上《众叹买票难》专栏发表的几篇读者文章的标题：《买票难，劣质邮品强搭配》（大多是搭配积压的纪念封片之类，甚至还有利用集邮票品强迫集邮者参加邮政储蓄的事）、《买票难，往返奔走空受累》（一位集邮者为买《三国演义》邮票，乘车进城跑了七回，仍因“新票未到”落空）、《买票难，熟人来了开后门》、《买票难，战士集邮真遭罪》（因部队流动性大，战士办不到预订证，无法买邮票）。

邮票具有商业属性无可非议，但集邮丝毫没有商业属性。不幸的是，随着1988年全国刮起对各类商品的抢购风潮，邮票市场也渐渐变得不那么斯文了。投机性的倒买倒卖愈演愈烈，高尚的邮坛将被卷进投机的旋涡，不禁使集邮界由看不惯到群起而攻之。例如，1989年第3期《集邮》发表王路的文章《极不正常的现象》，指出：

“本来，邮品拍卖也应像其它艺术收藏品拍卖一样，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活动，拍卖的邮品也应是一些较珍稀的邮品。但目前各地所举办的邮票拍卖会大多是拍卖近期的J、T票。这些票品在经过各地拍卖会的推波助澜后，价格达到了惊人的高度。”

1989年8月的《辽宁集邮》发表张世成文章《集邮为了什么？》，文中说：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最关注的是手中的票子。他们在寻找着自己认为比较保险的人民币保值方法。有人盯上了金货，也有人瞄上了集邮，他们确信，邮票就是‘软黄金’，与其说这部分人是集邮，不

如说是在攒邮票、攒钱更为确切。”

虽然集邮界一直在千方百计防止邮市堕落，但是，此时的邮票市场已如脱缰的野马，绝非集邮界所能驾驭。到1991年，一场中国集邮史上罕见的邮市“疯”潮席卷全国，各地邮市猛烈升温，价格持续暴涨。其中的兴风作浪者，是曾经倒卖过家电、摩托车、国库券、债券、股票、服装、药材等各式各样的“倒爷”。他们在其他行业里钻营冒险，发了大财，腰缠万贯之后又在寻找新的机会。他们盯上了邮票市场——这个无照无税，有利可图的好地方。于是，“大款”、“炒手”们携带巨额资金，施展娴熟手段，向邮票市场袭来，演出了一幕惊心动魄、鬼使神差的闹剧。

这场风潮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首先刮起炒早期J、T邮票的妖风。被倒爷们大口“通吃”的许多俏票价格像断了线的风筝。最典型的数1980年发行的生肖“猴票”，1990年8月，从每枚30元涨到60元，1991年2月涨到110元，6月初，四方连已突破千元大关。而1974—1982年的全套J、T票要价已高达万元以上。从5月开始，近期发行的小型张摇身一变成为热门货。1991年6月25日上午，“杜鹃花”邮票在昆明工人文化宫举行首发式，当邮迷们围住设计者签名时，距文化宫几百米的邮票市场上，成封（一封100枚）的“杜鹃花”小型张正在被邮贩们炒卖。面值5元的小型张价已升至12元，发行当天就涨价140%。

一天，4个上海年轻人乘飞机抵达昆明，他们随身带着装有10万元现金的密码箱，来到昆明巡津街邮市后，立即摆出两块牌子，一块上写：“大量收购杜鹃花邮票，每版600元。收购小型张，数量越多，价格越优。”另一块上写着：“收购各类邮资明信片”。很快，他们带着大量邮品满载而去。到8月份，发行仅2个月的“杜鹃花”小型张成交价竟达到原面值的500%。

1991年8月14日，一位倒票大老板和几个帮手，在成都暑袜北街邮市旁的茶馆里，仅用3个多小时，转手批出100盒（即封）“大龙110周年”小型张、72盒“邮联二大”小型张、45盒“国庆40周年”小

型张、2包“亚运会”小全张，获得利润3.4万元。

一天，在成都一座高级宾馆的客房里，本地和外地的邮贩正在做生意：一方交出的是4包“三元中”的“铜车马”小型张，一方交出的是12万元现金，然后各自东西。“三元中”是邮贩们的行话，指的是直接从邮局里拿出来的原包装、原封、原袋小型张，每包20盒。袋口是用滚子热合密封的。这种“三原”货是邮市上难得一见的珍品，其来源只能是黑道。

与此同时，邮资封片也被炒得滚烫。1991年5月28日，北京月坛公园邮市上出现了2名南方邮贩，他们声称专门收购“区票展览”邮资片，有多少要多少。起先以30元1枚“吃进”。当地邮贩们感到这阵风一定有来头，也跟着大“吃”，于是水涨船高，到下午，这种邮资片已涨到74元1枚。其他邮资封片的价格，数月内也随之以10倍、20倍的幅度猛涨。

另一项被炒得热火朝天的是整版邮票。“卖出一版猴，可盖一层楼”成了生动写照。

几个月内，各大城市的邮市上都出现了公开的倒卖团伙。但见出出进进的大老板，挎着进口的“大哥大”，手上提的密码箱里，不是成千上万的钞票，就是成千上万的整盒小型张，身后跟随着保镖。为了方便交易，整盒小型张不拆封光点数，看看边口是整齐的刀路，塑料封皮是机器热合的，断定是原封就行了。为了省时间数钱，一律用100元面额的。于是邮市上还有一种生意：把1万元10元面额钞票换成100元面额的，要收取5元“手续费”。就这样，举手投足之间，小型张像变戏法一样，使成万元、成十几万元的利润轻而易举地滚进了腰包。6—8月，北京月坛公园北门外，几乎天天停放着几十辆各式小汽车，邮市内晃动的密码箱不下100个，“大哥大”也有20多部。每天带进邮市的现金至少在5千万元以上。

6—9月，炒的最热的小型张有20种，版票20余种，封片近30种。正像人们总结的那样：“羊年邮市几大怪，新票比旧票增值快，存量越大越好卖。”越是新发行的邮票，越容易涨价和出手，原因无非是

新发行的邮品好收购，便于垄断。在倒腾高峰时，一批邮品每天易手不下三四次。

有人估计，仅1991年1至9月份，在国内各邮票市场进行的邮品交易总额不下2千亿元，投入邮市的资金约300亿元。邮票市场完全是大大小小倒爷们的天下，邮品交易绝大多数是在他们之间进行的。他们凭着雄厚的资金，买了就卖，赚了就走，人为操纵着邮市的涨落。邮品只不过是他们手中赌博的筹码，投机的工具。

真是野牛闯进花园里，才正式开办3年多的邮票市场，已经被金钱淹没，成了批发市场、股票市场，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名符其实的黑市。对此，广大集邮者无不痛恨，强烈要求进行彻底整顿。

1991年9月19日上午，上海徐汇区工商局、公安局等联合行动，在邮市上抓获一批倒卖者。第二天，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取缔上海邮票非法交易市场》。几天后，太原路邮市恢复开放，但规定，整封的小型张不许公开买卖，版票每次的成交量只限10版，还派了几名警察在邮市维持秩序。邮倒们惊呼上海"下课"，预感到前景不妙。

11月9日，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工商局、文化局决定停办月坛公园邮票市场，邮倒们又哀叹北京"停电"了。11月11日，《北京晚报》发表文章《打碎"怪圈"——月坛邮市昨天停办》。文中指出，月坛邮市成了地道的商品市场，原来意义的集邮活动已"退居二线"了。今年以来，邮市上买卖纠纷、打架斗殴、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偷盗抢劫现象经常发生。仅各类刑事案件发生了27起。

11月11日，路透社对此事作了报道。11月17日，中国的《参考消息》报转载了路透社的评述："北京的邮票自由市场，曾经是中国首都最接近证券交易的金融活动，吸引了数以万计急于发财的赌徒。在中国，邮票买卖是最佳的证券投资方式。"

11月23日，成都也贴出《安民告示》，规定"凡在兴隆街集邮市场收集邮票者，必须在五日内到街道办事处办理手续，否则发现后进行处罚。"

邮市狂潮被刹住了。各地都对邮市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整顿，随之

各种邮品价格大幅度下跌。中国的邮票市场又恢复了理智。痛定思痛，出现这场大风波的原因是错宗复杂的，但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这是大的经济环境影响的结果。1991 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总额已达 8 千多亿元，手中握有的现金也有 2 千多亿元。上万亿元的资金在寻找增值的机会。1991 年 4 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行第三次下调储蓄利息，引起人们担心存款贬值的焦虑。1990 年 10 月，中国集邮总公司对邮票价格自 1980 年以来第九次调整，调价平均增长率为 137.4%。这一调一降，无形中刺激了人们“存钱不如买邮票”的意识。而倒爷们投入数百亿元的巨额资金，是造成邮市地覆天翻的直接原因。

其次，集邮品大量流入邮贩手中是重要的条件。邮票是国家独家发行、垄断经营的特殊商品，国家有明确的管理制度。1989 年 2 月，中国集邮总公司曾提出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七个不准”。但是，仍然存在漏洞，个别人通过内外勾结，行贿受贿、截留截转、冒名预购、搭配出售等各式各样的违法乱纪行为，经由内部渠道将原装版票、原封小型张等邮市上紧俏的主要交易品，源源不断地大量流入邮贩手中，使得倒爷们能够囤积居奇，倒买倒卖。

第三，执法不严、缺乏管理是造成各种混乱局面的重要原因。多年来，绝大多数的邮票市场没有管理机制。公安、工商、街道办几乎是不出大事不来管。许多邮市靠当地集邮协会代管，但是又有什么权威呢？由于治安、营业、税收等缺乏管理，处于放任自流的失控状态，自然变成了团伙作案、黑道横行的自由市场。

1990 年 2 月 10 日，邮电部、国家工商局、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发布的联合通知，明确规定个体工商户经营邮品必须登记、纳税。但是，全国各地不登记、不纳税的邮贩何止成千上万，谁去检查处理？执法不严，形同虚设，从而使倒爷们放心大胆地倒、为所欲为地炒。

有后果必有前因，这些深刻的历史教训，太值得人们深思了。

震惊邮坛的这场邮市风波，引起了新闻界的极大关注，随之形成了报道评述热，这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

新闻界曾对邮票交易活动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作了少量的报道。例如，1985年《司法》杂志发表了《猴方连邮票之谜》，披露一起与邮票交易有关的案件。

1987年起，针对邮票市场活动的报道评述逐渐增多。例如，1月，《法律咨询》发表《疯狂的邮迷》。5月，《演讲与社交》发表《邮票贩子与邮票自由市场》。7月，《追求》杂志发表《来自邮票交易市场的报告》。

1988年，新闻界对邮票市场和邮票拍卖活动的发展进一步重视，开始形成被称为"集邮透视热"的高潮。这一年，仅《中国青年报》就连续数月发表文章：7月发表《来自邮品拍卖场的信息》，8月发表《邮贩子管窥》，9月在头版发表《集邮市场不见了"游击队"》，12月发表《北京邮品拍卖目击》。其他一些报刊也大量发表集邮内容的文章。其中1988年9月10日《四川日报》发表的《有钱去买邮票》，因提到"有钱还不如买邮票"，颇受集邮界非议。文中有一段大学教师的话很生动：

"集邮比存钱、购物有意思。你不可能把存折拿出来天天欣赏吧？也不会买七八个彩电、冰箱放在家里吧？可集邮不同，既能存储保值，又能给人以乐趣，何况集邮是一种高雅的业余爱好呢？"

1989—1990年，新闻界对邮票市场的关注有增无减，范围更广，社会影响面更大。《经济参考报》、《国际商报》、《了望》周刊、《法律与生活》、《生活周刊》、《青年一代》、《四川青年报》、《成都工人报》等30多家报刊分别发表了一些大块头文章。如"《魂断方寸间》、《中国邮票文化透视》、《形形色色的伪造邮票案》、《方寸之间起狂澜》、《当代集邮市场鸟瞰录》、《集邮市场邮价暴跌现象分析》、《集邮弥漫铜腥》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到了1991年，随着邮市疯潮升温，新闻界的报道述评热更加高涨。《北京日报》、《工人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金融时报》、《改革时报》、《成都晚报》等，又发表了一批有份量的文章，如：《猴票》、《邮票市场忧思录》、《小邮票大世界》、《邮票里的经济学》、

《邮票价格为何猛涨》等。8月21日、27日《四川日报》发表《邮票价格疯涨探源》(上、下)。9月7日,《经济参考报》头版头条刊出《邮票"疯"了》,光看标题就够吸引人的。

据不完全统计,非集邮报刊发表的这类"集邮透视"文章,1988年不到10篇,1989年约12篇,1990年约17篇,1991年已近40篇,数量呈上升趋势。新闻界出现的这股热潮有一些显著的特点:绝大多数围绕集邮经济领域中的流通、价格、管理、心态等热点问题进行调查采访,对集邮热中反映出的种种不正常现象进行观察剖析。由于对邮票市场活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影响非常敏感,一般都揭露的比较全面细致,分析的比较尖锐深刻。当然,也存在一些文章内容重复,观点雷同的现象。

对于这些披露和分析文章,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认为是推波助澜,明为劝告,实则传播生财之道,"点醒了不少人",向人们暗示"存钱不如买邮票"。"暧昧的新闻导向便如孙悟空偷来的假芭蕉扇,扇不灭火焰山的大火,反倒使烈火冲天,连自己的屁股也被烧焦。"(陈伯君、胡文忠《中国邮市忧思录》1992年版39页)

是真心灭火还是火上加油,问题的焦点似乎出在新闻舆论的动机与效果上。新闻界对邮市的关注和过问,对呼吁全社会重视纠正歪风邪气,提倡健康文明的集邮道德风尚能够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它反映出集邮文化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较大的新闻价值。这对集邮的发展是一种促进,无论如何是好事情。邮票市场发生的犯罪和混乱,是有关部门失控和失职造成的。新闻界挺身而出,公开抨击,不说劳苦功高,至少也应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一大批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仅长于新闻分析,而且是训练有素的大手笔。他们介入邮市采访后,往往能以职业的敏感,从不同的角度入手,运用新颖的文笔,写出全景式、多层次、大块头的特写和述评,对集邮文化的各种社会现象进行不讲情面的披露和深入的分析。因而这些文章令人耳目一新,格外生动、有份量,它们将成为重要的集邮历史文献。这一大批闯入邮

坛的“不速之客”，是集邮界缺乏的人才，他们是集邮文化研究的一支生力军。

第十章　华邮牵动同胞心

第一节　海峡彼岸

台湾省1949年起与大陆隔绝，天各一方。从此两岸的集邮活动鲜为对方知晓，实为中国邮坛一大不幸。与大陆同胞相比，台湾民众对集邮的热爱，有过之而无不及。

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退台湾，重设邮政总局。最初使用的邮票都是大陆旧存民国票加盖。以后台湾改革币制，1950年6月26日发行第一套在台湾印制的新台币邮票，图案为民族英雄郑成功像。很多台湾集邮者的台湾邮票集，都是从这套票开始的。

1953年8月9日，台湾"中国集邮协会"在台北成立。成立集会上还通过一项重要议案：把每年的8月9日定为台湾"集邮节"。1963年8月9日经当局批准，"集邮节"正式诞生，对推动台湾地区集邮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集邮协会"是台湾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集邮会。现在编号会员已达6400多人。该会出版两种刊物，一个是供会员内部阅读的《会务简讯》，一个是1954年6月创刊、每年出版两期的《中国邮刊》。《中国邮刊》主要刊载学术性集邮论文，全部涉及中国国邮，如"红印花"、罕戳等。台湾的著名集邮家均为该刊撰稿。对"红印花"、"大龙"等邮票的研究，虽研究者稀，但关心者众。由于该刊乐于扶植，因而这方面的著述不断，成果常新。

1956年8月26日，"高雄市邮学会"成立，该会又名"宝岛邮学会"。是台湾第二大集邮会，现有编号会员3200多人。会刊《宝岛邮讯》已出版200多期，有从不脱期之誉。30多年来，该会最大的成绩是出版集邮学书籍，普及集邮知识。现已出版《宝邮丛书》11种：《中

国珍邮收藏手册》、《中国古艺品邮票》、《集邮谈》、《联合国邮票》、《集邮教育讲义》、《观戳记趣》、《碧海青天方寸游》、《宝邮封目录》、《宝邮30年》等。该会另一大特点是，30多年来随同新邮发行，坚持自己印制首日封，设计新颖，别具一格，从未间断。

1959年，台湾出现“集邮热”，有十几个县、市先后成立邮学会。但大多数没有坚持几年即停止活动。只有“台南市邮学会”一直坚持活动，并发展成为台湾第三大邮会。现有编号会员1500多人。该会有两大特色：一是每年举办“四季邮展”，分春、夏、秋、冬四次，从不间断。二是长期举办“专题讲座”，每月一次，也始终坚持不懈。

据统计，台湾现有集邮爱好者13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0%。这个比例与一些发达国家相近。台湾《今日邮政》介绍：1990年，台湾全年集邮收入达新台币2.79亿元。全台湾现有县、市级集邮组织9个。另外，台湾28所大专院校和124所中专大都成立了邮协、邮会之类的组织。各学校对学生的集邮活动都很重视支持，每年专门给集邮组织拨出专门经费，使之有能力经常举办邮展和其他活动。

台湾的各类集邮刊物有20多种。其中比较出名的有：1958年1月创刊的《今日邮政》，由台湾“邮政总局”编辑，内容为邮政与集邮兼顾。1966年创刊的《新光邮钞》，由台湾新光邮钞杂志社出版，其发行量为台湾民间邮刊之冠。1981年9月创刊的《邮林》，由台中市中兴邮学会主办。还有《大众集邮》、《收藏家》、《邮通月刊》等。

台湾出版的集邮图书，比较著名的有晏星编著的《邮谭》(一、二集)、《图解邮票辞典》，王桥栋编著的《集邮小字典》，还有《古代邮驿与书信故事》、《中国邮票图鉴》、《红印花邮票》(上、下编)等。1977年，在台湾有“大龙”专家之称的陈志川病逝后，台湾先后出版了《陈志川邮学论著》、《谭邮》(纪念陈志川专辑)。《谭邮》由台湾802邮友俱乐部主编，1986年出版的这本纪念专辑，第一部分是台湾集邮家撰写的18篇纪念文章，第二部分是陈氏的著作辑录，第三部分是陈逝世后的悼念文章。为已故的集邮家出版纪念专辑，这在中国集邮历史上尚属首次。

台湾的各类邮票商社有200多家，私人小邮刊也种类繁多。最具特色的是还有专售邮刊的商店，世界上主要邮刊都有售，30—40年代大陆出版的一些著名邮刊，也有全套影印本出售。

目前，台湾集邮者大多以集民国票、台湾票为主，集有成就者多问鼎中国清代珍邮。80年代中期开始，收集大陆邮票渐成风气，许多邮刊也以较大篇幅介绍大陆邮票和集邮情况。

台湾每年发行新邮票15—18套，印数一般在100—300万枚间，远少于大陆邮票发行量，因而升值较快。1967年6月，台湾发行故宫古画"清明上河图"邮票，这是台湾首次以五连张一套印制的名画邮票，立即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爱好者。发行时，台北邮局门前车水马龙，人声鼎沸，邮迷们彻夜排队，长龙蜿蜒数公里。台北各大报也以大量篇幅争相报道，轰动一时。随即，在台湾掀起了又一次集邮热潮。台湾每年发行的古画邮票从此成为最受欢迎的热门专题之一。

台湾邮政总局设有集邮处，专门向本地和外国集邮者供应新发行的邮票。每发行新邮票之前，总局都专门彩印"集邮报道"，免费寄给长期订户，介绍新邮票的有关情况。在新邮票发行的前2天，台湾各邮局都出售专供集邮者制作首日封用的彩色首日信封。集邮者提前买回能从容填好地址、姓名，买到新邮票时一贴就可以寄发或加盖纪念戳，十分方便省时。台湾有44个较大的邮局可以办理邮票函购业务。到1989年，台湾因有集邮业务而获得划拨帐号、以利集邮者免费汇款长期订购邮品的邮局达到51家，有的邮局长期订户超过4000户。

为了普及和推广集邮活动，台湾邮政当局极力宣传集邮具有"益智、怡情、储财"的功效，并针对集邮者中约有60%是青少年，十分重视辅导青少年集邮。从1971年起，台湾邮政当局开始组织"集邮研习会"，每年利用寒暑假招收近百名各学校集邮社团的青少年集邮者，进行集邮基础知识、邮集制作、国际集邮活动新动向的讲习活动。通过这种形式，已经培训了几千名青少年集邮活动积极分子。

台湾邮政部门很重视各集邮团体举办的邮展和各种重大活动，

有这些活动时均设立临时邮局，刻制使用纪念邮戳。每年还由《今日邮政》杂志编印出版《台湾邮区纪念邮戳》编篇，图文并茂，如同邮票目录一样，成了台湾集邮者必备的工具书。

台湾的集邮爱好者很重视收集邮戳。1983 年 6 月 6 日台北市的第 100 支局开业时，邮迷们蜂拥而至，都以得到该局首日戳为一大乐事。

1984 年 10 月，座落在台北市重庆南路的台湾邮政博物馆新馆建成开馆。在这座现代化的博物馆里，收藏着大量台湾地区各类邮政、邮票、书刊资料，其中有不少是海内外华人集邮家捐赠的。虽然其馆藏品在中国清代、民国早期档案史料方面逊于大陆的中国邮票博物馆，但仍不失为一座珍贵的集邮文化宝库。

台湾邮政博物馆也是台湾开展集邮活动的重要场所，这里除常设展览外，还经常在新邮票发行之日，举办与新邮票内容相关的专项展览，而且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别具特色。比如，在发行蝴蝶邮票时，举办蝴蝶标本展览；发行“美国志愿队暨十四航空军来华作战 50 周年纪念”邮票时，举办展览会，同时邀请陈香梅女士出席并讲演，从而吸引了大量的集邮者前往。每年来邮政博物馆参观者达上千万人次。

随着集邮活动的深入，台湾对集邮史料的整理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1990 年，由台湾“邮文联谊会”出版了台湾第一本集邮年鉴——《集邮汇报》。这本由钟火盛任总编辑的工具书，包括 1988—1989 年度的邮政、集邮组织、服务、统计等资料，还有记事与资讯（信息）、邮学论著等摘要汇编。

目前，台湾著名的集邮家有：

黄建斌，曾担任中国集邮协会的理事长，是“英国皇家集邮学会”会士、台湾《中国邮票目录》、《大龙邮票封戳选辑》编委。他择精取萃，专集大“龙”、“小龙”邮品，现存世仅 1 枚的盖有最早日期销印的“大龙”票实寄封为他所藏。他在海内外华邮收藏家中成就斐然。

吴乐园（浙江东阳人），建筑工程师。是一位有 50 多年邮龄的老集邮家。在台湾期间，吴乐园编著有 3 本书：《红印花加盖邮票全集》、

《吴氏邮票让品目录:红印花加盖邮票专集》、《海关档案中有关台湾邮政创设之资料》。他早年在大陆参加新光邮票研究会。抗战时期在重庆,他的中国早期珍邮已很出色。他收藏的一部《红印花专集》,构思精邃,其中"红印花小字当壹元"票有2枚。他还是台湾英文《中国日报》的集邮专栏作家,文思汹涌,华章纵横。

潘安生(江苏苏州人,1919年生),集邮笔名晏星。他在邮政部门服务40多年,曾任台湾邮政博物馆馆长、邮政研究所所长、邮政总局副局长等职。潘安生编著和翻译过大量集邮书籍,如《邮人邮话》、《集邮初楷》、《赫德史话》、《邮史漫谭》、《怎样做个小集邮家》、《图解邮票辞典》、《大陆邮票寻幽》等,是位高产学者。

薛聘文,邮史研究专家,著有《中国邮资考》、《中国邮资》等书。

在1990年伦敦世界邮展上,台湾选送的3部邮集全部获得金牌。其中,张敏生的《1897年加盖邮票》获金奖加特别奖;黄建斌的《大龙邮票》获金奖;刘文泉的《蟠龙邮票》获镀金奖。这是台湾以台北集邮协会名义参加国际邮联后,第一次参加世界邮展。一鸣惊人,显示出台湾在古典华邮收藏研究方面的雄厚实力。

台湾的集邮活动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邮展和邮刊连续性很强。台湾每年举办一次全省性的邮展,自1974年以来,从未间断,许多集邮组织定期举办的邮展也始终坚持。无论是官方或民间组织,邮刊印刷质量高,装帧讲究,有些30多年从不脱期。各类研究著作、工具书出版很多。一些集邮会专设有图书室,向会员提供各类研究参考资料。

二、集邮学会活动活跃,如长期坚持举办青年辅导讲习、巡回邮展、专题讲座、邮刊作者联谊会等。与海外邮界的联系也很广泛。

三、所有邮学会均为民间组织,会务自理、财务自负,县、市邮会都有固定会址。一般内部机构设置周全、分工细密,如"中国集邮协会"设有发展、国际、研究、编辑、辅导、财务6个委员会,及会籍、会讯出版、图书资料、公共关系、票品流通、总务、会计、文件、服务等9个组。

台湾集邮事业的发展，也有一些不如人意之事。还是让我们听听台湾集邮界是如何评说吧。台湾台中国立科学馆馆长汉宝德是位艺术评论家，多年来以“也行”笔名在报刊发表“邮评”，内容辛辣与幽默兼而有之，其中对台湾邮票设计颇多不满。1970年，他在报纸“门墙外话”专栏发表题为《批评与自省》一文，文中称：“台湾的邮票确有不错的。但那若不是古人的画好，就是蝴蝶长得翅膀好，或塔养家使兰花花朵开放得好，谈不上设计的本领。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的邮票每出一张均能独创新意，有民族的气息，有现代的美感，那样一来，说不定我也要开始集邮了。”

1990年1月，汉宝德又在《联合报》上发表了《方寸之间》一文，谈到：“不知是甚么道理，我们的邮票是我所见的世上最难看的邮票。很高兴，最近看到民生报的文化版，大篇幅的谈论这个问题，邮局的先生们也出面正式沟通了。我的感觉是，我们邮票设计改革的时代来临了。”“这一次，如果不是大陆政策改变，我们得以比较台湾与中共的邮票之间的差异而感到脸红，那里会把不满方寸大小的邮票设计闹成一件大新闻！”

1987年，怡峰在台湾《新光邮钞》140期上发表的《从“邮识”到“邮学”》一文，则针对台湾集邮活动存在的隐患，单刀直入，很有代表性：“目前，台湾邮坛很热闹——可以从排队购买新邮得到证明；但邮识并不普及——可以从乱盖邮戳，不订不读邮刊得到证明；邮学研究更不风行——可以从邮协学术组的有名无实，邮刊质量不高得到证明。有些集邮者只是为了谋利更无邮识。”

台湾邮刊上的许多文章极有棱角，有的文章对人对事批评时不讲情面，读者都不免捏一把汗。文笔犀利，也不失为台湾集邮界的另一大特点。

第二节　来鸿去雁

海峡两岸明月共照，同属龙传。因历史的原因，鱼雁被阻达40年

之久。造成同胞离散之苦，使邮人邮学无法切磋交流。

50年代，大陆《集邮》杂志曾不断告诫集邮者，不许收集台湾的“反动邮票”。台湾当局更视大陆邮票为洪水猛兽，集之有“资匪通敌”嫌疑。在岛内函件邮票上大量加盖诸如“保密防谍”、“检举匪谍”之类的宣传戳。

进入80年代，海峡局势缓和，大陆与台湾集邮界的民间交往出现转机。据《香港快报》1980年3月12日报道，尽管台湾当局绝对禁止大陆出版的刊物进口，尽管当时大陆曾试图绕道美国和日本，把一些不涉及政治的纯科技刊物运入台湾，但皆被台湾有关当局查缉取缔。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复刊的《集邮》杂志，至该年3月10日止，已有4500本进入台湾，并且顺利避过官方耳目而送达读者手中。另外至少有1万本仍在“渠道”中待运。当然当时不可能在邮票店里公开销售，而是向经常有生意往来的集邮者批销，和暗中接受直接订户。仅从这一点看到，《集邮》在沟通海峡两岸交流上有着其他手段所替代不了的“功效”。

由于《集邮》的流入，台湾集邮界看到了大陆的集邮研究现状，产生了强烈反应。两岸集邮界绕道第三国或香港，逐渐开始来鸿去雁，重叙邮谊。这正是：海水未热“邮”先热，邮路不通信已通。

1982年和1986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集邮联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分别发出“致台湾集邮界同仁书”，衷心欢迎台湾邮友同仁前来大陆交流邮品，切磋邮学，互通信息，以维邮谊。并一再呼吁台湾当局尽快恢复大陆与台湾之间包括通邮在内的“三通”。

1982年1月，在长沙市烈士公园的浮香艺苑举办了“统一祖国、振兴中华邮展”，邮展印制了3000枚纪念封。这是大陆首次举办此类邮展。

1984年9月，民间邮刊《甲子邮刊》在湖南长沙问世，主编黎泽重。该刊是16开4版铅印月刊，创刊号上开宗明义：“本刊以振兴中华，统一祖国为宗旨；以沟通海峡两岸邮友、同胞联系为己任。”这份邮刊成了两岸交流的报春燕，在大陆和台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85年10月10日至16日，为纪念辛亥革命74周年和孙中山诞辰120周年，民革四川省委员会在成都市举办了“海峡两岸邮票展览”。邮展共展出大陆和台湾邮票2600余枚，展品共分孙中山邮票、台湾邮票、大陆与台湾同一题材的邮票三个部分。展出期间特制了纪念封和纪念戳。邮展在当地成了轰动新闻。

1986年2月，西安铁路局“西方文化社”在西安举办“台湾邮票展览”。这是大陆首次举办专门的台湾邮票展览，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前后展出18天，观众达到4万多人。海内外新闻界纷纷作了报道。

随着海峡两岸友好交往的不断加深，大陆与台湾集邮界的交流联谊也有了新的发展，多边的交流组织开始出现。

1988年2月17日这天是中国龙年正月初一，一大群龙的传人——来自大陆、台湾和旅美华人集邮者，会聚美国纽约，举行“海峡两岸民间集邮交流会”成立大会。会上，宣读了该会的宣言：“邮友们，同胞们，漫长的岁月过去了，沧海桑田，乃自然之规律，分久必合，为历史之必然。万朵花开一树生，两岸同胞一条根，既是同根生，相逢心更急。本协会的成立，希望进而带动海峡两岸各行各业的相互交流，牵一发可以动全身，集一邮而利全局，从而掀起交流热，促进海峡两岸的‘三通’，促进祖国的统一。……”

大会推举潘维疆为名誉会长，黎泽重为会长。这个消息在两岸产生了较大影响，新闻界作了广泛报道。

1988年3月，福州市集邮协会和台湾民主同盟福州市委员会联合举办“台湾地方邮政100周年纪念”活动。表达了大陆集邮界对台湾集邮同好的良好祝愿。

1988年4月18日，台湾开始实施“对大陆通信办法”。基于台湾当局顽固坚持“不通商、不通邮、不通航”的三不政策及“不接触”的立场，只得采取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租用台北市10099邮局第50000号信箱的办法，经由香港将信件转往大陆，即所谓“通信不通邮”。但大陆寄往台湾信件上贴的邮票，都被使用墨汁涂污，邮戳被加盖宣传

戳，搞得这些信件面目全非，引起台湾有识之士和集邮界强烈不满，怨声载道。后来当局被迫停止这种极不得人心的作法。

大陆邮政当局最初对来自台湾的平信，凡印有“中华民国”字样的封面和邮票，都用黑或蓝色涂画盖住这几个字后投递。后来还采用过对印有上述字样处加盖紫色波纹长戳的办法。

如今，这些两岸通信的“加盖品”实寄封，已成为海内外抢手的高档邮品。大陆寄台实寄封 1988 年上半年在台湾市价已达新台币 1000 元。近期封如此受宠实在罕见。因为台湾邮局在每个信封上加盖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自由民主安和乐利”的圆形戳记，在世界上尚无先例，对研究中国邮史具有特别价值。据说盖有这种戳记的实寄封总数有 80 多万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为日本集邮界抢先收购珍藏。

鸿雁纷飞，佳音频传。大陆与台湾恢复通信虽然才开始不久，据统计，两岸人民之间的书信往来一年已达 800 多万封。因此，对两岸集邮界形成的冲击波也非常大，收集研究形成热潮。随之而来还形成一门新的研究课题：“两岸通邮史”。1990 年，台湾各种邮刊均大量发表涉及这一课题的文章，且图文并茂，连篇累牍。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从两岸往来信函的投递方式、作业手续、封、片、戳、签条形式特点等技术性问题，到邮政当局制度规定、涂抹措施变化背景及民众反映等政治性问题，无不认真加以考查剖析。许多文章分析入微，读来令人折服。

高雄市《邮艺》杂志 1989 年 3 月创刊。由财团法人“高尚邮艺文教基金会”主办，名誉董事长沈嘉济、董事长兼主编陈博舟都是集邮家。该刊仅 1989 年第 4 期刊登两岸通邮研究文章达 6 篇之多，热诚可见。

江诗群把两岸“通邮”到目前为止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红十字会代转时期”，由 1988 年 4 月到 1989 年 6 月。这段时间内台湾红十字会接受台湾邮政总局委托租用信箱，受理民众寄往大陆亲友的信件。邮局专门为此同时印制了两种专用信封，一大一小。小封装

寄大陆的信，落款是在封上印好的“香港、内详”。寄信人在此封上浮贴1枚10元邮票，作为香港到大陆的邮资，然后将这个封装入大封。大封上面已印好寄5万号信箱收等，贴上3元邮票即可寄出。这种封中套封转口接力式的邮寄方式实行了440天，累计寄发出380多万件信函。

第二时期为“自贴邮票投邮时期”，台湾自1989年6月10日开始实行。此后寄件人贴上台湾邮票即可直接寄往大陆，不但省事省时，而且邮资由13元减至9元(新台币)。实现此变更的原因，据说是因为香港邮政局认为封中装封的方式不符合国际邮联法规。台湾集邮者们视“6月10日这天为40年来恢复邮寄大陆之第一日”，极为重视，大量给大陆亲友寄发封片，留作纪念。从此，台湾集邮者可以向大陆邮友直接寄出新邮首日封。

但是台湾这项新规定来得突然，直投信件的空运邮包由香港运到上海时，上海一下积压邮包太多，无法应付，停了几天才接收。待邮局处理完，信件送到收信人手中时已到7月中下旬了。这些意义非常的首日封，虽然行程一个多月才寄达，但在两岸集邮者眼中，最令人欣赏和感激的是几乎每1枚封片上都销了落地戳。

江诗群念及此不禁感慨联想：“反过来看，台湾邮政局对大陆邮件之处理方式却为‘画×’与不销落地戳。前者既浪费大量工时，又破坏邮票的美观，早为国人所诟病；后者更是不负责任的馊主意。因为缺乏落地戳，常给收件人带来极大的不便。贤明的邮政当局，何不省却‘画线’的工时来改销落地戳呢！全国人民有愿望焉！”

沙漠的文章分析了两岸互寄实寄封有很多值得注意的特点：

大陆来信的实寄封第一批到台湾时，在邮局储存了一二个月才分发投递；虽然允许信封上大陆邮票的存在，可是票上的国名用黑油墨涂去，还出现“人头涂黑”、“五星旗涂黑”的现象；邮票上盖有各寄发地的日戳，都用“特戳”涂消掉；除了初期大陆来信外，所有大陆来信一律不盖落地日戳。

台湾寄大陆的实寄封封面上只写大陆人名、收信地名，除了“香

港寄”以外，不写自何处寄来；信封上根本没有邮票，只有香港的一个大批信件的机销日戳；台湾信件直接贴邮票寄大陆后，大陆用波浪戳盖邮票文字和图案。

为适应两岸通信量与日俱增的需要，从1989年10月3日起，大陆寄交台湾的函件封袋，不再局限于上海转运中心一处，另增设广州、北京两站。台湾当局也采取了一些有益措施。

台湾两大报之一的《联合报》在1989年10月份连续发出一系列集邮新闻。10月14日，在第一版刊出报道，标题是“中共邮票不再抹黑”“便于集邮完整收藏”，副标题：“交通部官员表示，这一做法，并不表示两岸已正式通邮”。

10月22日，《联合报》在“大陆新闻”栏以《交流集邮化暗为明》为题，报道大陆邮政总局局长刘天瑞当天与台湾集邮人士电话交谈：

“刘天瑞表示，大陆邮电部门从未规定不准收集台湾邮票，对于来自台湾的信件上印有‘光复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等宣传口号，大陆邮电部门的处理方式是在盖销驻地邮戳时刮掉一些，但绝不会故意涂黑，信件也照常送达。刘天瑞强调，希望台湾不要再以这种不利于两岸交流的宣传字眼，进入大陆，破坏两岸集邮界的交流情感。”

10月27日，《联合报》又刊登一篇报道，标题是：“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禁售台湾邮票？纯属谣传！”副标题：“中共《统计信息报》报道，邮政总局局长否认”。如此客观报道，令人欣慰，由此可以感受到台湾新闻界也掀起了“大陆热”、“集邮热”。

1988年11月13日至14日，台湾大学学生社团“集邮笔友社”在该校学生活动中心主办“大陆邮票特展”，展出自1949年以来大陆发行的百余套专题邮票及相关封片，还有海峡两岸通信的实寄封等。这些邮品大都由台湾留学生带回。大陆邮票在台湾公开展览尚属首次，轰动一时，观众达几千人次。台大笔友社为此专门设计发行1枚贴有大陆熊猫邮票的纪念封，大受青睐。台湾新闻界报道之热烈亦前

所未有。

台湾《联合晚报》11月10日以通栏大标题“大陆邮展、台大主办，从一张邮票看两岸40年”发表评论说：“大陆邮票无论构图或印刷都较台湾精美，而且用色大胆，尤其文化大革命以后，取材广泛，变化特多。”“又一特色是各种‘尺码’俱全，有大到如半张钞票大小的，也有如国画长轴式的细长型邮票，迷你型的小邮票。”“中共邮票另具一个全球独创的‘怪招’，每张都印有编号，但倒有查询方便的好处。”该报对这次大陆邮票展在台湾的影响评论道：“邮票展览掀起大陆热，两岸交流火上加‘邮’。”

1989年11月13日至15日，台大“集邮笔友社”又主办首次“海峡两岸邮票选美”。投票者踊跃，共投入800多张选票，其中88%的选票投向大陆邮票。评选结果，第一名是大陆《三国演义》，第二名是大陆《中国兰花》，第三名是台湾发行的《明沈周庐山高木图》。台北邮局设临时服务台，加盖纪念戳。展出期间电台、电视台、报纸均作报道。

台湾大学指导老师何辉庆在《我们为什么要展出大陆邮票》一文中，曾介绍说：“上学年我们举办‘一人多邮，心怀同胞，之邮票捐献活动，将众多邮票转送大陆同胞，以增进其对台湾的了解。本学年我们藉着邮展展出部分大陆发行非政治性之文化、艺术等专题邮票，其真正目的是希望透过上述主题，从这方寸之间多了解大陆的相关层面，相信这是对陌生的彼岸同胞一种真切了解的方法之一。”（《甲子邮刊》1989年总46期）

1990年1月6日至8日，在湖南大学举办了一次“海峡两岸1989年度最佳邮票”评选活动。消息一传出，立即引起大陆集邮界和各界人士的浓厚兴趣，纷纷前往，使评选会场如节日一般，新闻界大量采访报道，电视台还转播盛况。最后评出大陆、台湾各3套最佳邮票。

1991年10月15日至22日，为弘扬妈祖文化，增进海峡两岸同胞的友好往来，福建省蒲田市集邮协会和台湾省台北市华夏集邮协

会等联合举办了“海峡两岸纪念妈祖集邮展览”。展览共展出22部专题邮集，两岸各提供一半。展览分别在蒲田市湄州岛和城关古蕉楼展出，6天中有5万多人次前往参观，影响很大。

1991年12月至1992年2月，大陆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华北制药厂、江苏丹阳哈利食品厂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海峡两岸集邮知识有奖征答竞赛”活动。由专家组成评委进行评奖。这是首次由两岸集邮者共同参加的集邮知识竞赛。

40年阻隔，给两岸集邮界造成极大损失。台湾许多老集邮家都是30—40年代“新光”、“甲戌”等邮会老会员，神交多年的老邮友彼此无音讯，惦念之心良苦。在华邮研究方面缺少合作交流，更成为阻碍整个中国集邮水平提高的绊脚石。

国脉系邮人，相逢自有缘。近年，两岸集邮界的频繁交往，已传出不少令人欣慰的趣闻佳话。

台湾一位集邮者喜爱收集实寄封。一次通过朋友收到几封大陆来信，他视若珍品，浏览再三，发现1枚封上的地址竟是他45年前就读过的中学，寄信人是谁不知晓。他抱着一试的心情，托友从美国寄去一封信。3个月后，他收到大陆来信惊悉：他收集的那枚实寄封，竟出自当年中学同学之手，此翁老泪涟涟长呼：“天助我也”。后来通过这位老同学又找到了自己的亲人。他感慨万分赋诗述怀：“萧萧白发倚门望，梦里飘飘到故乡。老母慈祥添饭菜，醒来仍觉口余香。”

1990年1月，大陆集邮界曾在上海、杭州等地为集邮家张包子俊祝贺90寿辰。张包老收到台湾台北市集邮家黄瑶、李文亮等老邮友们发来的贺电，令他喜不自禁。台湾集邮者沙漠在邮刊上撰文《中华邮老、松鹤延年》，文中说：“我们台湾集邮界青年才俊后起之秀虽对张包老尚感陌生，也感同身受默默为老前辈邮人一举嵩庆之长寿酒，盼能善养千金，待百岁寿辰‘真正’全国集邮界大庆祝再举庆寿杯。”“张包老目前居杭州家中，凛冽冬天仍驾铁马为中学师生讲说集邮课，座无虚席。我台地集邮后学应有警惕。不道将来两岸邮人见面，人家讲邮头头是道，我们只记得每套若干元。”字里行间热情诚挚，切

望两岸集邮界密切交往之心着实感人。

在两岸集邮界开展友好交往中，涌现出一些有胆有识的热心之士，其中最著名者当首推集邮家薛少棠(1919年生河北武邑人)，他是台湾一位商埠邮票收藏家。在谈到他的集邮经历时，他介绍说："我还是15岁的孩子时就喜欢上了集邮，那时只是觉得好玩。真正懂得集邮是1948年在台湾加入当地一个邮票会以后的事。世界邮票之多浩如烟海，我选择中国商埠邮票作为收集研究的重点。我认为商埠邮票记载了外国列强侵犯中国邮政主权的历史。收集范围虽窄，但难度大。"

1989年，薛少棠的邮集《上海工部书信馆封、片、简》专集首次作为台湾集邮家的作品，参加在北京举办的纪念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全国邮展。在同年北京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邮展时，组委会曾颁发"薛少棠特别奖"。这是由薛出资赞助，用以鼓励集邮成绩突出者，尤其是鼓励青少年集邮者。

1990年10月25日至29日，"海峡两岸集邮家首届邮展"在北京开幕，薛少棠又以《中国商埠邮集》参展。这部邮集汇集了1865—1893年间中国11处商埠邮政发行的全部邮票。其中以正票新票为主，各类加盖改值票、欠资票、变体票及邮资明信片、邮戳等也都基本齐全，是一部比较完整地反映商埠邮政史的专集。

除了集邮，薛少棠另一个嗜好是创作邮票剪贴画，用废弃的邮票制成剪贴的绘画艺术品，堪称邮坛一绝。他的剪贴画内容有人物、动物、山水、建筑等，许多作品被收入世界著名摄影家大卫·邓肯编辑的《奇异的幻想世界》画册。在著名画家毕加索90岁诞辰时，薛少棠曾精心制作了一幅邮票贴画《寿星图》，作为赠送给这位艺术大师的贺礼。

薛少棠不仅是沟通两岸集邮界密切交流合作的开拓者，而且以他匠心独具的邮票剪贴画为中国集邮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

近年，随着台湾邮坛一片"大陆热"，各种介绍大陆邮票和集邮活动的文章、书刊层出不穷。台湾前邮政总局副局长潘安生，应台湾《联

合报》特邀，以“晏星”笔名，自 1989 年 11 月起至 1990 年 1 月底，连续在该报“万象版”发表系列长文《大陆邮票寻幽》，先后共 68 篇。文章文笔生动，兼有彩图，被台湾邮刊评论为“内容涵盖了这些年来大陆邮票的‘精华’，笔下有褒有贬，不卑不亢，立论客观公正，深荷此间邮友的首肯，反应颇为热烈。”1990 年 6 月，台湾已将《大陆邮票寻幽》出版单行本。

一石激起千层浪。“寻幽”文问世后，读者纷纷投书《联合报》，各叙观感。一篇署名“美石”的文章写道：该文“字里行间常把大陆邮票形容得太美了，看得邮人‘牙痒痒’，心甚不平。希望晏先生在描述的文字上尽可能淡化些，勿使有尽长他人志气之感。”另一篇署名“君子重耳”的文章则说：“大陆多数东西都输给台湾，唯一邮票设计与题材比台湾好过甚多。又有人说，请晏星君介绍大陆邮票时要淡化些，但晏君原是邮局高级退休人员，他是一针见血，道出多数人的心声，不是过河拆桥。君不见‘台大’邮展，美丑投票结果，足为公论。”一时把评论又引向两岸邮票的对比。快人快语，读来颇有兴味。（台湾《中外集邮通讯》第 24—26 期）

其实，大陆邮票设计典雅、雕刻精美、国画味浓，颇令台湾集邮者眼热心痒，赞叹不已。1990 年台大“集邮笔友社”借组织“海峡两岸邮票选美”之机，对 800 多位台湾集邮者作了民意测验，结果是 51％的人拥有大陆邮票，绝大多数集邮者对大陆邮票有好感。一位台湾集邮者曾在邮刊撰文谈到，大陆邮票风格独特，价格相对较便宜。除了梅博士的“贵妃醉酒”无缘谋面外，其余的在台湾差不多都能集全。

同样，台湾邮票以其名画、文物票的雍容华贵，民俗童话票的古香古色，常使大陆集邮者倍感亲切，拍案称绝。已有相当数量的集邮者在收集研究台湾邮票。许多集邮家都千方百计搜求台湾故宫古画、珍宝、民俗、书法、戏剧、民间故事等系列大套邮票，必欲求全而后快。自 1987 年开放探亲后，许多台湾集邮者回大陆探亲时，总不忘带一些台湾古画等邮票分送大陆的远亲近邻。礼轻意重，倍受垂爱。

大陆的“台湾票热”和台湾的“大陆票热”真是旗鼓相当，难分高

下。这种热烈需求，使两岸邮商、邮市、邮刊紧忙不跌，大有供不应求之势。许多邮社还直接办理预订彼岸新邮票业务。大陆各种邮刊每期都短不了几篇介绍台湾集邮动态的文章。有的台湾邮刊介绍大陆邮坛的版面竟占到半数以上。

1990 年 3 月，台湾《工商时报》的一篇报道，充分反映出大陆邮票在台湾邮市上"声势如日中天"的畅销情景："大陆邮政机构发行之邮票，近半年间在集邮市场上狂飚到最高点，不仅老字号的邮社大批销量，坊间更多的是单帮客、地摊客，也兴起卖大陆邮票。""据某邮币钞社业者张明泉表示，大陆邮票的批销通路效率越来越高，现在已可达到大陆新票发行当天，台湾也可同步上市的程度。台湾集邮市场几乎可做到与大陆零时差。""集邮同好普遍认为，大陆邮票题材广泛，色彩多样化，构图也较仔细、活泼，比台湾发行的邮票好看得多，大获青睐。业者指出，大陆唯一缺点是纸张较薄。"

两地实现新邮同步上市，真是发展神速。由于大陆和台湾邮票设计中都注意吸收传统文化的营养，具有鲜明的民族艺术风格，继承同源，发挥各异，而且许多选题不谋而合，于是在大陆和台湾集邮者中涌现出了一个新的热门专题——"两岸同题(同图)邮票"，诸如历史名人、风光景物、古画珍宝、动植物、体育等，种类繁多、相映成趣。这真是：

"方寸纸连方寸愿，九州人盼九州同。"

1988 年 9 月 5 日，国际集邮联合会在布拉格举行的第 57 届代表大会上，批准中国台北集邮协会加入国际集邮联。这件事情还有一段小插曲。自从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加入国际集邮联后，台湾集邮界也有加入这个国际集邮组织的愿望。为此，大陆与台湾集邮界均与 FIP 进行了多次磋商。1987 年 12 月，FIP 的代表与台湾集邮组织的代表在新加坡达成了协议，规定台湾集邮组织必须改变名称，以"中国台北集邮协会"的名义申请加入 FIP。另外，台湾集邮组织在国际邮展、世界邮展和 FIP 代表大会上使用的旗、徽、歌均须经 FIP 同意。

自从大陆和台湾都加入国际集邮联以后，在海峡两岸集邮者之

间又架起了一座交流的金桥。(图 59)

图 59　1989 年 10 月，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长朱高峰向台湾华夏集邮会理事长李文亮(右)赠送纪念品

第三节　携手共攀登

在众多的古典华邮珍品中，“大龙”和“红印花”邮票如同绚丽的奇葩，最富盛名。它们不仅身价昂贵，而且经历非凡，国内外几代集邮家曾为之求索若渴，绞尽脑汁，成为学术研究价值很高的跨世纪课题。

“大龙”邮票位居华邮始祖，虽已发行 100 多年，但至今仍有许多身世之谜尚未解开，诸如其发行时间和邮票图案绘画者的确定，以及版式复杂的背景等，都引起集邮界极大的关注。虽经 80 多年的研究考证，仍然疑团层层，争议很大。

“红印花”加盖暂作邮票属清代改元废两过渡时期的产物，原票并非邮票。因其诞生原由怪异，加盖过程错综，发行数量稀少，使用时间短暂，加之鲜艳的红色被中国人视作祥气，因而在古典华邮中显得雍容华贵，卓尔不群，近百年来傲视邮坛而不坠，被尊为华邮珍品之冠。围绕“红印花”的来龙去脉，在集邮界形成了一门深邃的“红学”。

对以“大龙”、“红印花”为代表的华邮的收藏和研究，牵动了大陆

和台湾集邮界的赤子之心，也牵动了香港、澳门及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集邮家们的同胞之情。

由于海峡之隔，两岸“大龙”传人之间的集邮交往中断达 40 年之久。1980—1984 年间，大陆《集邮》和《集邮研究》杂志曾组织关于“大龙”邮票发行日期的学术讨论，不仅大陆集邮界踊跃参加这次笔会，台湾、香港、日本、新加坡、菲律宾等地的集邮家也纷纷撰文响应。这次讨论使“大龙”邮票的发行日期趋向明朗化，虽仍未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开创了海峡两岸集邮界携手进行学术交流的先河。

1980 年 5 月，《集邮》杂志发表了北京邮学家孙志平的《大龙邮票发行日期之我见》，1981 年《集邮》第 5 期发表上海集邮家刘广实的《大龙邮票发行于 1878 年 7 月》。这两篇文章，打破了“大龙”邮票发行日期研究多年徘徊不前的僵局。台湾集邮家黄建斌阅后，心情振奋，1981 年 10 月在台湾《今日邮政》第 386 期上发表了《大龙邮票发行日期定论》一文，表示赞同刘广实的论点。1982 年第 2 期《集邮》杂志全文转载了黄建斌的这篇文章。大陆与台湾集邮界共同为考证“大龙”的生日展开了有益的学术交流，使陈复祥、姜治方、陈湘涛、陈志川等已故“大龙”专家们未竟的事业得到突破性进展。

1982 年 4 月，台北市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中国古典邮票展览”，展品由港、台、菲三地集邮家提供，内容包括“大龙”、“小龙”、“万寿”邮票的加盖票、“红印花”加盖票等四部分。除新票、旧票、变体票、没有发行的样票及实寄封、片外，还有邮戳、齿孔、刷色、版式、水印、版模研究等珍贵资料。成为一次中国早期珍邮的高水平交流。

对“大龙”邮票绘图者之谜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1927 年，周今觉曾认为是法国人费拉尔，1942 年陈志川又提出是美国人马斯所为。1986 年 10 月，台湾出版了《中国邮票目录》，该书是由台湾邮政总局组织多位集邮专家集数十年研究成果的结晶，书中提到“大龙”邮票的绘图者是“中国艺术家(佚名)”。

1988 年 7 月，是“大龙”邮票发行 110 周年，由全国集邮联、邮电部邮政总局、邮票发行局、政策研究室、中国集邮总公司、中国集邮出

版社联合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应邀参加纪念活动的50多位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集邮家，与中国集邮界一起，举行了六项重点活动：

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大会。

二、在中国邮票博物馆举行“大龙”邮票专题展览。

三、在香山饭店举办“大龙”邮票学术讨论会。

四、出版发行《大龙邮票纪念专集》。

五、摄制发行《大龙邮票》电视录像片。

六、发行纪念邮票。

《大龙邮票纪念专集》分为“大龙”邮票、封戳选登，“大龙”邮票研究文章选登，“大龙”邮票史料选辑，“大龙”邮票研究文章索目四部分。它收选了近百年来中外学者撰写的有关“大龙”邮票的研究文章和档案史料，详尽珍贵，许多是首次公开露面，是一部专门论述“大龙”邮票的大型综合性的学术文献。在“专集”编写过程中，不仅国内各单位、团体通力合作，还得到香港、澳门集邮家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部择精取粹、纪年广博的专集，也是同胞协力的结晶。

“红印花加盖小字当壹元”邮票，几十年来成为中国集邮界瞩目的热点研究课题。许多集邮家为了查清它的家谱，八方索宝，四海觅珍，严密考证每枚票的详细身世，对存世仅30余枚的来龙去脉都有记录，目前半数以上在中国人手中。近年又在国外发现了第31、32枚票。

最早见诸报刊的“小壹元”资料当属铸秋撰《红印花小壹元之统计》，发表在1929年中华邮票会出版的《邮学月刊》第1卷6期。该文列举了已发现的17枚“小壹元”票情况。自那以后的60多年里，海内外发表的各种有关“小壹元”研究文章数以百计，涌现出周今觉、陈志川、叶颂蕃、郭植芳、王纪泽、马任全等已故的著名“红学”专家。80年代，“红学”研究又在海内外掀起了阵阵高潮。

大陆集邮家张文光中外邮品收藏非常丰富，仅各种“红印花”加盖邮票就有500多枚，其中重组“红印花小字2分”100枚全版，是他

1946—1980年花费几十年时间完成的集邮杰作。“红印花小字2分”100枚全张分5次加盖，每次加盖20枚。只有收集大量邮票，并精研每1枚的特征及其在全版中的位置，才能完成重组。

大陆集邮家赵人龙(江苏常熟人，1918年生)(图60)，1947年留学美国，研究生毕业，曾为能源部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1930年开始集邮，50年代起重点进行中国古典邮票和中国普票研究。他的“大龙”、“小龙”邮集，“万寿”及加盖票邮集，“红印花”加盖票邮集，“蟠龙”及加盖票邮集，民国帆船及加盖票邮集和中国欠资邮票集等，水平很高。1980年以来，赵人龙写作集邮论文约150余篇，并担任了《集邮》、《集邮研究》、英文《中国集邮》等杂志顾问。1983年，赵人龙对“红印花”票的几个疑点提出新的见解。

图60　赵人龙

1897年大清邮政成立并开办汇兑、包裹、保价业务。因一时没有现成的高面值邮票，为应急，将当时海关造册处所存未用的3分红印花原票加盖“大清邮政”字样暂作邮票。这种邮票共加盖了5种面值8个类别。

“红印花”原票是御吏陈璧奏请奉准印制的印花税票这一说法，是集邮家周今觉在1926年出版的《邮乘》第二卷第4期上首先提出的。周今觉以其“华邮之王”的盛名，对“红印花”原票一言定终身。但其中疑点甚多，半个多世纪令集邮界不得其解。

1983年7月，赵人龙在《集邮》杂志上发表《清代红印花税票不是陈璧建议印制的》，考证出该票印制与陈璧无关，打破了使人们长期固步的权威之见，这在“红印花”原票的研究上是很大的突破。

赵人龙在集邮研究上是颇有建树的。他对“红印花”加盖票的加盖版式、加盖数量、加盖程序、加盖字模的排列方式、字模特征、加盖全张和邮局全张的关系等，都曾经广泛收集资料，进行系统地研究。此外，赵人龙曾经发现了两枚“小龙”1分银新的版模特征。

赵人龙在集邮学术研究方面深厚的造诣，受到中外集邮界的尊

崇。菲律宾的黄光诚、日本的水原明窗等，长期与他交流研讨古典华邮。1989年，黄光诚计划出版《海关红印花原票流传考图鉴》一书，特意邀请赵人龙为该书作序。当赵人龙将序言写好寄往马尼拉时，不料黄光诚已去世，序文竟成了祭文。后来，台湾决定出版该书时，又邀请赵人龙再次撰写序言，赵人龙怀着对挚友的深切怀念之情，挥笔又写下了一篇序文。这成为海内外集邮"红学"研究中的一段佳话。

对"红印花"原票研究的另一大突破是查清了"红印花"的身世之谜。

几十年来，中外集邮界一直认为"红印花"原票是一种印花税票，既成定论，相延成习。80年代中期，海峡两岸集邮家对此提出质疑，台湾集邮家经过考证后认为，"红印花"原票不是印花税票，而是海关贴在"进口货物报关签证单"上的印花，简称"派司"。它只是海关内部业务使用的票证，与印花税票完全不同。这个重大发现一经公布，使世界华邮收藏研究者无不感到震惊。长期令世人感到眼花缭乱的"红印花"及其加盖暂作邮票，正逐渐被海峡两岸集邮界索本穷源，揭去其神密的面纱。

自1984年起，台湾邮政总局聘请了海内外"红印花"专家任顾问，历时1年多，将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发掘、钻研而问世的有代表性的"红印花"图片资料尽数网罗，并于1985年10月汇编出版了《红印花邮票》上下编两巨册。该书仅印制5000册，被誉为近代集邮文献中的珍品，是几代集邮家辛劳和智慧的结晶。

侨居菲律宾的集邮家黄光诚（福建晋江人，1902－1989年）（图61），集邮60余年，以专心收集研究"红印花"加盖邮票闻名于世。世界邮坛每逢有"红印花小字壹元"易手，不出两个月，就能见到他的评论文章。他集30多年的研究成果，用中英文编写了一部专著《红印花小壹元票存世考图鉴》。书中对存世的每枚"小壹元"票的来龙去脉，都作了非常详尽的记载，并附有照片，洋洋大观，宏论滔滔，是公认的权威著作。

1989年4月，黄光诚在台湾《邮艺》杂志上发表了《六十八年来

国际闻名华邮专集大拍卖流出之小壹元票漫谈》。文中还列出1922—1989年的68年来，国际著名的华邮专集大拍卖中46次拍售出“小壹元”票的情况一览表（其中重复拍卖票22枚）。表中详尽地列出每次拍卖每枚票的图鉴列号、拍卖日期、来源、拍卖商和地点、成交价、拍获者、现拥有者等。黄光诚在谈到自己的研究感受时说：

图61　黄光诚

“海关红印花加盖小字壹元票之留存于世者，现已有可考之32枚票，源流有自而具深长历史意义，已为举世集邮界所推崇而重视者。近多年来其价格猛涨，已跻身于世界珍邮中，为售价最高的10种珍邮之一，举世瞩目，震撼邮坛，为华邮提高国际地位，增色不浅！”

为了查探追踪“红印花”加盖小壹元票的转售易主线索，黄光诚将全世界举办过的120多次华邮大拍卖的目录资料全部收集，才整理出这样一份难得的史料。他长期执着寻根究源的研究精神，令人赞叹。

80年代末，台湾集邮界掀起一股“红印花翻案风”。台湾集邮家李颂平、公孙柳等坚持“红印花小壹元为样票而非正式发行票”的主张。集邮家潘安生也提出“小壹元”绝对不是正式发行的邮票，而应视为作废的“试样”之票，系以“偷渡”的方式混杂流入邮市。

这些否定意见，引起黄光诚极大不满，他撰文反驳：“我邮政当局既已公认此票系正式邮票之一，今已蜚声国际，成为我国第一珍贵邮票，本於爱护国邮之旨，又何必自贬国邮之声誉，妄加非议。”可惜黄先生现已作古，争论一方失去主帅。

1990年11月，潘安生在台湾《今日邮政》上撰文，重申其主张，在列出一系列论据后指出：“事实上，一枚邮票之是否珍贵，并不在乎它的名分是否为‘正票’。反正，世界上的珍邮绝大多数是‘怪胎’，是错体、变体、试样、废票……不管您如何贬低，打压它的出身名份，皆

无损于它的市场价格。”

老树发新芽,“红学”真是充满生命力。面临的种种新课题,有待两岸研究家们继续去探索和争鸣。

在“红印花”和大龙”邮票的收藏家中,有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香港集邮家,他先后将30年代曾轰动世界邮坛的两大华邮瑰宝(东半球最罕贵的华邮“红印花小字当壹元”四方连新票和西半球最罕贵的华邮“大龙”阔边伍分银全张)归入他的典藏。这位名重国际邮坛的集邮家就是林文琰。

林文琰立志要收集散落世界各地的华邮珍罕品,他数十年来,不惜巨资刻意搜求,取得了超人的成就。在他极为宏富的珍藏里,仅“大龙”实寄封就达300多枚。

1967年11月,郭植芳在美国去世后,其保存20多年的“红印花小字当壹元”四方连新票,以20万美元让与林文琰,从而使林文琰在海内外名声大振。

1991年9月11日,沉睡于纽约银行保险柜中40多年的施塔遗集在英国伦敦被公开拍卖,其中的“大龙”阔边伍分银全张票,底价为10—12万英镑。林文琰志在必得,通过电话报价,经一番激烈竞拍后,终于以64.3万美元购得。至此,东西半球的两大华邮瑰宝,喜逢合璧,重归故国。

国粹弘扬民族志,华邮牵动同胞心。中国早期集邮家们树立的爱国爱邮优良传统,今天正被一代又一代的华人集邮者发扬光大,这是当之无愧的“龙”的传人。

第四节　港澳邮坛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42年被英国强占。英国统治香港近一个半世纪,但香港繁荣的出现,只是近30多年的事。60年代,香港由一个商埠发展成为工业城市,70年代开始成为世界贸易、金融、交通、旅游、通信的重要中心之一。每年约有几百万世界各地游

客来香港观光，素有“购物天堂”美誉。

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后，集邮风气受外来影响，兴起较早。从上世纪末开始，香港即被各国作为与上海同样的远东贸易货物吞吐地，随着商务活动的日趋繁盛，进出邮件的种类和数量均为东方之冠。邮票来源渠道多，使香港邮品荟萃，邮人活跃。早期的香港集邮者以外国人为主，集邮的收藏内容以英国和英属地邮品为主。

从本世纪初开始，香港即出现邮票商社，其中中国邮商居多。到20世纪20年代，已有几家邮商小有名气，例如由香港最早的邮商李福生开设的福生邮票社，是香港邮业中的老字号。邮商丁伯钊1920年开始业邮，由他设立的陶兴古玩铺，主要经营早期华邮、香港及英属地邮票。由于他邮识与票品均丰富，在当地较有声誉。

随着邮商的增多，邮社较集中的香港楼梯街渐被称为香港的邮票街。这一带是当地著名的旧货市场，为这里的邮商收购旧票旧封提供了方便。多数邮商将收进来的信销邮票整理后，分门别类包装出口国外。因此，香港许多邮商的经营之道是外向型的，经营作风却是保守型的。集邮家陈志川曾对比香港与上海邮商的差别作过这样的描述：“香港的邮商，善于守株待兔，稳健经营，不求得失，是十足的实力派作风。邮商既少，而集邮家则多过邮商不知多少倍，不愁无利可图。所以从商战说来，上海的邮商是擅长于闪电式的游击战，有机可投，巨利可获。香港邮商，是使用阵地战，此种刻苦耐劳精神为别地邮商所不及。”（《国粹邮刊》5卷1期22页）

到40年代末，香港的邮票商社已发展到近20家，全部是中国邮商。香港作为一座国际化的商埠城市，20—40年代仅出现过两位外籍邮商，这种状况不禁使人感到奇怪。

20年代，葡萄牙籍邮商克拉沙在香港经营邮票，是香港当时唯一的外籍邮商。香港被日军占领期间，克拉沙曾避居澳门，抗战胜利后又重操旧业，不久去世。克拉沙去世后，香港又出现了一位犹太籍邮商开设的爱丽斯邮票社。40年代末犹太老板去世后，由其中国籍夫人继续支撑，成了50年代香港唯一的女邮商。

1950年，邮商袁必成为扩展成记邮社的业务，在思豪酒店举办了一次营业性邮票展览。这是香港第一次商业邮展，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营业额近万。可谓惠人惠己，名利双收。

40年代后期香港的邮票商社如下：

名　称	店　主	地　点
福生邮票社	李福生首创	皇后大道
邮林馆	林萍湘	大道中何东行
胜利邮社	张益存	楼梯街
昌记士坦公司	麦钧锡	楼梯街
锦昌邮社	李锦发	楼梯街
邮社	陈锦洪	楼梯街
合盛邮社	陈耀棣	楼梯街
邮社	薛洪年	楼梯街
协记邮社	陈根	荷里活道
保禄邮社	谭保禄	依利近街
陶兴古玩铺	丁伯剑	德辅道
成记邮票社	袁必成	九龙加连威老道
宝宫邮票社	霍启光、霍耀泉	毕打街於仁行
之希邮票社	李之希	九龙弥敦道
爱丽斯邮票社	犹太人	湾仔轩鲤诗道
植动邮票公司		九龙邮箱1927号
香港邮人服务社	陈汉伯	

此外，当时香港还有不少专门从事通信拍卖或出口的邮商，不设店经营。弹丸之地，邮商如此众多，着实可观。

1933年，“香港集邮学会”成立。这是一个以侨港英国人为主的集邮团体，会员来自各国，也有中国人参加。活动主要是每两周一次的聚会，进行集邮讲演、拍卖等，会上只使用英语发言。会刊则是利用英文《南华早报》，每星期三开辟《邮票述评》专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会活动陷入停顿。抗战胜利后，该会活动又恢复正常。

1946年1月27日，由萧作斌、陈江峰、方业光等发起香港第一个华人集邮团体“中国邮学会”成立。主要活动是每周聚会，每月一至二次的邮品拍卖，40多年从未间断。到1988年，会员发展到400多人。第一任理事长萧作斌（祖籍广东梅县，1917年生）（图62），毕业于

香港商业学院，抗战胜利后创办百合公司。他7岁开始集邮，早年即加入香港集邮学会，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华人会员之一。他经常在香港各大华文报纸上发表集邮文章，以期推动集邮在华人中的发展。他早年的邮集和集邮文稿，在日军入侵那年，因日军紧急征用他家的房子，限时搬走，全部散失了。

图62　萧作斌

1942年，香港集邮家周炳垣收藏数十年的邮集打算出让，萧作斌闻讯立即以重价承购，后来他在此基础上扩展成第一流的《香港邮票专集》。抗战胜利后，在香港集邮学会举办的首次邮展上，萧作斌以这部邮集夺得冠军奖。中国邮学会成立后，萧作斌负责出版部，主编会刊《邮光》。

1948年1月24日至25日，中国邮学会在香港中区皇后大道胜斯酒店二楼举办了首届邮票展览。展品有：萧作斌的香港邮票、方业光和陈江峰的早期华邮、赵芝云的解放区邮票、郑希贤的航空华邮、余绿佑的美国邮票、李光的客邮、周守愚的纪念戳封、龙真的日本及伪满邮票、郭永祺的英属地邮票、林萍湘的变体票等。这次规模很大的邮展，显示出当年香港集邮界收藏与研究已颇具水平，不仅范围广泛，而且较有深度。邮展在香港引起轰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成立不久的中国邮学会思想活跃，朝气蓬勃，每年都举办一些很有生气的面向社会的集邮活动，声望日盛。1950年4月儿童节之际，中国邮学会专门举办了一次征文比赛，题目是《我为什么喜欢集邮》。征文规定：年龄超过16岁者及文章超过300字者均不录取。消息传出，收到的应征作文达787篇，超出该会原来的预计，于是把原拟中奖名额由50名增至80名。4月15日举行的发奖会上，获奖者得到的奖品是袋票、集邮册和朱古力糖，均为集邮家们所赠。

中国邮学会现任理事长张金炽（祖籍广东鹤山，1943年生），50

年代开始收集新中国和解放区邮票，另外还收集山洞专题邮票。

为适应集邮活动的需要，1975年1月，香港邮政署成立集邮组，出售新邮票、邮折，办理新邮预订及实寄首日封。集邮者还能从这里买到国际回信邮票券、欠资邮票等。各邮局的集邮组专设集邮邮箱，凡投入该箱的信件、明信片，均由人工手盖当日邮戳，很受集邮者欢迎。在香港，集邮品流通主要靠邮商。80年代，全港大小邮票店已有上百家，其中历史较长的邮社有杨乃强邮票社、美艺集邮公司和保安邮票公司等。这些邮社都有些珍罕邮品，因此许多集邮家都是这里的常客。

香港的尖沙咀是个商业和旅游中心。1965年2月在这里成立了“尖沙咀集邮中心”，主任委员是刘焕民，出版《尖沙咀集邮中心会刊》，读者及订户遍及全世界。中心每隔一周星期日举行集会，活动内容包括邮品交换、拍卖、集邮讲座等。暑假还举办青少年集邮研习班。该中心的集邮图书馆，藏书丰富，据称在东南亚集邮图书馆中名列前茅。所藏的大量中外集邮书刊，有很多是由会员或邮友赠送。图书馆不仅供香港集邮者阅读，其他国家的许多集邮人士也远道来该馆查找集邮参考资料。该会在每年会庆时都举办一次邮展。

另外，香港的“联校邮学会”是一些香港学校的联合集邮组织。“香港警察邮学会”只吸收现役警务人员及学员参加。

香港是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在这里能买到英、美、日等国的邮刊。大陆、台湾出版的邮刊也在香港很流行，像大陆的《集邮》、《集邮研究》、《集邮博览》、台湾的《今日邮政》等，在香港都很受欢迎。80年代香港唯一的集邮月刊《邮票世界》，每期都有几篇重要文章。《收藏天地》内容除集邮外，还涉及火花、钱币、书画、金石等鉴赏知识。另外，香港不少报纸、杂志上辟有集邮栏目，文章多以精练有趣见长。

香港曾有“文化沙漠”之称，经济虽繁荣，文化事业却相对落后。香港集邮家周树楠（又名朱桐），热心于集邮研究，1980年1月创办了《邮票世界》，后来又先后创办了《收藏天地》和《艺术界》杂志。由于倍尝经费捉襟见肘、举步维艰之苦，他深有感触地叹道：文化刊物的

出版，在香港这个讲求实际的社会，绝非一件易事，否则，就不会流传那一句："谁要害人破产，就劝他办文化刊物"的金玉良言了。

正当《邮票世界》面临经济困难难以维继之时，1983 年，潘鉴良创办了香港邮学出版有限公司，该公司专门从事集邮书刊出版。看到《邮票世界》的困境，潘鉴良毅然决定由自己出钱把这份邮刊接过来，使之绝处逢生正常出版。

潘鉴良（祖籍广东南海，1936 年生）在香港新鸿基发展有限公司任职，经营房地产。他从上小学开始集邮，60 年代起收集研究中国解放区邮票，藏有许多珍品，仅实寄封就达 1000 多枚。潘鉴良不仅邮识渊博，更以热心集邮社会活动而闻名。现在担任香港邮学会副会长，粤、港、澳集邮联谊组副组长。接办《邮票世界》后，他不仅出钱而且出力，重要的稿件均亲自处理，常忙到深夜。潘鉴良精通集邮和经营，他用经营邮票赚来的钱贴补杂志的亏损，又通过刊物去扩大宣传，发展业务，生意和邮刊均办得很有起色。

从 1987 年 9 月《邮票世界》杂志举办首次展销会开始，以后几乎年年举办邮票展销。1988 年 3 月，在香港怡东酒店举行的第二次展销会上，当地 15 家邮票社在大厅里摆设了摊位。会场内集邮品琳琅满目，集邮者人头攒动，有些澳门集邮者也专程前来购买邮品。这种展销会，不仅是邮品流通的一种渠道，也成为集邮者互相欣赏、交换邮品，切磋交流邮识的"沙龙"。以后，在展销会场上，又增加了举办小型邮展。

1990 年起，《邮票世界》改为双月刊，每期 82 页以上，其中通信标售邮品目录约占 20 页，英文版占 24 页左右。该刊与大陆邮刊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凡投稿件均不付现金稿酬，采用记账方式，只能用作订该刊和购买该刊标售的邮品。

香港邮坛藏龙卧虎，不乏世界孤品和国际知名的集邮家。我国珍邮收藏在香港邮人手中不少，仅"红印花小字当壹元"邮票就有 9 枚之多，清代票、解放区票的集藏也都颇为可观。除"红印花"专家林文琰、"大龙"专家李镜禹外，集邮家潘鉴良则是一位"区票"专家。

由于香港具有特殊的国际经济贸易地位，它也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各国集邮界交往的重要桥梁，成为宣传新中国邮品的一个窗口。

早在60年代，中国集邮公司就在香港建立了业务代办处，从这里向国外大量出口新中国邮票。大陆还先后多次在香港举办中国邮票、邮史展览，吸引了大量邮迷。在香港集邮者中最受欢迎的是中国邮票和英联邦邮票。香港不仅是中国向各国转口集邮品的重要市场，也是大陆民间进口邮品的重要渠道。目前大陆邮市上出售的外国近代邮品大部分由香港贩入，还有许多新中国早期邮品也由香港倒流回来，对大陆邮市影响极大。

香港在大陆与台湾实行间接"三通"（通邮、通商、通航）中，是个极重要的中转站。两岸集邮品从60年代起就经由香港转入对方，70年代后期开始，香港的邮商业务几乎一半以上是从事两岸邮品转手买卖。80年代是这种特殊贸易的黄金时代。

1979年8月开始，湖南的《湘江文艺》杂志和香港《文汇报》"百花"副刊同时连载大陆集邮家姜治方的长篇回忆录《集邮六十年》，令中外集邮界瞩目。无独有隅，同年7月26日，台湾《联合报》发表了台湾集邮家柳无忌的回忆文章《集邮六十年琐记》。于是香港《邮票世界》分别转载了这两个回忆录，并在编者按中说："有趣的是，（两文）除了发表时间与发表题目颇似之外，连作者的年龄和籍贯也相同。这样的巧合实在少有。"一位香港集邮家评论道："现在有两个《集邮六十年》在连载，一个是台湾的，一个是大陆的，这种不谋而合不也反映了我们民族的渊源和不可分割么？"这件事当时引起了海外华人集邮界的极大兴趣。

柳无忌是民主人士柳亚子的公子。1920年在上海圣约翰青年会学校读书时，对集邮发生兴趣，几十年收集了大量中国及各国邮票。其中从清代至抗战时期的中国邮票基本完整。他说"虽然经历抗战期间流离颠沛的生活，虽然初来美时我们只带一些简单的行李，在美的30余年中又屡次搬家，我从中学就开始搜集，而累积至今的邮票，却全部保存着没有遗失。"

澳门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强行上岸租占,鸦片战争后逐步扩大地盘,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强占澳门。

澳门地区集邮活动虽远不及香港,但近十几年也发展迅速。1980年12月,"澳门集邮协会"成立,它是由一批年轻的职员、店员、工人、教师和小商人发起组织的,现在会员已由最初的20多人发展到几百人。协会的宗旨是加强邮人联络,交流集邮经验。他们大多数人收集中国邮票,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仍然举办过几次邮展。

1984年12月,在澳门市政厅举办了一次"澳门百年邮票展览"。澳门和各地集邮人士43人送来展品220多个展框。邮展共分两部分,前一部分以100年来澳门发行的票、封为主,送展者主要是葡萄牙邮政博物馆、澳门邮电司、葡萄牙和欧洲著名集邮家。许多展品曾在有名的国际邮展中获得过金牌,具有国际水平。后一部分是清代至新中国的邮票,由香港、澳门、大陆等地集邮人士提供。

这次邮展不设比赛奖,只发给参展者每人一枚铜质纪念章和一张参展证书。邮展不收门票,参观者络绎不绝。澳门总督亲自出席开幕式,并专门举行鸡尾酒会祝贺邮展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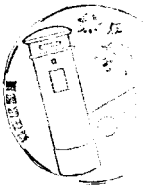
近年,澳门集邮协会获得了澳门文化学会的赞助,有了很大起色,租用了固定会址,坚持每周开展集邮活动。该会编辑出版的《澳门集邮协会会刊》,于1986年创刊,是澳门唯一的邮刊。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份不定期刊直到1988年4月才出版第二期。该刊文章中葡文对照,内容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从1982年开始,港、澳集邮家代表都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集邮联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了大陆举办的许多大型邮展。1987年11月,"粤、港、澳集邮学术研讨会"在广州成立,并举行了首届学术研讨会,通过这种地区性的联合组织,联络感情,开展学术交流,增进大陆与海外集邮界的联系和邮谊。在第二届研讨会上,决定成立"粤、港、澳集邮学术基金会",奖励优秀论文和开展集邮学术活动。第三届研讨会又扩大邀请台湾集邮界同好参加。

海外华人集邮家中也有许多成就卓越者。集邮家石少东(山东益都人,1906—1983年)是一位闻名国际邮坛的美籍华人。他大学毕业后从事铁路、纺织、化工等实业,是位实业家,后定居美国。他早在30年代就开始了集邮。他邮品收藏宏富,邮识渊博,从1970—1983年,他在美国和国际邮展上共获得104块奖牌,其中金质奖近30个,被集邮界誉为"冠军中的冠军"。1974年,他受美国集邮协会之聘,出任邮展评审委员。由于对集邮事业的杰出贡献,他被选为英国皇家集邮协会会士。

1985年1月,石少东的夫人及儿子遵照其生前遗嘱,亲自将他毕生收集的多达1吨重的集邮文献由美国护送到北京,捐献给国家。这批文献中,有世界各国的集邮刊物、邮票目录、百科全书等。特别是1925年创刊的中国最早邮刊《邮乘》全套,极为珍贵。石少东热爱集邮、热爱中国的一片赤子之心令人钦佩。

"攀山千条路,同仰一月高。"华邮牵动华人心。集邮像一条无形的纽带,使身世各异的同胞有了永远叙不完、道不尽的共同话题。



第十一章　方寸百年话沧桑

第一节　中华邮魂

韶华易逝，时节如流。时间的流逝使一切成为历史。

集邮风尚传入中国已历 1 个多世纪。其间虽起伏消长，挫顿迭生，仍能顽强不息，发扬光大，如崖之乔松苍劲，如山之翠竹长青，如长江大河滚滚向前奔流。当年中国第一批集邮者涉足邮坛时，他们并不曾想到自己正在创造一部新的历史——中国集邮史。

集邮最早起源于民间，根植于民间，其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翻过一页页沉重的中国集邮史，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充满艰辛、伴随战乱、始终奋进的悲壮历程。

中国集邮史绝不仅仅是一般的文化活动发展史，它是一部继承发扬民族传统和精神的创业史诗。集邮给中国人文化、观念很大的影响，通过集邮使中国人认识了世界，集邮也帮助世界人民认识了中国。

回首一幕幕往事，不禁令人感慨、沉思、振奋……

从 1878 年发行海关大龙邮票，至今已有 100 多年了。这 100 多年是中国风云变幻、兴衰荣辱的历史时期，其间不同政权、不同地区发行或使用的邮票近万种。旧中国邮票，有许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产生的。清朝邮票，基本上由外国人把持设计和发行，在国外印制。民国邮票，也多由外国承印，其间出现过“临时中立”、“洪宪登基”等“怪胎”。“满洲国”邮票和“华北自治”邮票是靠侵略者的刺刀来维持使用的。解放区邮票大部分是在艰难的条件下，由各根据地、解放区自印自用。台湾和港、澳邮票则是国家分裂的历史产物。

旧中国，社会政权更迭频繁，邮政时断时续，物价一涨再涨，造成将邮票一次又一次地频频加盖、改值、作废。由于国家长期内忧外患、动荡不宁，造成中国邮票极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极异常的珍罕品种。

旧中国的集邮事业还遭遇了外国掠夺、侵略、国家内战、动乱等一次又一次的摧残和劫难，使国家早期邮史档案大都散失，许多珍贵邮品和资料外流或被毁坏，造成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为邮史遗留下一系列的疑点悬案。此外，人民生活贫困，文化教育落后，致使集邮的普及和提高受到严重阻碍，集邮活动的发展长期缓慢。中国的集邮者中有雄厚物质条件者为数极微，大多数集邮者生活清苦，集邮只能在困难的条件下收藏，在动荡的岁月中保存，在艰苦的环境里研究。不少人为了收集华邮不惜倾囊求珍、安贫乐素；为了研究集邮学竭尽毕生心血，苦钻精研。可是，他们呕心沥血换来的邮集和成果，竟有许多遭遇不幸，或毁于战火，或失于浩劫，使多少出类拔萃的集邮家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痛心疾首，苦不堪言。

100 多年来，中国的集邮者们，如同饱经风霜的风竹，“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以百折不弯、顽强拼搏的精神从事集邮活动。无论遭受多大的危险、挫折，无论处境何等艰苦、困难，他们大多仍然以邮为乐、痴心不移。以爱国之德、爱邮之情在邮票王国里辛勤耕耘，孜孜以求，奉献出自己的赤子之心和聪明才智。他们以一部部精罕纷呈的邮集和一篇篇通今博古的论著，在中国集邮史上树起了一座座伟业丰碑。

经过几代集邮者们广收博集，再接再励，中国集邮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值得每一个炎黄子孙为之骄傲。

在艰难的条件下用油印、石印、木戳盖印的解放区邮票，为世界邮票百花园增添了奇葩。

中国悠久的文化、壮丽的山河和勤劳的人民，是邮票设计选题取之不尽的宝库。大陆和台湾邮票优美的民族风格，在世界邮票王国里独树一帜，令全球邮迷倾倒。每一个中国集邮者无不为此自豪。

中国首创了在邮票上编印志号的做法。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集邮爱好者，最大的全国性集邮组织和最大发行量的《集邮》杂志。

中国拥有一支包括大陆、台、港、澳、海外华人组成的充满献身精神的集邮家、集邮学家队伍。拥有一批称雄国际的邮集和享誉世界的邮学典籍。

中国的集邮者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崇尚邮德，以弘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集邮文化为己任。这就是中华邮魂。

……

今天，中国集邮事业已经走向世界；明天，中国集邮事业必将蓬勃发展，前途光明。

第二节　新的起点

1990年是中国集邮界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集邮大事：

5月，幸逢世界第一枚邮票“黑便士”诞生150周年，举世庆贺。在伦敦世界邮展上，大陆和台湾的集邮家并肩携手，参展邮集一举夺得4枚金牌。

8月，正值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邮票发行60周年，全国各地集邮界隆重举行各类纪念活动，掀起研究区票的热潮。

9月，在杭州、台湾等地进行了新光邮票会诞生65周年纪念活动。

9至10月，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亚运热”推动“集邮热”。由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倡议，首次随同亚运会举办了国际体育邮展。国内外还发行了各种亚运邮品，使集邮迷们心情振奋。

10月，北京市集邮协会在北京中国邮票博物馆举办“海峡两岸集邮家首届邮展”，展品160框，其中台湾提供100框，台湾省集邮家蔡诗滨、薛少棠、何馥南等组团参加展览活动。

11月，中华全国集邮联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

幕。这是一次继往开来的盛会。出席代表230人，代表着全国88.9万多会员。会议宣告，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已全部建立了集邮协会，全国的基层集邮组织有近万个，全国集邮爱好者已达800多万人，参加学术研究的有上千人。自“二大”以来的4年里，中国大陆先后参加世界和国际邮展12次，共获得奖牌64枚，其中获镀金奖以上的10枚。

“三大”决定继续聘请薄一波、朱学范为全国集邮联名誉会长，成安玉为顾问。选举朱高峰为会长，陈昌本、张包子俊、刘天瑞、宋兴民、常增书、刘殿杰为副会长。

在这次大会上，党和政府对发展中国集邮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薄一波名誉会长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指出：

“我国的集邮事业，应办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集邮事业。我国是一个有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集邮工作一定要突出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性质这两个特点。”

邮电部杨泰芳部长在大会的致词中，着重强调要在集邮界提倡研究集邮文化理论、宣传集邮文化价值。他在谈到发展集邮文化的意义时指出：“集邮属于文化范畴，它作为社会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在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我们国家增添喜庆、融洽气氛，促进国家稳定团结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集邮活动的这种社会价值，已经被社会更多的人认同和肯定。”

“三大”通过修改后的“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章程”进一步明确：“本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集邮爱好者，集邮学研究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和繁荣中国的集邮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增进与世界各国和地区集邮组织之间的友好合作。”

“三大”在工作规划中提出：今后四年，争取早日在我国举办亚洲与世界邮展。

这是一次务实的会议，成绩和目标明确，任重道远，令人鼓舞。

“春风得意马蹄疾。”

10年多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集邮事业注入了欣欣向荣的活

力。从这一重要历史时期集邮活动的发展实践，人们不难看出，中国集邮界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0多年来，集邮活动受到了国家高度的重视和支持，而且这种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由国家支持成立的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其权威和实力均非同一般。全国成千上万的地区和基层集邮组织，绝大多数都受到当地政府或所在单位的关照和支持。中国邮票总公司、中国邮票博物馆、人民邮电出版社等为集邮事业服务的机构，无一不是以国家的支持作为后盾。中国获得近10几年集邮活动的飞跃发展，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扶植至关重要。集邮在中国被各级政府视为全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大力提倡和热情关心集邮活动已蔚然成风。这是值得集邮者庆幸和自豪的。当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集邮活动，绝大多数由民间团体来组织，政府充其量只是在个别邮展等活动中给予名义上支持或少量的资金赞助。

中国的集邮活动由于受到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支持，使得诸如集邮协会会址、会刊、经费、人员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召开各种会议、举办邮展、颁发奖品、发行邮刊等项活动，都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不用集邮者们费心。

中国能否在世界集邮之林中创出一种独具特色的组织模式？关键在于中国究竟怎样区别于传统的西方商业化气氛浓厚的集邮活动，怎样发挥自己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集邮活动的不同点。这是一种既富有魅力，又富有挑战的尝试。这种尝试远远不是技术性的，也绝非纯业务性的。它是时代和社会的特定产物，是不同的社会制度产生不同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体现。

中国集邮模式的时代特征是它与国家的改革和开放事业紧密的依存关系。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生活中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改革和开放。改革既改变落后的体制，也改变观念形态。开放既包括社会、经济，也包括文化。现代国际集邮事业发展的新思潮，必将对中国集邮界产生很大的冲击，对中国集邮事业的发展有所影响。

不少人看到我国在国际邮展上所获金牌不丰，就认为中国集邮

发展落后。其实这并不全面，在健全集邮组织和树立集邮新风尚方面中国走在世界前列。我国提倡和引导人们“为求知而集邮，以集邮促求知”、“寓教育于集邮”。同时，通过开展把各级集邮组织办成“集邮者之家”的建“家”活动，和经常性地总结表彰集邮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集邮事业不断深入发展。

10多年来，中国的集邮活动和集邮方式有了极大的改进。现在，除了国外比较流行的集邮展览、拍卖、评选最佳邮品、夏令营、讲座等活动内容外，还创造推出一些具有特色的活动形式，例如：集邮知识竞赛、集邮灯谜、集邮晚会、集邮板报、集邮摄影比赛，以及集邮题材的电影电视剧、话剧等，丰富多彩，别具一格。这些，使得我国集邮的社会化成分加重，集邮的娱乐功能加强，集邮的知识性内涵加深，从而使集邮真正成为普及的大众化文化活动。

专题集邮的蓬勃兴起，是集邮方式更新最突出的表现。长期以来传统集邮在集邮界根深蒂固，占据主导地位。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专题集邮在中国异军突起，推广迅速，尤其倍受广大中青年集邮者欢迎。1986年，有人曾作过研究，排出当时中国有25个集邮专题可称为“热门”。但其中有不少还仅局限于国内事物，如：“歌颂伟大的祖国”、“中国各地人事风物”、“人民军队、革命战争”等，反映出那时认识上的差距。

专题集邮易学难精，它需要广博的专题知识做基础，选题设计和邮品收集均非易事。加上国际邮展有一系列要求和规则，真正做好绝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80年代末，随着对专题集邮理论的不断探讨，逐步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使中国专题集邮有了飞跃发展，专题邮集水平提高，有的在国际邮展上获奖。

近10几年，中国集邮活动中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我国大多数集邮者特别是青少年集邮者多只收集新邮票，轻视收集信销邮票和实寄封等集邮品。究其原因，一是大陆人民的用邮水平低，信销票来源少；二是纪念邮票不能大量用于邮寄信函，使收集信

销票(也包括收集实寄封)更加困难;三是存在错误认识,认为信销票没有收藏和保值价值。

自50年代起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集邮界与国际间的交往很少,因此至今未主办过大型国际(世界)邮展,有幸参观过高水平国际邮展的国内集邮人士也寥寥无几。由于缺乏对世界集邮动态的了解,绝大多数集邮者在收集和研究的方式、观念上处于比较保守陈旧的状态,视野不开阔,难适应国际邮展要求,加之绝大多数集邮者没有雄厚的财力,难以使其邮集达到国际水平。

在集邮研究方面,也存在着差距。虽然经过几代集邮者的不懈努力,中国集邮宝库拥有数以千计的邮学书刊、目录和大量珍贵的邮史资料、典籍,积累了丰富的集邮学识,但是,中国早期邮票(也包括近代邮票)还有许多课题没有攻克,不仅有学术性的,也有大量技术性的。尤其是应用现代先进科技对邮票(特别是解放区邮票)的真伪鉴定工作,尚属空白。随着技术发展,一些伪造的古今各类珍贵邮票赝品越来越逼真,难辨真伪。近年,不少人又深入到集邮活动尚未波及的偏僻地区寻觅收购早期邮票、旧信封及其他邮政史料,因而一些不见经传的邮票时而面世,其中又以区票居多。对这种一再冒出的新发现,广大集邮家有喜有忧。往往一石激起千层浪,肯定或否定的考据争论十分激烈。为此,集邮者强烈呼吁国家成立专门的邮品鉴定机构。筹备成立鉴定委员会的消息时有传闻,但始终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恐怕主要是涉及到的政策、法律、技术、经济等因素太复杂。

由此还引出一个问题,就是国内各方面的集邮人才缺乏,培养工作跟不上。限于国内目前条件,集邮学研究资料缺乏,手段落后。在全国集邮界中,具有渊博邮识的集邮家、集邮学家、邮品鉴定家大多仍是40—50年代崭露头角的元老,至今已进入耄耋之年。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流集邮家、集邮学家为数尚少。现在中国集邮界最缺少的正是一大批年富力强的专门人才:博览今古、精通邮史的集邮学家、鉴定家;能雄居国际邮坛的集邮家、评审家。

中国是一个正在向现代化奋斗的东方大国，中国又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在广大农村，许多地方生活和文化水平还处于较落后的状况，是开展集邮活动的薄弱或空白地区。

1985 年 2 月 17 日，河南禹县梁北乡一位姓郭的农民去郑州办事，在路旁拾到 200 多版才发行不久的整版生肖牛邮票，总数达 2 万多枚。可叹这位青年人不但不懂集邮，对邮票也毫无知识，视其为废纸，竟拿起一版包起猪头肉来。返回家乡后，他又将包过肉的邮票当引火纸烧掉，剩下的有的送邻居贴墙，有的送村里小孩作花纸玩，还有的当了手纸。直到过了快一个月，县邮局和省邮票公司闻讯赶去，才将其余的残缺邮票收回作了妥善处理。当时，全国各城镇的数以百万计的集邮者正为争购“牛”票费尽心机，到处抱怨买邮票难呢。在中国发行邮票已经 100 多年的 80 年代，农村竟还有如此可笑的“邮盲”，拿热门抢手的崭新邮票引火擦屁股，实属奇闻。在中国农村要想开展集邮，恐怕还得先在许多地方宣传邮票为何物。

差距严重，潜力巨大。在发展经济、实现小康生活水平的同时，必须重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文化消费水平，以健康高雅的业余活动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

近年来的发展表明，中国集邮队伍每年仍在不断扩大，其中潜力最大的三类社会成员是：青少年集邮者、老年集邮者和农民集邮者。老年人在我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他们时间充裕，阅历深广，参加集邮活动条件优越。老年集邮协会的扩大和发展极有潜力。随着农村生产发展、生活改善，许多地区开始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组织起了农村集邮组织，开展一些活动。农村是中国人口众多的文化落后地区，一旦出现集邮普及热潮，中国集邮事业的面貌无疑将产生巨大的变化。

流年似水，岁月迁嬗，十年弹指一挥间。跨入 90 年代，展现在中国集邮界面前的是：巨大的成就与明显的差距同在；严峻的挑战与广阔的前景并存。挑战是新的动力，差距是新的起点，奋发图强，时不我待。

1992年是全国集邮联成立10周年，回首往事，笑看今朝，我们对集邮的性质、特点与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明确。展望未来，下一个10年将是中华腾飞的新时代。

1988年3月10日初稿
1992年4月28日五稿

附　录

中国集邮大事记

1834年　英国首先在广州开办了英国邮局。

1863年　上海租界工部局成立书信馆。

1865年　上海书信馆发行“大龙”图案邮票。

1878年7月　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诞生。

1879年6月13日　上海《申报》刊登外国人收购信销邮票的广告。这是最早见于中国报刊有关集邮的资料。

1880年6月　上海基督教会清心堂出版的《花图新报》第3卷刊登《各国信馆之印图》。这是国内最早向群众宣传集邮的文章。

1891年1月22日　香港发行第一套纪念邮票“香港开埠50周年纪念”。因争购者众，造成挤死3人的惨剧。

1896年3月20日　清政府正式开办国家邮政。

1900年　张承惠(1888—1940年)在上海圣约翰学校上学时开始集邮。李辉堂(1869—1943年)在上海北四川路设店经营邮票。这是最早的中国邮商。

1903年10月20日　福州邮局使用“对剖邮票”，多为在华外籍集邮者抢购。

1906年　上海沪关税务司绵嘉义(意大利人，1860—1936年)编撰的《华邮报告书》出版，是最早的华邮目录。

1909年　“世界邮票社”在福州开业。

1911年9月　英国人赫德(1835—1911年)去世。他长期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以后兼任总邮政司，主持从“大龙”邮票开始的清朝

邮票发行和一系列邮政制度建立。

1911年　英籍犹太人汇啦在上海江西路南京路口开设汇啦洋行，出售各国邮票。

1912年　绵嘉义编辑的英文华邮贴票册《中国邮政票》，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

1912年　上海外侨成立“上海邮票会”，首任会长拉奇。这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个集邮组织。

1912年　在英国伦敦国际邮展上，勒夫雷司以华邮展品获得银牌奖。这是中国邮票首次在国际邮展获奖。

1912年　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印制中华民国“光复”、“共和”纪念邮票。这是首次由中国自行印制的邮票。

1915年　张景盂(1893—1945年)在苏州开设“五洲邮票社”。

1916年7月起　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小说界》月刊开辟《邮乘·邮票考略》副刊专栏。这是中国最早的集邮专栏。

1917年　设在上海北四川路的鲁意斯摩洋行开始举办邮票拍卖会。

1917年10月10日　中华邮政首次发行小本票——《中华邮政局邮票册》。

1918年2月　世界邮花联合会出版《邮志界》，主编白狄人。这是中国最早的中文集邮杂志。

1918年5月10日　魏柏熙等人在江苏常州公园举办个人集邮展览。这是中国最早的邮展活动。

1921年　在华外籍集邮者在上海华美书馆举办邮票展览。

1922年8月　“神州邮票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会长张棣村、副会长叶颂藩。这是中国第一个华人集邮组织。

1923年1月　中国第一份集邮会刊《神州邮票研究会会刊》创办。

1924年　周今觉(1879—1949年)购得东半球华邮绝品“红印花小字当壹元”四方连新票，他因此被誉为“邮王”。

1925年7月　“中华邮票会”在上海成立，会长周今觉。

1925年　福州基督教青年会集邮社团成立，正、副团长是阮景光，魏

叔彝。

1925年　班子华在北平东安市场开设“华通邮票社”。这是中国北方最早的邮票店。

1925年冬　在张包子俊等人倡议下，“新光邮票研究会”在杭州成立，会长柴冠群(1889—1945年)。

1925年　在华美国邮商薛多尔编写出版英文版《中国和中国商埠邮票目录》。

1926年1月6日　中华邮票会在上海举办“银杯竞赛邮展”，是中国第一次由华人集邮团体主办的邮展。

1926年1月　新光邮票研究会会刊《邮票新声》创刊。

1926年10月　《邮乘》杂志在纽约国际邮展上荣获“特别铜牌奖”，周今觉被英国皇家集邮学会吸收为会员，成为中国第一位获以上殊荣者。在这次邮展上，美国人施塔以华邮展品获得镀金奖牌。

1926年10月　辽宁海城蓑郎俱乐部成立，出版邮刊《邮趣》，主编宋尧阶。

1926年　在施秉章倡议下，“北平邮票交换会”成立，会长王翰祥。

1928年5月1日　重庆青年会举办了邮票展览。

1929年9月1日　“大同邮票社”在安徽芜湖成立，发起人谢慎修、林祖光、陈建章。

1930年5—6月间　赣西南赤色邮政发行了第一套解放区邮票。

1931年初　美国华邮收藏家施塔(1870—1948年)应周今觉之邀，携西半球最罕贵华邮孤品“大龙阔边五分银”黄色带四边纸全张新票赴沪，请中国集邮家观赏。施塔因此票与周今觉并称集邮界东西两大邮王。

1931年3月　在天津中山公园举办了“世界邮票展览”，这是华北地区首次邮展活动。

1933年　“香港集邮学会”成立，会员来自各国，会刊是英文版。

1933年9月1日　“大同邮票会”在安徽芜湖成立。1935年5月1

日，该会创办《邮话月刊》。

1934年9月1日　国民政府交通部决定建立邮票特销课，负责向国内外集邮者出售集邮邮票。不久，北平、上海等城市邮局设立了集邮组（处）。

1935年5月　“甲戌邮票会”在河南郑州成立，第一届会长王聘彦（1900—1946年），后任会长赵善长（1903—1989年）。

1935年8月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邮展上，《新光邮票杂志》、《甲戌邮刊》荣获奖状，并加入“万国邮学刊物联盟会”。

1936年　由陈复祥（1902—1970年）发起，“中国邮商公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邮商组织。

1937年6月5日　甲戌邮票会在河南开封青年会举办首届邮展。

1939年7月　《甲戌邮刊》第6卷6、7期合刊发表《记晋察冀边区邮票》一文，并附邮票图案，这是有关解放区邮票情况最早的公开报道。

1940年1月7日　“天津邮票会”成立，会长雷润生（1891—1963年）。

1940年5月5日　新光邮票研究会为纪念邮票诞生100周年，印制了以黑便士邮票为主图的纪念张。这是中国最早的纪念张。

1941年7月　“新竹邮票会”在贵阳成立，负责人许庆民，出版会刊《金竹邮刊》。

1941年11月3日　新光邮票研究会在上海大新公司举办邮票展览。

1942年3月　《国粹邮刊》在上海创刊，主编陈志川（1916—1977年）。

1942年7月　“成都集邮会”成立，负责人吴昭孔，出版会刊《邮苑》。

1942年11月　蒋介石派宋美龄出访美国，宋将邮政总局所存一册全套中国各时期邮票专集作为礼品赠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这是中国首次将珍贵华邮做为国礼馈赠外国元首。

1943年春　“金城邮票会”在兰州成立，理事长陈明达，出版会刊《金

城邮刊》。

1943年7月　“重庆市邮票研究会”成立，理事长郑汝纯（1904—1980年），出版会刊《陪都邮声》。

1944年　在葡萄牙里斯本国际邮展上，姜治方（1907—1980年）的中国“大龙”、“小龙”邮票和实寄封邮集获得镀金奖牌。姜是在国际邮展获金奖的第一个中国人。

1946年初　中华邮政总局陆续在全国部分城市开设集邮组（台），出售集邮邮票。

1946年1月　《近代邮刊》在上海创刊，主编钟笑炉（1903—1976年）。

1946年1月　东北邮票会会刊《集邮先声》创刊，主编丁少田。

1946年1月27日　香港第一个华人集邮团体“中国邮学会”成立，理事长萧作斌，会刊《邮光》。

1946年2月3日　四川“陪都邮票会”在重庆举办“陪都邮展”，其中展出有部分解放区邮票。

1946年4月30日　参加中美三方“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首席代表叶剑英，致信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邓小平，请协助为美军集邮者收集解放区邮票。

1947年6月15日　“广州市邮票研究会”成立，理事长林萍湘，出版会刊《广州邮刊》。

1947年9月7日　“首都集邮学会”在南京成立，理事长张枕鹤，出版会刊《首都邮刊》。

1947年11月中旬　新光邮票研究会举办了“第一届邮人旅行年”，组织上海、无锡、杭州会员及家属作杭州西湖三日游。

1948年1月24日至25日　香港中国邮学会举办了首届邮票展览。

1948年3月20日　为纪念“海关大龙”邮票发行70周年，中华邮政总局在南京社会服务处举办邮票展览，并宣布把每年的这一天作为邮政纪念日。这是中国首次由政府主办邮展，并首次为举办邮展发行纪念邮票，亦是中国首次发行“票中票”和无齿邮

票。

1948年5月19日至25日　中华邮政总局在新光邮会协助下，将南京邮展内容扩充后移至上海大新公司展出。这是中国首次由政府和集邮团体合作举办大型邮展。

1948年6月6日　“北平邮票会”成立，理事长郑汝纯，出版会刊《北平邮刊》，并首次在市广播电台举办系列集邮讲座。

1949年10月8日　华北邮电总局发行新中国第一套邮票，首创编印邮票志号。

1949年11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正式成立。

1950年2月26日　上海俄侨的“中华俄国邮票会”为纪念该会成立15周年，在沪举办邮票展览。

1950年4月　香港中国邮学会举办儿童节征文比赛，题目是《我为什么喜欢集邮》。

1950年4月15日　天津邮学月刊社出版《天津邮学月刊》，编辑杨耀增。

1950年6月26日　台湾当局发行第一套在台湾印制的新台币“郑成功像”邮票。

1950年7月　北京东方集邮研究社出版《东方邮刊》，主编吴嘉祥。

1950年11月　厦门陈天晨为配合当地复华小学校庆，在该校举办中苏邮票展览。

1951年夏　吴凤岗与上海50余位集邮家座谈，倡议筹组全国性集邮组织。

1951年9月25日　《集邮月刊》刊登钟笑炉起草的《为新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全国性集邮团体告全国邮友》。

1951年10月　由黎震寰(1901—1990年)编著的《中国人民邮票图鉴》在香港出版。这是第一部系统介绍新中国邮票的工具书。

1952年初　中国国际书店开始从苏联国际图书公司进口苏联邮票。

1952年6月　澳门新闻出版社发行的《集邮新闻(澳)》创刊。

1952年11月22日　为配合全国“中苏友好月”，贵州省和贵阳市邮

电局在贵阳举办“中苏邮票展览会”。

1952年底　全国各类集邮刊物全部停刊。

1953年8月9日　台湾“中国集邮协会”在台北成立。

1953年8月24日　邮电部发行“军人贴用”邮票，后又决定停止发行。这是新中国首次发行军用邮票。

1953年10月1日　人民邮电出版社成立。

1954年6月　台湾中国集邮协会会刊《中国邮刊》创刊，主编朱志平。

1955年1月10日　中国集邮公司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规模的集邮服务公司。邮电部决定同日将1949—1952年发行的24套纪、特邮票重新制版印刷发行。这是新中国唯一的一次再版发行纪、特邮票。

1955年1月　《集邮》杂志创刊。第2期发行量达5万份。

1955年7月　上海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在暑假举办的夏令营活动中，开设了集邮俱乐部。

1955年9月10日　邮电部选送新中国邮票和《集邮》杂志参加在捷克举办的布拉格国际邮展。

1955年10月23日　中国集邮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沪成立。

1955年底　广东顺德县勒流区成立“新风集邮小组”。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农村集邮组织。

1956年5月13日　北京大学集邮工作组和中国集邮公司联合在该校举办邮展。

1956年7月　马任全(1908—1988年)向上海市博物馆捐献邮票6166枚，其中包括珍贵的“红印花小字当壹元”旧票。

1956年7月1日　邮电部邮票发行局成立。

1956年7月15日　广西南宁市集邮小组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市级集邮组织。

1956年8月26日　“高雄市邮学会”在台湾成立，成为台湾第二大集邮组织。

1956年　王安国、吴凤岗为筹备建立全国集邮协会，走访北京集邮界人士。

1956年底　政府对工商业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全国各地的私人邮票商社绝大多数停业。

1957年7月28日　中国集邮公司组织京沪集邮家的7部邮集和北京4部少年邮集参加莫斯科国际邮票展览，10部获奖。其中姜治方的《中国早期实寄封集》邮集获金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集邮者首次在国际上获得荣誉。

1957年8月　《集邮》杂志编辑部和中国集邮公司邀请日本集邮家水原明窗访华。

1957年11月2日至7日　为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在北京举办苏联图片展览，其中有苏联邮票展出。朱德副主席、陈毅副总理等出席参观。

1958年1月　由台湾邮政总局编辑的《今日邮政》创刊，内容为邮政及集邮兼顾。

1958年5月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陈印白编译的《外国邮票地名译文手册》。

1958年8月1日　上海集邮公司和上海青年宫联合举办“中国革命的道路邮票展览”。9月20日，又举办“台湾是中国的领土邮票展览”。

1958年11月　天津白金林的《俄罗斯和苏联地方邮政机关发行的邮票》邮集，在罗马尼亚国际邮展上获得铜奖。

1959年1月　《集邮》杂志发表作家老舍题词：“集邮长知识，嗜爱颇高尚，切莫去居奇，赚钱代欣赏。”

1959年2月7日　包头市工会和邮电局联合举办“东风压倒西风邮票展览会”。

1959年2月8日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举办“中国革命邮票展览”。这是中国首次大型解放区邮票展览。

1959年9月25日　由捷克援建的北京邮票厂建成投产。

1960年8月至1961年6月　《集邮》杂志停刊。

1960年9月　无锡市崇安区工人俱乐部集邮小组恢复油印刊物《邮友信箱》，主编孙君毅(1902—1983年)。

1961年7月　《集邮》恢复出刊。

1961年10月1日　中国集邮公司天津分公司开业。

1962年1月21日　中国集邮公司哈尔滨分公司举办集邮展览。

1962年8月1日　中国集邮公司广州分公司成立。

1963年8月9日　台湾将每年这一天(台湾中国集邮协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日)定为集邮节。

1963年10月1日　广州市工人文化宫业余集邮小组成立，同时举办"伟大的祖国邮票展览"。

1963年11月1日　中国集邮公司沈阳分公司开业。

1965年2月2日　广州集邮分公司和广东省博物馆联合举办邮票展览。

1965年2月　香港尖沙咀成立"尖沙咀集邮中心"，主任委员刘焕民，出版《尖沙咀集邮中心会刊》。

1965年10月1日　广州市工人文化宫集邮小组举办"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邮票展览"。这是"文革"前国内举办的最后一次邮展。

1965年10月　无锡《邮友信箱》停刊。

1966年5月开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集邮活动在全国受到批判，大量集邮家遭受迫害，集邮品被抄被毁，邮电部被军管。

1966年6月　《集邮》从第6期以后被迫停刊。

1966年8月　中国集邮公司停业。

1966年　台湾新光邮钞杂志社出版的《新光邮钞》创刊，其发行量为台湾民间邮刊之冠。

1967年4月20日　邮电部发行"毛主席万岁(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邮票，从此开始取消了邮票上志号。

1968年2月22日　邮电部军管会发出邮电部(68)军管字第21号

通知，内称“集邮业务经中央文革、国务院 2 月 22 日批准，自 1969 年起停止办理。”

1968 年底　邮电部几个直属单位在北京中山公园联合举办以批判建国十七年邮票上的“封、资、修黑货”为主要内容的邮票展览。

1970 年 8 月 1 日　邮电部发行“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邮票。从这套邮票开始，在邮票上印制编号。

1971 年起　台湾邮政当局组织“集邮研习会”，利用每年寒暑假招收学校青少年集邮者，进行集邮知识讲习活动。

1972 年 7 月 1 日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邮票出口公司成立。

1972 年 8 月 9 日　台湾发行“集邮节”纪念邮票。

1972 年 9 月 2 日　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发行“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邮票首日封（仅对外供应），由此开始陆续发行了一些首日白封。

1972 年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25 日　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在广州第 32 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上举办新中国邮票展览。以后历届“广交会”上，该公司都举办对外邮票展销。

1972 年　西安铁路局的韦殿才、居洽群暗地编辑油印了一份《1967—1972 年邮票目录》，秘密分送各地邮友。这是国内第一本“文革”邮票目录。

1973 年 1 月 1 日　交通部邮票发行局成立，负责邮票设计、发行、供应、出口管理。北京邮票厂设置的邮票设计、发行机构同时撤消。

1973 年 6 月　恢复成立邮电部，邮票发行局归邮电部领导。

1974 年 1 月 1 日　邮电部发行 T·1“体操运动”特种邮票，从此开始恢复发行以“J”、“T”为字头志号的特种和纪念邮票。

1974 年 1 月　邮电部将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并入邮电部邮票发行局。此时，国内集邮业务仍未恢复。

1975 年 1 月　香港邮政署成立集邮组，并在各邮局设立集邮邮箱。

1976 年 10 月　“文革”宣告结束。

1977年　由孙君毅发起，汇集编印了几十位老集邮家抒发“文革”劫后余生欣喜心情的诗作《丁已邮人唱和集》。

1978年1月　邮电部向国务院递交报告，提出扩大邮票题材范围，扩大邮票出口，恢复在国内开办集邮业务，恢复《集邮》杂志。报告很快得到国务院批准。

1978年1月27日　《光明日报》在“文物考古”专栏发表了邮票发行局资料室文章《湘赣边区的邮政》，这是10多年内未见报端的集邮文章。

1978年6月　邮电部发出《关于恢复国内集邮业务问题的通知》。

1978年7月1日　邮电部决定将中国邮票出口公司改为“中国邮票公司”。

1979年1月　邮电部决定成立“中国邮票总公司”，它由邮票发行局、中国邮票公司和北京邮票厂合并而成。

1979年2月16日　邮电部在湖南大学举行授奖仪式，嘉奖姜治方1966年捐献全部邮票和邮史文物的爱国之举。

1979年5月1日　江苏常州曹源福和上海屠松鉴在常州东风区文化馆举办“中日邮票展览”。这是“文革”后国内首次举办的邮展活动。

1979年8月19日　“北京鼓楼集邮研究会”成立。这是“文革”后全国第一个民间集邮组织，发起人朱祖威、成志伟。

1979年8月25日至28日　中国参加“里乔内第31届国际邮票博览会”。这是“文革”后中国首次参加国际邮展。邮电部为此发行纪念邮票小型张1枚。此小型张是用“万里长城·山海关”特种邮票小型张加字改制。

1979年9月27日　北京鼓楼集邮研究会编印的《鼓楼集邮专刊》创刊。这是“文革”后最早出现的邮刊。

1979年11月10日至25日　中国邮票总公司和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联合在香港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展览”。这是“文革”后首次由官方在港举办的大型邮展活动。为此，邮电部发行加字

改制的纪念邮票小型张1枚。

1979年起　邮票发行局对即将发行的新邮票开始预报。

1980年1月　《集邮》杂志停顿14年后复刊。

1980年1月10日　“上海市集邮协会”成立。

1980年1月　香港中英文并列邮刊《邮票世界》创刊，主编朱桐。

1980年3月20日　邮电部发行T·49“邮政运输”特种邮票。这是中国首次发行的磷光邮票。

1980年3月20日　“广州市集邮协会”成立。

1980年3月23日至30日　中国邮票总公司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邮票展览，展出新中国成立30年来发行的各类邮票。这是“文革”后国内首次由官方主办的邮展。

1980年3至4月　《集邮》杂志举办新中国30年最佳邮票评选活动。

1980年7月1日　在北京举行新中国最佳邮票授奖大会。

1980年9月15日　广州市集邮协会主办的《集邮家》报创刊。这是全国创办最早的集邮报纸。

1980年9月20日　邮电部发行SB(1)1980“童话——咕咚”特种邮票小本票。这是新中国首次发行的小本票。

1980年起　《集邮》每期刊登新邮预报，并公布邮票发行量。

1980年12月　“澳门集邮协会”成立。

1981年4月　《上海市集邮协会会刊》创刊(1982年刊名改为《上海集邮》)。

1981年5月起　全国各地集邮服务机构陆续开办集邮者新邮票预订业务，部分集邮机构还开办了函购预订邮票业务。

1981年9月　共青团上海市委、中国福利会、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共同筹组成立了“上海市青少年集邮协会”。这是全国最早的市级青少年集邮组织。

1981年9月　台湾台中市中兴邮学会会刊《邮林》创刊。

1981年10月22日　日本邮趣协会理事长水原明窗中国邮票藏品

展览在北京美术馆开幕。邮品11月3日至9日移至上海展出。这是建国后首次在华举办的外国集邮家个人邮展。

1981年12月20日　邮电部首次发行我国第一套贺年邮资明信片。

1982年1月28日　“广东省集邮协会”成立。这是中国成立最早的省级集邮组织。

1982年1月30日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集邮组织。

1982年1月　《集邮》成为全国集邮联会刊。《中国集邮》(英文)创刊。

1982年1月　在长沙市烈士公园举办了“统一祖国，振兴中华邮展”。这是大陆首次举办此类邮展。

1982年4月　邮电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建立邮票公司，负责领导和推动各地集邮工作。

1982年7月　北京市集邮协会主办的《北京集邮》创刊(1987年更名为《集邮博览》)。

1982年8月25日至29日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并选举产生领导机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朱学范担任名誉会长，会长成安玉，副会长宋兴民、马任全、张包子俊，秘书长李洪义。

1982年8月26日　邮电部发行JF·1“纳米比亚日”纪念邮资封。这是我国发行的首套纪念邮资封。

1982年8月底　中国邮票总公司召开第一次全国邮票公司经理会议。会议明确集邮业务的经营方针是：“为集邮者服务、对集邮者负责，为两个文明建设多作贡献。”

1982年11月　《集邮通讯》创刊。它是全国集邮联内部发行的工作性、指导性会刊。

1982年12月　上海市邮电管理局、上海市邮票公司在上海举办“邮票和集邮知识干训班”。中国邮票总公司及9省市有关领导、业务人员参加。这是我国首次举办全国性集邮干部培训班。

1983年2月18日　全国集邮联学术委员会在广州市成立。

1983年6月25日　中国集邮出版社在北京正式成立。

1983年6月　《中国集邮》(英文)从1983年第3期起增出北美版，由美国万国首日封公司印刷发行。

1983年7月27日　国际集邮联合会接纳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为该会正式成员。

1983年8月12日　亚洲集邮联合会接纳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为该会正式会员。

1983年10月　《少年集邮》创刊。

1983年11月　全国集邮联学术性会刊《集邮研究》创刊(1985年底停刊)。

1983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　全国集邮联与邮电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在北京举办“中华全国集邮展览”。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全国性邮展。

1984年初　上海市邮票公司设立邮票信托部，办理收购寄售邮票业务。

1984年2月16日　邮电部发行T·92“儿童”特种附捐邮票。这是新中国首次发行的附捐邮票。

1984年5月15日至7月16日　“西北五省区集邮联展”依次在兰州、银川、西宁、西安、乌鲁木齐展出。

1984年6月18日　黑龙江省直离休干部集邮协会成立。这是国内最早的老年集邮协会。

1984年6月22日　邮电部、文化部、教育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集邮联联合发出《关于加强集邮工作领导和管理的联合通知》。

1984年7月20日至31日　全国集邮联和共青团中央等联合在青岛举办“全国第一届青少年集邮夏令营”。

1984年7月28日至8月18日　中国第一届体育邮票展览会在北京举行。

1984年8月1日至19日　邮电部发行JP·1“中国在第23届奥运会获金质奖章”纪念邮资明信片。这是我国首次发行的纪念邮资明信片。

1984年8月20日　邮电部第一次发行彩色风景邮资明信片YP·1“桂林山水”。

1984年9月　《甲子邮刊》在长沙创刊。这是大陆第一份以沟通海峡两岸集邮交流为宗旨的民间邮刊。

1984年10月　台湾邮政博物馆新馆在台北市建成开馆。

1984年10月　日本集邮家古庄昭夫在汉城世界邮展上以《中国解放区邮票集》获得金奖加特别奖。这是中国解放区邮票首次在世界邮展上荣获金奖。

1985年1月　《集邮》杂志为纪念黄兴诞生110周年，举办“辛亥革命集邮知识竞赛”活动。

1985年2月22日　广州《集邮家》报主办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义捐拍卖集邮品活动。

1985年4月8日　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中瑞首航纪念封”，从此开始发行系列编号纪念封。

1985年5月24日　邮电部发行T·106“熊猫”特种邮票和小型张，从这套邮票销售收入中拿出10万元捐赠给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1985年7月1日　邮电部根据政企分开的原则，将邮票发行局与邮票总公司分开，中国邮票总公司改名为“中国集邮总公司”。

1985年7月　邮电部正式将风景日戳列为邮政日戳的一种。

1985年7月　中国邮票博物馆在北京成立。

1985年10月　梁鸿贵被国际集邮联批准为国际邮展评审员，成为中国第一位国际评审员。

1985年10月13日至20日　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全国集邮联在北京举办“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邮票展览”。这是我国首次举办全国性的解放区邮票展览。

1985年10月15日　邮电部成立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

1985年10月　台湾聘请海内外“红印花”研究专家编辑的《红印花邮票》专集出版。

1986年1月10日　上海市集邮协会决定自该年起，将每年的1月10日（该邮协成立纪念日）定为上海市集邮活动日。

1986年4月28日至5月4日　墨西哥邮展在北京举行。5月9日至15日移至上海展出，5月20日至26日移至广州展出。中国邮票博物馆开始发行我国赴外或外国来华邮展系列纪念封。

1986年4月29日　“中国体育集邮协会”在北京成立，会长郎平。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行业集邮组织。

1986年6月16日　民间“原地封研究会”在上海成立。

1986年6月　北京市集邮协会编辑的《实用集邮辞典》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的集邮工具书。

1986年8月28日至9月7日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邮展上，天津游乃器的《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实寄封选粹》邮集获镀金奖牌。这是“文革”后中国首次夺得国际邮展金奖。

1986年10月17日至21日　全国集邮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

1986年11月13日　经邮电部批准，集邮书刊编委会在北京成立。

1986年　厦门大学何大仁教授率先在该校开设“集邮学基础”选修课程。

1986年　台湾802邮友俱乐部出版《谭邮》（为纪念已故集邮家陈志川专辑），这在中国尚属首次。

1986年　《澳门集邮协会会刊》创刊。

1987年1月1日　广东省开始对交寄的挂号、印刷品邮件收取附加费。此后，许多省、市、自治区仿效。这为邮政史集邮增加了新内容。

1987年1月9日　上海市集邮协会主办邮品拍卖会。这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首次的邮品拍卖活动。

1987年3月　北京宣武区老龄大学开设集邮专业班。

1987年5月　《中国集邮年鉴(1986)》由中国集邮出版社出版。

1987年5月至10月　由全国集邮联等7单位联合举办“邮票上的科学文化知识竞赛”。竞赛分为书面预赛和电视决赛两个阶段。

1987年7月20日至29日，“中华全国青少年专题邮展”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首次举办全国性的青少年集邮展览。

1987年11月22日　“粤、港、澳集邮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1987年11月25日至27日　“全国集邮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

1988年2月17日　“海峡两岸民间集邮交流会”在美国纽约成立，黎泽重任会长。

1988年3月　《集邮研究》复刊。

1988年3月8日至13日　西安市集邮协会举办“中国五位女邮票设计家作品展览”。这是中国首次为女邮票设计家举办的展览。

1988年4月5日　上海市中小学集邮指导老师联谊会成立。

1988年4月18日　台湾开始实施《对大陆通信办法》，两岸开始通过香港间接通信。中断40年的海峡两岸集邮交往开始逐渐恢复。

1988年4月22日　亚洲集邮联合会执委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开幕。这是首次在中国举行的国际集邮组织会议。

1988年6月　“钟笑炉集邮基金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以著名集邮家名字命名的集邮基金会。

1988年6月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邮票目录》由中国集邮出版社出版，填补了我国邮票史工具书的一项空白。

1988年7月2日至4日　全国集邮联等单位联合组织了“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来自美、日、港、澳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50位集邮人士应邀参加。

1988年9月5日　国际集邮联批准中国台北集邮协会加入国际集邮联。

1988年10月15日至29日　全国集邮联在长沙举办第一期邮展评审员培训班。经考核，评定出第一批国家级和省级邮展评审员。

1988年10月20日　由上海市集邮协会和上海电视台联合举办的“'88上海电视节集邮展览”开幕。这是上海首次举办的大型国际邮展。

1988年11月13日至14日　台湾大学集邮笔友社在校内举办“大陆邮票特展”。这是大陆邮票首次在台湾公开展出。

1988年12月11日　北京东城区集邮协会主办的首届东城民间邮品拍卖大会，成交额达26万元，创国内邮品拍卖会最高纪录。

1988年12月　由《集邮》杂志、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集邮协会共同举办的“全国集邮摄影大赛”拉开序幕。

1988年　《集邮》、《集邮博览》杂志和中国集邮总公司联合举办1983—1987年最佳首日封评选。

1989年2月10日　邮电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税务局、海关总署发布《关于允许个体工商户经营邮票和集邮品的联合通知》。

1989年4月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维吾尔文版《集邮知识》，由依米提·苏皮编著。

1989年5月11日　山东省邮票博物馆正式成立。这是国内首家省级邮票博物馆。

1989年6月22日至24日　全国集邮联等在江西九江联合召开区票认定标准研讨会。会议确认，1930年开始发行解放区邮票。

1989年7月15日　中国专利局将“卡式首日封”专利权授予其发明人陆培恩。这是中国首次授予的有关集邮品的专利权。

1989年7月　全国集邮联与首都新闻出版界集邮联谊会联合举办“全国最佳集邮宣传报道文章评选”活动。

1989年9月1日　刘广实被国际集邮联批准为国际邮展评审员。

1989年10月12日至21日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全国集邮联在北京举办了“1989年中华全国集邮展览”。这是

中国首次举办竞赛性的全国邮展。邮电部为举办全国性邮展筹集经费，首次专门发行特殊邮品——面值10元的小型张。台湾集邮界首次送邮集参展并派代表观展。

1989年10月20日至26日　“全国石油职工首届集邮展览”在河南濮阳中原油田举行，同时成立“中国石油集邮协会”。这是第一个全国性产业集邮协会。

1989年11月13日至15日　台湾大学集邮笔友社举办“首次海峡两岸邮票选美”。

1989年12月2日　北京市集邮协会授于杜庆云等7位集邮家以会员会士称号，这在中国属首次。

1989年12月　中国集邮出版社撤消。

1990年1月6日至8日　湖南大学举办“海峡两岸1989年度最佳邮票评选”活动。

1990年3月3日　中国和加拿大同时发行同图案2枚一套的“诺尔曼·白求恩诞生100周年”纪念邮票。这是中国首次与外国合作发行邮票。

1990年4月5日　山西省集邮协会主办的《集邮报》在山西运城试刊，该报发行周期属国内最短(旬报)。

1990年5月3日至13日　在英国伦敦世界邮展上，沈曾华的《华东解放区邮票》邮集获得金奖。这是国内集邮家首次在国际集邮联赞助的世界邮展中获得的高奖。台湾选送的3部邮集也全部获得金奖，其中，张敏生的《1897年加盖邮票》获金奖加特别奖。

1990年5月　《集邮》杂志、经济时报社、香港中国经济出版社联合举办“’90大陆香港集邮知识联谊赛”。

1990年6月10日　北京首家涉外集邮中心——“燕翔集邮中心”开业。

1990年6月　全国集邮联翻译编辑的《国际集邮联合会集邮展览与评审各项规则》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1990年6月　台湾潘安生(晏星)编著的《大陆邮票寻幽》由台湾台

北业强出版社出版。这是台湾首次出版专门介绍大陆邮票的图书。

1990年8月　邮电部、文化部、全国集邮联等单位联合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邮票发行60周年纪念”活动。

1990年9月21日至10月3日　“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国际体育集邮展览”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首次举办的国际邮展。

1990年10月25日至29日　北京集邮协会在北京举办“海峡两岸集邮家首届邮展。”

1990年11月26日至29日　全国集邮联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理事会。会议强调集邮工作要突出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性质这两个特点，号召开展集邮文化理论的研究。

1990年　台湾首次出版集邮年鉴——《集邮汇报》。

1991年4月4日　全国邮展委员会在郑州成立。

1991年4月　北京市集邮协会与西城区文化馆合作举办“’91集邮知识函授班”。

1991年5月9日　全国集邮联集邮名词审定委员会在福州市成立。

1991年6月28日至7月8日　由全国集邮联主办、上海市邮电管理局和上海市集邮协会承办的“光辉的七十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全国集邮展览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这是首次在北京以外地区举办综合性全国邮展。

1991年7月20日　台湾发行“国内信函基本邮资”、“限时信函基本邮资”两种无面值邮票。

1991年8月26日至9月1日　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甘肃省总工会承办的“全国职工专题集邮展览”在兰州甘肃省博物馆举行。这是中国工会史上首次全国职工邮展。

1991年9月14日　邮电部发行T·168“赈灾”特种邮票，销售收入1200万元全部捐献救灾。这是新中国首次发行的赈灾邮票。

1991年9月19日　全国集邮联青少年工作委员会在大庆市成立。

1991年10月19日　全国集邮联举办的全国邮展征集员培训班在山东威海市邮电培训中心开课。

1991年11月16日至24日　在东京世界邮展上《中国解放区邮票史》(苏区卷)获得文献类镀金奖。这是中国集邮文献首次荣获世界邮展金奖。

1991年12月1日至1992年2月3日　邮电部发行中国邮政贺年(有奖)明信片。这是中国首次发行的有奖邮资明信片。

1991年12月18日　全国集邮联集邮名词审定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公告,公布第一批集邮名词80条词目,广泛征求意见。

1991年12月20日　《集邮博览》杂志社读者服务部在北京成立。这是国内首家集邮书刊专营服务部。

1991年12月至1992年2月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华北制药厂、江苏丹阳哈利食品厂联合举办了"海峡两岸集邮知识有奖征答竞赛"活动。

1991年底　全国集邮联主办的《集邮研究》和《集邮通讯》停刊,同时开始筹备创办《中国集邮报》。

后　记

1987年，我联想曾经阅读过的大量集邮书刊，产生了一种想法：目前国内集邮研究和集邮书刊的重点，大都偏重于邮政史、邮票史及集邮知识等方面，反映集邮历史的文章显得比较零散，不能给人一个清晰的整体印象。我想，在中国集邮史这个研究领域应该有人下点功夫，写出一部较全面的书来。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历史是一面镜子。集邮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与社会——成千上万的集邮者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从事的各种各样的集邮活动。通过这种研究，可以从几代集邮者们经受的成功和挫折中，总结出集邮文化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时代特点和客观规律；引起人们对历史、对社会的理解与反思，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鼓舞今天和后来的集邮者继往开来，去创造新的集邮历史。这是一项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学术研究。

早在40年代中期，一些有时代责任感的集邮家，曾在邮刊上发表文章呼吁过重视和整理有关中国集邮史的资料，并把这项工作当成是“中国邮学者的历史任务”。

我读过这些文章后，我的心被打动了，决心完成老集邮家们未竟的事业。我从1987年底开始动手收集资料，进行中国集邮史的编写。

今天回想，我当初设想得比较简单，不仅把征途想得简单，而且把目标也想得简单。当把初步收集来的材料一整理，我不由大吃一惊：中国集邮事业的发展竟如此多姿多彩，曲折艰难，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动荡坎坷，悲欢离合，真是出人预料。谁说平凡中没有绚烂，没有悲壮！中国几代集邮家们忘我追求奉献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我开始认识到：中国集邮史绝不仅是一般的文化娱乐发展史，它是一部厚重的民族集邮文化的创业史、奋斗史，显示出十足的中国特

色，中国气概，真是大有文章可作。一种责任感使我清醒地意识到：要反映出中国百年来集邮文化发展的历史，任务艰巨，非拿出拼搏精神不可。

中国是一个史学著作汗牛充栋的文明古国，几千年中无数史学前辈开创了“秉笔直书”、反对曲笔的优良史学传统。写历史贵在尊重历史，既不能讲空话，又不能讲套话，更不能讲假话。应该“求实”、“存真”，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出能够昭信于今人和后人的历史来。

得时名易，得史名难。史书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否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5年来五易其稿，我的体会更加深刻。百年史话乃百年大计，必须严肃认真，精益求精。在编写过程中，困难自然不少，除了自己学识水平所限外，我感到最大的困难有三方面：

一、收集资料难。厚积薄发乃天下做学问的基本道理。集邮在中国问世100多年了，其间名家辈出，述著如林，轶闻稗史不胜枚举，要从繁杂的事件和散见的书刊中理出个头绪的确不易。收集素材成了头号难题，一般的图书馆内根本找不到这类资料，四处告借也苦于无门。好在我父亲的藏书藏邮非常丰富，大部分资料是从他那里挖掘出来的。陕西的集邮前辈们也帮我收集资料。此外，我还购买复印了一些早期邮刊。我先后花了1年多时间，反复阅读和摘抄，做了几千张笔记卡片，真是书山有路，史海钩沉。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学到了大量的知识。

二、设计结构难。一部中国集邮史，时间跨越百载，涉及的人物、活动、团体、书刊数以百计，如何编排最合理？重要的人和事该如何评述？怎样落笔才能使它们显得不重复枯燥？艺无定法。经过反复思索，多次变更，采取了以历史发展顺序为纵线，以重要的事件和人物为横线，有主有次，纵横交错的方法。同时运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力求达到史论结合的目的。这是我的初次尝试，成功与否有待行家们指点。

三、挤出时间难。我是一名工程师，人到中年万事忙，苦于没有足够的时间从事写作。几年来收集、阅读、整理资料和撰稿、改稿、誊抄，

主要靠晚上和假日。多少个不眠之夜，大地在窗外睡着了，我仍在灯下苦思冥想，寻找佳句；在卷帙浩繁的史籍华章中追根索本，推敲史实。寒来暑往，年复一年，时常搞到更深夜半，脑子兴奋了，躺下又失眠。过去只说读书苦，如今方知写书更苦。多亏我母亲帮助我修改抄写稿子，我妻子全担起了家务，并兼顾抄写，使我能够完成这项写作计划。

在这部书稿编撰中，我受到了许多集邮前辈的热情鼓励和精心指点。特别是90多高龄的集邮家张包子俊先生，当我向他求教一系列邮史难题时，他总是有求必应，详细说明，有时一封来信长达7页。更使我感动的是，张包先生不仅为我指点迷津，而且多次提出忠告，例如他说："我认为笔记要有真实性，但可以加进一些轻松笔调，使人如嚼橄榄，有回味，有真情。"他还告诫我："集邮史不可能一时写得很完全，(以前未有)只能留在以后补充。"

1988年3月，当我写完"史话"第一稿时，集邮家李容先生和《陕西集邮》主编李茵萍先生对该稿进行了认真审阅，提出大量具体的修改意见，使我坚定了把书稿改好的信心。1990年4至6月，在《集邮研究》杂志编辑部和陕西省集邮协会的关怀帮助下，我先后完成了"史话"第二稿和第三稿，并以《中国集邮百年史话》为题，在1990年第3期至1991年第4期《集邮研究》连载。商彻、严忠辉等同志为改稿付出了大量心血，使我非常感激。

1991年3月至4月，集邮家钟韵玉先生受张包子俊先生之托，对"史话"第四稿进行了审阅，逐章节、逐字句细细过目，提出大量极中肯切要的修改意见。钟先生是老报社编辑出身，对文字、史实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使我肃然起敬，获益匪浅。这两位德高望重的集邮前辈与我素不相识，却如此真诚相待、平易近人，教诲之恩我永生难忘。

人民邮电出版社集邮图书编辑部有关同志，对书稿的修改给予细心指导。与此同时，李容先生再次对第五稿提出大量重要意见，并为本书撰写了序言。

陕西集邮家叶增英、韦殿才先生热情地为我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早期邮刊资料。集邮家居洽群以及中国邮票博物馆徐灿先生为本书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回首一幕幕往事，这部书稿全赖这些可亲可敬的良师们热情支持和宝贵指导，否则本书绝不可能形成今天的规模。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本书参考引用了大量集邮书刊的珍贵资料和集邮家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全部参考资料目录，我在此对他们表达深深的谢意。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饮水思源，感慨万千。

我深知这样多的前辈和朋友如此鼎力扶植，是因为他们和我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让人民、让世界认识中国集邮事业和中国集邮者的历史业绩。我愿和集邮界的朋友们一道，坚持不懈地探索、耕耘，不断向这个目标迈进。

中国邮票史上的悬案不少，中国集邮史上的疑点更多，加上很多资料出自集邮者个人回忆，缺少史料印证，使得集邮史研究云遮雾障，如履薄冰。因此，本书中难免有失误，有待倾听更多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李毅民

1992 年 4 月于西安

果粉藏書

時光若水 歲月無

装帧设计：胡萍丽

ISBN 7-115-04958-0

9 787115 049582 >

ISBN7-115-04958-0/G・240
定价：14.00 元